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

江阴市周庄镇人民政府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抗日英雄

朱松寿



徐泉法 陆其明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日英雄朱松寿 / 徐泉法, 陆其明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12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1 辑)

ISBN 978-7-5496-0706-8

I. ①抗… II. ①徐…②陆… III. ①朱松寿(1900~1941)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440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一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特约编辑 / 曾云龙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1600 千

印 张 / 167

书 号 / ISBN 978-7-5496-0706-8

全套定价 / 260.00 元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龚振东

主 任：吴国忠

副 主 任：吴 广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周永良

编 委：吴国忠 卞 宏 吴 广 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周永良 张 明

目 录

MU LU

序篇 陆墓之谜	(1)
上篇 浪子之醒	(7)
第一节 在血淋淋的人头前	(9)
第二节 朱老太太的喜与忧	(16)
第三节 他砸开了县城监狱的大铁锁	(25)
第四节 慕义庄宣誓	(32)
中篇 双枪之勇	(41)
第一节 深夜的呐喊	(43)
第二节 不平静的家庭	(51)
第三节 虎入牢笼	(59)
第四节 江阴朱茅季庄密会	(70)
第五节 峭岐镇上的硝烟	(78)
第六节 爱情港湾里的波澜	(88)
第七节 当血腥镇压来临的时候	(98)
第八节 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	(107)
第九节 上海街头的拖板车车夫	(121)
下篇 抗敌之奇	(131)
第一节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伙夫	(133)
第二节 毗山大王庙的人影	(141)
第三节 在母亲的葬礼上	(150)
第四节 轻取敌枪	(162)

目 录

MU LU

第五节 抗日救亡剧团的年轻人	(171)
第六节 这步棋走错了	(183)
第七节 从县党部来了一位指导干事	(191)
第八节 三先生遇刺	(201)
第九节 颜家桥伏击战	(211)
第十节 郇墩兵变	(221)
第十一节 朱、袁九思街对阵	(235)
第十二节 三先生墓前的清算	(247)
第十三节 陈毅请朱司令上山	(253)
第十四节 袁亚承兵败祝塘镇	(259)
第十五节 项英给了他再度崛起的力量	(270)
第十六节 亭子间夫妇诀别	(280)
尾篇 毗山之松	(285)
附录:	(302)
把民抗壮大起来	包厚昌 (302)
永远的怀念——回忆我的丈夫朱松寿 杨绮云口述 朱远整理	(304)
朱松寿生平大事年表	徐泉法 (315)
后记	(320)

序 篇

陆墓之谜



1989年12月，新华社海军分社原副社长陆其明（左1），在江阴市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田柳（右2）陪同下，前往吴县陆墓镇调查朱松寿1941年5月遇害经过。左2是朱松寿烈士女儿朱远，左3是陆墓镇党委书记陈卫良，右1是当地群众须阿坤。

（徐泉法 摄）

苏州城北3公里处，有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狭窄的街道铺着一块块花岗石板，宽阔的河面上架着弯弯的石拱桥。据说，1000多年前，唐朝的宰相陆贽死后葬于此地，故名陆墓镇。名字虽不雅，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是苏州到常熟的必经之路，陆有公路，水有水道，汽车轮船，商贾旅客，给小镇倒带来了许多生机。

自从淞沪战役失败，苏南沦于敌手以后，苏州成了日军的盘踞要地，汪伪江苏省政府也选中了这座“天堂”，陆墓镇就在苏州的眼皮底下，一下子冷落起来了：街上行人稀少，生意萧条，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家家店门关闭，犹如一座墓地。

1941年5月初的一天，正当陆墓镇上乒乒乓乓关着店门的时候，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大汉跨过一座石拱桥，机灵地向四面瞥了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踏着临河的一条小街，向北走去。不一会儿，他轻轻地敲响了一家大门。过了很久，门才“吱呀”一声拉开了一条缝隙，露出一个脸蛋俊俏的女人。

“杨先生在家吗？”大汉压低声音问道。

“你是朱司令吧？”俊俏女人的眼睛盯着大汉偏长而黝黑的脸，门缝随之加大了许多，“进来坐坐吧，我家先生嘱咐过我，今天下午他在三千浜等你。”

大汉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杨家，走出陆墓镇，向东北方向的一个名叫三千浜的村子走去。

时值初夏，麦子已经抽穗，露出嫩生生纤细的脖子，高高的油菜枝头上爬满了青虫般肥胖的籽荚，红花草的顶部残留着一两片深红色的花瓣，似乎向春天依依惜别。

大汉无意欣赏江南春末夏初的景致，他的心沉甸甸的。自2月份以来，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陆墓镇找这位杨先生了。前两次，杨先生态度暧昧。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第三次上。

三千浜是一个只有3户农家的小村。村上有一棵数围粗、几丈高的大

朴树，正巧长在一家王姓地主的院子里，巨大的树荫把前后三进瓦房遮盖得阴沉沉的。

“朱司令，三国时期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只是去了3次。你这样看得起我，我杨某再推三阻四，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陆墓镇上的父老乡亲呢？一言为定，从今日起，我杨某所带100多条人枪，听从你的指挥，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抗击鬼子。”

这位姓杨的原是一个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单名忠，字筱南。他见到这位大汉，嘱咐王姓地主摆上酒菜，两人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边吃边谈。几杯酒下肚，就拍着胸脯把憋了许久的话倒了出来。

这位被称作朱司令的大汉，三次来找杨筱南，不就是为了这句话吗？他笑眯眯地站起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笑眯眯地说道：

“杨司令，自我3年前认识了你，就知道你是一位抗日英雄。虽然这中间走了一段弯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好，现在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趁着太阳还没有下山，我还要赶回苏州去。”

杨筱南起身送客。

朱司令大踏步地向陆墓镇走去。

突然，路边的麦地里传出一声细微的响动，朱司令警惕地站住，正要从腰间掏枪，杨筱南凑前一步说道：

“傍晚起风，请司令不要疑心。”

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尖啸着从麦地里飞出，穿透朱司令厚实的胸膛。朱司令痛苦地摇晃着高大伟岸的身躯，转身盯住杨筱南的眼睛，斥责道：

“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何苦用此小人之计？”

杨筱南不答。麦地里又飞出第二颗子弹，钻进了朱司令的腹部。顷刻间，他的青布长衫渗透出一块块湿漉漉的血迹。血，大滴大滴地掉到干涸的土地上。他终于站立不住，仰面跌倒在路边的麦田里。

他的嘴像浮到河面上的鱼一样张合着，发出游丝一般断断续续的声音。杨筱南凑近他的嘴边，只听见他的最后几句话：“我大荡未死，死在洋沟里，可叹可恨！杨司令，你成全了我的名节。”说罢就咽了气。

朱司令在陆墓遇刺的消息，传到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江南行署主任何克希，警卫一团政治部主任包厚昌，无不悲痛万分。

何克希叹息道：“我党培养一个军事干部多不容易呀。像朱司令这

样的军事人才尤其难得。可惜死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之手!”

包厚昌提议说:“我们要为朱司令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了解这个人。他1926年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领导过江阴的秋收起义,曾有‘江阴朱茅’之称。1928年他到过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谭震林沉重地点头,“嚓”的一声划亮火柴,点燃了一支美丽牌香烟,静静地倾听着两位干部对朱司令的评价,最后说道:

“要尽快地收集朱司令参加革命15年的资料,要让六师十八旅的每一个干部战士都知道他的英雄业绩。什么时候准备好,追悼会就什么时候召开!”

从师部到班排,从江南行署到乡村民主政权,凡是认识朱司令的人,这几天都在谈论着他的牺牲。一些传奇故事不胫而走。钦敬、赞叹、惋惜、悲伤,一种炽烈的悼念情绪像初夏的暖风在部队和乡镇弥漫开来。人们都盼着朱司令的追悼会早些召开,心中压抑的心绪可以在隆重、肃穆的大会上尽情地宣泄。

可是,突然传出一个消息:新四军六师师部取消了朱司令的追悼会。

我军一切认识和不认识朱司令的人,都感到迷惘和困惑。有一个曾在朱司令身边做过警卫排长叫余炳德的人,愤愤不平地要去追问谭师长“这是为什么”。人们都在私下猜疑:是朱司令死得不明不白呢,还是生前得罪了师部哪一位首长,死后受到排斥呢……

潜逃在苏州城里隐居多时的大财主陈祥安回到长寿镇,天天上饭馆酒店,美酒佳肴,谈笑风生。镇上的居民疑云顿起:陈祥安这一阵子遇上什么大喜事了?往日朱司令在家乡的时候,他连面都不敢露出一露,现在怎么突然神气起来了呢?

这一段时间,峭岐、后塍、周庄、云亭诸镇的国民党头面人物,都往酒店里坐。他们碰到一起,猜拳行令,挤眉弄眼,杯盘狼藉,烂醉如泥。

人们终于看出了一些眉目:这些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地主老爷这么高兴,莫非与朱司令的死有关系?说得更确切些,他们对朱司令死后的冷清,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快慰!

余炳德让人主动靠拢陈祥安,以刺探其中的奥秘。陈祥安笑而不答。禁不住再三催问,陈祥安才极其神秘地说道:“你们还蒙在鼓里呢?朱

司令到苏州投降日伪，到陆墓拉杨筱南下水。杨筱南岂是那样的人？把消息暗暗通了出去，朱司令被人杀了。虽说死得可怜，可汉奸国贼，不能不除。这也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嘛！”

啊，原来如此：六师师部取消追悼会，各镇地主弹冠相庆，虽然出发点不一样，可根子却都在朱司令的死因上。在人们受尽了鬼子伪军的百般蹂躏之后，提起汉奸国贼，无不切齿痛恨。既然朱司令走了这条极不光彩的路，那么，人们恨不得赶快把他从记忆中驱赶出去。

可是，澄锡虞地区的人们对此说产生了疑问：朱司令一生轰轰烈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这条叛国投敌道路的呢？又有什么人证物证呢？古时候县官审判犯人，没有人证物证也不轻易判罪呢！后来有人传出消息：六师师部正在调查朱司令的死因，没有结论之前，不允许横加猜疑。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默默祈祷：但愿新四军早早把朱司令的死因弄个水落石出，不要让陈祥安这伙人抓住了什么把柄。

想不到东路地区风云突变。1941年7月，日本鬼子集中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在苏常太（苏州、常熟、太仓）“清乡”，六师师长谭震林调兵遣将，动员所属十八旅及警卫一、二团投入反“清乡”斗争，保卫东路抗日根据地。只是由于日伪兵力过于强大，谭震林先是放弃了苏常太，接着又率主力退出澄锡虞，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也随之撤销。澄锡虞地区红红火火的抗日形势，一下子冷清下来。几个月后，当人们回过神来再次提到朱司令的时候，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十八旅已经往苏中江高宝（江都、高邮、宝应）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去了，人们的心凉了半截。

朱司令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澄锡虞地区人民的心中消失了吗？

朱司令的死成了一个谜。这个谜，牵动着一个人的毁誉，一家人的命运，一个区域人民的深深的牵挂。何时才能解开这个谜呢？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上 篇

浪子之醒



朱松寿家住江阴长寿朱家巷，参加革命前，有一幢三进两院堂的农家庄园，共有 20 多间房屋。1928 年 6 月，长寿土豪劣绅陈祥安带领自卫团将朱家大院大部拆毁，只留下三间房子给朱松寿母亲和前妻刘三妹母女居住。图为朱松寿故居。

(徐泉法 2012 年 12 月 18 日 摄)

第一节 在血淋淋的人头前

这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凛冽的北风像一条条无形的鞭子，刮到人们的脸上，辣生生地疼。初升的太阳像刚刚生过孩子的产妇的脸，苍白苍白的，低低地在遥远的铅灰色的天际徘徊。疏疏落落的行人低头缩脖地在狭窄的大街上走着，经过县署门口那堵灰白色的照壁时，无不惶恐地低下头去，害怕见到那颗刚刚脱离躯体的年轻人的头颅。

太阳渐渐升高，江苏省江阴县署门前那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依旧是空荡荡的，人们如果没有要事，都绕道而行了。照壁附近，更是没有一个人影。直到快要吃中饭时分，才来了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一袭青布长衫裹着他魁伟壮实的躯体，偏长而黑苍苍的脸上直冒着热气，两颗乌黑的闪闪生光的眸子，深藏在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他是从本县长寿乡专程来看人头的。因为长得特别高大，他用不到像一般人那样需要抬头才能看到，只要有勇气走上前去，那颗人头就在他的眼前了。



江苏农运先驱周水平烈士
(吴惠玉提供)

县署照壁的南侧挂着一个小木笼，笼里放着一只陶器小盆，盆里撒上厚厚的一层石灰，那颗人头就平摆在石灰上，从伤口处渗出的血水都被石灰吸干了。死者自然地闭着眼睛，没有一丝痛苦绝望的神色，没有一丝临刑前挣扎反抗的痕迹，好像根本不是与这世界、与他的亲人、与他追求的事业诀别，而是闭目思考着什么问题，或者劳累以后在放松地小憩……

高个子青年人的心猛然地收缩起来，禁不住砰砰乱跳。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当一个人愈是受到剧烈的迫害甚至丧失生命时，愈是坦然自若，人们受到的震撼也就愈为强烈。他赶

紧收回视线，在照壁附近那块宽阔的空地上徘徊。死者往日的奋斗业绩，像潮水一样涌到了他的眼前——

死者叫周水平（1894~1926）。他1894年6月27日出生，原名侃，又名树平，号刚直，江阴顾山周东庄人。父亲是个穷困的小学教师。他12岁学裁缝，后由亲友资助，才读完高小。1915年夏，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习所。1917年夏，无锡三师毕业后，又得到亲友资助，于当年9月留学日本东京高等体育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示威游行活动，曾被警方拘留。他痛感“弱国无外交”、“救国须救民”，便毅然回国。他回到家乡，担任顾山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师，并自筹经费，开办平民夜校。后在徐州甲种师范、浙江省立五中、川沙县立师范任教。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结识了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和在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侯绍裘等人，参加了国民党，1925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当年，兼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体育教师。他由于劳累过度，咯血病加剧，暑假回家养病。

在江阴，周水平与共产党员孙逊群（1897~1927）、陈叔璇（1900~1929）等人组织“星社”，创办《星光》旬刊，在第一期上发表《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的署名文章，并在《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一文中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个最公平……的人生观。”他深入农村，广泛从事宣传工作。这一年，江阴大旱，顾山一带稻谷因螟灾严重减产，可是地主豪绅们依然追租逼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贫苦农民濒于破产的境地。周水平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着手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他亲自撰写该会简章，还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来往各村，游说农民联合起来，向地主豪绅开展减租斗争。三县边区的农民纷纷响应。11月17日，他利用顾山沈舍里庙会演戏的机会，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他列数佃农受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的种种痛苦，号召农民参加“自救会”，同心合力参加斗争，并提出减租二五的主张，当场得到广大农民的热列拥护，纷纷商议入会。江阴、常熟的地主豪绅33人联名向江阴县署控告周水平，罪名是“宣传赤化，鼓吹共产，煽惑抗租，散发传单，非法集会”。11月18日，周水平被捕。

在狱中，周水平写了《请求省释之呈文》，严正指出“言论集会为人民应享之自由权，文明国家所不禁，我国约法、宪法均有明文规定”，痛斥军阀政府对他的非法拘捕。在狱中写作的另一篇文章《抗告文》中愤

怒控告说：“拘捕人仅来便衣，自称法警，既不着相当制服，又始终不肯出示捕票，仅用狂言欺人，何异匪类绑票！”他数次向江阴县署、苏州地方审判厅及省府上诉，但20天过去了，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奋笔疾书：“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奋斗十年当使民生个个能登仙。”那些地主豪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孙传芳的支持下，欲置周水平于死地而后快。周水平想，柳亚子是了解和信任自己的，又是一个有影响的、能说得上话的知名人士，为什么不请他设法营救自己呢？于是他马上给柳亚子写信。果然，柳亚子接到周水平的信后，立即致函江苏省省长陈道遗，要求释放周水平。陈道遗又指示江阴县知事王家锦说：对周水平要“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后释放”。12月30日，周水平移居优待室。

1926年1月17日凌晨，周水平还在睡梦中，几个法警打开优待室的门，点亮了昏黄的油灯，催促周水平穿衣待审。

周水平一边穿衣，一边疑惑地问：“狱中审问，已经进行了多次，都是白天进行，今日何故半夜三更提审我？”

“省里昨日来人，要把你转到南京释放。”法警说着，伸手去抓周水平的胳膊。

周水平开始有些将信将疑，但一想到柳亚子的营救，也就相信这也许不是一句戏言。

法警哪能容得周水平慢条斯理地穿衣，当他刚刚披上一件皮袄，正要下床穿鞋的时候，就粗暴地架起他的胳膊拖着往外走。

法庭上，知事王家锦一改半个月前安排他进优待室时温和的面容，简单地象征性地审讯结束，就命人将周水平捆绑结实，验明正身，宣读“罪行”，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形势变化如此之快，这是周水平无法知道的。原来江阴的土豪劣绅知道柳亚子保释周水平，就趁孙传芳在南京召开借漕会议的机会，拍电电诬告周水平“鼓吹共产，煽动抗租，无法筹缴冬漕”。孙传芳为了漕米（征粮），密电江阴县署将周水平“依照军法枭首示众”。

周水平被法警押到江阴南门市桥堍（今青果路与南街交汇处）。市桥是一座花岗石质地的石拱桥，横跨在南北方向的一条内河上。这里是县署处决犯人的地方。市桥西堍有一块较大的空地，已经挤满了来看行刑的人。正值严冬时节，黎明前的寒气和刑场上的恐怖，让这些穿得厚厚

实实的市民从头到脚都在筛糠般地颤抖。

周水平被押到市桥堍，抬头一看，摆着一部笨拙的绞桩。他先前阅读旧小说，知道这是刽子手杀人时用的辅助工具。但是，现在是民国15年了，刀刑早已废止，于是他转过头来向刽子手问道：

“请问今天用何刑处我？”

刽子手没有回答，强令周水平跪下，取出麻绳把他绑在绞桩上，只是受到周水平临刑前如此镇定自若的威慑，心慌意乱没有将绳子绑紧。

这时天色渐明，周水平扭动颈部，环视远远站着观看行刑的居民，大声呼喊道：“各位乡亲，各位同胞，我叫周水平，非盗非匪，是为贫民而死，心地坦然，死而无愧！”

话音刚落，刽子手举起屠刀，向周水平的脖子上砍去。因为事前没有缚紧，颈部在刀子的重压下向旁边别去，只留下一条深深的刀痕。周水平厉声喝道：“我和你无冤无仇，请把手脚做干净点！”慌乱中，刽子手又砍一刀，仍是没有成功，只是割开了一道口子。当第三刀猛砍下去的时候，周水平头颅落地，颈口收缩，须臾，鲜红的热血像赤色的岩浆迸裂而出，失去头颅的躯体和四周一片猩红。接着，死者的头就被挂到县署前面的照壁示众，尸体抛在市桥堍，严禁家属亲友收尸安葬。

穿青布长衫的青年人又向照壁上的头颅投去深深的一瞥，像突然有一盆冰凉的雪水浇到他的头上，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发觉自己在这里徘徊的时间太久了，急忙向四周看去，照壁附近仍旧没有一个人影。他不能再看下去了，就朝附近一家茶馆走去，向伙计买了一壶茶，慢慢喝着，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无法理清自己为什么对周水平有这么深的感情。如果说周水平倡导发起的佃户合作自救会，对那些缴不起佃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苦人家能带来切身利益的话，那么，对他朱松寿来说，只能受到损失。他家住长寿镇朱家巷，包括自田和租田在内，家有良田百亩。这百亩家产，在父亲过世后，已由朱松寿亲自掌管。可是，从他童年时候起，就喜欢和贫苦人家的子弟在一起，觉得和他们玩耍痛快自在，无拘无束。以后渐渐长大，就同情起他们饥寒交迫的生活，对这些人家常有接济。一些人家里没有粮食了，找到他，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松寿官，我家没有米了。”他就让长工如数称给他们。一些人家里没有柴草烧了，说一声：“松寿官，我家没有柴了。”他同样嘱咐长工把柴送到他们家里。

这些作为，自然瞒不过他的父亲，可是并不为难他，一则朱松寿是独养儿子，朱家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父母不忍心声色俱厉地训斥他。二则他经手外借的粮食和柴草，乡邻们或迟或早都如数归还，只是不付利息罢了，朱家也不伤元气。只是有一次儿子越过了界限，垂垂老矣的双亲不得不斥骂他一顿，事后又觉得后悔，不值得为几个钱惹宝贝儿子伤心。

那是朱松寿18岁那年，稻谷上场，父亲要他邀集几个朋友，把一船稻谷摇到无锡城里出售。完成任务后，松寿带着帮他摇船的几个朋友，到一家馒头店吃点心。无锡的小笼馒头闻名京沪线，馒头的馅子用上等精肉制成，配上各色调料，味美可口。馒头表皮薄得像一层透明的胶，刚从热气腾腾的笼中取出，轻轻咬上一口，一汪鲜美的卤水直向你的喉咙涌去。朱松寿大口大口地吞咽着，一笼馒头很快被他吞进肚里。他抬头看去，几个朋友都在吃着，唯有一个个子瘦小、面色黝黑，绰号叫做“黑皮”的小伙子只是看着馒头，并不夹着吃。他心里感到奇怪，问道：“黑皮，这么好的小笼馒头，为何不吃？”

“松寿官，我……”黑皮支吾着。

“你有话直说，有难处我会帮你一把。”朱松寿催促道。

“我肚子不舒服，吃了馒头会拉稀。你让我带几个回去，煮着慢慢地吃。”黑皮睁大着期待的眼睛，看看比自己小几岁却高出一个头的朱家公子。

“行嘛，待会你带两笼回去。”朱松寿爽快地说。

当晚，朱松寿走到邻村，有事找黑皮帮忙。大门虚掩着，他侧身闪了进去。微弱的灯光下，只见黑皮正往躺在床上的母亲嘴里塞着什么，他心里一动，站在那里看个究竟。母亲费力地将东西咽下，停了片刻，低声问道：“这馒头是你在无锡买的吗？”黑皮憨厚地笑笑说：“我帮松寿官摇稻谷到无锡去卖，他付了工钱，还给每人买了几笼馒头，我吃饱了，省下两笼孝敬母亲……”

朱松寿听到这里，两颗泪珠在湿润的眼窝中滚动着，强忍住没有滴落下来。他一步步走进低矮灰暗的房间，慌得黑皮的母亲要挣扎着爬起来，被他挡住了。

“你母亲怎么了？”朱松寿声音有些哽咽。

“她病了，我家没钱请郎中买药，只好硬顶着……”黑皮只得老实说了。

沉默良久，朱松寿从长衫口袋里摸出几大包银元，往桌子上一掷，银元叮当作响，有几个滚到地上去了。“这是今天在无锡卖稻谷的全部

款子，黑皮，你拿去赶快为母亲治病。我有话在先，这钱，不用你们还了！”

黑皮和他的母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收钱，也不作谢，当娘儿俩回过神来，朱松寿已经走了。病中的母亲流着浑浊的老泪，嘱咐黑皮说：“儿啊，日后倘有机会，一定要报答松寿官的救命之恩！”

朱松寿喝干一壶，堂官眼快，掂着脚尖走过来，向他的紫酱色茶壶中灌满了沸腾的开水。这时，他才注意到茶馆中的许多茶客都在议论周水平的死，叹息的有，同情的有，不以为然的也有，也有认为杀得痛快的——杀戒一开，以后谁还敢聚众减租？朱松寿不摸高深，不便接口说话，只是远远地瞅着照壁上的那颗人头发呆。

这条路走下去，也许有一日，自己的头也会挂在照壁上示众，遗体也会在市桥堍或异乡暴尸。他根本想不到，同情和资助贫苦乡邻，也会得罪人，而且会得罪有权有势的人！想到这里，一个体态丰腴、个子中等、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人就映现在他的面前……

这人叫陈祥安，长寿东街人，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财主。此人颇有心计，舍得花些小钱收买人心，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家养有一只鹰，颈脖子上系有一块鸡心形的骨牌，刻有“长寿祥记”四个小字。每当天空有像样一点的鸟儿飞过，陈祥安就把鹰放出，搏击长空，与它的猎物拼命厮杀。每有获胜，就咬住鸟儿的喉管，飘飘荡荡降落下来。拾得者看见鹰脖子上的骨牌，不敢怠慢，小心捉住鹰和拾起受伤的鸟，给镇上的陈家送去。每当这时，陈祥安就喜笑颜开，拉着来者的手一起到附近的茶馆或饭店请客，临走时还要送一笼馒头或几包方糕给他们。靠着此法，倒也拉拢了一些人。

朱松寿虽然用不着向陈祥安趋炎附势，但是，两人也相安无事。慢慢地，朱松寿帮助穷苦子弟的故事传到陈祥安的耳朵里，陈祥安心里就老大地不愉快；这不是故意在拆我的台脚吗？大家都知道，我陈某从不怜悯穷人。心不毒，手不辣，人家肯乖乖地把金灿灿的谷子和白花花的银元往我陈家送吗？现在乡里出了个朱松寿，居然对交不起租子的农民一副笑脸，人家不是要背后指着我姓陈的脊梁骂娘吗？自此朱陈两人出现了芥蒂。

事有凑巧，一年初秋，朱松寿和乡下的几个穷朋友上街玩耍，看见东街上里三层外三圈地齐集着一群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陈祥安正兴

致勃勃地与人斗着蟋蟀。也许蟋蟀也仗人势，陈家养的蟋蟀每斗必赢。朱松寿暗暗捅同去人的胳膊，那人会意，钻出圈子，就向朱松寿家奔去。原来松寿自小也喜欢养鸟斗蟋蟀。父母虽然不指望儿子成为花花公子，只是溺爱过甚，从不去扫儿子的兴。现在儿子派人回家取蟋蟀，母亲按照他的需要，挑选了几只雄壮健大的蟋蟀让来人带去。松寿却不出面，就叫那人捧着蟋蟀罐头上阵。谁知几个回合，朱家的蟋蟀把陈家的咬得吱吱直叫。陈祥安当着众人的面打了败仗，对手又是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小子，于是恼羞成怒，唆使族人将那人打了。

朱松寿把陈祥安仗势欺人的这一幕看在眼里，像激怒的雄狮那样大吼一声，挽起衣袖就要还击。陈祥安看见朱松寿动怒，吃了一惊，这才知道刚才几只强健善斗的蟋蟀绝不是那个穷小子所养，一定是朱松寿的了。那好，你姓朱的专门寻我陈某的衅，我一定要给你点厉害看看。可是，陈祥安一向知道朱松寿力大而勇猛，他家砖场上有一块石灰岩凿成的圆柱形的结牛石，有100多公斤分量，朱家巷的年轻人都想一试身手，可谁都无法挪动一步。原来结牛石光滑如玉，系绳的地方雕着一个小孔，只能伸进去两个指头，如何能提得起来。朱松寿冷笑一声，走近石块，俯下身子，像怀抱婴孩似的将它轻轻抱起，绕场一周，面色依旧。众人喝彩不止。朱松寿从怀中轻轻放下，又伸出两根铁钳似的指头，伸进石孔，猛喝一声，100多公斤重的石块好像粘住了他手指似的，又绕场走了一圈。自此，朱松寿勇力过人的名声传遍长寿。现在，朱松寿怒气冲冲，一旦较量起来，陈祥安方面一定要吃亏。他想找个台阶，可又下不了这个面子。正在为难之际，一个穿着绸布长衫、脸色白净的中年男子，一把按住朱松寿小树桩般粗实的手臂，柔声说道：“松寿官，遇事要平心静气，三思而行，为斗蟋蟀引起的小小波折，不值得如此认真，你看呢？”

说话的叫吴子卿，因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在长寿镇上颇有威望。松寿经他劝导，率先退出人圈，拉着几个穷朋友走了。人群一哄而散，陈祥安摸出手帕擦擦额头渗出的冷汗，对朱松寿增加了一分仇恨。

“像陈祥安这样的霸道人物，哪一个乡，哪一个镇，不都有几个吗？周水平留学日本，见多识广，又加入了国民党，可是与黑暗势力一对抗，不是身首异处了吗？我朱某身单力孤，能有力量改变这个社会吗？”朱松寿从县署照壁那一颗人头处收回目光，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这是去年秋冬之交的事了，周水平在顾山发动农民向地主减租减息，朱松寿知道

了这个消息，决定先从自家做起，向租种朱家田的农民宣布，今年田租一律减免三成，农民们奔走相告，喜色溢于脸面。可是，陈祥安却坐不住了，他的佃户们以朱松寿已经减租为理由，要求陈祥安同样实行减租减息。那时，周水平倡导的佃户合作自救会，像燎原之火在澄锡虞三县蔓延开来。陈祥安减又不是，不减又不是，像世界到了末日般地惶惶不可终日。想不到才几个月时间，一手制造这场混乱的周水平就进了班房，被孙大帅割了头。陈祥安明白，长寿地区也有一个周水平式的人物，如果时机成熟，要比周水平狠十倍百倍！这人就是朱松寿。自此，陈祥安对朱松寿的仇恨又增加了一份。

这时，照壁面前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围着人头评点嬉笑，朱松寿在茶馆再也坐不下去了，向店老板点了点头，慢慢地向照壁走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相貌英俊的男学生正在发着脾气，他去得迟，只听见最后几句：“人家忧国忧民，脑袋都干掉了，遗体还在市桥堍暴尸，你们能笑得出来吗？真是麻木不仁！”

朱松寿吃了一惊，悄悄把这个男学生拉到一边，低声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男学生向他瞪了一眼，朗声说道：“怎么样？你想抓人？我叫郑潮涌……”说着，飞也似的向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奔去。

第二节 朱老太太的喜与忧

朱松寿从县署照壁看过周水平的头颅回到长寿朱家巷，一直关心着这位革命志士的后事。不久，听说周水平的父亲花了50银元，买下了儿子的头，又购置了一口棺材，在市桥堍将遗体草草入殓，运回顾山周东庄，把棺材搁置在周家祠堂里，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声息。倒是陈祥安在长寿镇上热闹了几天，把周水平骂了个狗血喷头，扬言谁再敢闹佃户合作自救会和减租减息，周水平就是他们的下场。

这话是说给朱松寿听的，他也只得忍了。但是，他总有一种预感，周水平绝不会这么白死，江阴还会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为这位革命志士报仇的运动，可是春去秋来，一年快要过去了，从县城到乡村，没有任何迹象要为周水平翻案。

1926年冬。

一天，朱松寿闷得发慌，一个人在自家的砖场上玩那块圆柱形的结牛石，他一忽儿将石块抱在怀里，一忽儿又举到肩上。他玩得热了，脱去青布长衫，往石上一放，坐到上面休息。

“松寿官，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你热成这般模样，在干什么呀？”一个熟悉而颇有几分亲切的声音从前面传来，他抬头一看，见是一个高高大大的读书人，端庄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两颗深邃的眸子透过镜片闪烁着智慧而友善的光，乌黑的短发往脑后梳理着，显得果敢而富有朝气。

“啊，是老五呀！”朱松寿从圆柱形的结牛石上跳起来，疾步向陈叔璇走去。

陈叔璇，字明崙，1900年出生于江阴周庄陈家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大家又称他为“陈老五”。20年代初，陈叔璇在上海中国体操学校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探索革命真理。假期回乡，他总要与长工们一起劳动。有时佃户交不起租，他就劝母亲不要去收租。1923年下半年，他经人介绍，进了无锡城西脚下的艺芳小学当体育老师。这是一所进步小学，是中共无锡文教支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侯绍裘、萧楚女到无锡活动总是住在这里。陈叔璇在革命环境的熏陶下，于1925年春在艺芳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他到上海大学参加了由中共上海区委举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随后以省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到江阴，与中共江阴独立支部书记孙逊群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并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派担任江阴县党部的农商部长。

朱松寿一把拉着陈叔璇的手，径直朝家里走去。

朱家的住宅位于长寿朱家巷的东南隅，是一座三进两院堂的农家大院，每进五间。第一进是长工们居住和堆放粮食的仓库，第二进、第三进都铺着地板，是朱松寿和他的眷属居住。每进房间之间，都有一个很大的天井，下面铺着砖块。大院的东、北两侧，各有一条宽阔的河，河面上结着薄薄的冰。

陈老五跟着朱松寿，边走边打量着朱家的住宅和环境。到了第三进，松寿推开门，房间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少妇，手里抱着一个还不到周岁的婴孩，一条结实闪亮的长辫从后背一直垂至臀部，满月般的脸上透出青春的光泽。她看见有生人进屋，两只漂亮的大眼睛漫无目的地盯着自己

的脚尖。

“这是我的妻子杨绮云。”朱松寿介绍说。趁着陈老五不注意的时候，他向妻子递了个眼色，杨绮云抱着孩子连忙走了出去。

陈老五狐疑地瞥了一眼她的背影，觉得无论她的身长、姿色和年龄都不像先前看见的那个大嫂，正欲发问，忽然想到这中间恐有隐情，于是压下了这个念头。

朱松寿并没有注意陈老五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仍然沉浸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气氛里。不一会儿，杨绮云端来两杯茶，又悄然退出。他这才想起老五近年来一直在无锡艺芳小学任教，现在离放寒假还有一段时间，怎么有余暇回家看望朋友，于是问道：“艺芳小学今年提前放假了？”

陈老五爽朗地发出一阵大笑，告诉松寿说：“我早不在无锡工作了，这次到上海参加了一期农民运动训练班，刚刚回到江阴，还没进家，就先来看你了。”

朱松寿感到话中有因，既然上海还在办农民运动训练班，这说明农民运动还要搞下去，那么，怎样来评价周水平呢？

“我听说今年年初周水平的头挂在县署照壁上，你特地赶到江阴去看？”陈老五见松寿在沉思，想先从周水平说起。

“我去看了，周水平了不起，说得上是一位英雄。可是，周水平被害快一年了，江阴悄无声息。土豪劣绅照样横行乡里，孙传芳照样做他的五省联军总司令。”朱松寿愤愤不平地说。

陈老五摘下金丝眼镜，掏出丝绒手帕，慢慢地擦拭着镜片。“松寿官，怎么能这样说呢？”他把眼镜重新架上鼻梁。“外面许多报刊上，都在揭露孙传芳屠杀周水平的罪行，为烈士伸张正义。有一个叫毛润之的人，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1月25日的《向导》周报上。”他打开身边的小包，找出一本杂志，递到朱松寿的手中。

朱松寿小时候读过私塾，一般的书报杂志都能阅读。他急忙打开杂志，是有一篇署名为润之的文章，题目是《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其中有一段文字，老五用红笔圈了出来：

从无锡乘轮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顾山镇。这顾山镇界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利害。去年

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周水平（周原在无锡市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户合作自救会”。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

正读得入神之际，房门“吱呀”一声推开了，朱松寿急忙将《向导》藏好。进来的是妻子杨绮云，松寿不悦道：“我和老五有要事谈着，你到母亲房里歇着去。”

妻子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道：“天快黑了，酒菜已准备好。有话吃了饭还可以说。”

朱松寿这才想起，老五远道而来，一定肚子饿了，赶紧把客人叫到堂前。吃过晚饭，松寿又让老五同母亲见了面。母亲喜欢得不得了，当着儿子和媳妇的面直夸老五如何有才学，如何有志气，要儿子好好向他学习。

朱松寿像沙漠中饥渴的骆驼，一看见清澈的溪水，埋下头吸个痛快才走。他把陈老五拉进房间，准备来个彻夜长谈。只是老五要走，他依依不舍地送至村边，直到看不见身影才回家。

他催着妻子先睡了，才悄悄取出那本《向导》杂志，翻到毛润之写的那篇文章处，继续全神贯注地读下去：

但当农民尚未完全联合起来之时，劣绅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绅士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雪片告到孙传芳，孙传芳哪有不听劣绅地主的话，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户合作自救会解散，把周水平捕获，今年1月便把他枪毙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镇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顾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们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们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不好，农民又想起来要求减租。可见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以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

这一段话，因为写的是朱松寿亲眼看到，日夜思索而渴望得到答案的事，感到特别亲切。周水平为什么失败了？那是因为澄锡虞三县的劣绅地主联合起来，又有军阀孙传芳做他们的后台。那么，江阴的农民运

动要轰轰烈烈地搞下去，谁来做这个联合工作呢？孙传芳知道了，会不会再来镇压呢？他正想请写这篇文章的毛润之来回答这些问题，继而“扑哧”一声笑将起来，谁知这个毛润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突然，在他的思维深处，陈老五和毛润之重叠在一起了。对，说不准老五用了个什么笔名，写下了这篇文章，下次见面时一定要问问这个老五。

这天晚上，朱松寿的母亲睡得特别香甜。第二天一早起来，她把媳妇悄悄地拉到一边，问晚上松寿说什么来着？媳妇说丈夫看了半夜的书，什么话也没有说。老太太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挪动小脚，抖巍巍地向灶房走去，准备亲自烧几个水溲蛋，为儿子补补身子。

母亲是最了解儿子的。小时候，松寿的父亲朱文魁望子成龙，特地把长寿镇上一个很有名望的先生请到家里，担任启蒙先生。可是，溺爱过度的独养儿子哪能静下心来攻读诗书？先生稍不留神，就钻出去找穷孩子玩耍。文魁就找了一个聪明的穷孩子来做陪读，儿子的兴趣还是转不到书本上。陪读的人倒成了才，长大后学了医。为了感激朱家的栽培之恩，每到朱家巷行医，从不坐轿子，收费也很低廉。父亲知道儿子不是吃墨水的料，第六年就辞退了先生。自此，松寿成天与村上的穷小子们混在一起，不图上进。文魁叹了口气，只得听之任之。

现在，想不到成家的儿子倒学起好与读书人交起朋友来了。母亲认识陈老五，他的家就在朱家巷不远的陈家仓。陈家先辈在京城里做过大官，家门前竖着一座用花岗石刻凿成的牌楼，上面还刻着乾隆皇帝的字呢。书香门第的陈家崇尚读书之风不衰，老五叔璇毕业于上海中国体操学校，老六叔文就读于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儿子和陈家的几个读书人能常在一起碰碰头，说说话，不愁不走上正道。你看，昨天和陈老五关在房中说得多投机，晚上还读了半夜的书，这叫她如何不高兴呢？她真巴不得陈老五常常到朱家来，如果他愿意，住在这里也行！

正是事遂人意。陈家的这个公子每隔几天就来找朱松寿。他一到，儿子就喜形于色，坐到房间里谈个没完没了。有时儿子跟着老五出去，到很晚才回家睡觉，老太太也从未怀疑他们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动，相反觉得挺自然，年轻人嘛！谁不喜欢串串门子，海南天北地说个热闹！

其实，朱老太太既不了解陈家的五公子，也不了解自己的儿子。1926年底，朱松寿自从同老五叔璇频繁接触以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

化。当他知道毛润之就是共产党的毛泽东时，紧紧抓住了陈叔璇的手，兴奋无比地说道：“这么说，江阴的佃户合作自救会闹到全国去了，共产党内这么有影响的大人物都写文章为周水平打抱不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周水平还能翻过来呢！”

陈叔璇不动声色地说：“这就要靠我们锲而不舍地去奋斗。现在压迫最深受苦最大的还是农民群众。我们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像周水平那样，把最贫困的农民，不，还包括最有志于改变这个黑暗世界的人，像你松寿官就是一个，组织起来，向一切维护这个旧世界的劣绅地主、官僚军阀作斗争。”

朱松寿参加了农民协会，并接受陈叔璇的指示，先在朱家巷附近，慢慢地扩大活动范围，在长寿、周庄、云亭三乡积极发展农协会员。开始是晚上出去活动，以后就整天整夜地不回家了。

1927年春节刚过，朱家巷来了个穿绸布长衫、戴呢质礼帽的斯斯文文的中年人，要找朱松寿。凑巧松寿不在家，朱老太太就把客人迎进屋里。

“你是……”朱老太太端过一张凳子，让客人坐下，试探着问道。

“我叫吴子卿。”客人回答说。

“你就是镇上的三先生？我家松寿官常常提着你。绮云，你快去把松寿官找回来，说三先生来了。”朱老太太对媳妇说。

不一会儿，朱松寿回到家里，看见吴子卿，喜出望外，两人丢下老太太，躲到房间里说话去了。

吴子卿是朱松寿新近发展的秘密农民协会会员。这位已经40岁的小镇知识分子，虽然家里并不缺吃少穿，也有着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对参加农会兴趣甚高。原来，吴子卿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有一年，陈祥安看中了长寿东街一位姓夏的小店主的女儿，竟欲强占为妾。可是这位姑娘早许婆家，为防不测，就提前出嫁到了夫家泗河口村。陈祥安哪肯甘心，就组织了一帮地痞流氓，摇了一条船，赶到离长寿四里多路的泗河口抢亲。吴子卿闻讯，匆忙中只带了几个人，急如星火地向泗河口奔去，远远地听见人声嘈杂，伴有妇女的哭叫声。吴子卿一到泗河口，看见陈祥安正指挥几个地痞拖着一个年轻女子，向停泊在河中的木船上拉去。吴子卿大怒，大喊一声：“乡亲们，拔船！”泗河口的农民看见有三先生撑腰，一齐动手，把靠在岸边的木船向河心推去。几个地痞上来争夺，被愤怒的农民抛到河里。陈祥安见三先生坏了他的好事，恨得牙

根直咬，只是众怒难犯，跳上木船遁去。自此两人结下怨仇。现在有朱松寿出头组织农民协会，与陈祥安斗争，他岂有不参加之理？

朱老太太见三先生与儿子说个没完，就产生了几分警惕。她知道这位有钱有见识的中年人不会带坏她的宝贝儿子，可是泗河口与陈祥安的一场斗争在长寿乡里是妇孺皆知的，一旦三先生煽动松寿官也去反对陈祥安，那么恩恩怨怨到何时是个头呢？想到这里，她轻移三寸金莲，走近儿子的房门，注意里边的动静。

“农民协会一起来，第一个该斗争的就是陈祥安。”这是儿子的声音。

“小心别让他溜了。”三先生谨慎地说。

“他能往哪里逃？老五说，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革命军，正势如破竹，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兵败如山倒。主子一垮台，陈祥安这些土豪劣绅末日也就来到了……”这又是儿子的声音。大约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他们说说话就低下去，下面的再也听不清楚了。

朱老太太心里已经明白，这一段时间，儿子瞒着自己正在向一个危险的深渊走去。她搞不明白农民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也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但是，她对陈祥安是知道的。此人仗着有几百亩田产，过于霸道，她也不赞成。然而，对于这种人，惹不起，难道就躲不起吗？如果与他纠缠下去，儿子能是他的对手吗？此人心狠手辣，什么丑事干不出来呢？她打定主意要干涉干涉儿子的思想与行动了。

江阴乡村里，从农历年初二开始，就忙着走亲戚家了。一般是先走近亲，再走远亲，对相隔过远的亲戚，一年年疏远，最后也就不来往了。朱老太太有4个女儿，每年春节都相约在同一天回到朱家巷，看望年迈的母亲和弟弟、弟媳。这一年大约各家都要招待自己的女儿、女婿或者儿媳家来的亲戚，忙得走不开，一直拖到正月十五才一起回到朱家巷。

吃过中饭，朱家的四姐妹围着朱老太太坐下，嘴里嗑着瓜子，朱松寿坐在旁边陪着姐姐们，妻子在一旁添茶。这时，从房间里传出婴儿的哭声，三姐脚快，三脚两步地跑进房间，从床上抱起孩子，又回到堂前。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孩子的身上。只见他长得圆头大耳，嫩乎乎的脸蛋，黑亮亮的眼睛，两串泪痕挂在腮边，小嘴高高地撅着，煞是可爱。

三姐先是逗乐了孩子，接着，又把他放到地上，然后放开手，自己向后慢慢退着，嘴里用母性的温柔鼓励着：“走呀，鸿坤，走到三姑姑这边来，三姑姑给你糖吃。”

奇迹出现了。从未学过走路的小鸿坤艰难地移动了第一步，接着第二步、第三步，像一只蹒跚的小鸭，笨拙地摇摇摆摆地向三姑姑走去。

四姐妹乐得你争我夺地把孩子抱在怀中，朱松寿夫妇也在一片赞扬声中笑得合不拢嘴。在这场喜剧中，只有朱老太太是个悲观主义者，满脸挂着忧郁的神色。

“妈妈，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出嫁在云亭季庄的第三个女儿关切地问道。

“不，我是为这个大孙子担忧。”老太太动了感情，“俗话说，孩子超纪行（即不满周岁就会走路），长大无住堂。我的大孙子还没满周岁呢，今后要是真的没有房子住，谁来解他难？”

“妈，你还这么迷信哪？三进两院堂，二十间瓦房，还不够鸿坤长大后住吗？”朱松寿不满地瞥了一眼母亲。

“老实本分，种田养蚕，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自然用不到愁孙辈们长大会无家可归。可是，你这一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呀？今天四个姐姐都在这里，你同她们说个明白。”老太太慈爱的眼神里透出威严，紧紧地逼着儿子。“你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陈祥安这样的人，你惹得起他吗？去年江阴市桥堍杀了人，你这样闯下去，自己不要命，还让我和这个苦命的孙子一起陪着你不成吗？”说着说着，老太太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欢乐的新年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四个女儿轮流劝慰着妈妈，帮她擦拭眼泪，做媳妇的不知怎么办才好，站在老人一边吧，会伤了丈夫的心；帮着丈夫说话吧，老人担忧的也不无道理。

“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惹你这么伤心？陈老五和三先生，都是知书达理、受人尊敬的人，我不与他们交朋友，倒去与伤天害理的陈祥安来往不成？”朱松寿心平气和地劝慰着母亲。他是一个对母亲很孝顺的人，看见老人家伤感，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知道，母亲为了他的安危早已把一颗心悬了起来。要让母亲放下心来，只有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什么事都不过问，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可是，他做不到，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只是为了不让母亲过于伤心，以后注意瞒着她就是了。

朱老太太从儿子的话中，知道他没有半点悔悟的意思，又不能当着一家人的面，把偷听到的“农民协会”、“国民革命军”一类的事都说出来。她觉得朱家从此不会太平了，想到丈夫和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经营

起来的家业说不定会败落在儿子的手里，心里有无限的委屈，鼻子一酸，悲悲切切地哭泣起来。

这哭声传到住在第二进的一个女人的耳朵里，心里焦躁起来，几次想走出房间，去劝慰劝慰老太太。可是她又踌躇不前。这几年来，她一直默默地陪伴自己的女儿朱露英，在第二进的几间房子里深居简出地生活着。不过，她感到吃有田产，住有房屋，寂寞有女儿，偶或偷偷地窥视一下朱松寿高大魁伟的背影，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今天，她知道朱松寿的四个姐姐都在家里，一家人欢欢喜喜过着元宵节，她也暗暗高兴。觉得自己的命运同朱家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同朱老太太，更无法割断其中的感情。现在，老人一哭，正像有只猫爪在撕裂她的心一样难受。她终于鼓起勇气，迈动伶仃小脚，向第三进房子走去。

朱老太太泪眼朦胧，看见她向这边走来，立刻收住了哭声，并示意儿子和媳妇回到他们的房间去，一边站起来，喊道：“三妹，你来得正好，露英的四个姑姑都在这里，多时不见了，你们一起聊聊，我为你们烧茶去。”

媳妇在房中把嘴贴到丈夫的耳边，轻声问道：“婆婆看见刘三妹进来，就不吵不闹了，难道她怕三妹不成？”

“母亲是为我好，这我知道。如果再哭下去，刘三妹一定要又劝又问，这叫母亲如何回答呢？”

一场家庭的冲突，由于刘三妹的出现，终于暂时地平息下去了。

朱老太太这么一闹，似乎起了许多作用，到朱家来找儿子的人，从这天开始越来越少。白天，朱松寿与杨绮云一起逗逗孩子，说说笑笑，晚上关门睡觉，粗重的鼾声常常透过紧闭的房门传到老人的耳朵里。母亲见状，慢慢放下心来，感激菩萨保佑朱家平安无事。但是，她哪里知道，儿子在与母亲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呢！

元宵节过后，四个姐姐住了几天，先后回到她们的夫家去了。朱松寿关在房中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妻子关切地问道：“你心中有事，对母亲信不过，难道对我也信不过，不可以同我说说吗？”

“我担心你同老太太是一个心眼儿，女人嘛，总是胆小、心窄、自私的。”朱松寿试探地说。

“我不是那样的女人。几年前，我从常安镇嫁到朱家巷，就是看上你的胆略、气魄和与众不同的英雄气概。”妻子站了起来，把胸前的长辫子

往后用力一甩，似乎对丈夫的不信任生气了。

“我有几个正直的朋友，你都认识，他们迫切希望我每天晚上能同他们去商量事儿，可是，母亲知道了会担心和难过。我想请你帮个忙……”他后面的几句话说得很轻、很轻。

“只要你们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这个忙我可以帮。”她说得很坚决、很肯定。

“啊，绮云，我的好绮云！”朱松寿大喜过望，冲过去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中。

于是，朱松寿每天吃过晚饭，就倒头便睡，深更半夜，在妻子杨绮云的掩护下，悄悄潜出屋去。天亮之前，再偷偷地回到房中。

第三节 他砸开了县城监狱的大铁锁

这样到了1927年3月中旬，外面纷纷传言：江阴要打大仗了！说是从广东开过来一支部队，能征善战，要为一年前被杀的周水平报仇。一些同情周水平的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巴不得这支部队早早开过来，把江阴打个天翻地覆，把那些劣绅地主和他们的靠山县署、孙传芳的联军打个屁滚尿流，才解多年来郁积在胸中的仇恨。而城乡上流社会人士一面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外出避难，一面竭力散布悲观情绪：江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打起仗来玉石俱焚，两年前的乙丑兵灾，奉军卢永祥部与直军齐燮元部争夺江阴城，激战七天七夜，不仅城内千家万户受到骚扰抢劫，而且耸立在城中的兴国塔被炮弹炸去两层，成了钢笔尖形。这次打仗，不把兴国塔连根拔掉才怪呢！那些家伙造谣的目的，是想阻止革命军队开进江阴城。

但是，形势并没有朝着这些上流社会人士的愿望发展，江阴已经处于决战的前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像农历八月十八日的潮水，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冲刷着一切企图阻止它前进的泥沙，滚滚向前。中路北伐军攻占江西南昌后，进入安徽南部，沿着苏皖边境直插茅山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攻打南京，一路穿过宜兴到常州，顺着京沪铁路向无锡进攻。如果无锡一破，江阴就兵临城下。江阴的驻军是直系军阀孙传芳五省联军江苏第一师白宝山部。如果凭借江阴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那么，这座长江之滨的古城，又将成为两军厮杀

的战场。

面对当前形势，中共江阴独立支部于3月18日傍晚召开了紧急会议。

江阴是江苏省建立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派员到江阴物色对象发展共产党员。1925年5月，中共江阴支部成立，隶属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1925年8月至1926年4月，隶属中共上海区委员会。1926年4月，江阴支部改为中共江阴独立支部，是中共上海区委所领导的15个独立支部之一。1927年2月，中共江阴独立支部隶属中共无锡地委。独立支部当时活动于江阴东乡一带，独立支部有党员孙逊群、陈叔璇，蒋云、朱杏南、李维选、徐鸿英等，支部书记是孙逊群。

孙逊群，又名孙选，化名王泽民，1897年1月出生于江阴县中兴乡大德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7月江阴县甲种师范毕业后，到大南乡立第二初级小学任教。他不顾地方势力反对，与校长殷念乔一起，把关帝等泥像当众捣毁，将庙堂辟为教室。1924年，任云亭小学教师。同年7月去南京参加小学教师暑期学习班，认识了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侯绍裘，由此加入国民党。1925年5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担任中共江阴支部书记。6月，孙逊群在云亭小学会见团中央委员萧楚女，接受发展共青团工作。8月，协助周水平组织《星社》，10月，出版《星光》旬刊，并兼任编辑。针对江阴地主豪绅刻薄平民回赎田产而泡制的《钱洋折合法》，与周水平一道接连发表抨击钱洋折合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迫使江阴县署废除该项法案。1926年1月，周水平被军阀政府枭首示众，孙逊群当即写了《鸣冤宣言》，文章在《申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政党、社团发表声明、通电，痛斥军阀政府倒行逆施的罪行。1926年4月，孙逊群担任中共江阴独立支部书记。本月，他由中共上海区委推荐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中共江阴独立支部书记孙逊群烈士
(孙品元 提供)

习，聆听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的讲课，经受严格军事训练，还到海丰、韶关等地实习农民运动。9月结业后，他以江苏省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江阴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2月，中共江浙区委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孙逊群为委员。他秘密组织了江阴县农民协会，任委员长，仍担任独立支部书记，主持这次紧急会议。

会议是在陈家仓陈叔璇、陈叔文即蒋云兄弟家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他就是朱松寿。

会议紧紧围绕着如何配合国民革命军攻占江阴城的问题而展开，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时刻了。

“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直倾听着党员们发言的朱松寿突然说，“我建议：在北伐军攻城前几天，动员农民协会会员潜入江阴城。两军交战开始后，我们看准机会，来个里应外合，把孙传芳的联军赶出江阴城。”

陈叔璇向朱松寿投去赞许的目光，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表示支持。

蒋云望望朱松寿。蒋云原名陈流，字宇中，又名陈叔文，是陈叔璇的弟弟，出生于1903年。由于他排行第六，又叫陈老六。1925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办公室主任。此刻蒋云听了朱松寿的发言，感到建议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能否做到，没有把握。他说：

“我们农协会会员没有武器，又缺乏军事知识，一旦与城内的军阀部队冲突起来，徒手作战，必然要遭受到严重损失。”

几个党员发言支持蒋云意见，不主张同敌人面对面地拼杀。

独支书记孙逊群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望望身边的茅学勤。茅学勤于1900年出生于江阴后塍学田圩一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1923年弃学回乡创办学田圩小学，并在那里任教，1926年春，茅学勤的好友孙逊群在沙洲秘密从事农民运动。茅学勤接受了共产党组织农民闹革命的主张，带领100多个农民，上他妻子的干爹、大地主朱孔阳家“吃大户”，开仓分粮，在沙洲引起很大反响。此刻，他分析了大家的意见，说：

“可先派几个农协会会员，身藏尖刀利器，潜入城内，看准时机，集中力量刺杀一个城门的守军，然后打开城门，让北伐军乘虚而入。”

“这个意见好，完善了松寿的建议。”

孙逊群见多数共产党员赞成茅学勤的意见，又引导大家讨论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以及北伐军进城以后如何组织群众迎接，如何清除劣绅地主的恶势力，又如何为周水平报仇等所有细节。

会议结束，天色微明。大家吃了陈叔璇和蒋云兄弟准备的夜宵，然后分散到各室休息。大家刚迷糊上眼睛，紧闭的房门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打门声。朱松寿猛地从床上跳起，顺手抢过一根扁担，守候在门后，准备着与前来捕捉他们的人拼个你死我活。

陈叔璇看着这副紧张的样子，仰头大笑起来。这时大家都到齐了，围着陈叔璇都问出了什么事。陈叔璇这才大声宣布了一个消息：刚才的打门声，是江阴农协会员派人送来了喜讯——驻守在江阴城内的孙传芳联军白宝山部今天凌晨仓皇退出，过江到苏北去了。

这不啻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雷。朱松寿把手中的扁担往门角落里丢去，把几只正在打困的老母鸡惊得扑腾而起，直向人们的头顶上飞来。孙逊群一边躲闪着惊慌失措的母鸡，一边风趣幽默地说道：“北伐军一到江阴，那些劣绅地主就像门角落里受惊的鸡，不知往哪里躲呢！”

一句话提醒了朱松寿，他高声说道：“军阀部队今早退出江阴，县城必然一片混乱，一些作恶多端的特别是参与杀害周水平的官僚、土豪、劣绅就会趁乱潜出城去，不法分子也会趁机打劫，我们何不率领农协会员赶往县城，以维持秩序呢？”

大家都说这个想法好。孙逊群又作了一番分工与部署，就带着这班江阴最早觉醒的除朱松寿外都是共产党员的农运骨干，踏着澄杨（江阴——杨舍）公路细碎的沙子，向江阴疾步奔去。朱松寿高大的身躯，又大又急的步伐，一副渴望战斗的迫切的神情，在这队列中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从东门走进县城，朱松寿遵照孙逊群的安排，立即关闭了东城门。一起进城的陈叔璇、蒋云、茅学勤等人，分别关闭了其他三个城门。接着，他们爬上城墙，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上升起了国民党的国旗，并沿着城墙巡视，防止有人攀墙外逃。

江阴的城墙始建于六朝梁武帝时代，以后不断加固加高，用定制的窑砖做成墙的内外面子。墙高二丈二尺，周围九里十三步，并建有东门、南门、北门、西门等四门；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筑有城铺、城楼、窝铺一类设施，在敌人攻城时以作瞭望、藏兵、安放武器之用。在12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在这座古城里发生过多少悲壮激烈的战争，留下了多

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特别让江阴人难以忘怀并引以自豪的是明末清初阎应元领导人民抗清81天的那场血战。

那是清顺治二年（1645）夏，清军占领江阴城，强行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知县方亨强迫百姓3日内剃发改俗，激起民众反对，百余人在文庙疾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倡议守城。百姓闻讯而起，揭竿为兵，裂衣为旗。百姓推县典史陈明遇为首领，杀方亨、斩清差，除奸细，多次击败攻城清军。清军受挫，增兵10万，分16营围城，烧城门，掠富户，杀义兵，欲绝城内军民外援。军情紧急，典史陈明遇把住在城东砂山的江阴县前任典史阎应元请到城内。阎应元为人严正，军事才干出众，曾以抗击海盗而深孚众望。全城百姓推阎应元为城主和义军首领。这时，城内兵不满千、户不足万，装备物资匮乏，义兵却丝毫不乱。阎应元祭旗发令，开城门合乡兵计20余万人，分守四门。城内缺箭，阎应元即仿草船借箭法，夜间命义兵在城上树草人，得箭无数。清军炮击北门，掩护3万清军分10处扎云梯登城。义军施放炮统，用长枪抵抗，用乱石投掷。清军死伤惨重，屡攻不破，改为劝降。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武士百余名，以奉送“降礼”为名，暗带火器进入清军兵营，炸死炸伤清兵2000余人。激战数日，清军仍不得入城，又派援兵，使围城总兵力达24万，大小火炮数百门。清军炮击10余天，义军奋力抵抗。阎应元多处负伤，仍率众格杀，并亲自操炮，炸死清军无数。后终因粮弹不济，义兵疲困，寡不敌众，清军乘机入城。阎应元和陈明遇又率义兵巷战，斩杀清军数千。清军屠城三日，幸存者仅老少53口。此役，双方相持81天，城内外江阴军民死难者约17.2万人，清军损兵折将7.5万余。历史上把这称之为“81天惨案”。自此，江阴得了个“忠义之邦”的美名而誉扬天下。朱松寿踏着数百年来被守城将士磨损成一个个凹坑的城砖，眼前好像展现出280多年前那悲壮的一幕，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敬意。

下午，陈叔璇带了朱松寿和一部分农民协会会员，来到县城监狱，监狱长和大小官员都仓皇逃走，只留着几个上了年纪的狱卒，没精打采地在打饭、分菜，整个监狱弥漫着死寂、悲怆、阴冷的气息。当陈叔璇代表县农民协会宣布打开监狱、释放全部犯人的决定时，狱卒们战战兢兢，没有一个敢为牢门开锁。朱松寿早已忍耐不住，取出随身携带的铁锤，“乒乒乓乓”一阵猛砸，像螃蟹般的大铁锁纷纷落地。犯人们如打

开闸门的潮水，哗哗地涌出牢门。朱松寿感到一阵轻松。也许他此时没有想到，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自此，他自己就与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后话不提。

县城里的民众翘首以待，等待着北伐军进城。朱松寿协助孙逊群、陈叔璇工作，已顾不得回家。这几天他亢奋不已，想不到革命如此容易，北伐军一进城，江阴就是农民协会的天下，一切反动派都会跪倒在他们的脚下。果然，1927年3月21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一师全体官兵，在师长熊式辉的率领下，高呼着“为周水平烈士报仇”的口号，威武雄壮地开进江阴城。这时城门大开，沿途群众手持五彩缤纷的三角旗，列队迎接。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江阴县农民协会欢迎英雄的北伐军”、“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欢迎北伐军”的巨大横幅。按照原先的计划，部队、民众云集公共体育场（今中山公园前面），举行了数千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孙逊群和北伐军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军民游行，军乐高奏，民众欢腾，江阴古城迎来了第一个富有革命气息的、生机勃勃的春天。

确实，北伐军进城是江阴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件大事。当天，江阴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宣布正式成立，孙逊群分别担任委员长和总指挥，中共江阴独立支部拥有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和武装，虽然力量还很弱小。几天后，又成立了“办理周案委员会”，孙逊群被选为主席，朱松寿等为委员，在文庙为周水平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查封了33个周案要犯的房屋财产，逮捕和通缉了部分要犯……

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来到了！

一切劣绅地主末日的丧钟敲响了！

为了迅速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县农民协会在励实中学举办了农民运动训练班。朱松寿被独立支部送到训练班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许多新的同志和朋友，有澄西夏港的朱杏南、县城的徐鸿英、南沙的徐江萍等人。清明节后，为期两周的农训班结束，四五十名学员回到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朱松寿被中共江阴独立支部书记、江阴农民协会委员长孙逊群派到长寿组建区农民协会，领导群众惩办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晚上，他回到朱家巷看望母亲和妻子。

虽说分别才半个多月，杨绮云已饱受相思之苦。她知道丈夫在做着一项了不起的然而又充满着风险的工作，以前自己掩护他每晚外出活动，虽然也提心吊胆的，可是天天能见到他，心里还觉得比较踏实。现

在，他一个人在外面奔波，与陈祥安一类的土豪恶霸斗争，能不遭到别人的暗算吗？她甚至后悔自己以前不该瞒着婆婆暗中支持丈夫出去革命。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泪流满面，把枕巾浸湿了一大片。正当杨绮云自怨自艾的时候，一个长长大大的黑影出现在她的面前，不容她细看，两只有力的臂膀已经像两根常春藤把她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他那来势凶猛的拥抱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熟悉的气息，使她感到一阵眩晕般的愉悦。

“干得太痛快了，绮云，那些先前谋害周水平的凶神恶煞的人，北伐军一到，逮捕的逮捕了，通缉的通缉了，江阴县农民协会还要一一审判他们呢！”朱松寿气喘吁吁地说着，却并没有松开杨绮云，“真是太痛快了，现在一切权力归农会，北洋军阀的旧县署，城乡的地主劣绅，谁还敢乱说乱动！这场革命，来得太快，太及时了。绮云，你有兴趣，我带你到县城里去看看，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到处都是觉醒的群众，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农民自卫军，北伐军军纪肃然，秋毫无犯……”

“松寿官回来了吗？”话音未落，“吱呀”一声，朱老太太已经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猛然看见儿子和媳妇正亲昵着，正欲退出，已经来不及了，便稍稍侧过脸。松寿听见母亲的声音，急忙松开手，向老人家走来，却把杨绮云闹了个大红脸，羞涩地用双手捂住了发烫的脸颊。

“妈妈，你还没有睡？”松寿为了掩饰窘态，同母亲说起话来。

“你在外边没日没夜不回家，做娘的如何睡得着？”母亲接过儿子的话头，“长寿街上的人都说你爬上了城头，关上了城门，把那个守城的部队赶跑了。松寿官，这可是闯大祸的事哪！历朝历代，动刀动枪的人，哪一个有好结果？”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情绪亢奋起来，凑到儿子的耳边，“前几天，吃过晚饭，我和绮云正要关门睡觉，陈祥安突然来到我们家里，从怀中取出两块玉璧，说是孝敬我的。我定神一看，玉璧洁白无瑕，闪闪生光，果然是上等的玉石雕琢而成。”

“妈妈，你收下了？”朱松寿打断了母亲的话，急着问道。

“璧是无瑕，可持璧的人肚子里打什么主意，这我知道。陈祥安的东西，可是轻易能拿的？我朱家要的不是白璧，而是太平无事。对了，陈祥安临走时，要我转言于你，等你县城回家，他还要前来看你。他说朱陈两家，无冤无仇，在这动荡时期，应该互相照应。”老太太一口气说下去，脸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哀愁，“松寿官，你与陈祥安，做不到互相

照应，也希望你们不要成为怨家。否则，你们斗过来斗过去，对两家都没有好处。”

“妈妈，你不收陈祥安的玉璧，这做得对。你儿子参加农民协会，难道是为了一对玉璧吗？当然不是的。我们要的是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不允许存在人吃人的现象。可是，陈祥安却舍不得他的几百亩土地，舍不得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生活，也舍不得他的三妻四妾和随意抢占民女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次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要冲刷到他的头上。他企图以一对玉璧的代价，来躲避这一场革命，那是不可能的。”朱松寿把农民运动训练班上学到的理论，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后来才发觉年迈的母亲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才戛然刹车。

母亲在儿子滔滔不绝的谈话中，感到一片惘然，快快地退出了房间，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文魁呀，你如果在天有灵，就让我们的宝贝儿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她心中呼喊着重逝世的丈夫的名字，一步一颠地走出了儿子和媳妇的房间。

第四节 慕义庄宣誓

第二天，朱松寿上街找到吴子卿，两人商量了在长寿开展农民运动的步骤：先发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再组织他们向地主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当形成一定的势力后，集中力量惩办陈祥安。

长寿地区的农民像在茫茫的苦海中漂泊的孤舟，突然看到了一星灯光，陡增了生存的勇气。可是，也有甘心情愿继续受苦的。曾得到过朱松寿卖稻款救济的那个叫黑皮的人，死活不愿参加农民协会。他对朱松寿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恩德，那年没有你的帮助，我母亲早就病死了。我本应该听你的话，加入农民协会。可是这样就要今天与这个地主斗，明天与那个地主斗，地主岂是我们能斗倒的吗？他们有钱，有势，有文化，又有各级衙门做他们的靠山，一同他们红脸，这一辈子就不得安生了。”尽管朱松寿耐着心启发教育，都无济于事。朱松寿本想狠狠地批评他一顿，突然想起陈叔璇在县农训班上说过的一句话，知道这个黑皮就是属于那种革命胜利以后津津乐道分享成果而不愿冒一分风险的人，就压了压心头的怒火，走了。

1927年4月的前半个月，江阴城乡的农民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

峰。担任后滕区农民协会会长的茅学勤发动农民斗争了恶霸地主吴阮琴，将土豪劣绅俞道聘和反动牧师王森宝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顾山的王增涛带领农协会员逐丘丈量土地并进行登记。夏港的朱杏南搜集军阀部队溃退时遗弃的枪支弹药武装农民。长山的陆尔康、陆掌林带领农协会员对地主开展说理斗争，让他们捐出30多石大米分给缺粮农民度春荒……朱松寿在吴子卿的协助下，也秩序井然地做好了斗争恶霸地主陈祥安的准备，时间就选在4月16日午后。

16日上午，当朱松寿带了农协会员冲向长寿东街陈祥安家的时候，在距离长寿30多里路的江阴县城，一场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变发生了。一度被江阴人民寄予厚望赖以打散封建秩序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转了向，秉承蒋介石的密令，军长赖世璜指令一师出动部队，勾结国民党右派势力，强行对县农民协会进行封闭和对农民自卫军实行缴械，禁止一切群众运动，严令通缉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逊群以及农运负责人陈叔璇、茅学勤等人。然而这一切朱松寿却并不知道，他带领农协会员，继续向陈祥安家逼近。

这时，祝塘方向风驰电掣般地开过来一支队伍，进入长寿东街，穿过集镇，从西街向北而去。从服式和军容来看，这是北伐军的部队，从行军速度和官兵紧张的神色来看，可能出现了军情紧急变化。朱松寿正在疑虑，一个县农民自卫军战士飞奔过来，把他拉到一边，悄声说道：“蒋介石叛变革命，驻守江阴的北伐军实行清党，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孙逊群、陈叔璇等领导人生死不明！”

朱松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正要询问在这种形势下农民运动如何开展，想到那个自卫军战士说他是在关闭城门前出来的，领导没有指示，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朱松寿略一思索，认为现在形势突变，又与领导人中断联系，靠着几个农协会员徒手空拳与陈祥安斗争，必然要吃大亏。于是当即宣布会员各自回家，就地隐蔽。自己没有再回朱家巷，来到云亭季庄三姐家里暂避风头。

第二天，各种消息传到季庄。有人说，国民革命军十四军第一师在县城捕捉农协会员，抓到一个杀一个；有人说，东门城头上挂着孙逊群、陈叔璇的头；有人说，凡是参加农民运动的人，都要投降自首，否则一律逮捕入狱……还有说得更可怕的。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毛骨悚然。朱松寿虽然不会相信这些都会是真的，甚至敏锐地看出传

播这些谣言的人，无不都是对农民运动持有异议甚至刻骨仇恨的人。但是，有一点他认为不会假，国民革命军已经把原先对准军阀的枪口转向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了。这一点，他从无锡回来的人口中也得到证实：4月14日晚上，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支持和撑腰的武装商团和警察，用武力打开无锡总工会的大门，双方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原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30余人伤亡，委员长秦起负伤被捕，革命力量被迫转入地下……

最让朱松寿担忧的是，孙逊群、陈叔璇至今未有任何消息，只是从贴满城乡的悬赏捉拿他们的通告中可以推测，江阴农民运动的这些主要领导人还没有落入敌人的手中。他相信，只要他们还在，这些骨干还在，江阴的革命火种就不会熄灭。他早在童年时代跟私塾先生读书的时候起，就听先生说：江阴地处军事要冲，自古以来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磨难，千百年来锤炼出了一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性格，认准的事都要一干到底，哪怕屠城杀戮都不会反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江阴的革命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他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

这几天，他老是担心陈祥安得到讯息会派人来抓他。后来让三姐回到朱家巷探听消息。三姐回来说：“陈祥安知道县农民协会已被查封的消息，在4月16日晚上就带了人到朱家巷抓朱松寿，母亲花了一大笔钱，陈祥安才悻悻而走。”

又过了一段时间，局势慢慢平静下来。朱松寿在夜深人静之际，回到朱家巷。杨绮云看到丈夫好好的，只是消瘦了许多，禁不住悲喜交集，扑在松寿温厚的胸怀里嚶嚶低泣。这一夜，紧紧搂着丈夫的杨绮云也许已经累了，也许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甜甜地进入了梦乡，可是朱松寿却睡不着。他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军，为什么如此仇视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呢？他还很难理清这里面的深奥理论。但是，陈祥安仇恨自己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自己要反对的就是他这种靠剥削压迫农民而维系的寄生虫式的生活，这不仅危及他独霸一方的政治地位，而且会动摇他的经济基础，这样，这种斗争的性质就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不彻底摧毁其中的任何一方就不会停顿和结束。他面前又出现了周水平的头颅和尸体，也许，这也是他朱松寿的最后归宿？如果他就此退却，这一步陷得还不算深，政治上，自己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国共双方都不会怎

样为难他；生活上，外有田地河流，室有娇妻爱子，过的是舒服闲适的农桑生活，他大可以像他的父亲、祖父甚至许多代以前的祖先一样，平淡地繁衍生息，最后埋在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几尺方圆的土地上。

不久，传来了茅学勤在后塍被捕的消息，他捉摸着要不要潜往他乡。这一天，杨绮云到长寿镇上探听消息去了，母亲到离家三里多路的毗山大王庙烧香祈求神灵去了。他一人躲在家里十分压抑，正当他苦闷异常的时候，一个娇小的女人，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一手提了一个篮子，篮子里很沉，上面用一块青布蒙着，向朱松寿居住的第三进屋子走来。

“你找我有事吗？”朱松寿本来并不想见她，尤其是在绮云和母亲都不在家的時候，可是已经晚了，她已经跨进了门槛，自己找了张凳子坐了下来。

这个娇小的女人就是朱松寿的前妻刘三妹。她希望同他说话，喜欢看那高大健壮的身躯，甚至连他身上的气息也让她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现在听见朱松寿问她，连忙答道：“我积了几十个鸡蛋，知道你今春以来东奔西走很辛苦，送给你补养补养身子骨。”她把孩子拉到面前，低声催促道：“露英，快叫你爹。”

孩子怯生生地喊了声“爹”，就偎依到母亲的怀里，两眼盯着朱松寿看个不停。

两人默默地坐着。朱松寿在这个三年前曾是他妻子的刘三妹面前，觉得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说实在的，他从来就没有爱过这个女人。只是出于一种礼貌，他让她在屋里坐着。刘三妹呢，也知道朱松寿同她不会多说什么，但却迟迟不肯离开。她真希望时间就这样凝固起来，或者让自己变成一尊石像，和三年前的丈夫不即不离、不冷不热地相处在一起。

第一进的大门被人打开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正向这边移过来。刘三妹一惊，急忙拉起女儿的小手，向外走去。由于走得太急，正与进来的杨绮云撞了个满怀。她人小，脚小，心慌情急，一个趔趄，几欲跌倒。杨绮云一把将她扶住，语含双关地说：“什么要紧的事呀，走得这样急？”刘三妹不答，低着头回到第二进那三间属于她母女俩居住的房间，嘴里轻声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杨绮云告诉丈夫，她找到了吴子卿。吴子卿因为没有到江阴去出头露面，陈祥安并没有很注意他，虽然他俩有旧隙，在街上或茶馆见

上面，彼此还能招呼一声。因此，长寿街上的一些议论还都能听到。陈祥安同人说，他知道朱松寿到过江阴，参加过农运训练班，是长寿地区农民运动最得力的一名领导人。他之所以没有去抓他，是想与他交个朋友，彼此可以互相关照。一些区农民协会会员还正以为朱陈已经联合起来，背地里骂娘呢！

“陈祥安是一箭双雕，既挑拨了我与农协会会员的关系，又在拉我下水，我不会上他的当。绮云，三先生听到孙逊群、陈叔璇他们的消息吗？”朱松寿追问道。

“他从陈祥安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说是在什么地方抓住了，已经秘密处决了，尸体被抛在长江里喂了鱼。”杨绮云侧着头，边想边说道。

真有这种事吗？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这只能暴露陈祥安对农民运动的仇恨心理。但是，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干或者怎样去干，就没有主心骨。有一次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摸黑走到陈家仓，可是哪里有陈叔璇和他弟弟蒋云的影子？他还想到孙逊群的家里去寻这位农民协会委员长，转念一想，反动派正日夜通缉捉拿他，他不会傻到在家坐等待毙。

朱松寿只得继续痛苦地等待着。

1927年5月里的一天傍晚，乌云重重叠叠地布满了天空，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紧缩了许多，云层低得快要擦着屋顶和树梢了。没有一丝儿风，没有一声雷，天气又闷又热，像一个高烧的病人喘着粗气。突然，一声炸雷从天而降，随之，狂风大作，铺天盖地的雨水倾盆而下，风声，雨声，雷声，把天地间的一切喧闹都吞没了。

朱松寿点亮了油灯，陪母亲和妻子坐着。一家人默默无声，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间，第一进的大门口传来了沉重而急促的敲门声，连母亲都听见了。三人都大吃一惊，想不到陈祥安挑选了这么个恶劣的天气来捕人。朱老太太像筛糠般地推着儿子，要他去房里躲一躲。杨绮云不满地瞥了一眼婆婆，用无声的语言责怪她吓糊涂了，房间里哪能藏得住一个人呢？绮云用手指了指高耸的围墙，要丈夫越墙而走。

然而，丈夫却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侧着头，细细地辨听着外面的声音。突然，他大叫起来，“绮云，你去开门，陈老五来了！”

杨绮云凝神听着，敲门声急促而有节奏，而且有着一定的规律，先是一响，稍停，接着是连续三响。她不知道这是陈叔璇同丈夫事前

约定的暗号，但是她明白，如果是敌人来抓丈夫，绝不会这么耐心，早就拳打脚踢破门而入了。她撑了一把伞，穿上鞋，走过两个铺着砖地的天井，轻轻地打开了大门。

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老汉，戴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两只被雨水冲淋得血红的眼睛，闪烁着狡黠的光。他的头发、胡子上滴滴答答淌着水珠，一身灰色长衫湿漉漉的，紧紧地裹着他的躯体，露出一块块浑圆形的肌肉的痕迹。杨绮云吓得转身就走。高个子老汉也不咋呼，随手关上了大门，向朱松寿夫妇居住的第三进屋走去。

朱松寿正注意着大门口的情況，看见进来一个水淋淋的高个子老人，也惊诧不已。当老人走近，才忍不住伸出结实的拳头，向老人的肩膀上打去，朗声大笑起来：“叔璇，快里边坐，快换衣服，快说说怎么这般模样，你这是急死我了，我想你们想得快发疯了。对，对，你先换衣服，先吃晚饭，先好好坐坐，再慢慢说，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说。”

杨绮云转身找衣服去了，朱老太太喜忧参半地准备晚饭去了。片刻功夫，陈叔璇走出更衣室，依然是一个眉目清秀、戴眼镜、穿长衫的英俊小伙子。吃过晚饭，朱松寿示意母亲和妻子先去睡了，自己和叔璇在另一间屋子里谈起话来。

“叔璇，你怎么在这种天气来找我？”松寿问道。

“我离家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风云变幻，令人莫测。”陈叔璇神色严峻。一个月前江阴发生的那场“4·16”反革命政变，就像今晚的暴风雨一样，说来就来了，好端端的革命形势，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和屠杀所葬送了。他曾经也感到痛苦和迷惘，但是很快就振作起来了。江阴的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要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坚定分子加入这个阵营中来。朱松寿就是他最先想到的一个人。所以，他刚从外地避难回家，还没有坐定，就化装成一个老人找上门来了。

“4月16日那天，听说关闭了四边城门，你们是怎样出城的呢？”朱松寿迫切想知道那天在江阴发生的这场反革命事变的真相。

“其实，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面目，早就有所暴露了。蒋介石先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两天后，又指使无锡的国民党右派砸烂了工人纠察队的司令部，爆发了‘4·14’反革命事变。接着，蒋介石把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屠刀伸到江阴来了，4月16日那天……”陈叔璇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那场触目惊心

的反革命事变一幕一幕地重新在他眼前出现——

那天清晨，孙逊群、陈叔璇等还没有去县农民协会办公地址——关帝庙上班，江阴县城就响起了尖厉的警车声，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奔赴入城，紧闭城门并在那里戒严。由于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没有足够的准备，加上转向的国民革命军的突然行动，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缴了农民自卫军的械，封了农民协会的大门。通缉孙逊群、陈叔璇等的布告贴满了大街小巷。

当夜幕降临江阴古城的时候，天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像山冈般高耸的古城墙上，有一个黑影正在向上奋力攀越。到了城墙顶上，就机警地向四下环顾，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把随身携带的一顶黄色油布雨伞打开，两手紧紧握住伞柄，向城外纵身跳去。张开的雨伞延缓了他下落的速度，他稳稳地落到地上，不一会儿，就融化在茫茫苍苍的雨野里。这人就是孙逊群，他连夜赶到三甲里，在当地农民的掩护下，化装成病人，坐轿到周庄，乘轮船到无锡，接上了党的关系，担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

陈叔璇又是怎样摆脱敌人追捕的呢？事变发生的当日傍晚，守城的军警开了城门，允许居民在严密盘查下出入。也许，这正是敌人引诱共产党人投入罗网的奸计呢！陈叔璇和另一名农运骨干王永根也利用敌人第一天盘查可能不会太严密的心理，冒着霏霏细雨，来到东门。这时天色渐暗，各人一把雨伞遮住了自己的脸。军警果然没有细看，就让他们出城去了。两人走到陈家仓，请叔璇的哥哥用船连夜把他们送到苏州香山一位亲戚家里。风声渐渐平息，他们在香山再也呆不下去了，陈叔璇就辗转回到陈家仓，王永根乘船去了武汉。

在这次事变中，后塍的茅学勤被捕入狱，南沙的徐江萍关押江阴，数名共产党员被杀，大批农运骨干积极分子被抓进了牢房，江阴的监狱一度人满为患。而国民党右派和投机革命者攫取了革命果实，十四军第一师的一个营长做了江阴县长，青阳的右派首领李仲丹当了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改组委员会主席。江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就此失败了。

“江阴的革命就此结束了吗？”朱松寿听完了陈叔璇的叙述，一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油灯的火苗猛烈地跳动着，终于熄灭了。他掏出火柴，重又点着。

“只要革命者在，只要人民心中的火焰没有熄灭，只要人剥削人的

罪恶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推翻，那么，江阴的革命就同整个中国的革命一样，绝不会就此结束。松寿，你看呢？”陈叔璇语气坚定，两眼炯炯，给人一种很强的感染力。

“4·16反革命事变以来，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江阴要不要革命了？如果还要革命，我朱松寿愿意跟着你们再干下去。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说？”朱松寿欲说又止，引起了陈叔璇的注意。

“如果信得过我的话，那么，你就直说吧。”陈叔璇鼓励他说下去。

朱松寿正要说话，门外边响起了脚步声，接着一个声音透过门的缝隙传了进来：“松寿官，时候不早了，你就让老五住在我们家吧，外面还在下雨呢！”这是母亲在说话，弦外之音两人都明白：夜深人静，不要再说下去了，让人听见就惹祸了。

亏得母亲的提醒，朱松寿吹熄了灯，与陈叔璇一起上床休息。听得母亲走了，他附在叔璇的耳边低声说道：“老五，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员，虽然以前你从没有告诉我。为了跟着你们赤胆忠心再革命下去，我想参加你们的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叔璇点了点头，可是黑暗中朱松寿并没有看见，陈叔璇只得摸索着找到朱的手，用劲地捏了一把。朱松寿会意，没有再说什么，很快传出了两个男子低沉有力的鼾声。

在“4·16”反革命事变中窃得江阴革命政权的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委员会和县政府，他们为了巩固已得手的利益，正以百倍的疯狂通缉和追捕共产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每天，都有人落入他们的陷阱和泥坑。但是，朱松寿却因为得到党组织批准他入党的消息而兴奋不已。这一天，他按照陈叔璇的通知，来到毗山南麓的慕义庄。慕义庄是一个很古老的大集镇，镇上有一条东西方向的街道，历史上曾经繁荣热闹过。传说在明朝的时候，住在祝塘大宅村的一位徐姓大地主，为了招募天下义士，组建武装，图谋推翻朝廷，在毗山之南建造了这座村庄，取名募义庄，一时豪杰毕至，义士咸集，战马似云。后来朝廷得到消息，正德皇帝微服前来察访。徐姓地主慌了手脚，仓促间解散了武装，改村名为慕义庄，慕义庄才逐渐冷落萧条起来。这段传说，是否可靠，已难以证实。可是到了公元1927年6月的时候，慕义庄又成了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屠杀政策的革命志士聚集的地方。

在一间很不引人注目的房间里，朱松寿神情肃穆，紧握成拳的右

手举过肩头。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鲜艳如火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微弱的灯光下闪耀着醒目的光彩。陈叔璇就站在他的对面，用低沉庄严的声音宣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江阴独立支部委员会，批准朱松寿加入这个神圣的组织。现在举行入党宣誓——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积极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本书作者注：朱松寿入党时间，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江阴地方史志著作，都记载为1927年6月。今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的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书中记载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规定“出席（中共六大）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朱松寿是中共六大正式代表，按此规定，他的入党时间应该在1926年11月以前。）



朱松寿的入党介绍人陈叔璇烈士

朱松寿跟着读完誓言，觉得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涌遍全身，神圣，崇高，庄严。从这天起，他的这具躯体，已经同一项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他的生命，已不完全属于自己，也不属于母亲、妻子和家庭了，他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做到，可是母亲和妻子呢，母亲年纪大了，一时难以改变，然而妻子还年轻，难道不可以说服她以更大的程度支持自己革命？不，应该动员她一起投入这砸烂旧世界的战斗中去，成为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回家的路上，他苦苦盘算着如何向自己的妻子开口。

这时，东方微白，黑色的帷幕渐渐收去，毗山的轮廓愈来愈清晰。山坡上，那稀疏落落一人多高的松树，像站了一夜岗的战士，因为黎明的到来而精神昂然。突然，大块的乌云从遥远的天际向天空涌起，遮没了经过一夜拼搏即将脱颖而出的晨曦，那毗山的轮廓、村庄的模样，一下子都隐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朱松寿加快了脚步，流星般地向朱家巷那座三进两院堂的大院走去。

中 篇

双枪之勇



1928年3月21日傍晚，朱松寿参与指挥江阴峭岐农民暴动，1000余名农民革命军战士集中在毗山南麓中山寺前的广场上，浩浩荡荡开往峭岐镇。当夜，峭岐暴动爆发。图为毗山中山寺遗址。

(徐泉法 摄)

第一节 深夜的呐喊

太阳早就下山了，下弦月却迟迟没有露脸，初冬的一览无余的田野墨黑墨黑的，带着寒意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把没有收割的荳棵的枯叶吹得“沙沙”作响，给人一种苍凉单调的感觉。

在后塍镇附近的一丘麦田里，蹲伏着一个高高大大的青年农民，穿一身两短打的土织青布长衫，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把厚背大砍刀，在漆黑的夜间闪着灰白色的光。他密切地注视着后塍中段那座三面环水的法水庵，焦急地等待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号令。只要号令一响，他就会率领分散隐藏在四周麦地里、河滩边和荳棵岗里的暴动农民，像潮水般地向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第三分局的驻地涌去。

这人就是朱松寿。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像童年时代渴望过年一样，已经等待了许多个日日夜夜——

在慕义庄宣誓入党以后，朱松寿更勇敢地站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江阴党组织，鼓舞了党员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1927年9月10日，朱松寿奉命带着农协协会会员来到长寿镇上，制止陈祥安开设赌局，聚集不义之财。可是，陈祥安仗着有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撑腰，根本不把朱松寿放在眼里，唆使“4·16”反革命事变以后网罗起来的一批地痞流氓大打出手，数名农协会员身受重伤。

“开赌蓄娼，为民国以来法律所不容。我们在长寿禁赌，是一项合法的群众也拥护支持的正义行动，陈祥安公然毒打我们的农协委员，我们首先应该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把他的反动气焰压下去！”陈叔璇召集朱松寿等共产党员、农协会员在陈家仓开会，商议制裁陈祥安的办法。

“我们与陈祥安的斗争，是江阴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殊死作战的前奏曲。只是目前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我同意老五所说的合法斗争方案。现在，天赐良机，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陈祥安以沉重的打击！”当朱松寿把这个机会原原本本介绍出来的时候，大家一齐拍手称好。

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农协会员兴奋地说：“如果把陈祥安比作为一只

凶猛的老虎的话，那么，我们农协会员和觉醒了的农民群众，就是成千上万只勇敢的蚂蚁。一两只单独的蚂蚁也许力量并不大，但是当成群结队的蚂蚁钻入老虎的鼻子里、嘴巴里、心脏里，咬断它的血管，撕裂它的毛皮，那它就非死不可！”

与会者的情绪高涨起来，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天明以后，演出一场整治陈祥安的好戏。

9月13日上午，朱松寿随同陈叔璇率领几百农民，守候在江阴到长寿的必经要道七里庙。中午时分，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常务委员祝兆同带着四个警察，经过七里庙向长寿而去。农民群众一拥而上，将祝兆同等拦住。陈叔璇将陈祥安开设赌局的劣迹披露于众，要求祝兆同依法将其拘捕。祝兆同原是陈祥安一路上的人，今天到长寿，就是与陈祥安密谋筹建由县党部一手控制的县农民协会事宜，和共产党的农民协会分庭抗礼。因此，哪肯轻易就范？只是害怕农民人多势众，被迫答应回城去取拘票。陈叔璇知道祝兆同奸诈多变，令其写好手令，派人去江阴县公安局办理拘票。下午4时，陈叔璇、朱松寿得到拘票，逼令祝兆同同往长寿。农民队伍手持三角小彩旗，进入长寿西街就高呼口号：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恶霸地主！

打倒陈祥安！

朱松寿指挥农民包围了陈家住宅，正欲攻打，忽然街上锣声四起，一队队手执扁担、铁棍的地痞流氓凶神恶煞地向农民队伍打将过来。农民猝不及防，有几人受了重伤，朱松寿大怒，夺过一条扁担，向一个暴徒打去。农民群众纷纷上前抢夺武器，又有几人挨了铁棍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陈叔璇这时已得到一根铁棍，正欲寻找祝兆同，迫令其喝退暴徒，可是祝兆同早已不知去向。正在苦苦厮杀之际，陈祥安家的大门洞开，冲出一支队伍，把农民群众围在核心四面攻打。朱松寿一看诡计多端的陈祥安早有准备，赤手空拳的农民难以取胜，就边打边杀出重围。回身一看，陈叔璇正被一群暴徒包围得密不透风，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他吼声如雷，返身杀入，掩护陈叔璇突围。当晚整顿队伍，农民重伤6人，轻伤20余人，史称“长寿事件”。

“长寿事件”以后，陈祥安更是有恃无恐，在这次帮助他打退农民队伍的暴徒中，挑选了一部分强悍之人，组成长寿自卫团，其中有团丁和

团员两种，团丁发给武器，脱产吃饷，团员不脱产，需要的时候，将他们召来，充当陈祥安的打手。而脱产和不脱产的经济负担，都转嫁到长寿镇的民众身上。

朱松寿在同陈祥安的两面对面的斗争中，都吃了大亏。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陈祥安和一切把共产党与农民协会视作仇敌的土豪劣绅，他们背后有国民党县、区、乡政权的支持，手中有自卫团和武器，如果靠合法斗争要求他们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那如同要求毒蛇猛兽自己把皮剥下来一样，是根本做不到的。陈祥安有武器，我们为什么不拿起武器和他们干呢？自此，他日夜想着能有一支枪，不，要有好多好多的枪，农民们都武装起来，呼喊着重向反动派冲去，打开他们的住宅，把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甚至占领国民党的公安局、县政府……

1927年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批准下正式成立，蒋云担任县委书记，陈叔璇等担任县委委员，遵照省委要以主要力量开展农民暴动的指示，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积极地做着准备。朱松寿知道与反动派大干一场的时机来到了，以最大的热情协助着蒋云、陈叔璇工作。10月17日，县委在顾山沈舍里召开周水平烈士追悼大会，三县边区的数千农民涌向会场。朱松寿亲眼看到群情如此激愤，只要县委一声令下，必然应者如云。他多次在蒋云、陈叔璇面前询问农民暴动何时进行，而蒋云、陈叔璇总是因为没有武器而一时下不了决心。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共江苏省委派钱振标（1895~1928）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回江阴指导农民暴动。（作者注：上世纪90年代江阴市党史地方志部门编写出版的史志著作，都记载钱振标在1927年10月10日担任江阴县委书记。经本书作者之一徐泉法和党史工作者潘明清考证，这样的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钱振标的身份是江苏省委特派员，没有担任中共江阴县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应是蒋云。）

钱振标，1895年出生于江阴西郊能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从小



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江阴农民革命军总司令钱振标烈士

卖过大饼、油条。1915年，钱振标考进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在江阴、丹阳等地学校执教。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成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通过《民国日报》广泛征求党员。这年暑期，他到执行部接洽入党之事，受到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和胡汉民部长的接见，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1925年4月，他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共产党。5月，他受李大钊派遣，以中共特派员的身份，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又随西征部队远征甘肃，担任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到达兰州后，他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秘密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并与宣侠父、张一悟等共产党员一起，于1925年底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钱振标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回到南方，10月，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回到江阴。他一到江阴，就向全县100多个党员传达了省委关于农民暴动的决定，批判了没有武器就不能暴动的思想，与会者的暴动意识很快就鼓动起来了。

朱松寿在“长寿事件”失败以后，原本就朦朦胧胧地滋生了暴动的思想，现在听到钱振标这样明确、这样坚决、这样毫无余地的论述农民暴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知道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湖南、江西、广东等省风起云涌的秋收起义的形势，热血沸腾起来。他一面接受县委的分工，在云亭、长寿、祝塘一带农村加紧活动，一面在暗暗寻觅武器。苦于枪支难搞，用钱向民间买了一把厚背大砍刀，藏在自家田边的荳棵岗里，每当夜深人静，就在野外演习起来。由于他自小好动，力气又大，只几个晚上，就无师自通地舞得呼呼风生，在月光下只看见一团游动的白光。

他觉得还必须学会使枪，一旦农暴成功，夺得枪支，仓促间谁来打枪？困难的是既找不到枪，又没有懂使枪的人，如何能学会打枪？一日，他在乡间动员农民参加暴动的时候，偶然得悉有一个在光绪年间曾在清军当过兵的老人，晚年穷困潦倒，无以度日，他灵机一动，背了些米麦到老人家中。老人热泪盈眶，伸出枯柴般的大手在空中颤抖。过了几天，朱松寿又带了些衣服送给老人。老人拉住松寿的手不放，眯起昏花的泪眼瞅着这位年轻人，好像要从他常常堆着笑容的脸上瞅出个子丑寅卯来。可是年轻人二话不说，返身就走。又过了几天，朱松寿第三次走到老人家里，从青布长衫的口袋里摸出一大把银元，塞到老人的手里。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不然你带来的粮食、衣服和这银元，我什么

都不要。”老人坦率地说道。

“我要拜师学艺。”朱松寿正要下跪，被老人一把拉住。

“我一不懂泥水木工，二不懂裁剪成衣，三不懂买卖赚钱，你跟我学什么艺呢？”老人为难地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无艺可授。

“跟你学打枪，”朱松寿做着手势，“我要学会打枪，学会打各种各样的枪。”

老人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容，想不到自己年轻时候在清军学会的这一套早已被人鄙视的知识，竟然受到这个高个子青年人如此的器重和青睐，可是很快又暗淡下来，问道：“你学习打枪，又为哪般？再说，我身边没有一支枪，如何教你？”

“学文习武，都为报效国家，”朱松寿说，“你老人家不必生疑，也不必为难，我只是要你说说一般枪械的主要结构，如何上弹，如何瞄准，如何击发，以后有机会从军入伍，可以一学就会。”

老人点头答应，每天都给朱松寿讲习枪支弹药的知识，并找来长短两根树棍，分别代替长枪和短枪，练习瞄准。七八天下来，朱松寿心中有了谱儿，便拜别老人，继续发动他朝思暮想的农民暴动去了。

1927年11月1日，宜兴县农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在苏南率先举行暴动，以公开的武装斗争的形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予以回击。数千暴动农民占领宜兴县城，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呼喊“一切权力归工农委员会”的口号，公开审判和枪毙了数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当众烧毁了借据、田契和租簿……第三天黎明，暴动农民有计划地撤出宜兴城。

这个消息，使江阴县委的领导同志坐不住了，省委特派员钱振标、县委书记蒋云加快了暴动的实施计划，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宣布成立江阴农民革命军，钱振标任总司令，出狱不久刚被吸收入党的茅学勤（1900~1929）任副总司令。

11月9日傍晚，无锡县东北乡农民暴动的呐喊声传到江阴县委领导的耳朵里，江苏省委又一再严厉地督促江阴方面尽快行动，钱振标、蒋云、陈叔璇、茅学勤、朱松寿决定首先在后塍举行暴动。后塍镇在江阴城东40里，不仅距离县城较远，而且因为今春在茅学勤的领导和发动下，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如果暴动成功，可以继而解决相毗邻的杨舍、华士、顾山诸镇，与无锡的东北乡连成一片。更诱

感人的是，后塍镇法水庵，驻有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第三分局，有毛瑟枪10支，警察、巡士20余人，加上禁烟检验所的2支，共有12支毛瑟枪，能够把这批武器夺过来，对农民革命军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11月15日傍晚，朱松寿按照县委的部署，带领一队暴动农民，悄悄地来到法水庵附近潜伏下来。

夜愈来愈深了，初冬清凉的水汽洒落到朱松寿和他率领的暴动农民身上，凝结成一层薄薄的银霜，甚至连他们随身携带的大刀、铁棍、锄头、木棒、镰刀上面也布满了白霜。一轮弯弯的下弦月像迟到的小学生害怕见到老师似的，一钻出地平线就在鱼鳞般的云片中躲躲闪闪。后塍镇像火山爆发前一样静极了，街上的电灯早已熄灭了，只有法水庵前还亮着灯，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岗哨抱着一支毛瑟枪，紧紧地蜷缩着身子，没精打采地打着哈欠。朱松寿借着田边堆土的掩护，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法水庵前的动静。他恨不得一个箭步冲上去，夺下岗哨手里的毛瑟枪，再率领周围埋伏了半夜的一个个眼睛冒火的农民冲进法水庵。可是，他不能，按照事前的周密安排，解决岗哨不是他的任务。

突然，朱松寿看见一个戴着呢质礼帽、身穿黑色长衫的青年人，迈着潇洒的步子，向法水庵门前走去。刚才还耷拉着脑袋的岗哨，像猛然发现老虎就在面前的山羊，陡地警觉起来，枪栓拉得乒乓作响。他定神一看，原来是学田圩小学的茅校长，于是堆着笑脸问道：“茅校长，这



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朱松寿参与指挥三次后塍农民暴动，图为当年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第三分局驻地后塍法水庵。

么晚了，还到哪里去呀？”

“我要找你们的局长，”茅学勤一边回答，一边向前走去，“有一件机密大事，要向局长当面禀报。”

“局长不在家里，”岗哨似乎觉得不应该说出局长的去向，马上改口道，“局长有过指示，晚上不……”

岗哨的话还没有说完，茅学勤像敏捷的豹子一样猛扑上去，两只铁钳似的大手死死地卡住了岗哨的脖子。朱松寿看到这里，举起厚背大砍刀，在空中一挥，大声呼喊：“同志们，冲啊！”他一跃而起，直向法水庵门口冲去。几乎同时，钱振标从另一方面冲杀出来，手里握着这次暴动唯一的一支六英寸小手枪，向法水庵冲去。黑压压一大片愤怒的农民，手里举起的大刀、铁棍、锄头、木棒，像从哪里移来一片森林似的。他们跟着钱振标、朱松寿像洪水决堤一样向法水庵冲去。茅学勤在两个农民的帮助下，把早已准备好的浸透了火油的棉絮团塞进那个岗哨的嘴里，又把他绑了个结实，由两个农民看管着。处理结束，茅学勤又向法水庵冲进去了。

朱松寿和钱振标冲在农民队伍的最前面，绕过一排房子，前面十几个警察一字儿排开，其中一个警察高声喝道：“农民兄弟们，你们好端端的冲什么公安局呀，这是杀头坐牢的事。你们再不退出，我们就要开枪了！”话音未落，面前窜过两条黑影。警察把头一低，肩膀上已挨了一刀，他摇晃着身子，正要举枪射击，朱松寿的大砍刀又向他头部劈去。警察丢下枪支，嚎叫着向后奔逃。朱松寿夺过枪支，高高举起，漆黑的枪杆在电灯下发出诱人的光芒。农民们受到鼓舞，各自举起手中武器，向警察们打去。一时间，枪械碰击声，农民呼喊声，警察怒骂声，挨刀着棍者的呻吟声，混成一片，法水庵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警察因为局长外出，未有命令，不敢贸然开枪。结果大部枪械被暴动农民所夺。

大院里的战斗并没有结束，朱松寿遵照钱振标的命令，又带了部分农民革命军搜索公安分局的办公室、饭堂和卧室。当他持枪冲进一间卧室，室内空无一人，正欲退出，忽听得头顶上一声喝叫：“松寿官，你有田不种，有房不住，有漂亮的妻子不断守在一起，却领人造反，打劫公安局，你需记住，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朱松寿抬头一看，见是一个胖胖的巡士，躲在卧室的小阁楼上，一支黑色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只要一扣扳机，自己就会脑浆迸裂而

死。他猛然想起此人小名阿胖，原是邻村的一个少年同伴，早年随经商发了财的父亲搬到江阴城里去了，于是冷笑道：“阿胖，这里枪声一响，激怒的农民赶到这里，会将你打成肉泥。终然被你逃走，日后抓住，也难免一死。农民暴动，并非对准你们，你又何必去为国民党政权卖命呢？”朱松寿说着，把手中枪支放在一边，“今天，你留下武器，我朱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你逃走，日后见面，仍是朋友。”

胖巡士想，今日打死朱松寿，只是打死了一个领头造反的农民，算不得英雄好汉，如果日后农民造反成功，自己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不如灵活点儿保得性命，再作计较。想到这里，胖巡士跳下阁楼，交出枪支。朱松寿收下武器，网开一面。想不到这个要紧的动作，被公安分局的一个小头目看见。胖巡士心中一愣，但已顾不了许多，一溜烟地飞蹿而去。

这时，朱松寿和钱振标、茅学勤汇集一起，共缴到8支毛瑟枪、若干发子弹以及一批警服、刺刀等战利品。暴动农民高举手中的大刀、铁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庆贺第一次农民暴动的胜利。

“振标，后滕暴动一举成功，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鸣枪40，以鼓舞士气，威慑敌人，以利再战。”朱松寿请求道。

钱振标爱惜地抚摸着缴获到的毛瑟枪，正在考虑是否合适，茅学勤说道：“让枪声随同这次暴动一起载入史册，也让枪声告诉敌人，农民革命军是战无不胜的！”茅学勤说罢，钱振标圆睁着暴突明亮的眼睛，兴奋地喊道：“长脚，这个主意好呀，你看怎么放呢？”

长脚是朱松寿的绰号，只在几个亲近的同志中叫唤。他想了想，有了主意：“我们缴到8支毛瑟枪，每支枪装上5颗子弹，然后发给8个会打枪的战士，同时开枪，声音一定传得很远。”

钱振标、茅学勤都点头同意，鸣枪的事就交给朱松寿去办了。朱松寿迅速地打开弹仓，在8支枪中装上子弹，围着的农民革命军战士看得呆了，都不知道这位“长脚”什么时候学会使用枪支的。接着，朱松寿把7支上弹的毛瑟枪交给7位能打枪的革命军战士，自己留着一支，枪口一齐向上，高喊一声：“放！”“砰、砰、砰……”一眨眼间，40颗子弹穿过枪膛，向空中呼啸而去。枪声标志着江阴觉醒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跨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的第一步。

“农民暴动胜利万岁！”

法水庵上空，伴随着清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声浪，在空中回荡。

农民革命军退出法水庵的时候，钱振标下令点火烧房。一时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江阴县公安局第三分局就像它所维护的国民党政权一样受到严重的挑战。

暴动农民按照原定计划，呼喊着重“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冲向后塍东弄一位姓俞的劣绅家里。主人闻讯早已逃走。朱松寿带着一队人正在搜寻俞家的田契、债据、租簿，翻遍大箱小柜，都没有看见一个银元。钱振标说：“不要搜了，一把火连同房屋烧个精光，难道还会留下田契、债据不成？”朱松寿又让人点火，火苗直向屋顶窜去，只听得屋内叮叮当当像下着冰雹一般。有人冒着灼热的气浪，探头一看，原来是藏在屋顶上的银元因梁椽烧断，没有了依托，纷纷掉在坚硬的方砖地上。“这家伙也真够狡猾的。”朱松寿骂了一声，跟着钱振标、茅学勤，带着队伍，向后塍东北方向撤去。

后塍街上，留下了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标语：

枪毙县长孙揆均！

火烧县政府！

革命成功万岁！

第二天，正当钱振标会同茅学勤、朱松寿等农暴骨干在一个村子上总结后塍暴动经验的时候，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长张品泉亲率三个排的警察和驻澄（即江阴）部队的两个连，在后塍通兴桥的暴动指挥所抓去一个14岁的姑娘。这次事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朱松寿和他的战友们还蒙在鼓里呢！

第二节 不平静的家庭

后塍暴动后的一个晚上，天刮着很大的风，带着强烈的寒气，送向隐没在夜幕中的一座座村庄。人们在这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冬天，早早地关门睡觉了。朱松寿在熟悉的村落之间穿行，竟然没有遇到一个人，心中暗自得意。自后塍暴动后，他的名字像大雪天中的雷声一样引起江阴东乡人的关注和议论，公安局长张品泉把他作为后塍暴动的主犯四下

捕捉。这次，他是奉钱振标之命，回家取钱资助县委活动经费来了。

他轻轻敲了几下门，住在第二进的刘三妹还没有睡，走出屋来打开了院子的大门。一看是朱松寿，暗中吃了一惊。吃晚饭的时候，她就远远地听见朱老太太在念叨儿子，说好好的一个殷实之家，要葬送在儿子的手里了。联想到近日村上的风言风语，好像是朱松寿参加了烧杀法水庵暴动。这是灭门抄斩的罪行。现在，他回来了，老太太能放他过去吗？她向他使了一个眼色，可是朱松寿并没注意，径直向第三进屋走去。

老太太和杨绮云都没有进各自的房间，坐在一起说着话儿，只听见老太太说：“绮云，你就真的不知道松寿官在哪里吗？”

“婆婆，”杨绮云说，“我也天天想，夜夜盼，就是不见他的影子。现在外边这么乱，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养子难养心哪。”老太太叹了口气，“还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发了高烧，吃了药都不退。我听人说长寿街上的一个郎中从无锡买回来一箱冰块，可以退烧。他爹又不在家，我只得自己去了，花了10多个银元拣了一块拳头大的冰。郎中说在阳光下拿不回家，要用棉衣包裹。我又买了一件新棉衣，把冰包了赶回家，打开一看，冰都化了，我急得哭了起来，正想把棉衣丢了，觉得冰凉冰凉的，灵机一动，就把那湿漉漉凉飕飕的棉衣贴在孩子的额角上，想不到热就此慢慢退了……”

站在门外的朱松寿鼻子一酸，这个故事他以前听母亲讲过，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打动他的心。他再也忍不住了，轻轻敲了敲门，绮云问了声：“谁呀？”听见丈夫的声音，就“吱呀”一声开了门。

朱老太太被这突然的场面惊喜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松寿呢，知道母亲心里有气，硬着头皮准备承受暴风骤雨般的训斥。沉默了好久，朱老太太伸出颤巍巍的手，拉着儿子像铁块般结实的大手向门外走去。

“婆婆，你今天怎么啦？”杨绮云追进一步，不安地问。

老人像中了邪不说一句话，一直把儿子拉到朱家大院的第一进。“这三间屋，是长工们居住和堆放稻谷用的。”老太太说，“从这里开门出去就是砖场，麦收稻起，雨过就可以脱粒，小户人家盼了几十年，也铺不起巴掌大的一块砖场。砖场南端有三间瓦屋，是我们家碾米用的，每年秋冬时节，长工们就在那里碾米，晚上累了，可以烧水洗浴，里面砌着浴锅。”

朱松寿紧紧抿着厚实的嘴唇不说一句话，母亲说的，他这个长了二



坐落于江阴市周庄镇长寿朱家巷的朱松寿烈士故居（背面）（徐泉法 摄）

十七八岁的儿子，难道还不知道吗？母亲一定有着很深的用意，今天且耐着心听下去再说。

老太太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第二进。“这东面一间是地板房，刘三妹母女俩住着。其余四间，是我们家存放白米的仓库。”刘三妹听见老太太的声音，急忙开出门来，看见松寿的一只大手被母亲抓着，后面紧紧跟着杨绮云，知道一定为松寿的事母子闹翻了，自己不便去凑热闹，就小心地把门关上，从细小的门缝里观看着外面的动静。

母亲执拗地让杨绮云打开一间间仓库，果然，里面囤着新碾的白米、刚入仓不久的黄豆、夏收入库的小麦。

“这是你和绮云的房间，”朱老太太用手指了指第三进靠东那间的地板房，“绮云是你自己寻找的媳妇，她漂亮、贤淑、聪慧，你们的孩子也长得白白胖胖、活活泼泼……”

杨绮云倒被婆婆说得红了脸，甜甜地喊了声“婆婆”，意思要老人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没有用，她又打开后门，因为天黑没有走出去。“屋后是一丘田，是我们家最近最肥的一丘田。往北有一条河，屋子的东面也有一条河，洗衣、淘米、养鱼、种菱，爱怎样干就怎样干。”老太太把门关上，“两边还有侧厢，大多空着。这前后两个天井，冬晒太阳，夏可乘凉。”

“妈，这些房屋、田产，是你和爹留下来的财富，我和绮云不会忘记的。”朱松寿理解母亲的一番苦心，用好言安慰着老人。

老太太并不满足儿子的话，放松了手，冷笑一声道：“松寿官，人家造反，是为了无米下锅，无衣裹体，无钱娶媳妇，没有本领养活一家子人。你去造反，和他们相反，是为了要毁掉满仓白米，毁掉房屋田地，把好端端的媳妇往火坑里推，把我这副老骨头往死路上送，把一家人搅得鸡犬不宁，东抛西散！我说松寿官你是好硬的心肠啊！”

说完，朱老太太痛哭起来，由于夜深人静，朱家又是被人注视的人家，她不敢放声悲号，只是低低地压抑地抽泣，像一只受伤的猫，在呜呜地叫。她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如何经得起这般过度的悲伤？松寿和绮云坐在她的面前，百般劝导，都无法中止她的哀哭。朱松寿急得慌了神，忙对绮云说道：“你去叫刘三妹来一趟，她同母亲感情好，也许能劝醒她停止哭泣。”

可是，朱老太太看到刘三妹跪在自己膝前，苦苦劝说，感到朱家对不起这门媳妇，郁郁攻心，终于一头倒在地上，昏厥了过去。

朱松寿从小一向孝顺母亲，今天看到母亲伤感得这般模样，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他也扑地跪了下来，在母亲的前胸轻轻地捶打，轻声呼唤着。杨绮云端来了一碗温水，一汤匙一汤匙地喂着婆婆。刘三妹出身富裕之家，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为老人掐着人中。折腾了好一会工夫，老太太终于苏醒过来。朱松寿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妈，你不要难过，有话慢慢地说。我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听信人家的瞎说，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真的没有去。”朱松寿把母亲扶了起来，贴着她的耳朵，温顺地说。

朱老太太见儿子这般体贴自己，心里好受了许多，决定趁热打铁，进一步感化儿子。她伸出苍老而干瘪的手，揉了揉红肿的眼睛，用那发哑的嗓音对儿子、也是对依偎在身边先后做过她媳妇的两个年轻女人说道：“我这个儿子，得来不容易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唉，我从没有给你们讲过，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这些事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就是像我到了70多岁的年纪，还觉得开不出这个口。如果不是为了松寿官好，我真要让这些往事，带到棺材里去了……”

老人侃侃地说着，几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又一幕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朱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长得楚楚动人，嫁给朱文魁后，很受丈夫的宠爱。小夫妻俩甜甜蜜蜜地生活着。一年以后，她怀上了孕，朱文魁喜

欢得不得了，天天盼望给他添个头生子。她也很有信心，腹中躁动的男孩，从那一方说，都像那些生过男孩的女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儿子的料。临盆那天，丈夫守在产房外面，凝神进息地等着倾听着里边传出儿子的哭声。当妻子经过一阵阵痛苦的挣扎终于把孩子挤出自己躯体的时候，丈夫因为得到了不如意的消息，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好像刚才不是妻子而是自己在生孩子。

朱文魁是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财主，原本希望妻子头胎给他朱家带来个大公子，结果期望越高失望越重，怨恨妻子没有为他争气，他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第二胎上。真是老天与朱家作对，第二胎竟又是个“赔本货”。他不甘心，自然是不甘心的。可是妻子偏偏迟迟不怀孕。他开始冷言冷语，继而骂骂咧咧，一切沉重的家务劳动，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妻子自怨命苦，忍气吞声地忍受着。又等了几年，妻子终于怀了孕，可十月怀胎，生下的仍是个女孩！

一气之下，丈夫就领养了一个男孩，而且当着家庭成员的面宣布：妻子因为没有为朱家生过一个儿子，所以没有资格当家。事实也是如此，她在朱家的地位，只能算是一个有资格可以和男主人睡觉的女佣人。

40岁那年，她第四次怀上了孕，丈夫和她都不抱任何指望了，反正领养的孩子也很乖巧，没有儿子是命中注定，谁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孩子落地的时候，果然又是一个女孩。好在朱家富裕，不愁养不活孩子，朱文魁仍像前三个女儿那样养育起来。

又过了几年，妻子已经是四十三四岁的人了，已经不是生儿育女的年龄了，朱文魁早已死了这条心。妻子表面上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面对大囤的米麦、满箱的衣裳、白花花的银元，却没有半分掌管权力；可是，她的内心深处像断离了树干的柳枝条，并没有失去生的希望。有一天，平时很少出门的她到外嫁的大女儿家小住，看见村边的大路上走动很多女人，穿戴得花花绿绿的，每人手里都挽着一只精致的竹篮，篮里放着一筒一筒的香。她大着胆儿拉住一个年龄比她大一点的女人，低声问道：“请问大姐们到哪里去呀，这么穿红戴绿漂漂亮亮的？”

那个女人脸儿腾地红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听说毗山大王庙的观音娘娘近年显灵，我们去许许愿，说不定能送个儿子给我们呢！”

“大姐难道也没生养过儿子？”朱文魁的妻子怯怯地问。

“不瞒妹妹，我今年48岁了，前后生过8个女儿，就是没见过儿子的

影子。我想，大慈大悲的观音娘娘总要可怜可怜我了。”女人说着，触到了心灵的痛处，大颗大颗的泪水往下掉。朱文魁的妻子遇到这个同病相怜的人，眼圈儿也红红的。也就在此时，她深藏在心底的希望燃烧起来，向这个女人告了别，三脚两步地回到大女儿家里，里里外外地寻找着竹篮和香，跟着那些烧香求子的女人向毗山上走去。她那双很少出远门的小脚，噔噔噔地走得很有精神。

毗山是一座并不很高的山，即使站在平原水乡的角度来说，它也算不得挺拔和峻峭。山呈东北-西南走向，延绵3里多路，有几个小小的山峰，像大海里起伏的波浪。山上树木很少，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松树，也无人照料，随其自生自灭。可是，就这么一座小山，却建有三座寺庙。西山顶上叫玉皇殿，距玉皇殿一里多路的毗山中段，在山南建有一座中山寺，原名能仁寺。

第三座寺庙就是在毗山东山头的大王庙。朱文魁的妻子跟着那些烧香的女人爬到大王庙的广场上，已经气喘吁吁，热汗淋漓了。这时占地并不太大的广场上已经热闹得很了，三个一群、四个一簇的人站在两棵古银杏树下擦汗，做着进香的准备工作。稍过片刻，朱文魁妻子就随着人群跨进一座山门，第一进房屋共有三间房子，并没有佛像。这进房子的背后，是一进五间高大畅通的大殿，正中间坐着大王佛像，右边是关公，左边就是观音娘娘了。各个佛像面前，都站着不少人，轮流着给佛像烧香、叩头，整个大殿内弥漫着浓烈的烟雾，既给人一种庄严肃穆身处仙境的神秘感，又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朱文魁的妻子走到观音娘娘面前，先把香点着，当轮到她进香的时候，就小心地把香插进香炉里，然后跪倒在地，无声地诉说着自己没有生育男孩后如何受到丈夫的虐待和族人的奚落，如何祈求慈悲的观音娘娘恩赐她一个儿子，得子后如何捐款重塑金身……她在心里说着说着，完全忘了这里是毗山的大王庙，好像在同一个很知心的女人诉说着这辈子的不幸，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这个大姐怎么老跪着不起来呀？”旁边的女人等得时间太久了，忍不住埋怨起来。这时她才回过神来，赶紧站起，把进香叩头的地方让给别人，正好与那个生了8个女儿的老大姐相遇。老大姐把她拉过一边，贴着她耳朵说了几句什么话，朱文魁妻子连连点头，那张白白的已经爬上不少皱纹的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钻出人群，独自下山去了。

她遵照那个大姐的嘱咐，不能再在女儿家住下去了，当天返回朱家巷，满脸春风，一下子年轻了10多岁。朱文魁并不知道妻子为什么变得这样温柔、这样妩媚、这样富有感染力，自然满足了她的要求，接连亲昵了几个晚上。

现代的人们自然不会相信观音娘娘会馈赠爱子，可是，朱文魁的妻子却实实在在怀了孕，而且9个月后真的生了一个鲜灵灵白胖胖的儿子。她在朱家一下子从女婢的位置上升到女主人的地位。她感激佛力无边的观音娘娘，满月后不仅悄悄地向大王庙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而且从此就信了佛教。接着，她把全部的爱一股脑儿地倾注到儿子身上，就像一个不懂得养花的人每天向他心爱的花儿灌注过多的肥水一样。她想起要给儿子起一个名字。她记得那天上山求子，看到毗山上长着一些松树，虽不茂盛高大，生命力却是挺旺盛的，也耐旱耐风，就题名松寿，又名寿华。可是又不忍心直呼儿子的名字，于是又在“松寿”两字的后面加了一个“官”字，从此“松寿官”就不离她的口，叫得亲亲热热、甜甜蜜蜜的。连她的四个女儿和村上比较亲近一点的人，都这么称呼她的这个宝贝儿子。

松寿到了读书的年龄了，家中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儿子玩性甚重，先生布置的抄书作业常有完不成的，她就替儿子代写了。当先生查出其中舞弊，知道是女主人所为，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儿子喜爱蟋蟀，有时捕捉不到啼哭时，她就让还没有出嫁的两个女儿替着挖墙脚，翻砖块。以后儿子又爱上了养鸟，她让人从长寿街上买来很昂贵的鸟笼，又让长工们停了田中活计到处捕鸟。再后儿子与穷人的孩子交上了朋友，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就常暗中资助。她知道后就把东西直接送到那些穷孩子的家中，以讨儿子的欢心。

当儿子进入成年以后，她才吃惊地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傻事：松寿官不仅不懂得治理家产，而且还把家里的钱财源源不断地外流到他的穷朋友家去，这样下去，朱家有金山银海也要被儿子挖空。她蓦地想起一句古老的俗话：“求来子，不是发，就是败。”虽然她从来不肯公开承认松寿官是向大王庙观音娘娘求来的，但是，她心里却并不否认这个事实。“从小看看，到老一半。”松寿官要振兴家业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朱家就要败在这个宝贝儿子的手里了。想到这里，她像吞了麦芒一般的难受。于是她果断地决定，将多年积蓄下来的原本计划添置田产的

银元购置砖石木料，在朱家宅基上建造了第三进高高大大的瓦房。她私下里想过，儿子不图长进，添了田地也会被他卖掉，我造上房屋，他总不会拆了去送给穷人吧。老人自然不会想到，在她暮年的时候，不只是原先的老屋几乎拆光，就是新建的第三进，也拆成一片平地。不过不是儿子所为，是其他人所干罢了。

现在，这个朱家唯一的继承人，竟然走上了一条极其可怕的道路——参与了后滕农民攻打政府公安局的大逆不道的事，其严重的后果是任何一个老实本分的人都能知道的。这叫朱老太太如何不急，如何不愁，如何不苦呢？

“松寿官，”朱老太太对坐在她膝前认真听着她追述往事的儿子说，“你可以不要命，不要家，像许许多多历史上造反的英雄好汉一样。可是，朱家不能没有你，你的媳妇和我的孙儿不能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不能没有你，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叫我如何向死去的你爹和朱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啊？”说罢，又嚤嚤抽泣起来，杨绮云和刘三妹在一边陪着流泪。

朱松寿第一次听到隐藏在母亲心中的秘密，虽然对求子的效果如何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也不同母亲去争，这自然是争不清的。然而，母亲过了不惑之年得子，她的幸福，她的希望，她晚年的安慰，同自己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了。如果自己在农民暴动中牺牲，或者遭到敌人的逮捕而被杀害，那么，这位70多岁的年迈的老人，她能顶得住，她能勇敢地活下去吗？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它不只是一定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要牺牲家庭的利益，甚至家庭成员的生命。当然，他不会知道，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还会牺牲个人直至整个家庭的荣誉！

他一语不发，不知道怎样安慰心胆欲裂的年老的母亲，也不知道随着革命的深入，他的一家会发生怎样恶劣的后果，他甚至觉得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育孩子，也就不会过多地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干扰和障碍……

朱老太太收住了泪，发现儿子呆呆地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心痛他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伸出一双干枯的衰老了的手，摇晃着儿子铁一般坚实的臂膀。“松寿官，你不要难过，妈是为你好，只要你答应不做那样的事，妈就不哭了，真的不哭了。”她勉强地露出了一点儿笑容，只是

拌着老年人的泪，显得那样悲怆和压抑，“妈还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依你。”

天快黎明的时候，刘三妹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朱老太太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杨绮云寸步不离地陪着丈夫和婆婆。当婆媳俩醒来的时候，不见了朱松寿。杨绮云急忙回房间去找，那里有丈夫的影子？她只得如实告诉了婆婆。老太太知道儿子又走出去了。昨天一夜的劝导白费了精神，“松寿官——”她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两只干瘪的手像冬天野外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第三节 虎入牢笼

这一夜，朱松寿看到母亲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觉得任何语言都不能抚慰老人创伤的心灵，再留在家中，天明以后只能在母亲痛苦的伤口中撒上一把盐，而且增加一分被反动派捕捉的危险。于是趁着母亲和杨绮云睡意朦胧的时候，悄悄地进入房间，取出一包银元，摸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你看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走到陈家仓，找到陈叔璇，把家里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对陈说了，“为了不牵连年老的母亲，我想干脆登个报，和家庭脱离关系。”

“这样做，正好被国民党抓住了把柄，要说共产党是一伙不要母亲，不要妻子，不要家庭的六亲不认的人，离间我们同群众的关系。”陈叔璇连连摇头，唯恐面前这位入党不久的同志因为要摆脱家庭的牵连而做出不利于革命的蠢事来。“再说你脱离家庭，会把正在痛苦万分中的伯母逼上绝望的深渊，而反动派却会变本加厉地迫害你的母亲和妻儿。是不是这样？你可以再想想。”

“我这个人就是见不得母亲的眼泪。”朱松寿沉默片刻，继续说了下去，“她给了我很多爱，当然，这其中不少是溺爱、偏爱、宠爱，因为我的出生改变了她在朱家的地位。她希望我能继承家业，发展家业，最低的要求也要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养儿育女，繁衍生息。现在，我连她老人家最低的要求也难做到，难怪她要生这么大的气！我自己可以坐牢，可以流血，可以牺牲，可是一想到母亲，如果由于我的原因锒铛入狱，

心里就很不平静。”

“革命就是牺牲。”陈叔璇也激动起来，“参加共产党，就是牺牲得更早，更彻底，也更全面。我无法猜测革命胜利后如何来评价这个问题，至少我们现在的共产党员是这样。你家是这样，我家也是这样，茅学勤家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迫害，你也许还不知道吧——”

原来，后塍暴动的第二天，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长张品泉率领3个排的警察和驻军的2个连，杀气腾腾地开到后塍镇，经过一番侦察，知道了这次暴动的总指挥机关设在后塍附近的一个村子上，捕去了一名14岁的小姑娘。奸诈的张品泉知道女孩年幼无知，皂白难辨，就让几名警察装扮成上面来指导农民运动的首长，急切要找到高大鹏、王天民两人。当着小姑娘的面，又拿出一袋子银元，欺骗说这是上级发给这两位司令的经费，如果不能及时送到他们的手里，江阴的农民运动就要受到损失，土豪劣绅就要反攻倒算，你们这些支持农民运动的人都要关进监狱。小姑娘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真想一下子帮他们找到高大鹏、王天民这两位司令。她想了想，告诉这两个伪装的首长说：“我认识王司令，他就是学田圩小学校长，我是他的学生，怎么会不认识呢。”“那个高司令呢？”警察迫不及待地追问。“我见过高司令，可是不认识他。唉，你们找到了茅校长，不就可以知道高司令了吗？”小姑娘十分天真地说。敌人如获至宝，释放了这个女孩，当天就包围了后塍学田圩茅学勤的家。学勤不在家，张品泉就命令警察将茅学勤的父母和哥哥茅学友当场逮捕，又将茅学勤家房屋一把火化为灰烬。此外，张品泉又在学田圩及附近村子抓去了20余个农民。至今，一人未放。

事后，那个小姑娘被父亲打得死去活来。小姑娘知道自己受骗上当做错了事，恳求父亲狠狠心把她杀死，为茅校长和他爸爸妈妈哥哥报仇。父亲听得落了泪，才饶了遍体鳞伤的女儿。

陈叔璇又告诉朱松寿一个消息：中共江阴特别支部书记、县农协委员长孙逊群在江阴“4·16”反革命事变后，去无锡担任县委书记，在组织农民暴动时，不幸被敌人抓获。11月13日，与一起被捕的到无锡指导农民暴动的省委委员夏霖等七人被杀于无锡小校场，他的头颅挂在无锡光复门示众。朱松寿听了陈叔璇这一段沉重的叙述，更深刻地懂得了母亲为什么不顾一切体面地说出自己的隐私，死拖硬拽地不让他出来革命的苦心了。是啊，由于宜兴、无锡、江阴先后发生农民暴动，松动了国

民党反动派在苏南统治的根基，敌人正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扑过来。孙逊群的牺牲和茅学勤一家人的被捕，只是一个先兆，一记警钟。随着斗争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人的牺牲、被捕和家破人亡。除了母亲，他常常为杨绮云梦牵魂绕，这是一个多么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好妻子啊，她为了丈夫担心受怕，说不定还会遇到更大的风险，可是丈夫又给了她什么呢？

“斗争并没有结束，”陈叔璇见朱松寿在沉思，知道他还未完全放下家庭的包袱，但是现在已没有过多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了。“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后塍暴动缴到了8支毛瑟枪和一批子弹，可是还不够，县委决定自己搞一个兵工厂制造武器，由我的弟弟、江阴县委书记蒋云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你去做他的助手。你看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正说着，蒋云从里间走了出来，一把抓住朱松寿的手，爽朗地笑着说：“长脚，你放心，我是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化工系毕业的，本来不是职业革命家，县委要搞兵工厂，造个土炸弹一类的东西，我还懂一些。怎么样？我做‘老板’，你做‘伙计’，不感到委屈吧？”

“伙计不就是工人阶级吗？做工人阶级不是很光荣的吗？”朱松寿在同志们中间，一开口总是笑咪咪的，“蒋云，你就不怕我这个伙计造你的反吗？”

三人说笑了一阵，就开始讨论兵工厂的事。朱松寿建议把地点设在毗山脚下的茅柴火村，那里村庄稀落，试制过程中不慎爆炸，不容易伤到群众，如果被敌人发现，也可以及时向毗山转移。陈家两兄弟都一口赞成。

几天后，毗山附近村子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汉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一条旧棉裤千疮百孔，从里边探出头来的一朵朵棉絮，像粘上了一身雪花。他的背伛偻着，肩上挑着一副当时农村中常见的换糖担子，嘴里变腔变调地喊着：“用香烟筒换糖啰！”很快就围上了一群小孩子，把一颗颗小脑袋探向他的圆竹筐，里面有白花花的麦芽糖，红艳艳的片片糖，满身粘着白芝麻的常州寸梗糖，像铜板大小的薄薄的梅片糖……于是一个个流着口水，瞪着圆圆的漆黑的眸子，怔怔地看着这个像小铁塔般的换糖佬，奢望着能恩赐一点儿让他们尝尝。

“小朋友们，来，一人一块梅片，它是用梅子压制做成，有几种滋

味，又甜，又酸，又辣！”换糖佬说着，真的从圆竹筐中拿出一叠梅片，每个小孩一片。“你们回去找找，有美丽牌、前门牌、海盗牌香烟筒筒，赶快拿来换糖换梅片。”

小孩子们轰的一声走开了，撒开小腿向自己的家里奔去。不一会儿，一些小孩子抱来几个香烟筒筒，换到了他们爱吃的东西，笑嘻嘻地走散了。另一些家里没有香烟筒筒的孩子，馋得嚤嚤地哭。

换糖佬挑起担子，又向别的村子走去。

傍晚，当他挑了两竹筐香烟筒筒回到茅柴火村的时候，蒋云笑着迎了出来，夸奖说：“长脚，你这个办法好。我做老板的，怎样奖励你这个好伙计呢？”

前几天，蒋云和朱松寿到了茅柴火村，一开始准备造土手榴弹。可是，手榴弹的铁壳子不容易铸造，一时难住了他们。朱松寿建议说：“这个铁壳子能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呢？”“当然可以代替。”蒋云回答说。那么，用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呢？两人苦思冥想，都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来。朱松寿急得额角上的汗水直渗出来，一气之下，把刚抽完香烟的一只美丽牌香烟的铁皮筒猛地扔到砖地上，铁皮筒像受到委屈似的在地上蹦蹦跳跳，躲到壁角落里去了。

“有了，有了！”蒋云欢呼起来。“这香烟筒就可以代替铁壳子，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朱松寿想不到自己一个随意的动作，就触发了这位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的高材生的灵感，感到十分的快意。只是香烟筒散布在各家各户，又不能贴个布告让大家把这些废物交出来，于是扮作了一个换糖佬，故意佝偻着背，串村走户地去收集这玩意儿。蒋云指导着几个助手在茅柴火村配制火药，他们在香烟筒中塞上火药、铁片、敲成米粒般大小的碗锋以及一小撮石子，然后装上引线，封闭铁筒，土武器就这样制成了。

一天深夜，蒋云让朱松寿带了几个制成的香烟筒，离开茅柴火村，来到毗山上试掷。朱松寿按照蒋云的嘱咐，把引线缠在右手的小指上，猛力地向前方掷去，只听“轰”的一声，蒋云急忙赶到闪光的地方用手一摸，山的表层炸出一个小坑。

他们两人把这玩意儿命名为土炸弹，决定大批量地生产。这时，因为蒋云需要安排县委的工作，就决定茅柴火兵工厂由朱松寿留下来负责。

1927年12月中旬接近旬末的一天，县委通知朱松寿去周庄开会。当

他赶到目的地，钱振标、蒋云、陈叔璇、茅学勤等人都到齐了。省委特派员钱振标传达了江苏省委决定在1928年元旦组织江阴、无锡、常州、宜兴4县举行总暴动的指示，这是苏南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向反动派发动的一次总攻击。省委要求各地零星暴动暂不举行。会议部署了江阴方面如何参加总暴动的有关事宜。由于会场附近发现了可疑的人，钱振标立即宣布散会，并告诫大家近期可能出了叛徒，要各自提高警惕。

一会儿，20多个国民党警察包围了会场，虽然一无所得，但是从敌人的消息如此准确这一点来看，没有叛徒提供情报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惜钱振标不知道，朱松寿自然也不会知道。

朱松寿从周庄出来，就向茅柴火村走去。为了迎接四县大暴动，县委分配给他的任务是赶制大批土炸弹，同时要生产新的土制武器。他向兵工厂的十几个工人传达了周庄会议的精神，作了一番动员，就直接动手试制武器。他一个人捣捣鼓鼓地摆弄着，突然灵机一动，一项新的设想构成了。他把几个工人找来，兴致勃勃地说：“农暴的时候，带上几个空火油箱，箱内装上几串小爆竹，把引线点上，小爆竹在箱内接连爆炸，一定会发出可怕的响声，敌人以为是我们用上了机枪而影响斗志。”

大家一齐拍手叫好，又补充了一些改进的意见。

当晚，朱松寿想到茅学勤全家被捕的教训，现在距离四县总暴动的日期已近，应该回去看看，动员母亲和杨绮云外出避避风头，以免落入敌手遭受侮辱和杀戮。他随身带着那把厚背大砍刀，潜入朱家巷。为了不再深夜惊动妻小和老母，就蹑手蹑脚地攀上自家的院堂，轻轻地跳了进去。

这时院子里黑糊糊的，母亲和前妻刘三妹的房间都熄了灯，没有一丝儿声音，只有杨绮云还没有睡，窗子上刻着她富有曲线美的剪影，从门窗的缝隙渗出了一阵轻如游丝、柔如轻烟的歌声，朱松寿贴着墙壁细听，歌词唱道：

一更一点月正东，
农民最苦痛，
穷人没有自田种，
搁租田，负债重，
先缴租金，然后才得种，

想想头并痛。

二更二点月渐升，
土豪搭劣绅，
租田农民难生存
一要靠老天，二靠牛车全，
否则无收成。

三更三点月光辉。
田业办公会，
钱洋折合赎田块，
就是用刀砍你头，
逼你绝路走。

四更四点月西斜，
听我说大家，
团结成一家，
佃户合作自救会，
改良农业减租额，
联村结队抵制官府衙，
团结力量大。

五更五点月西沉，
农民要发愤，
佃户要自尊，
佃户自救靠章程，
江阴报刊来评论，
有了章程保自身，
大功一定成。

五更五点唱完了，
种田人听好，
军阀官僚勾土豪，
就是豺狼搭虎豹，

你勿打死它，
自身就难保。

这是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流传在江阴、无锡、常熟三县边区的五更调，农民暴动发生后，这一带唱的人就更多了。（作者注：2012年春夏间，张家港市金港镇党史工作者瞿涌晨发现当地农民瞿兴尧家中保存了四份80多年的唱本资料，《种田人听好》是其中的一份，署名孙逊群、周刚直著，写作时间是1925年仲夏。本书采用的就是《种田人听好》的原文。）朱松寿想不到妻子也唱着这首歌，而且感情这样深沉和专注，对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他不想马上去惊动她，抽出身边的大砍刀，在天井里挥舞起来。他自小喜欢武功，拳、刀、枪一类似乎颇有悟性。参加农暴以后，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更是一有空闲就练习。现在，他舞得呼呼风生，时或像春天解冰的河水在缓缓流动，时或像远方的马群奔腾向前，时或像冬天松林里传出富有节奏的涛声……

突然一个黑影在面前闪过，朱松寿吃了一惊，正欲喝问是谁，黑影处已传来柔和亲热的声音：“是松寿吗？这么晚了还在练刀功，莫非想进毗山大王庙做和尚不成？”

朱松寿“唔”了一声，收了刀随妻子回到房间，低声说道：“这几日风声很紧，我们要小心才是。绮云，你是不是带了母亲和孩子，到外面住一段日子？”

杨绮云吹熄了灯，默默地坐在床上不作声。丈夫与她靠得很近，她觉得有一股热浪，掺和着男人的气息，向她身上扑来。不一会，就有一只坚实的硬邦邦的大手，抚摩着她的丰满而高高突起的乳房，两片温润而灼热的嘴唇，紧紧地贴到了自己的嘴上。她动情地依偎到丈夫温热的胸怀里，低低地嗫嚅着：“松寿，你教我打枪，我跟你一起去革命吧。只要你在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朱松寿正要说话，忽听得院子外面一片喊杀声，口口声声要抓朱松寿。朱家养的两只大黄狗伸长着脖子狂叫起来。朱老太太从睡梦中醒来，听得声音，知道有变，披上一件棉袄，来不及扣好钮子，就跌跌撞撞冲了出来。这时朱松寿把杨绮云推到一边，抢过一把大刀，正想越墙而逃，屋上已站着许多人，于是就向天井冲去，正遇上破门而入的警察，松寿举刀一阵砍杀，几个警察受了重伤，滚到一边哼哼去了。可是马上又冲

上来几个警察，把朱松寿围在核心，高声大叫：“抓不住朱松寿，就杀他全家，烧他房屋！”朱松寿听出这是陈祥安的声音，又恨又恼，准备拼了这条命，也要把这个土豪劣绅杀死，可是转念想到自己一家人今晚都会死于这群虎狼之手，于心不忍，稍一疏忽，头上挨了警察重击，站立不稳，几个敌人一拥而上，把他绑了。

朱老太太被刚才这一阵刀枪格斗吓得像掉进冰窟窿似的，血液都凝固了，呼喊不得，动弹不得，现在见自己的宝贝儿子被官兵捉住，下意识地跪倒在地，连连叩头，仍说不出一句话来。刘三妹从床上跳起，披着一件棉袍出来，试了几次，终于没敢冲上去。

只有杨绮云比较镇静，既不跪下，也不颤抖，走到丈夫面前安慰说：“你一不做贼，二不为盗，放心地跟着这班当差的去。我们朱家倾家荡产，也要把你从虎口中救出来！”

“绮云，”朱松寿一边挣扎着，一边回头喊道，“你千万不要心存幻想。我死之后，母亲和孩子，你要多费神了。远亲近眷，也烦你一一告知，恳求有个照顾。”

陈祥和来捕捉朱松寿的20多个警察，带着朱松寿和在附近抓到的另外两个农暴骨干——张老四和茅学思，得意洋洋地走了。

朱家院子里传出一片凄凄戚戚的哭声。杨绮云流着眼泪，琢磨着丈夫临走时几句话的深刻含义。“远亲近眷，也烦你一一告知，恳求有个照顾。”对，这一句双关语，既可理解丈夫死后要向诸亲好友报讯，以求得到他们的照应，也可理解为赶快把他被捕的消息告知陈叔璇蒋云兄弟知道，把他从狱中救出。她越想越坐不住，把婆婆劝回家中，刘三妹也进屋去了，就咬咬牙向夜色苍茫的野外冲去。

她忘命地奔跑着，看不清面前是路，是田，还是河流，坟丘？这是她平生以来第一次走夜路。以前一到晚上，她就怕狗叫声，怕听鬼的故事，尤其怕一个人突然之间走到荒坟岗中，四边都是浮屠的棺木，新插上的飘山纸在夜风中瑟瑟发抖，遇到这种情景，准会把她吓死。可是，今夜她却出奇地胆大，把一切可怕的东西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她甚至想身边有一支枪就好了，遇上坏人，可以和他们周旋。也许，这就是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质变，她正从一个家庭妇女向一个战士飞跃。

杨绮云赶到陈叔璇的家里，浑身上下都是泥迹斑驳，衣服也破了好几处，盘在头上的那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也松了下来。原来，从朱家

巷到陈家仓，要经过几条又长又狭的土坝，为了避免跌到河里去，她是摸着爬着过去的。一到陈叔璇家里，她满腹的仇恨、痛苦、焦躁，一股脑儿地化作两行清泪，像夏天清晨满载露珠的荷叶突然倾斜起来，水珠儿争先恐后地滴落到地上。

陈叔璇听了她的汇报，满腹疑惑地问道：“朱松寿半夜回家，就是被反动派看见了，齐集人马，也要几个小时。这里面一定有鬼！”

杨绮云想了想，认为陈叔璇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她无法知道谁出卖了丈夫，只好含糊地点了点头。

陈叔璇感到朱松寿等三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立即把白天周庄会议后秘密住宿在陈家仓的钱振标、蒋云、茅学勤等人找来商量营救事宜。钱振标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即派人查明朱松寿等人的去向，立即调集沙洲、云亭、长寿、周庄、长泾等地农民，由茅学勤担任总指挥组织劫狱。

江阴的党组织和农民革命军像一架处在临战状态的歼敌机，一朵火花就能腾空而起，向着目标风驰电掣般地飞去。凌晨，钱振标派出的几个侦察员先后赶回陈家仓，报告朱松寿等人被关押在后塍，天明就要押送江阴。这位小学教师出身的省委特派员，对这几位尚未经过训练的农民侦察员在短短几个小时就搞清了朱松寿等人的去向，感到满意，美中不足的是尚未正确把握被捕人关押的具体位置，这对劫狱带来了困难。可是，他决定不能再等待了，就和蒋云、茅学勤、陈叔璇等人简单地说了几句，准备立即发出各路农民革命军向后塍进发的命令。

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女乞丐跌跌撞撞向屋里冲了进来，一只黑色蚌壳棉帽压到眉毛上，遮住了她的半张脸，头顶上露出的灰白头发冒着热腾腾的水汽，爬满蜘蛛网般皱纹的脸上沾着一颗颗晶亮的汗珠，也许由于太热，那件又脏又破穿了几十年的棉袄敞开着。她右手握一根几尺长的枯竹子，左手提一只破篮，篮里放着一只旧碗和一双长短不齐的筷子。众人吃了一惊，在这极其紧急的时刻，来了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叫花子，该怎么办呢？陈叔璇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额纸币，塞到老妇人的手里，温和地劝她赶快离开这里。

“我不是来向你们要钱花的，”女乞丐刚才跑得太急，喘着气一时说不出话来，休息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我是来向县委报告朱松寿消息的！”

钱振标圆睁着像电灯泡般明亮而突出的眼珠，脱口说道：

“你是钱大妹，你这一身打扮，真把我们弄糊涂了，还真的把你当成讨饭叫花子了呢？快说说朱松寿的事。”

陈叔璇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几张小额纸币又塞进了口袋里，脸上露出了一种错把同志当乞丐的很抱歉的神色。

“我就是靠这身打扮，混进后塍镇。”钱大妹不无得意地说，“茅司令交给了我侦察朱松寿关押地点的紧急任务，我一想这么一个老太婆，半夜三更在外面跑，人家不起疑心才怪呢？这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我先侦察出了朱松寿在后塍的消息，一想，这还不算完成任务，要查出到底关在哪里，农民革命军才能去救他。我硬硬头皮向后塍走去，后塍已经戒严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我好说歹说，岗哨才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放行了。”

“你真有办法。”杨绮云在一旁听得入了神，情不自禁地打断了钱大妹的话，“你怎样知道松寿他们消息的？”

“你听我说下去，”钱大妹瞥了一眼这位衣衫凌乱而仍不失光彩照人的少妇，“一进后塍镇，去找谁打听消息呢？家家户户紧闭着门，街上一团漆黑，而且时间紧迫，又等不得天明。我急得站在凛冽的风口里却燥热难忍。这一急，倒急出了一个主意，我记得后塍教堂有一个神父，以前曾是我的邻居，何不去问问他呢？我敲开了教堂的侧门，找到了神父。神父一听我的来意，吓得全身筛糠般地哆嗦。我尽力安慰他，他才告诉我今天半夜过后，街道上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他从床上爬起来，贴着临街的玻璃窗，看见一队警察，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人向电灯厂走去，其中有一人我认识，就是长寿朱家巷朱文魁的独养儿子朱松寿。”

钱振标、蒋云、茅学勤走过去，紧紧握住了钱大妹的手，算是对这位机智英勇的女共产党员的褒扬和鼓励。杨绮云一迭连声地说：“同志，谢谢你，松寿有了下落，就可以把他救出来，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担任这次劫狱总指挥的茅学勤把他的设想对钱振标、蒋云、陈叔璇等人说了，大家统一了看法。接着，在很短时间内齐集起来的一队队农民自卫军，带着很少的枪支和茅柴火村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土炸弹，以及大刀、长矛、铁叉、棍棒之类中国农民在历朝起义时习惯使用的原始武器，悄无声息地融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朱松寿押到了后塍。敌人知道他体壮力大，怕他逃脱，就在脚上和手上都锁上了笨重的铁链，又加缚了一道麻绳，嘴里塞上了也许从垃圾

堆里捡来的脏布，被国民党警察秘密地关进了光华电灯厂。敌人还不放心，又像当年镇江金山寺的法海和尚处置白娘娘一样，将他塞进了一只倒合的大缸之中，只留一丝缝隙让他呼吸空气。其他两人关在另外一间屋子，也用同样的方法藏了起来。

“想不到才斗了几个回合，就成了瓮中之鳖。”朱松寿回忆着今夜发生在自己家中的那一幕，心里不免有些沮丧。他个子高大，蜷缩在水缸底下，镣铐又紧扣着他的皮肉，感到刀砍火灼般的疼痛，嘴巴中的那一快脏布，既让他恶心得要呕吐，又让他窒息得快要昏过去。他知道自从后塍暴动后，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长张品泉，已把他列入首犯之一，这次被俘，要想生还是不可能的了。也许天一亮，就像两年前北洋军阀孙传芳杀害周水平一样处决他，他的头颅也会挂到县政府前的照壁上。对这样的结果他已不感到震惊和害怕。他已经100次1000次地想过，既然参加了共产党，流血牺牲随时都会发生，无论砍头或枪毙，憋一下气就过去了，也绝不会是太痛苦的事。只是从今后，自己就不能再和同志们一起去冲锋陷阵了，未免感到有些遗憾。

他也有不少的安慰，那就是妻子杨绮云越来越支持他的革命行动，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相信，一旦自己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绮云决不会因为丧夫而从此一蹶不起，她会加倍地照顾婆婆，抚育孩子，甚至会直接走上革命的道路。这真是他所希望的。他巴不得那个因超纪行（即不满周岁就会走路）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小鸿坤快快长大，举起父亲遗下的大砍刀，出没在农民暴动的队伍里，成为一员出色的革命战士，倘有机会，将那长寿镇的恶霸陈祥安杀了，以告慰自己的在天之灵……

想到这里，他觉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急促而嘈杂的脚步声，还有隐隐的呐喊声，偶或听到一二声枪响。他开始以为是听觉上的幻觉，慢慢地，这些声音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他仔细地核实着这声音的方向和在后塍镇的位置，惊喜地发现，声音来自后塍法水庵。这就是一个多月前江阴农民革命武装暴动的地方。他知道那次暴动胜利后，虽然钱振标下令点火焚烧，但是由于火势不足，第三分局只烧毁几间瓦屋就熄灭了。农民革命军退出后塍后，第三分局的警察们又回到法水庵，这里继续成为关押农民和镇压暴动的所在地。现在，也许县委知道了自己和其他两位同志被押到后塍，率领农民革命军劫狱来了。他感到一阵兴奋，恨不得高声呼喊起来，张了张嘴巴，没有一点儿声音，知道嘴里

塞着东西，人被反动派倒合在一只大水缸里。

不一会儿，枪声越来越密，人声越来越大，好像农民革命军正在向光华电灯厂靠拢。这是钱振标他们营救自己来了。他静静地等待着。大约农民革命军已经与守卫光华电灯厂的警察在正面冲突了，呐喊的声浪像夏天的闷雷在上空回荡，刀枪碰击发出的短促的声音传到那只大缸里，发出嗡嗡的响声。突然，外边响起了机关枪一连串的哒哒声，朱松寿禁不住一阵战栗。他知道钱振标他们不会拥有机枪，那么，这枪声就一定来自警察的了，如果这样，那正在进攻中的几路农民一定要遭到极大的伤亡。他仔细辨听着，忽然无声地笑了起来，这不是几天前自己在茅柴火兵工厂发明的新式武器嘛，用火油箱盛着几串小鞭炮，点燃鞭炮后发出的“劈劈啪啪”的爆炸声，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机关枪在点射呢！

从声音上判断，农民革命军已经攻进了电灯厂，警察们发出一阵阵绝望的叫声。果然，有一队革命军冲进了他关押的地方，好像在寻找自己似的，每个角落里都去敲敲打打。他们哪里知道朱松寿会被倒扣到大缸底下呢？

“看来反动派已经把人转移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像是陈叔璇。

“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就不能再找下去了，‘电灯泡’有过命令，找不到朱松寿就放火烧掉这家电灯厂！”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像是茅学勤。

“那我们就点火吧，‘电灯泡’已经在外边发出讯号催我们了。”陈叔璇同意了茅学勤的主张。

这几句话，朱松寿听得明明白白，茅学勤和陈叔璇说的“电灯泡”，就是指钱振标。在这样的环境中呼唤钱的绰号主要是为了保密。现在，农民革命军就要点火烧屋，那么，他顷刻就要葬身这火海之中。他虽然不会去怨恨他们，但是，自己死得多不值得啊！从脚步声中，他听出茅学勤和陈叔璇正向他倒合的那只大缸走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发出一点什么声音，势必引起他俩的注意而把自己救出来。他试着用手脚去敲大缸，可是不行，他上了脚镣手铐的手脚还用麻绳连同身子一起绑着，就像一只用麻线绑得结结实实带在旅行包里的螃蟹一样动弹不得。他急得心口像塞进去一把荆棘一样刺痛。猛然间，他用尽被折磨得很微弱的力气，把全身唯一可以扭动的头颅向缸壁撞去，“咚”的一声，声音是传出去了，可他也昏迷了过去。

第四节 江阴朱茅季庄密会

这声音并不高，可茅学勤和陈叔璇都听到了。他们立即停下脚步，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里有几只很大的缸，都倒扣在地上，这也并没有什么怀疑的地方。他们希望再听到那“咚”的声音，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声音再也没有响起。他们叫来几个农民革命军，帮着把倒扣的大缸翻过来。当翻到扣合朱松寿的那只大缸时，茅学勤和陈叔璇都吓得倒退几步，一个在重重铁链和道道麻绳捆绑下的大汉，已经昏厥在里面。他们把塞在他嘴里的脏布取了出来，又用刀子把麻绳小心地割断，铁链很粗，一时无法弄断，只得派一个壮实的革命军战士，将昏迷中的朱松寿驮在背上，飞奔而去。

茅学勤和陈叔璇得到启发，在另一间屋子倒合的几只水缸里找到了张老四和茅学勤的弟弟茅学思，也派人驮了向乡下转移。正要率部退出电灯厂，突然看见发电间里抖抖索索地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参加11月15日后膛暴动的钱文秀。此人几天前被张品泉逮捕抓回江阴，怎么会后膛的光华电灯厂发现呢？

茅学勤一步一步地向他走去，十分威严地盯着他的眼睛。这时天色虽未全明，但已看得清钱文秀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一个刚刚奸污了良家少妇的阔公子正好遇上少妇的丈夫一样丧魂失魂。茅学勤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了钱文秀那张白纸般的脸。陈叔璇紧紧地跟在茅学勤的后面，为朱松寿3人被捕所产生的疑团，似乎可以从这张白纸般的脸上找到答案。

“啪”的一声，钱文秀双膝跪到冰凉的方砖地上，“茅司令，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弟弟，也对不起朱松寿……”他把头磕得“蓬蓬”作响，交代了自己如何出卖朱松寿他们的罪行——

后膛暴动中，钱文秀被一个警察认了出来，第二天他就不辞而别躲了起来。可是他又放心不下家里年轻的妻子，有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被暗暗监视的密探发现而逮捕了。在敌人的棍棒和金钱的轮流进攻下，他做了一个死心塌地的叛徒。前天，这个叛徒得悉钱振标等人在周庄开会，就向江阴县公安局副卫队长梅寿根密报，结果扑了个空。他不甘心，又让梅寿根密令长寿镇上的陈祥安暗中监视朱松寿的行踪，梅又亲率警

察下乡，在陈祥安的配合下，一举抓获了三个农暴骨干。当夜，钱文秀跟着梅寿根到了后塍，喜滋滋地等待主子的赏赐。想不到美梦才做了一半，黎明的时候农民革命军就攻破了法水庵和电灯厂……

“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理，”茅学勤听完钱文秀的交待，平心静气地说，“凡是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人，不只是灵魂丑陋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且由于对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害而要受到武器的惩罚。”当钱文秀刚刚听明白茅学勤这一段声音不高而义正词严的话，感到问题严重的时候，茅学勤手里的短枪已经打响了，这个与江阴农民暴动同时产生、玷污革命史册的蛀虫，绝望地惨叫一声就滚在一边不动了。

光华电灯厂是梅寿根开设在后塍镇上的一家工厂，因为它的主人在镇压农民暴动中扮演了一个凶恶的角色，当茅学勤他们在黎明时分率领农民革命军撤离后塍的时候，同法水庵一样化为一片火海！

这次因营救朱松寿三人发生的3000余农民革命军和赤色群众劫狱的事件，在江阴革命史上称作第二次后塍暴动，暴动时间是1927年12月21日凌晨。

再说朱松寿被茅学勤、陈叔璇在后塍光华电灯厂倒扣的大水缸中救出后，被人连夜背到云亭季庄的三姐家里，用锉刀锉断手上和脚上的镣铐，这才发现松寿的后脑上有一个馒头般大小的肿块，在流着血水，于是为他包扎了。松寿的三姐泡来一杯红糖姜末汤，喂松寿慢慢喝下，就把他抬到床上，众人这才放心地离开。

朱松寿的四个姐姐中，要数嫁在季庄的这个三姐最疼爱这位弟弟，彼此往来也最为密切。也许是接触得多了，三姐对弟弟打土豪除劣绅一类革命活动，不仅不反对，而且有所支持。今天，她见弟弟脚镣手铐，知道闯下大祸，但是仍不忍心责怪他。相反，唯恐照顾不好，派人把朱家巷的杨绮云也找来了。杨绮云本欲与婆婆一起来看望松寿，也避避风头，只是朱老太太死也不肯离开老家，只得抱着儿子在当晚摸黑来到了季庄。

到了三姑家里，杨绮云三步两脚地奔入后房。三姑点上了灯，把窗帘拉严。这时松寿仍在昏睡，绮云借着暗淡的灯光，看见丈夫头上扎着白布，布上渗透着血迹，手腕上脚踝骨上都受了重伤，鼻子一酸，眼圈就热了起来，低低地抽泣着。三姑把她拉到一边嘱咐说：

“别哭别哭，哭声传出去，反动派再来抓人，他和你能抵挡得住吗？”

杨绮云止住哭声，小心翼翼地坐到床沿上，看着丈夫发呆……

朱松寿在妻子和三姐的精心照料下，几天后就恢复了健康，他急着要去找县委，三姐说道：

“几天前你被人背到这里，曾留下话要我转告你，说你伤好后不要抛头露面，也不要自己去外面找人，以免撞到反动派张设的网兜里，到时候他们会派人来同你联系。”

杨绮云也竭力劝阻，朱松寿才耐心在季庄住下来。

明天就是元旦了，朱松寿想到周庄会议上省委特派员钱振标传达的省委关于四县总暴动的决定，再也坐不住了。正要往外走去，见村边有一个身穿着棉袍、脖子上系着一条水灰色羊毛围巾的人正向这边张望，他警惕地退回室内，要三姐去注意这个人的动向。

穿棉袍的人看看四周并没有人注视他，就向三姐家走来。三姐正要关门回避，那人紧走几步，已跨进大门。

“先生，你走错门了，我们不认识你。”三姐用力挡着，不让穿棉袍的人向里走去。

“我们有话进去谈，”穿棉袍的人态度十分温和，“在门口拉拉扯扯，让人看见有多不好！”

三姐还要阻止，朱松寿在里边听见声音，连忙走了出来，一把拉住穿棉袍的人的手，直向里边拖去。三姐被冷落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三姐，快进来，这是我们老朋友茅校长。”朱松寿一个多星期没有看见自己的同志，就像沙漠中旅行的人几天没有喝到水一样渴不可待。他看着三姐和绮云远远地站着，用极低的声音问道：

“省委布置的四县总暴动……”

还没等他的话说完，茅学勤就用眼色制止了他，并用较高的音量说：“我还没有吃中饭呢，你有事，我们慢慢再谈。”

朱松寿会意，安排三姐准备中饭去了。不一会，三姐端出两碗米饭、三个菜，茅学勤也不客气，像用饭菜去填满一个窟窿一般，一忽儿，三只碗都底朝天地吃得干干净净的了。

“老土豪，”朱松寿叫着茅学勤参加革命以后被同志们喊出来的绰号，“你吃饭这样快，哪里学来的本领？”

“从饥饿学来的嘛，”茅学勤饭菜下肚，来了精神，说话也幽默起来，“不信让你长脚饿上三天，吃饭快的本领也就无师自通了。”

“这么说你已几顿没有吃上东西了？”朱松寿感到十分惊奇。

茅学勤点点头，告诉朱松寿一个十分严峻的事实——

原来，后塍两次暴动发生后，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出高价悬赏农暴领袖，天天下乡抓人，特别是后塍一带，白色恐怖闹得十分厉害。茅学勤父母被捕，哥哥入狱，房屋被焚，田产查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学勤平时又不治产业，毫无积蓄。就是他在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读书时，中了一张3000元彩票，他也未动用分文，全部款子用来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学田圩小学，改善农民子弟的教育条件。现在，他身无分文，县委又没有活动经费，附近的老百姓害怕受到牵连又不敢招待茅学勤吃饭。

因此，这位江阴县农民革命军的副司令，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的。特别是最近几天，张品泉带着警察盘查得紧，茅学勤只得常常在野外签棵坟冢中躲藏，着着实实已经饿了两天了。今天，他奉县委书记蒋云的命令，化装来到季庄，是来和朱松寿商量几件重要工作的。他暂时把饿肚皮的事放在一边，对松寿说道：“蒋云要我告诉你，省委原定1928年1月1日举行四县总暴动，因为那次为了营救你们三人，搞了个第二次后塍暴动，江阴、无锡、常州、宜兴的反动派加强了防卫，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已取消了这个计划。什么时候条件成熟，像这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县委还是要搞的。”

朱松寿感到惋惜，如果早知道这样，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因为劫狱而打草惊蛇，影响到四县总暴动的进行。他正在自责自怨，又听茅学勤说下去：“后塍第二次暴动后，县委活动经费遇到极大的困难，省委特派员钱振标决定亲自去上海，向省委申请一部分经费，再设法购买一些枪支弹药回来。钱振标已经离开江阴几天了。县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召开全县第一次党代会，你以正式代表的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会另行通知你。”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有比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更光荣和幸福的



江阴农民革命军副司令茅学勤烈士
(茅永良 提供)

事吗？朱松寿满脸放着红光，两颗晶亮的眸子散发出无比坚定的神色。他久久地凝视着茅学勤，几次翕动着厚实的嘴唇，可是由于激动和兴奋，终于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三姐端来两杯热茶，朝茅学勤笑了笑，抱歉地说：“你看，吃完饭这么久了，才把茶水泡来，茅校长，你不嫌松寿的三姐手脚慢吧？”

“哪能呢？”茅学勤恭敬地站起来，“只怪我刚才狼吞虎咽吃得这么快呢！”

“这也说的是，”三姐说，“我正在为你烧一只鲫鱼木耳汤呢，鱼刚下锅，你已经吃完了。等到烧好汤，你们就到里边说话去了，我就不好意思再端出来。茅校长，这可不能怪我三姐小气，要怨你自己没有吃福！”

三人都大笑起来。三姐知道他俩有正经事要谈，不能在此逗留太久，就退出去了。

“老土豪，”朱松寿又叫起茅学勤的绰号来，“我有一个想法，许多同志为了革命，家也破了，人也亡了，我们这活着的人，还要田产干什么？”

“你的意思是……”茅学勤问道。

“我准备卖田。从你的饿肚皮我想到一定还有县委和农民革命军的领导人在饿肚皮，甚至一部分农民革命军的战士也在饿肚皮，还有这些同志的父母、妻子、孩子，因为参加革命没有了以前那种正常的经济收入，一定也在饿肚皮。”朱松寿很动感情地说，“我家的田产，据说是曾祖父手里流传下来的，但这些田地的最初主人，一定是忠厚朴实的农民。我现在不能无偿地把田还给农民，因为还没有这个条件，农民得了田最终还要被陈祥安这些土豪劣绅们侵吞去。我是卖田，得到的款子用来支持革命。老土豪，你看怎么样？”

“卖田的事，是否再缓一下？”茅学勤想了想，慎重地说，“我们都知 道，你家老太太惜田如命，轻易不会答应。用她的话说，列祖列宗传下来的田产，到了她手里守不住，她就是败家子。到了儿子手里守不住，儿子就是败家子。败家子死后是无脸面去见列祖列宗的。我有一次听她这样说过。为了不让她过分伤心，我不主张你卖田。县委和农民革命军的开支，蒋云、叔璇和我商量过，准备向地主，土豪摊派，请开明士绅捐助，我们力量壮大后，还可以收税和收缴公粮，这当然是建立红色政权以后的事了。”

朱松寿被茅学勤描绘的革命前景兴奋起来，一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两只茶杯受到强烈震动，茶水从杯中飞溅而出，朱、茅两人急忙用手扶住：“我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地主，请同样摊上一份。”朱松寿音量陡地增高，茅学勤急忙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不要被在堂前坐着放风的三姐和绮云听见了。吃晚饭的时候，朱松寿频频地给茅学勤的碗上夹肉，让这位饿了两天的副司令饱餐一顿。临走的时候，茅学勤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硬邦邦的用黑布包着的东西，塞进松寿的手里。

茅学勤走后，朱松寿打开黑布小包，见是一支乌黑锃亮的手枪，他翻来覆去地欣赏着，嘴里不断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杨绮云在一旁见了，羡慕地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得到一支这样的手枪呢？”朱松寿说：“只要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枪总是有的，你等着吧。”他小心地藏了手枪，又把卖田支援革命的想法对妻子说了，杨绮云犹豫半晌，最终同意了，只是他俩都不能回去，就委托三姐到朱家巷，偷偷物色买主，讲好价钱，交出田契。这次共卖出10亩良田，三姐带着银元，回到季庄。

“妈知道我卖田的事吗？”朱松寿不安地问。

“为了你，我只能做不孝女了。”三姐从一只小提包里取出银元，当着弟弟的面清点，边点边说，“妈问我回来干什么呀，里里外外跑个不停？我说弟弟和弟媳住在季庄，我为他们回来取衣服的。她又问我你的伤好了没有？现在还往不往外面跑？我说伤早已好了，整天在家养着。妈妈才放下了心。”

朱松寿急着要把钱送到县委领导人手里，三姐和杨绮云都不让他出去，说外面风声日紧，出门就是自投虎口。杨绮云自告奋勇愿意去送款，朱松寿又下不了决心。历来谋财害命，是身边带钱太多的缘故。何况现在兵荒马乱，一个漂漂亮亮的少妇，怎不引人注目呢？丢了夫人又赔钱的蠢事，他不干。正在商量之际，来了一个青年农民，身着对胸土布棉袄，脚穿用稻草编成的蒲鞋，腰系一条藏青色竹裙，显得稳重朴实，就是眼睛小了点儿，深藏着一种农民的狡黠。

“小纹，快里边坐。”朱松寿热情地招呼着。

“你让我好找！”承小纹一脚跨进屋内，一拳轻轻地打在朱松寿宽厚的胸膛上，“自那次3000农民把你从后滕救出，我就没有看见过你。这几天来，可把我想苦了。不是我一个人，许许多多的革命军战士都想着你。”

承小纹的家与朱家巷相距不远，自小就与朱松寿有着来往。他家很贫困，朱松寿每每接济他家。15岁那年，承小纹由朱松寿介绍，来到上

海一家眼镜公司做学徒，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朱松寿的侄子，从此两人关系更为密切。江阴闹农民暴动前，朱松寿又去信上海，动员承小纹回家参加革命。在后膛两次暴动中，承小纹都挺勇敢，冲在队伍的前列。朱松寿认为他革命意志坚决，已经向县委说过，要介绍他参加共产党。现在，朱松寿准备把卖田的一笔款子交给他送给县委。正要提出，承小纹气鼓鼓地埋怨开了：“老朱，我们跟着你造反，是想得到你保护的，总不能眼看着让我们吃亏啊！”

“你说到哪里去了？”朱松寿温和地说，“我们要保护的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利益。当然，你现在是农民革命军的一个战士，你的利益同整个农民革命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小纹，你究竟为哪件事想不开呀？”

“茅司令要处分我，我哪能想得开呢？”承小纹气呼呼地说。

朱松寿耐着心听完了他的诉说。原来，第二次后膛暴动后，由于革命军的阵营不断扩大，县委的活动经费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县委就动员农民革命军向殷实富户捐款。一部分农民意识严重的革命军战士，就把捐款占为己有，也不向县委报告。有极少数人以此手段想趁机发家致富，捐款数目过大，造成了殷实富户的不满，他们就向县委告状。县委一查就发现了问题，这些捐款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私人的腰包，承小纹是其中的一个。茅学勤知道了很生气，一定要处分承小纹。承小纹就是为此事打听朱松寿住地的消息，今天找上门来，想请朱松寿在茅学勤面前说说情，不要一本正经地处分他。

“我不能去说这个情。”朱松寿收起温和的脸色，原本偏长的脸拉得更长了，“革命，不只是一定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且要革除贪污腐化那一大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你自己想一想，打着农民革命军的旗号，仗着手中的几杆旧枪，向社会捐款中饱私囊，这是什么行为？这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如果在革命中你掌握了更大的一部分权力，或者说革命胜利以后，你做了一个什么级别的官，那不是要向人民索取更多的钱财吗？那你今天革人家的命，明天就等着人民革自己的命吧。小纹，老实说，我对你这种做法很反感。茅学勤要处分你，我说处分得好，还要处分得重一些，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

承小纹的脸色十分难看。他是来托朱松寿去说情的，想不到朱松寿比茅学勤批评得更凶，更厉害，也更触到他心灵的痛处。他霍地站了起

来，推开大门，向外冲去。刚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他咽不下这口气：“老朱，你可能不理解我的处境，像一个吃饱了酒肉的人不理解乞丐的饥饿一样。你们家有田有地，有吃有穿，闹闹革命，倒挺有趣味。像我承小纹有什么？要田无田，要房无房，连个女人都没有接触过！参加农暴，总不能饿着肚皮去冲杀，光着身子去打仗吧！你们看见我得了几个钱，就不得了啦？这个批评，那个指责，总不能把我承小纹杀头吧？跟着你们闹事，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头呢？好，我承小纹到此为止，不干啦！”

当承小纹发脾气的时候，杨绮云就注意听着，这时她走出来，和颜悦色地对承小纹说：“小纹弟，你家里困难，我们没有及时照顾你，这是老朱的过失。不过，刚才你这样讲，好像我家老朱吃饱了饭没事做，才去冲冲杀杀造反的，就像年轻的时候斗蟋蟀一样。你这种说法伤人伤人？要说吃，要说住，我家确是有，陈叔璇、蒋云家也有，茅学勤家也不缺。他们这些人领头出来革命，绝不是为自己一家子的生活，还不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杨绮云说到这里，把承小纹拉过一边，低声说道：“老朱知道你们困难，托他三姐瞒着他母亲卖了10亩地。这样下去，我家那些田地房屋，早晚有一天全部会用到革命上去。到那时，我朱家也是无产阶级了，你说是不是研？”

承小纹的气终于慢慢地缓和下来，觉得自己在捐款中中饱私囊和今天向朱松寿大发脾气，都是错误的，表示要把那些不应该得的钱全部退出来。最后，他对松寿说：“以前我总盯着你们几家有钱，好像我们这些穷光蛋跟着你们干吃亏了。现在我想通了，要说牺牲，你和叔璇、蒋云家的牺牲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在革命中是不断提高自身的地位，你们却在不断地减少自己的财产。”

朱松寿见他有所认识，而且家里生活也着实困难，就从卖田的款子中拿出一部分银元，送给承小纹，再三嘱咐他要如数退出私用的捐款。承小纹连连点头，含着眼泪离开了季庄。

第五节 峭岐镇上的硝烟

承小纹刚走，杨绮云问道：“你何不将卖田的款子叫小纹送去县委呢？”

“我不放心他。”朱松寿说，“还是让我自己送去吧。”

杨绮云不好再阻拦。等到傍晚朱松寿把银元藏在身边，又取出茅学勤带来的手枪，三姐和绮云千叮万嘱，两个对革命有着特殊感情的女人，怀着矛盾的心理，含着泪水一直目送着他被夜色完全吞没，才像丢失了珍宝快快不乐地回到家中。

1928年1月上旬，江阴革命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江阴县委在周庄耿家住基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第一任县委书记蒋云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30多名代表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蒋云任书记，县委委员除陈叔璇、张一声等人外，增选了茅学勤、朱松寿、朱杏南等。钱振标此时不在江阴，但他依然是江苏省委特派员，县委委员们推举他兼任江阴县委军委主任，茅学勤为军事委员。会上决定将农民革命军划分为东北路、东路、南路，西路四个支队，茅学勤统一指挥，朱松寿被选为农民革命军南路支队司令（作者注：江阴部分史志著作曾记载1928年1月中共江阴县委将农民革命军改番号为江阴红军。今查当年省委特派员程德1928年9月21日所写《江阴县的报告》和《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江阴红军成立于1928年6月。1928年1月成立江阴红军并无可靠依据）。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会同驻澄部队加紧了对江阴农军的“围剿”，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家属、房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毁坏。长寿镇上的恶霸地主陈祥安，几次带了自卫团丁，赶到朱家巷，准备拆毁朱松寿的住宅大院。有个团丁提醒陈祥安说：“朱松寿在后塍电灯厂被人劫狱救出，据说已当了江阴农军南路支队司令，纵虎归山已养成势力。现在拆他的房屋，一旦惹怒了他，集中全县的赤色力量，岂不把长寿小镇踏为平地？莫不如先把此人擒住，再拆他的房屋，谁还敢为他出力？”

陈祥安点头称是，遂将自卫团团丁像他豢养的鹰一样放出去，两个一伙、三个一档地四出搜寻朱松寿。

1928年3月中旬的一天，云亭季庄来了三个商人打扮的陌生人，住在一家地主家里，每天向村上农民收购土布。云亭、峭岐、周庄一带向来就有织土布的传统，走进这一带的村庄，看不见一个坐着闲聊的媳妇和姑娘，她们各自坐在织机面前，专心致志地织着土布，织布机声像夏天水田里传出的蛙声响成一片。因此，村上住了几个来收土布的商人，杨绮云和朱松寿的三姐并没有引起注意。可是，这三个收布商总喜欢从三

姐家的门前走过，而且六只眼睛常常骨碌碌地往三姐家里扫去。有一次，三姐看见其中有一个人腰间别着短枪，枪柄上系着血红色绒线。她们很快明白了这三个收布商是前来捕捉朱松寿的国民党鹰犬！她们巴望他们快走。可是他们一住几天，完全没有离开这里的迹象。这可把这两个女人急坏了，如果朱松寿或别的革命同志走到三姐家里，不是撞到他们的枪口上吗？

“现在最要紧的是应该把消息告诉弟弟。”三姐着急地说，一个好看的鼻子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困难的是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出去，都会受到他们的盯梢，反而暴露了弟弟他们的秘密。”

杨绮云觉得三姑的话很有道理，可是不把这三条鹰犬住在季庄的消息透出去，那又非常危险。她苦苦地思索着，忽然两条弯弯的秀眉一扬，绷紧着的脸像早上绽开的太阳花有了一点儿笑容。她凑到三姑耳边，低声嘀咕了一阵，三姑半信半疑，只是拗不过这位弟媳，也就不再加以阻止。

吃中饭的时候，从三姑家里走出一个小伙子，向村后的茅坑走去。住在地主家里的一个收布商，像狐狸看见了公鸡立刻来了兴趣，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他的脸丰满而白皙，他的两只眼睛大而明亮，他的身材不算高，却长得很均匀、很清秀。收布商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他们监视的这家有这样一个俊美的小伙子。也许本不是家的人，何必这样疑神疑鬼呢？收布商这样想着，最后瞥了一眼这个俊小子，只见他仍慢慢悠悠地走着，看不出有一点异样的感觉，于是放弃了对他的监视。

季庄的茅坑一般都做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一家一只，用稻柴编成的草帘围成半个圆周，挡在茅坑的前面，用以遮拦上坑大便的人那种虽然天天做着却并不雅观的姿势和动作。那个俊小子在茅坑边蹲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向村子那边留神瞥了一眼，发现并没有人注意他，才离开茅坑，向附近的一个村子走去。

直到傍晚时分，这个俊小子才在毗山附近的一座坟地上找到朱松寿。这时暮色苍茫，俊小子环顾四周无人，就不顾一切地猛扑到朱松寿的身上，把头靠在他的怀里，久久不肯离开。朱松寿没有防备，吃了一惊，正要将这个没头没脑的人推出去，低头一看，不觉“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绮云，你怎么这种打扮，这样到处找我有危险！”朱松寿嗔怪地说。

“季庄来了三个收布的人，一天到晚盯着三姑姑的家。”绮云把头移开丈夫的胸膛，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凝视着他日渐消瘦的偏长的脸，“我

们估计他们是来监视你的，担心你莽莽撞撞地回到季庄，再被反动派捕去，我们急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可是又走不出去，我只得冒冒风险，化妆成一个假小子找你来了。”

“反动派抓不到我，不会甘心。这几天我已得到消息，陈祥安把他的团丁都派出去了，不仅在我的亲戚村上安排这样的暗探，而且在我们经常出入的村上都有这样的人。”朱松寿拉拉杨绮云的手，示意她坐下来谈。“所以村上根本不能住宿，我们不得不分散住在野外苍棵岗里，或者荒坟上。等会儿，我送你进村里到一位农军战士家里去住，我还得睡在外面。”

“不，你住外面，我也住外面，我也想锻炼锻炼胆量呢！”杨绮云认真地说。

“这给你，我教你怎样使用它。”朱松寿从身边掏出一文精巧乌亮的小手枪，塞到杨绮云柔软温热的手里，“形势这样紧张，你为我又经常东跑西颠的，这东西，用得到。”

“你给了我，自己遇到敌人怎么办呢？”妻子担心地问。

“我身边还有呢。”朱松寿又掏出一支手枪，为妻子做着上弹、瞄准、射击等动作，“你有了它，晚上走路胆子就壮了，遇到反动派也就用不着害怕了。只是今晚不能试枪，你一放枪，敌人就包围上来了。”

天很黑了，朱松寿拉着杨绮云，又转移了一座荒坟，这坟有一亩多面积，四边筑着一人多高的坟框子，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景。坟上又长着许多一抱多粗的高高的松树和柏树，晚风吹来，发出一阵阵令人心悸的松涛声。借着暗淡的星光，看得见一个个坟头不规则地隐没在一



本书作者之一徐泉法(左)在写作本书前
采访朱松寿烈士夫人杨绮云(右)时合影
(陆其明 摄)

二尺高的枯草中。如果仔细地看，坟的一个角落里还蹲伏着一个像水牛一般大小的黑影，旁边有几缕剪成一条条的纸在夜空中瑟瑟地抖动，它的声音不大，但让人感到死一般的静寂和莫名其妙的忧伤。朱松寿知道，这是坟主新近死了人，把棺材抬到坟地，一半埋到泥里，一半露在上面，这种葬法称为浮厝。如果气温升高，腐尸的臭气透过棺材的缝隙扩散开来，令人窒息般地难受。

他们就选了一个背风的地方，铺上一块破旧的油布和衣睡了下来。杨绮云第一次露宿在荒坟里，禁不住身子骨一阵阵颤抖，下意识地向丈夫的身边靠去。

过了一段时间，朱松寿以为妻子睡熟了，就悄悄地爬了起来，从身边摸索出一支竹管，倒出一支香来，用火柴点着了，再用细线把香的一头系在自己的一条小腿上。他这些动作，做得这样熟练，这样敏捷，这样无声无息，说明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些动作了。杨绮云其实并没有睡着，丈夫的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于是用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臂膀，小声问道：“松寿，你领头造反，威震乡里，何等英雄气概！为什么还像你妈妈那样，烧香点烛，相信菩萨？”

朱松寿调皮地拍拍妻子的背，又在她嫩生生的脸蛋上爱抚地轻吻了一下，就侧过身子独自睡觉去了。也许他太疲倦了，不一会儿，就传出了低沉有力的鼾声。

绮云哪里睡得着？虽说身边偎依着丈夫魁伟温热的躯体，闻到的是她熟悉的男人的气息，连打呼噜的声音听起来也觉得那么亲切，安抚着她忐忑不安的灵魂。可是，这算什么生活呀？传出去了，朱家巷那些习惯于正常生活的女人一定会像看见老鼠抓猫一样，叽叽喳喳地议论个没完没了！特别是婆婆，对自己支持丈夫革命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还以为是媳妇怂恿儿子这样干的。对了，朱家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个与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的刘三妹，虽说生活得有些寂寞，可她还有着优越感呢，总说自己出身富家望族，言下之意就是我杨绮云娘家贫贱。这个人也怪，离了婚还住在夫家干什么？平时相处，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堪。松寿不喜欢她，可是当年她为什么又要嫁过来呢？我同她就不一样。如果松寿不爱我，那么，他家有再多的田地，再宽敞的屋子，我都不会嫁给他。即使嫁过来了，也可以离婚，寻找新的归宿，像她这样留在夫家，别别扭扭地生活，我做不出来……

“啊呀!”朱松寿突然轻叫一声,把正在遐想的杨绮云吓了一跳:“松寿,出了什么事?有情况吗?”她问。

“香烧到我小腿上了,怎能不叫?”朱松寿说。

“那你好好地睡觉,为什么要把香系在腿上呢?”杨绮云饶有兴趣地追问着。

“这个问题,刚才你已经问过了,我担心告诉你后你睡不着觉。”丈夫解释说,“现在情况紧急,反动派即使在晚上也要出来捉人,我担心在一个地方睡得太沉了容易被敌人抓去,才想出了这个办法。现在,我们该换一个地方了。”

杨绮云站起来,跟着丈夫向另一座坟地走去。田野里一片黑糊糊的,带着寒意的夜风飕飕地吹着,远处传来一阵阵狗的紧张的吠声和隐隐约约的人声。杨绮云心中陡地紧张起来,莫不是反动派又在抓人了?如果敌人包围了这座坟地,那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们一连转移了几个地方。东方微微发白的时候,朱松寿带着妻子悄悄地摸进毗山南麓的慕义庄,把杨绮云安排在一户赤色群众家里。为了不遭到麻烦,杨绮云又恢复了漂亮少妇的本来面貌。

朱松寿又走了,而且走得很急,今天——也就是1928年3月21日傍晚,县委决定要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暴动。这是极端秘密的军事行动,他只字都未向杨绮云透露。

天又黑下来了,毗山像只在浩瀚的沙漠中苦苦走了一天路程的骆驼,疲惫不堪地蹲伏在沙地上。就在这两个骆驼峰中间,坐落着一座寺庙,原名能仁寺。据说初建时的规模很大,一幢幢富有宗教色彩的建筑从山腰开始,一直向南延伸到一里多路的平地上,重重叠叠,错落有致,颇为壮观。寺内挖有数条很大的池塘,用以解决寺内和尚和其他人员的饮用并作为景点观赏。寺的四周砌有坚固高大的石墙,凭借它保卫寺院的安全。能仁寺建于什么年代,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建造如此规模的寺院,已经难以查考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不知是由于政治的还是战争的原因,能仁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只留下一片断垣残壁、折梁枯柱。也许是这里的地势得天独厚,有好事者在能仁寺的原址上又动起土木,建造了一座中山寺,不过无论是建筑的规模,还是香火的鼎盛,都不能与历史上存在过的能仁寺同日而语了。

现在,中山寺前面一片随着山势稍稍向南倾斜的广场上,站满了

1000余扛着各种原始武器的农军战士，他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总指挥茅学勤激昂慷慨的演说。茅学勤的左边站着朱松寿，右边站着陈叔璇。虽说天色已暗，但是站在队伍前面的人，仍看得清这几位领导人威武凛悍的外形和坚定沉着的气概。

江阴的农民暴动已进入了白炽化的状态。1928年1月第一次党代会后，县委又在2月26日举行了一次有700多个农军战士参加的杨舍暴动，夺取了杨舍公安分局，攻进了缉私盐局，烧毁了公安分局的12间房屋和土豪劣绅的数十间住宅，缴获了一批武器和2万余元现款。得手后，暴动农民主动退出杨舍镇。江阴三次大暴动的成功，震动了京沪沿线。1928年春，宜兴、无锡、常熟等地革命力量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已经没有力量再掀起农民暴动了，可是江阴却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暴动的成功。这不仅让国民党江阴县政府惊恐不安，而且也引起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视与关注。距杨舍暴动才三个星期，江阴县委在毗山中山寺又宣誓暴动，它攻击的目标又在哪里呢？

江阴东南乡有一个叫峭岐的大镇，住着徐、吴两姓数家大地主，他们购置枪械，私设牢狱，扬言要杀尽江阴的共产党员。县委认为这是蔑视江阴农军的力量，决定动员云亭、长寿、周庄数乡农军，暴动峭岐，

继而为攻占江阴县城做好准备工作。

站在中山寺广场上1000余名农军战士，像积蓄了巨大能量的弦上的箭，一刻都不能等待了，他们按照茅学勤、朱松寿的命令，被分成第一、第二两队及炸弹队。朱松寿负责指挥第一队与炸弹队，从东面进攻峭岐镇；茅学勤指挥第二队，由北面抄入袭击侧面，使盘踞镇上的敌人失去联络。各队领了口令、旗帜，分别由朱、茅等人率领，浩浩荡荡向峭岐杀去。



吴子卿，1937年冬协助朱松寿组建抗日武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1938年7月10日英勇牺牲。

（江阴市革命烈士陵园 提供）

这时，有一人气喘吁吁地向中山寺走来，要找朱司令。朱松寿收住脚步，抬头一看，夜色朦胧中认

出是长寿镇上的三先生吴子卿（1889~1938，又名志清）。吴子卿虽然已是不惑之年，可革命的热情却挺高涨，恳切要求参加共产党。第一次后膛暴动前夕，在朱松寿等人的介绍下，他光荣地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朱松寿考虑他年龄偏大，又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不适宜拿着大砍刀或红缨枪上战场冲杀，就让他做一些出谋划策、侦察敌情方面的工作。今天一早，吴子卿奉朱松寿的命令，到峭岐观察地形，现在是向他报告情况来的。因为行军在即，吴子卿用最扼要的语言介绍了峭岐镇的地形特点和徐、吴两大家族的武力防备情况，最后谈了自己对这次攻克峭岐在战术上的见解，朱松寿连连点头。为了不让吴子卿暴露身份，又嘱他连夜赶回长寿家中去了。

朱松寿一溜小跑，追上了第一队和炸弹队。一路上，沿途有许多农民自带了锄头、钉耙、扁担一类简陋武器，有的背着整箱的火油，要求加入暴动队伍。开头，朱松寿尚有疑虑，担心各镇豪绅地主豢养的自卫团趁机混入队伍，杀害农暴领导人。可是，这一类自愿参加暴动的人越来越多，一路上尾随而来，快到峭岐镇的时候，竟有1000余人，连同原来有组织的队伍，已超过2000人。如果茅学勤率领的第二队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这次暴动总数会超过3000人。朱松寿刚将沿途加入的农民，临时作了编排，简要交待了暴动纪律和口令，峭岐镇就像一座黑色的山丘，横在面前了。

“峭岐暴动已准备了几天，上千分散在各行各村的暴动农民，难免泄露消息，峭岐近街恐已有埋伏。”朱松寿边走边迅速地作出判断，命令前锋部队分成几路纵队以扇面形向前挺进，其余原地待命。

当部队抵达峭岐东街的东西木桥时，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噓噓噓”地直向暴动农民的头上飞来，幸好早做准备，立即伏地卧倒。几路队伍一齐向东木桥堍开枪射击，经过一场激战，东木桥边的枪声终于哑了下去。原来大地主徐习吾听到共产党要在峭岐暴动的消息，依仗自己坚固的庄园和精悍的自卫团武装，决心与共产党较量一番，为了万无一失，又到县公安局长张品泉那里借了一个班的警察，预先埋伏在峭岐镇的东西木桥附近，准备当暴动农民从毗山方向杀来的时候，出其不意地给予突然袭击。想不到经三次大暴动锻炼的朱松寿和他的农民队伍，有了相当的作战经验，一举就把这个班的警察击溃，大部被歼，少数活着的就向徐习吾的庄园逃去。

朱松寿解决了第一个障碍，就指挥第一队与炸弹队从东面进攻徐习吾的庄园。须臾，第一队散开队形，摆开了架势。可是，炸弹队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朱松寿着急起来，立即派人寻找，同时下达了暂缓开火的命令。炸弹队离开中山寺的时候，是尾随在第一队后面的，沿路自动参加暴动的农民超过了原有人数的一倍，那个炸弹队长就有些控制不住队伍了。东木桥一接火，炸弹队自动冲上去作战，就与朱松寿失去了联系。当炸弹队走到峭岐北面的时候，按原定计划已经到达此地的第二队因夜黑朦胧看不清是哪支队伍，以为是敌人的援兵来了，正欲准备出击；而炸弹队又把第二队当作是镇上的自卫团，拉开队伍向第二队包围过去。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朱松寿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找到炸弹队长，问明情况，低声责问道：“你们自己走错了方向，赶到峭岐北面来了。”炸弹队长才恍然大悟，急忙与对方互通了口令，果然他们是第二队。这时茅学勤也来了，两个指挥员一商量，决定将错就错，炸弹队就与第二队各为一路，担任侧翼攻击的任务。

“同志们！峭岐暴动现在开始，大家冲呀！”朱松寿回到第一队的阵地，埋伏在这里的1000多农民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一声命令，农暴队伍像山洪暴发一样向徐习吾的庄园扑去。

“达达达！”一阵密集的子弹泼落到愤怒的农民身上，冲在前面的人纷纷中弹倒下。

子弹是从徐家庄园那堵高耸、陡峭、厚实的围墙上射下来的。徐习吾的自卫团见围墙外人影后退，一时趾高气扬地大喊大叫：

“农民兄弟们，吃了花生米再走呀！”

“别走呀，徐先生准备着银元和白米，等着你们来领呢！”

朱松寿听到围墙上的喊声，知道狡猾的徐习吾不仅已有准备，而且兵员充足，弹药充裕，死打硬拼对自己不利，于是想起今晚吴子卿在毗山中山寺对他说的话，决定改用火攻。他一面命人疏疏落落地向围墙上打枪，一面叫农民点燃了火把向庄园内掷去。只是围墙太高，挡住了目标，大多火把被里面的自卫团拾起丢到事先准备的大水缸里熄灭了，而且从里面传出了搬动灭火机的声音。也许徐家地主吸取了后塍和杨舍三次暴动的教训，早就做好了灭火的准备。

围墙上，又传出了得意忘形的喊声：

“兄弟们，再生几个火把来暖暖身子嘛！”

“别小家子气舍不得呀!”

突然，围墙上的声音没有了，朱松寿正感到奇怪，忽听得一阵阵的喊杀声从北面传来，知道是茅学勤指挥的第二队也发动了进攻。守卫在围墙上的自卫队员和警察知道四面被围，听人声暴动农民又在数千以上，刚才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

“轰，轰!”从北边传来两声山炮声，这是炸弹队拥有的唯一一架土炮，是茅柴火兵工厂新近制造出来的武器，只是声音挺大，杀伤力却挺小，在攻坚战中并不能起大的作用。

“着火了，着火了，快抬灭火器!”庄园里一片惊叫声。

这一叫，倒给朱松寿一个启发：如果借台灭火器，把火油喷进庄园里去，再用土炮轰击产生的灼热把火油点燃，岂不火势汹涌？里边救火也来不及了。他让人去借灭火器，又转下命令，把土炮从炸弹队调到第一队使用。不一会儿，几个农民抬来了一架灭火器。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江阴农村，使用的灭火器还比较原始，它由两个人分别按着灭火器上面的横木两端，此起彼伏地用劲向下使力，横木带动两个活塞，上下抽动，产生的压力把吸进去的水喷向很高很远的地方。现在，朱松寿把水改为火油，一忽儿工夫，火油通过灭火器的压力聚合成一股浓雾般的油流，向庄园内喷去。朱松寿又命令抬来的土炮向里边开炮。这一招真绝，徐家庄园从天降下一条火龙，通红的火舌贪婪地舔着雕梁画栋的上等瓦房，发出“劈劈啪啪”的断梁折柱的声音。徐习吾眼看大势已去，带着老婆孩子，背了金银细软，从一个



1928年3月21日峭岐农民暴动后，徐姓地主投资巨款修建铁屋，以防暴动再次发生。图为铁屋大门。
(徐泉法 提供)

很隐蔽的侧门逃窜而去。自卫团和警察见庄园主人已走，也像受到惊扰的马蜂逃个精光。

朱松寿和茅学勤各率队伍冲进庄园，灭了大火，打开仓库，把白米、小麦、布匹、衣服等物全部运走。谁知朱松寿这么一烧，在徐家庄园的原址崛起了一座像黑监狱般的铁屋来。这自然是以后的事了——1928年夏，江阴农民暴动失败以后，徐习吾回到峭岐，在属于他的那片废墟上盘桓了很多时候，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要在此造一幢铁屋，梁柱门窗，都用铁做，墙壁瓦片，都用铁铸。看你朱松寿如何烧它？”徐习吾仗着钱财，把江阴东乡所有的铁匠请到峭岐，开炉铸铁，叮叮当当，一直造了两年。铁屋竣工之日，茅学勤等人已经牺牲，徐习吾大摆宴席，扬言此生还要亲眼看到农暴头目朱松寿的下场才肯闭目。这座铁屋像压在暴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谁还敢动它？直到1940年夏天谭震林创建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江阴县委领导的铁工会才在这座大山头上掘了几铲土。它的彻底毁灭，要到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

再说朱松寿和茅学勤的两支队伍，攻破徐习吾的庄园以后，3000余人汇合一处，杀声震天，向吴姓大地主的住宅冲去。

峭岐镇分南北两个小镇，如果说徐姓地主是北峭岐土霸王的话，那么，吴姓地主就是南峭岐的地头蛇了。南峭岐地势比北峭岐更为有利，三面环水，河面宽阔。与北峭岐相隔一条凤泾河，河面上架着一座青龙桥。当农民队伍攻打北峭岐的时候，南峭岐的吴姓大地主就让自卫团和从县公安局借来的警察驻守南桥堍，抢修工事，架设铁丝网，接通了电源。当茅学勤、朱松寿率领农暴队伍赶到青龙桥时，敌人枪弹乱发，又用十个手电筒绑扎一起，组成一支强烈的光束，向桥北照耀。农民队伍既无掩体遮护，又完全暴露在电筒光之下，一时中弹者甚多。朱松寿亲自率领队伍向青龙桥冲锋，只因火器不足，被敌人凶猛的子弹压回桥堍。

朱、茅在阵地上稍作商议，由茅学勤集中大部枪支向敌人阵地射击，吸引桥南守军的注意力。当双方鏖战之际，朱松寿第二次率队向桥南猛冲，当快到青龙桥的中央时，狡猾的敌人已经把枪口全部转向青龙桥，一阵猛烈的扫射，农军又倒下了一批战士，只得撤回桥北阵地。以后，朱松寿又发动两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第六节 爱情港湾里的波澜

朱松寿自参加农暴以来，还没有遇到如此强硬对手，不甘心就此退却，让峭岐的地主豪绅看轻农军的力量，准备组织第五次大冲锋，誓死夺下青龙桥阵地。茅学勤认为久战对我不利，如果江阴县公安局和国民党驻军闻讯赶来增援，暴动农民腹背受敌，势必要遭到重大损失，于是果断决定，让朱松寿率队断后，其余三路队伍全部撤出峭岐镇。

这次暴动虽然没有按预定计划全部拿下峭岐镇，但是对国民党江阴县政府的威慑和震惊，却超过了先前的三次暴动。一方面，后塍、杨舍距江阴县城都比较远，而峭岐则要近得多，这说明江阴农军无论是胆略还是力量都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峭岐暴动后，江阴城乡到处都在议论农军不日就要暴动县城，在县城里居住的豪绅地主纷纷举家向上海搬迁。国民党南京政府严词斥责江阴县政府镇压不力，吓得县长孙捷均弃官而去。新任县长申炳炎对朱松寿切齿痛恨，大街小巷贴满了“谁捉得朱松寿赏洋1000元”的通告。

消息传到朱家巷，把朱老太太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儿子闯下了杀身大祸，外面的田地，村上的房屋，还有她辛辛苦苦积蓄下来的金银财物，都必将为他人所有。她恨自己由于过分溺爱儿子，让他一步步走上了这条可怕的道路。她真想一死了之，免得亲眼看到儿子悲惨的结局和朱家的衰败而折磨她脆弱的灵魂。可是，她又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决心。就是儿子被政府捕去砍头，可也得有人照料他的后事啊！刘三妹是不会担这个干系了，杨绮云年轻，能把丈夫的后事办得庄重和像样一点吗？想到这里，老太太撕心裂肺般地疼痛。干吗要想到儿子的死呢？或许苍天可怜放他一条生路也未有一定呀！老太太想到在这关系朱家兴亡成败的关键时刻，应该乞求那佛力无边的观音菩萨保佑。既然儿子的诞生是观音帮忙的结果，那么当儿子遭到杀头之灾的时候，这位大慈大悲的观音怎么会袖手旁观呢？她迅速地点上三支香，叩了三个头，又默默地祈祷了一番，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坐在那里发呆。

老人的这一系列动作，被一个人全部看在眼里，她就是朱松寿的前妻刘三妹。自从杨绮云离家住到季庄以后，刘三妹看到老太太孤单寂寞，常常前来陪伴。应该说，这一老一少无论从思想意识到生活习惯，都有

极其相似的地方，因此许多事情常常想到一块儿去，彼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刘三妹看见老太太独坐在那儿，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

“婆婆又在想儿子了？”刘三妹轻声问道。

朱老太太抬起头来，看见刘三妹温柔体贴的面容，十分感动，就拉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一个劲地瞅着她看，从头看到她的脚，又从脚看到她的头。看着看着，老太太觉得刘三妹除了个子娇小一些外，并没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为什么儿子会不喜欢她呢？当然，杨绮云要比刘三妹端庄漂亮，待人也敦厚温和，这一点，老太太实在无法指责。但是，杨绮云在她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一个无法原谅的缺点，那就是同情和支持她的宝贝儿子松寿官去造反，甚至两人合计着欺骗自己。自从松寿官从后塍被人救出来后，杨绮云离开朱家巷，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回过家门，有人看见她握着双枪，跟在松寿官的后面，参加了峭岐暴动。她后悔当初一时糊涂，听了儿子的话，把杨绮云娶回家，委屈了眼前的这个大家闺秀刘三妹。她觉得应该趁自己还健在，重新处理这桩错误的婚姻。当然，这样做，会把杨绮云毁了，她心中也觉得过意不去。但是，这同朱家能不能延续和繁荣下去的大事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呢？

老太太想听听刘三妹的意见，就隐晦曲折地问道：“三妹，你说松寿官还有救吗？还能活着回到朱家巷吗？”

“你老人家天天吃素念佛，行善积德，”刘三妹为了安慰朱老太太，话就专拣好的说，“朱家列祖列宗，都是善良忠厚之士，我想苍天有眼，菩萨有灵，也会让松寿官平平安安回到你身边的。”

“三妹，你跟我说实话，”朱老太太脸上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你还恨松寿官吗？”

一句话触到了刘三妹心灵的痛处，鼻子一酸，压抑了多年的眼泪滚滚而下。她双手捧住瘦小的脸颊，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她的痛苦，她的委屈，她的愤懑，都随着清泉般的泪水喷涌而出。朱老太太看到刘三妹哭得这般伤心，又触动了自己的心事，在一边陪着流泪。

“松寿官不喜欢我，这是我的命不好。”刘三妹摸出一块素净的散发出淡淡香味的手帕，先替老太太擦干了挂在腮边的泪水，再随便抹了抹自己湿漉漉的脸，“松寿官是不错的，我不怪他，更不会恨他。朱家不厌弃我，让我住在这大院子里，我已经很满足了。老太太现在再提这些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朱老太太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刘三妹又是一阵悲咽，低着头断断续续地说：“只要松寿官……喜欢我，我来生投牛做马，也要……报答老太太……恩情……”

听刘三妹这么说，朱老太太就下定了决心。第一步首先要找到松寿官。她把大孙子鸿坤托人照看了，在刘三妹的搀扶下，一步一摇地走到季庄三女儿的家里。松寿官不在，她不死心，又向大女儿家走去。松寿官仍不在，她再向二女儿、四女儿家走去，仍没有见到儿子和媳妇的影子。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4只金莲，为了各自的神圣目的，跑遍了长寿乡的各个村庄，终于在毗山南麓的慕义庄找到了杨绮云。老太太要媳妇去寻儿子，杨绮云拗不过婆婆，只得各村各巷去寻找。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周庄和后塍之间的一个小村子上找到了丈夫。这时朱松寿和蒋云、茅学勤、陈叔璇等人正在谋划一次新的农民暴动，听说母亲为见到自己，一双小足多走了路，肿成了两只大脚。他心疼老人，答应今晚在慕义庄附近的水墩庵见一见面，嘱杨绮云先去告诉母亲。

水墩庵位于毗山南麓一里多路的地方，庵不大，四面都是河，只有一条土坝可以出入。当家的勤悟和尚同情革命，支持暴动，朱松寿他们有事，常到这里商量。晚上七八点钟，当朱松寿赶了10多里路来到水墩庵的时候，见母亲、杨绮云和刘三妹都在里边等着了。刚坐定，老太太伸出干枯的手，像春风吹拂毗山上小松树似的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和肩膀，眼圈儿红红的，抖动着的嘴唇张合了几次，仍然没有说出话来。

“妈，我在外面好好的，你走这么多路，找我有事吗？”朱松寿打破了沉寂。

“你不想妈，妈可日日夜夜想着你呢！”母亲悲哀地说，“儿子大啦，羽毛硬了，妈的话就听不进去了。现在，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以前说过的话，再说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在我死之前，有一件事，我还得做一做主！”

“妈你就说吧，做儿子的那能不听妈妈的话呢？”朱松寿心里想，只要母亲不干涉他参加革命的事，其他事都可以商量。再说母亲举着这一双伶仃小脚，一个村一个村地寻找自己，也够可怜的了，能安慰就安慰安慰她吧。

“绮云，三妹，你们都出去一会儿，妈单独同松寿官说说话儿。”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说话也响亮起来了。

绮云不知婆婆葫芦里卖什么药，顺从地走了出去，在庵内的另一间房子里坐着。刘三妹离开的时候，笑吟吟地好像枯萎的花朵重新开放，脸上映出一片明媚的色彩。

“松寿官，”母亲的话越发温和，“妈妈先前办错过一件事，现在想改过来，只要你答应我，妈就是死了，也就放心了。”

“什么事，妈快说呀！”儿子催问道。

“你看三妹待妈好吗？”母亲反问道。

“好。”松寿照实说了。

“三妹待妈好，这不错。在我看来，三妹对你也是有情有义的。她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识礼的，虽然朱家一时亏待了她，让她受了不少的委屈，可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这是有修养的女子才有的品德啊！当年，是我一时糊涂，同意了你另娶杨绮云的要求。这位新娘子人品也不错，你和她也很恩爱。可是，我总觉得做错了事，这几年我们家里不顺当的事接连发生，外面沸沸扬扬。你们受得了，可我实在受不了。细细想来，这也是对我做错事的一个报应。几天前，我梦见了你的爸爸，他在阴间也在责怪着我呢！我是一个一只脚踏进黄土的人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跟着你爸爸走了。只是这件错事不纠正过来，我到了阴间，没法儿向你爸爸交待。松寿官，你就答应了吧。杨绮云那里，我们也不会亏待她。她要走，还是要田要屋，都由她挑选。松寿官，你就认了这个命吧……”朱老太太一口气数说着，看得出，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容置疑的，不答应不会罢休的。

朱松寿平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这样严肃刻板的脸，就是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参与领导了江阴的农民暴动，她都没有这样对待过自己。这几年来，他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革命上，很少有时间去回味自己爱情生活的酸甜苦辣。现在，母亲提出的这个无法回避的必须作出明确选择的问题，像陡然而起的12级台风刮进了爱情的港湾，掀起了滔天波澜！

朱家最初在什么时候与刘家攀结缘亲，朱松寿并不知道。当他意识到这件婚姻大事的时候，已经到了十六七岁的年龄。那一年，周庄刘长巷一个颇有田产的老头儿刘喜康逝世了，朱文魁要儿子去刘家吊孝。朱松寿不愿意去，文魁斥责道：“刘喜康是你的岳父大人，不幸去世，做女婿的岂有不去吊孝之理？”

“他家的女儿是高是矮，是俊是丑，我都不知道，谁愿意做他的女

婿？”朱松寿年轻气盛，顶撞了父亲。

“谁家的儿子娶媳妇是自己挑挑拣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就是如此。”朱文魁虽然宝贝着儿子，可这千年传下来的规矩，却是不能破的。

朱松寿只得以未来女婿的名义，身穿孝服，躬着脊背，走在送殡的队列中。可是他的眼睛却老是向那几个号啕大哭的刘家女儿瞟去。他以前听母亲说过，那个未来的妻子叫刘三妹，是刘喜康的第三个女儿。他隐约发现，刘家的大女儿是个小个子，二女儿矮而肥胖，三女儿个子也很瘦小，心中就凉了半截。

刘喜康没有儿子，葬礼主要靠3个女儿和3个女婿操持。葬了岳父，他们6口人围在一张桌子上吃丧宴。泾渭分明，朱松寿很快就认出了坐在对面的那个刘三妹。她因为还没有出嫁，与未婚夫骤然见面，又坐在一桌吃饭，虽然丧父悲伤，总免不了羞羞答答地低着头。因为近在咫尺，他不能正眼看她。当村人前来敬酒的时候，朱松寿趁着桌面上混乱，抬眼向三妹看去。事有凑巧，三妹也在偷看未来的丈夫。这第一次眼睛的对视，就为朱刘悲剧婚姻定下了基调。刘三妹看见的是一个伟岸英俊而不乏温和敦厚的小伙子，两道浓黑的剑眉平添了几分英气，她心里像抹了蜜似的甜滋滋的。可是她很快发现这个英气勃勃的男子汉脸上出现了一层失望的灰暗的色彩。难道他不喜欢自己吗？她忐忑不安地低下头去。刘三妹的猜测是有根据的，朱松寿确实不喜欢这个未来的妻子。她的全部缺点集中在三个“小”字上，一是个子矮小，同高高大大的他站立一起，像高耸的宝塔旁边砌了一个小烟囱；二是脸面瘦小，脸小必然眼小鼻小，少女的丰满和妩媚就不翼而飞了；三是足小，走路摇摇晃晃的多乏味儿，丧宴还未吃完，朱松寿推说肚子疼痛，提前走了。饭后大女婿二女婿要找他商量事儿，早不见了他的影子。此事刘三妹心中明白，暗暗叫苦，却不敢贸然乱说。

自从在丧宴上看到了刘三妹的容颜，朱松寿就失去了对这门婚事的一丝一毫的吸引力，几次同父母吵着要解除婚姻关系，只是并无结果。

这门婚事就这样拖了下来。到了朱松寿19岁那年，父亲突然患病，服了许多帖中药，并未见好，反而一天重似一天。一日，父亲把儿子叫到床前，滚下两颗浑浊的老泪。松寿以为父亲不行了，伏在床上恸哭。过了好久，父亲才艰难地一字一句地说着：

“松寿官，我有一件事，放不下心。在我咽气之前，我想看着你和刘家三姑娘的亲事办了。也许，我心里高兴，还会好起来……”

朱松寿像遭到雷击一样停止了思维。父亲在这个时候提出把媳妇娶回来，作为儿子是不能抗拒的。在1918年的江阴农村，还盛行着一个古老的习俗：当父母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把定亲的媳妇提前娶回来，这叫“冲喜”，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甚至把病冲掉而恢复健康。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刻抗婚，那么就被视为不孝，遭到传统观念的非议和责难，在家中和社会上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三天后，一顶大红花轿停在朱家大院的门前，吹打声、鞭炮声、戏闹声组合成一曲热烈、高亢、红火的旧式婚礼的进行曲，可是，新郎却像掉进冰窟窿似的毫无生气。洞房之夜，客人们都走了，新娘遮着鲜丽的红绸头巾，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等待着新郎去采摘。可是，久久没有一丝儿动静，却听到了一阵阵打鼾声。新娘偷偷地挑起头巾，只见新郎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忍不住一阵伤心，大滴大滴浸透着怀春少女失望的泪水，沿着那厚厚一层脂粉的脸颊滚落下来……

媳妇终于娶回了家，朱文魁怀着深深的满足离开了人世，留给儿子和媳妇的却是一部永远不会下幕的人生悲剧。

以后，也许是母亲和四个姐姐苦口婆心的规劝，也许是刘三妹成熟女性芬芳和温馨吸引，也许是青春男子一种本能的情欲的冲动，朱松寿和刘三妹在肉体上结合在一起了，并生下了女儿朱露英。再后又生下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但是，这两个青年男女却始终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爱情。

如果不是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朱松寿到了常安镇，见到了一个同刘三妹形象截然不同的姑娘，那么，他与刘家三姑娘的婚姻，就会像当时许许多多同床异梦的青年夫妇一样，会年复一年地苟合下去。

常安镇位于长江南岸，与南通的天生港隔江相望。上世纪20年代初，长江下游改道，常安镇附近，每年都有大块的土地坍塌江中，渐渐向镇上蚕食过来。一时间，到常安镇来观看坍江的人很多，就像浙江海宁县盐官镇是观看钱塘江大潮的好所在一样。1921年夏天，朱松寿会同几个年轻人，步行一天，到常安镇天已黑了，就在一家客栈歇息。吃过晚饭，只听店主人说道：

“你们都把坍江看作有趣事寻找快乐，可是，常安镇上的人却天天咒

骂着这可恶的长江。就是我们这家小店，如果不是为了赚几个看坍江人的钱，也早就搬走了。”

“如果有人搬不起这个家，那该怎么办呢？”朱松寿不知为什么，总是为穷人着想。

“这样的人家有呀，就说‘杨家两枝花’，家里没有男人，钱也不足，就不打算搬家啦！”店主人的语气充满着同情和体贴。

“杨家两枝花是什么样的人呀？”小伙子好奇地问。

“你是外地人吧？”店主人抬起头，借着柜台上一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瞥了一眼朱松寿，“两枝花就是两个漂亮的姑娘，长得亭亭玉立、白白净净，就像夏天刚刚探出水面的两枝荷花一样惹人喜爱。杨家先前开一爿酒店，生意倒也兴隆。可惜六七年前死了当家的，剩下寡妇孤女，酒店勉强维持了几年，也在前两年歇了，靠种几亩沙地生活。”

第二天一早，同来的伙伴都到长江边去了，朱松寿推说有事，找到了杨家。

“客官，你找谁呀？”一位稍稍发胖但却挺干练的中年妇女操着沙洲口音问道。

“这是杨家酒店吗？几年前我在这里吃过，酒香，菜好。今天路过这里，想再来品尝品尝。”朱松寿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真的吗？”干练的中年妇女高兴起来，“只是我家酒店早已停了。不过你远道而来，真的爱吃杨家的酒菜，那就别走了，在我家吃中饭，怎么样？”

“那好啊，”朱松寿从怀中掏出几个银元，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这是酒钱，你先收下。”

这时两个少女从房中探出头来，见有人要在她家吃饭，“扑哧”一笑，感到很新鲜有趣，一先一后地走到堂屋里。朱松寿凝神一看，这是姐妹俩，长得很相像，姐姐十六七岁模样，比妹妹要大两三岁，因此显得更为丰满和充满着少女的魅力。她的两颗明亮的眸子，躲在长长的睫毛下，像草丛中的两颗晶莹的宝石，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她的脸像是用刚刚挖出山的汉白玉刻凿而成，线条柔美，光彩照人。她的嘴唇，像中秋节从荷塘里刚刚采来的大红菱，水灵灵，红艳艳，玲珑饱满而又富于弹性。她的胸脯，像长着两座小山峰，高高挺立着，那薄薄的旗袍快要被它顶破了。她脑后留着一根长辫，乌黑油亮，一直垂至臀部，辫梢系

着红绸子像是开着一朵鲜丽的石榴花。

“这是我家的两个闺女，”中年妇女介绍说，“大的叫绮云，小的叫银梅。”

那个叫绮云的姑娘，见那个陌生的男子怔怔地看着自己，不觉脸儿一红，可是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前几年她家开着酒店的时候，她常端菜提酒地帮着妈妈做事，见的生人一多，也就习以为常了。“客人到江边小镇来，可是过江到天生港做买卖的？”绮云很有礼貌地倒上一杯茶，随便地说起话来。

“不，我是来看坍江的。”朱松寿说，“听说坍江很壮观，很有气魄，我想开开眼界。”

“坍江有什么好看的？”绮云撅起了那红菱般好看的小嘴，“坍江坍江，害得我妈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天夜里听到那轰隆隆的响声，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有钱的人家都搬走了，我们只能让那可恶的江水吞到江底里去。我们真是恨死了长江，为什么偏偏要欺侮常安这个小镇呢？”

“杨小姐，我不知道坍江还有这么多害处，引起你们伤心，那我就不去看了，”朱松寿沉默了好一会儿，难过地说道。

“那不是因为我家的事而扫了你的兴吗？”杨绮云收起愁云，像深秋

的天空那样明朗起来，“我陪你到江边去！”

女主人看见朱松寿是个忠厚地道的小伙子，不至于会使坏伤害自己的女儿，也就点头答应了。

两人一前一后地朝长江边走去。镇北一里多路的地方，一



本书作者之一陆其明(左)和夫人范敏若(右),从北京专程赶到江阴访问朱松寿烈士夫人杨绮云(中)时合影。

(徐泉法 摄)

条白茫茫的无法看到边际的大江拦在面前，汹涌澎湃的水浪猛烈地冲击着堤岸，发出令人心悸的响声。江边，稀稀落落地站着一些人，他们都是来看坍江的。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有时白白地站一天，什么都不会看见。

“看坍江不能靠江边太近，”杨绮云回过头来，对紧跟在她身后的朱松寿说，“几天前，有一个10多岁的男孩，骑在牛背上，到江边来放牧。牛吃着青草，慢慢地向江边靠拢。男孩不知道坍江的厉害，在牛背上悠闲地哼着小曲儿，随牛走动。突然，一大块土地坍入长江中去了，转眼间，那男孩和牛都不见了踪影。你说吓不吓人？”

朱松寿以为杨绮云在编故事吓人，一边应着，一边向江边走去。看看离江边还有10多米远，才站住脚头。杨绮云吓了一跳，说这里危险，返身要走。朱松寿哪里肯依。正在争执间，突然脚下的土地上下左右摇晃起来，两人才举脚要走，面前的土地裂开了一条不规则的缝隙，缝隙越来越宽，越来越长，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怎样沉入水底的，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裂缝外面的土地就不见了，一排水浪直扑过来，向这两个离江靠得过近的人身上压来。慌急间，朱松寿拉起杨绮云的小手奔跑起来，快到常安镇的时候，少女才发现自己的手握在这个陌生男子的手中，嫩白的脸蛋儿涨得通红，猛地把手缩了回去。

吃过中饭，杨绮云无意间问了他的姓名和住址。当朱松寿离开以后，她感到有些儿惆怅，总想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这个英俊而侠义的小伙子。

朱松寿心急火燎地赶回长寿朱家巷，把遇到杨绮云的事同母亲说了，发誓要把这个姑娘娶回来。那时朱母对儿子正百依百顺，可又碍着刘三妹。朱松寿这时已下了决心，要与她解除婚姻关系。谁知刘家也是有财有势的人，加上刘三妹哭着闹着，一时如何肯就范？此事拖了很久，刘三妹才答应解除夫妻关系，但要仍住朱家。朱松寿就划给她10亩地、3间瓦房，让她与女儿露英一起生活。

朱家就托人向杨家说媒，杨绮云自然乐意。她的母亲提出了唯一的一个条件说：“常安镇不久就要被江水吞没，我们已没有力量搬家了。你家儿子既然喜欢绮云，我和孩子都没有意见。只是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绮云结婚后，我和小女儿要跟着住到她夫家的。”

朱松寿和母亲一商量，一口答应，在长寿镇上租了两间屋子。第二年早春，杨家母亲趁船先期到了长寿，收拾房屋。杨绮云和妹妹请了两

辆独轮车，一辆车上驮着衣服细软，另一辆车上载着“杨家两枝花”，离开了生育她们的即将坍入长江的常安镇，车轮碾着大道上的泥土，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杨绮云坐在车上，想到这是与故乡诀别，禁不住一阵难过，不由得频频回首，直到看不到常安镇的房屋，听不到长江的涛声，才慢慢安静下来。

又过了一年，杨绮云19岁了，出落得花枝招展，婀娜多姿，胸前的两座乳峰，顶着衣裳，露出浑圆高挺的轮廓。修长的躯体，像从碧波里脱颖而出的白莲花，轻盈，飘逸，舒展。她已经完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朱家就定了吉日，欢欢喜喜地把杨绮云娶了回来。可这一夜，刘三妹躲在房中，暗暗流泪，把个枕头都淋得湿漉漉的，几天都不肯与人见面。

结婚以后，朱松寿才知道杨绮云不只外貌美丽，而且心灵淳朴，胸怀宽阔，常常主动接济贫苦之家。参加革命以后，他更意外地发现，她性格坚强，目光深远，不仅是一位难得的助手，而且有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不过，他已经看出来，她支持自己革命的思想与行动，在老太太眼里，是对儿子不轨行动的推波助澜，是把这个家庭送往衰败深渊的不可饶恕的过错！

“妈，你要我答应这件事，得有一个条件。”朱松寿从长时间的沉默中回过神来，冲着母亲冷冷地说。

“松寿官，我的好儿子，你毕竟是我生的，儿子再大也会听妈的话，你答应了这件事，我就放心了。你说吧，别说一个条件，就是十个百个条件，只要能办到的，我都依，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依你！”老太太想不到事情办得这样顺利，兴奋得一阵眩晕，忙朝椅子上靠了靠，闭目养了一会神，才睁开眼睛，等待儿子提出条件。

第七节 当血腥镇压来临的时候

“妈，你不是信仰佛教吗？”朱松寿依然冷冰冰地说，“佛教认为人死了以后还可以投胎成人。待我们百年以后转了世，而且，你仍然是我的妈，那么，我才会答应你今天的事！”

“你，你……”老太太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愤怒地站了起来，摸着墙壁，用颤抖的声音喊着刘三妹。杨绮云看见婆婆脸色青紫，不知出了什

么事，赶忙走过来搀扶。刘三妹看到这个情景，知道刚才母子两人一定为自己的事闹翻了，想到自己的命这般苦，又忍不住泪流满面。

“妈，这几日风声很紧，你就去外面躲一躲吧，免得再受陈祥安他们的惊吓。”朱松寿刚才一时气愤，把上了年纪的母亲气成这般模样，心中很为不安，说话声音也温和了许多。

“妈年纪大了，要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好好的日子不过，常常在外面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是说去就要去的人了，到时那里去寻找你们呢？妈40多岁才生了你，不管你有出息没出息，我总要见了你才闭眼哪。”老太太似生离死别般的痛苦。在儿子的护送下，她和刘三妹一起摸着黑路颤颤巍巍地向朱家巷走去。

不假，自此以后，朱老太太再没有见到儿子和儿媳杨绮云，她的预言不幸竟成了事实！

朱松寿回到家里，从邻居家里抱回儿子，又匆匆回到水墩庵。他知道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又连夜用船把妻儿送到10余里以外的璜塘乡下杨银梅夫家。杨绮云的妹妹是两年前嫁到这里来的，丈夫是一位裁缝师傅，常年在无锡做工，杨母就跟着来到第二个女儿家生活。临走的时候，朱松寿低声对杨绮云说：“反动派的鼻子很灵，这里也不是最安全的，你千万要提高警惕！非常必要时，”他做了一个打枪的姿势，“那东西可以帮你解围。”

中共江阴县委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领导的四次大暴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最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但是，也暴露了我党在江阴地区的力量，给长期坚持斗争带来了困难。像朱松寿和钱振标、蒋云、茅学勤、陈叔璇等主要领导人，成了敌人日夜捕捉的对象，甚至他们的家属都受到残酷的迫害和屠杀，江阴人民的优秀儿女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在长寿、云亭、峭岐、周庄诸乡，朱松寿实在呆不下去了，就偷偷地潜往沙洲沿江地带国民党防务薄弱的乡村隐蔽起来，瞅准机会打击敌人。可是，国民党公安局和驻军很快就开赴沙洲，搜捕朱松寿。敌人知道朱松寿身材高大，传下命令说：“看见脚长的人，不问是谁，先捕起来再说。”吓得高个子的人不敢出门。以后又听说朱松寿三个月没有理发，又传下命令说：“看见长发的人，一定要严密盘查。”也有土豪出主意说：“朱松寿会使双枪，两只手掌有老茧的人，要特别留意。”于是又

检查起行人的手掌来……

这位“钦犯”的头发，倒是被国民党的鹰犬们说准了。自从县委组织3000农民把他从后塍光华电灯厂救出来以后，他没有一天停止过紧张的活动，着实没有时间来修理他的头发。另外，到镇上去理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椅子上，也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反动派。好在春寒料峭，他戴个帽子，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可是，峭岐暴动后，天气慢慢地热了起来，头上还粘着一只帽子，反而会引人注目，他下定决心要理一理头发了。

一天下午，他来到一个小镇，在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理发店，就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理发师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给他围上了白布，提起夹剪，“格得，格得”地理起来。

他从镜子中注视着街上走动的行人，并没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他松了一口气，正要闭目休息一会儿，只听耳边响起一声粗暴的喝叫：

“不许动，站起来！”

朱松寿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站着四五个警察，四五把短枪对着自己只理了一半头发的脑袋，也许敌人觉得稳操胜券了，像几只狐狸围住一只公鸡一样露出胜利者的得意之色。

理发师傅看到这个场面，手中的夹剪“当”的一声掉到地上，他看看警察，又看看朱松寿，脸色都吓得白了。

朱松寿只得老老实实地站起来。警察正要上前捉拿，他猛地扯掉被理发师傅挡在自己胸前的那块白布，两支驳壳枪的黑色枪口挑战似的张着大嘴巴。“警察兄弟，要不要试一试？”他平静地问着。

“不用试了，不用试了！”四五个警察边说边向店外退出。

朱松寿紧紧地握着驳壳枪，旁若无人地向外走去。

警察觉得今天放走朱松寿，上峰追查下来担当不起责任，再说1000银元的赏格，也够动心的，于是又不即不离地追了上去。

“达达达！”朱松寿扬起双枪，向这边射击，警察们赶紧伏倒地上。可是，子弹并没有向他们的身体内钻去，却打在离他们半米多远的地上。沙洲沿江地带是沙土，干旱季节的大路上常常积有10多厘米厚的泥尘。高速进行着的子弹带着巨大的势能，击打在泥尘上，泥尘立即飞腾而起，迅速弥散开来，像深秋早上的浓雾，几米以外的东西都朦朦胧胧，无法辨认，哪里还看得见朱松寿？更有甚者，泥尘扑进了警察的眼睛，像撒上了一把干燥的石灰粉，呛得眼睛疼痛难忍，谁还顾得去抓这1000银元

赏格的人？朱松寿此次脱险，完全凭着智慧和勇敢，把公安局长张品泉气得干瞪眼，只得以《共党分子朱松寿双枪拒捕》为题在报上作了报道，掩饰了他们的愚昧和无能。

张品泉抓不到朱松寿并不甘心，派出大批特务和利用叛徒变节分子，侦察朱松寿的行踪。1928年3月下旬的某一天，朱松寿被几十个警察包围在后塍的一个村子里。为了万无一失地抓到这个江阴农暴的“首犯”，张品泉又用电话向县城驻军调来了一个连。就在这个连将到而未到之际，村子里晃晃悠悠地走出一个换糖佬，挑着一副破旧的糖担。一只圆柱形的竹筐里除了少许剩下的糖果外，下面藏着不少废铜旧铁；另一只竹筐里，是堆得高高的破布，旧絮、烂布伞、也许担子太沉，压得他的背都有些驼了。警察看到他散发着霉烂气味的破棉袄和沉甸甸的一担破烂货，以一种正遇到重大事情不屑与闲杂小人物拉扯的气概，一挥手叫他快滚。换糖佬受到了闲气，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

现在，人马齐全，张品泉像指挥一个重大战役一样，命令驻军包围村庄，警察进村搜索，抓不到朱松寿，不得回城。这100多人，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暗，也未见到朱松寿的影子。张品泉要警察和部队连夜搜查，一个警察赶来报告说：“几个小时前有一个换糖佬挑着一副糖担出村去了，会不会就是朱松寿？”

“那人个子高不高？”张品泉迫不及待地问。

“很高，不过已经驼背了。”警察回答。

“那人脸形长不长？”

“长，只是满脸灰尘，半头白发了。”

“啪”的一声，警察挨了张品泉重重一记耳光。公安局长破口大骂道：“这个高个子长脸的换糖佬，就是朱松寿！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为什么不请示就放了他？为什么放了几个小时才来报告？你是不是通共了？是不是得了朱松寿的金条了？看我不枪毙你才怪！”

张品泉估计得一点不错，那个换糖佬确实是朱松寿。当他被围以后，他原想用双枪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去，看到警察人多，硬冲对自己不利。正当这时，村边走过来一个换糖老人，朱松寿急中生智，用5个银元买下了这副糖担和老人的全套衣服，闪进一间养猪屋，迅速换了衣服，挑着糖担向外走去。当张品泉发现上当咆哮如雷的时候，朱松寿已经走出10多里路，在一个联络点找到了茅学勤和陈叔璇。

“今天怎么这身打扮？”茅学勤问。

朱松寿把今天的脱险经过叙述了一遍，茅学勤和陈叔璇禁不住捧腹大笑。

“我还当过一次捉鱼人呢！”陈叔璇得意地说，“几天前，张品泉带着警察，把陈家仓包围得水泄不通，突围和躲藏都难免要落入敌人之手，我就来个逆向思维，自个儿向敌人走去……”

“那不是自投罗网了吗？”朱松寿打断了陈叔璇的话，关切地问。

“长脚，你看见过一种橡胶做的衣服吗？人们穿着它，冬天下水，不会过于寒冷，我们叫摸鱼衣。”陈叔璇继续讲着他的故事，“我当时就想起这种衣服，可惜家里没有，邻居是有的，但不相信我会去干这种摸鱼的勾当，不肯借。外边的敌人快要进村了，我急得额角上渗出了汗珠。邻居说，你要吃鱼，我去替你摸。我说，自己摸的鱼鲜。邻居说，淹死了咋办？我说，我会游泳，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上海中国体操学校的高材生吗？邻居一想这是真的，才磨磨蹭蹭地寻出那套摸鱼衣，帮着我穿上。我说，那鱼叉和鱼篓也一同借了吧，邻居只得答应了。为了装得更像一些，我又往摸鱼衣上泼了点水，把鱼篓浸湿了，才大模大样地走出村去。一个警察问我：“你看见陈叔璇往哪里去了？”如果我说不知道或者不认识，敌人就要怀疑我了，甚至找来麻烦。我说，陈叔璇把我鱼篓里的鱼全买了，往村北走的呢！警察拔腿就向村北追去，我就趁机溜了。”

“为什么不同邻居说明真情呢？”茅学勤有些不好理解。

“我的邻居一向胆小怕事，你一说明情况，他就怕受牵连啦，怕窝匪资匪啦，最少也得怕被县里的黑头警察没收了摸鱼衣。”陈叔璇补充说。

“干我们这一行，随时都会被敌人抓住。可是能走还得想办法走呀。”茅学勤也说起了一个真实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

峭岐暴动后的一天，敌人发现了茅学勤，像一群饿狼发现一只野兔一样拼命地追逐过来。茅学勤撒开两腿，穿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还是甩脱不了敌人的追捕。当他再一次闪进一座村庄后，看见一个小姑娘穿着破旧的衣衫，正在门口玩耍，就凑到她的耳边说：

“坏人正在追捕我，你能救救我吗？”

“你要躲就进屋去躲吧，打死我也不说出来。”小姑娘说。

“躲在家里没用，敌人挨家挨户抄家，会搜出来的。”茅学勤说。

“那怎么办呢？我家爸爸哥哥不在家，我人小，打不过敌人。”小姑

娘显得有些为难。

“那你会哭吗？”茅学勤又问。

“会呀，爸爸说我最会哭呢！”小姑娘又高兴起来。

“会哭就能救我。我躺在门板上，盖上一条被单，把头全部蒙住，下边再烧一堆纸钱，你就伏在我身上爹呀爹呀放声大哭，敌人就不会抓我这个‘死人’了。”茅学勤看见小姑娘点点头，就把她家的房门卸了下来，又从房间拿了一床破旧的被单和一叠乱纸，先把纸点上了火，然后就躺上门板，盖好床单。这时村边已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在床单里催道：“小妹妹，快哭呀，坏人来了！”

“叔叔，我哭不出来呀！”小姑娘急得直跺脚。

“你听到枪声了吗？坏人一到，就要把叔叔抓去，用大刀砍叔叔的头，那多害怕呀！叔叔死了，谁来同坏人斗争呢？你家不是又要过苦日子吗……”从被单里传出的这些话，触动了小姑娘的心，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喊着“叔叔，叔叔”，十分凄凉和悲怆。

“不要叫叔叔，喊爹，现在死去的是你爹。”茅学勤纠正说。

“爹爹，你不能死，不能死，你死了，叫我怎么活下去呀？”小姑娘动了感情，大放悲声。

一群警察挨家挨户地查了过来，看到满地飞舞的纸灰，破烂被单下的僵硬尸体，小姑娘呼天抢地的悲哀情景，没有搜查就过去了。过了很久，敌人才失望地离开了村子。

朱松寿十分钦佩陈叔璇和茅学勤的机智和胆略。三人各自说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知道反动派正在调动力量血腥镇压江阴的农民暴动，每天都有数十个农民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或者被捕入狱，长寿、周庄、后塍一带的农民因忍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折磨，有的主张同敌人拼死干一场，有的携带家小逃往苏州、嘉兴农村，另谋生路去了。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决定把筹备的后塍暴动提前到3月底4月初举行。商量完毕，各人分头做着准备去了。

第二天，吴子卿找到朱松寿，悄声说：“长寿东巷门挂着一个人头，人们都在议论说是你家的一位亲戚。”

朱松寿连忙问清了人头的特点，大惊失色：“这是我大姐的女婿周阿桑，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反动派如何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呢？”

他从周阿桑很快地联想到杨绮云，从杨绮云联想到他的儿子小鸿坤。

“完了，他们母子两人都完了！”这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的家属、亲戚第一次为他，不，应该说是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这一天，他脚步有些沉重，远处的毗山，近处的村庄，连片的麦苗，弯弯的小河，都失去了光彩。太阳躲进了云层，像恸哭的少妇蒙上了一块灰色的手帕。他觉得口中干渴得发烧，向一家农民要了一碗凉水，可水是苦的，他喝不下去。母亲担心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想不到竟这样过早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接下去，反动派就会一步一步地逼害他的母亲、四个姐姐，甚至连早已解除婚姻关系的刘三妹也不能幸免。

他很快地振作起来，要用自己更坚决的行动与反动派斗争，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他与吴子卿一起，在毗山以北秘密地活动了几个村子，继续煽动农民参加暴动。天黑以后，吴子卿回长寿去了，他在一个农军战士的家里休息。

晚上，他无论如何睡不着，周阿桑那颗人头常常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来，杨绮云母子刚到璜塘乡下杨银梅夫家住下，朱松寿就得到一个消息：陈祥安要派自卫团去杨银梅家抓人。他急忙让承小纹赶到季庄三姐家里，要三姐连夜去璜塘通知杨绮云母子转移。他自己来到大姐的女婿周阿桑家里，说服阿桑摇了一条小船，把杨绮云母子送到苏州香山大姐夫的亲戚家里。阿桑面有难色，坦率地说：“舅舅，你们杀了头，只要共产党革命成功，会有人纪念你们，抚养你们的家眷。我们杀了头，只是默默无闻，谁来照顾我的妻子孩子呢？”朱松寿好说歹说，阿桑才答应下来。那么，阿桑摇了船，是在什么地方遇上陈祥安自卫团的呢？杀害了阿桑为什么又要把他的头颅挂出来呢？这是不是陈祥安用此作为诱饵把自己钓出去呢？现在后塍暴动在即，自己应该顾全大局，绝不能为了亲人的事分散了县委和自己的精力。

1928年3月30日，江阴县委以营救被后塍警察在周庄捕去的24个农民为契机，决然发动第三次后塍大暴动。晚上，3000余被白色恐怖激怒的农民将后塍团团围住，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茅学勤率领一支主力武装向后塍公安分局冲去，遇到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法水庵经过两次暴动，敌人吸取了教训，不仅房屋修建得很坚固，而且构筑了作战工事，易守难攻。半个小时后，茅学勤就命人放火助战。敌人仍死守不出。

正在久攻不克之际，朱松寿带着另一支暴动主力，冲到公安分局侧翼，与茅学勤的武装互为呼应，两路夹击。朱松寿冲锋在前，双枪齐发，

一连击倒几个敌人。暴动农民齐声呐喊，一鼓作气向前冲击。敌人凭借弹药充足，一阵狂扫滥射，农民被迫后退。当敌人还没有喘过气来，朱松寿又指挥队伍像海边的大潮充满信心地向堤岸冲去，这样一进一退，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塍公安分局始终没有攻克下来，而朱松寿和茅学勤指挥的暴动主力，子弹却快要没有了。

朱、茅在阵地前碰了头，决定不再硬拼，命令队伍后撤。在这节骨眼上，只听见后塍四面枪声骤起，张品泉亲率60余人的援军赶到，带来的两支手提机枪和20支盒子炮，以强有力的杀伤力在弹药殆尽的农民队伍面前，逞着淫威。朱、茅的队伍腹背受敌，后塍外围的农民拿着大刀长矛，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几乎不能发挥作用。张品泉看到农民队伍枪弹渐渐稀疏，以逸待劳发动冲锋。朱、茅指挥队伍拼命将敌人打退，便命令暴动农民退却。可是大多农民没有受过训练，无法把握局势，以为自己打了胜仗，不愿撤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人的第二次冲锋又上来了，农民中弹纷纷倒毙，血流成河。这时农民才知道已支持不住，有秩序地向后塍以北长江地带转移。

后塍公安分局一位姓徐的代局长看见暴动队伍撤退，以为是立功升官的机会来了，急忙带了警察乘胜追杀。朱松寿、茅学勤对敌人这一手早有防备，率领队伍返身杀回，徐代局长猝不及防，被朱松寿一枪击毙在河边，其余警察不敢向前，远远打着冷枪。朱、茅边打边撤，忽见又有一队人马向这边冲来，两人大惊，正要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可是那支队伍只是向法水庵方向的警察射击，朱松寿仔细一看，原来是陈叔璇领着100余人前来接应。朱、茅、陈三人合为一体，带着队伍追赶先前撤退的大队人马去了。

这是江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大规模暴动的最后一次，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暴动农民阵亡60余人，受伤10余人。敌人方面被打死代局长1人，巡官1人，士兵6人，伤10余人。这次暴动从后塍公安分局的警察在周庄捕人开始，延续了10个多小时，整个后塍成为一片争夺和厮杀的战场。双方激战时，老板、店员、居民被流弹打死30余人。在焚烧土豪劣绅房屋时，由于风大火烈，波及民房和商店，全镇370余间房屋化为灰烬。

第二天，新任江阴县长申炳炎和公安局长张品泉坐镇后塍，出动大批警察和士兵搜捕暴动农民，特别是朱松寿、茅学勤等农暴领导人，形势极其险恶。江阴县委书记蒋云为了保存干部，要求朱、茅暂时到外地

躲一躲，但是谁也不愿离开农暴地区。

一个月后。从无锡到后塍的一条大河里，17条机动船组成一支庞大的船队，威风凛凛地在水面上游弋。每条船上，坐着20多个全副武装的军士或警察，腰间环绕着子弹带，像盘着的灰色毒蛇，肩上背着长枪，枪头上的刺刀在太阳下闪耀着一道道白光。他们那狰狞的充满着杀气的神色，像是从魔瓶里逃出来的一群魔鬼。这是国民党三十二军二师二团一营和省驻（无）锡水上公安队、驻苏（州）游巡队组成的四五百人的联合武装，正在开往后塍等地的农暴区域，镇压革命力量。沙洲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组成还乡团，向农民反攻倒算，每天都有农民弃家逃亡，或被捕被杀，或被没收土地，或被拆去、烧毁房屋……

朱松寿继续隐蔽在暴动农民中间，看到这些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在流血牺牲，心里无比地难过。但是，第三次后塍暴动后，反革命的力量数十倍地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县委要再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暴动，已经不可能了。然而，这些淳朴的农民兄弟，在自己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的情况下，想到的首先是县委领导人的安全。一个老太太知道自己家里躲藏着的是大名鼎鼎的朱松寿时，涕泪俱下地跪倒在他的面前，恳求说：

“反动派天天在抓你，我们这里也不安全呀！一旦落入敌人手中，我们如何对得起你和你的妈妈、妻子呢？你可以不怕牺牲，可是，你们这些领导人全部牺牲了，反动派会更加重地压迫我们，我们也就没有指望了！孩子，你看在我老太太面上，就到外面去躲一躲吧！”

“老太太，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朱松寿弯下腰，把老人扶了起来，让她坐在椅子上，自己陪坐在她的对面，“可是，我们不能把生命留给自己，把牺牲推给群众啊。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留在农暴区，瞅准机会，对那些反攻倒算最凶的土豪、劣绅、地主和自卫团，狠狠地杀他几个，也许，敌人的反动气焰会收敛一些。”

朱松寿和茅学勤、陈叔璇组织了一支极其精悍的队伍，深夜摸到反动派的家里，从床上热被窝里拉出来，杀在他的家门前。这样干掉了一批，地头蛇们害怕了，却刺激了那些用17条机动船装来的警察和士兵，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暴动区的农民。农民逃进长高的麦地里，敌人用长绳系了砖头，在麦子地里一遍又一遍地拉过来又拉过去，发现农民，不论有否参加农暴或者是在田间劳动，立即开枪打死。夜间在路上遇到行人，都用刀砍死。警察和士兵趁机抢劫掳掠，奸淫妇女，拆屋焚村，敲

诈勒索，江阴农民暴动的风暴刮过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劫难。

1928年4月里的一天，朱松寿、茅学勤、陈叔璇等人正在总结江阴农民暴动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如何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几天前到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工作的蒋云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大家又惊又喜，立即中止了发言，纷纷询问省委对江阴农暴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蒋云传达了省委关于支持邻县武装斗争的指示，分派茅学勤去靖江、陈叔璇去常熟、朱杏南去苏州活动。

“那我呢？”朱松寿听见蒋云传达省委指示，总以为有自己一份，可是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县委书记始终没有分配自己任务，于是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朱松寿和我立即去上海到省委报到，另行分配任务。”蒋云说话平静而又果断。

“省委要我和老蒋去上海做什么呢？”朱松寿心里一团疑问，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他没有问，茅学勤和陈叔璇也没有问，但是，他们隐隐感觉到，一定有特别重要的使命，落到蒋云和朱松寿的身上。

第八节 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

当朱松寿和蒋云到达上海找到江苏省委秘密联络点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项英同他谈了话。项英是湖北省武昌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职员家庭里，幼时丧父，靠母亲帮助别人纺织、刺绣所得的微薄收入抚养他和他的妹妹。12岁小学毕业后，为帮助家庭维持生活，不得不寻找职业，但三年都没找到工作，致使他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家庭的遭遇，使他对旧社会逐渐产生了不满。1913年，考入武昌一家大工厂当学徒。1920年，在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利用本厂工人对工头虐待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小罢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在中共“三大”至“五大”的会议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现为江苏省委书记。朱松寿是第一次与项英见面，他那结实的蕴藏着使不完精力的躯体，不苟言笑永远严肃的表情，对朱松寿有着很大的诱惑力。项英详细听了蒋云和朱松寿关于江阴农民暴动的汇报，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不易被人觉察的神色，对他俩说道：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农民暴动，可是像江阴这样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地搞了五次很说得规模的暴动，还是罕见的。”

朱松寿和蒋云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又听项英说了下去：

“江阴的工作，省委是肯定的，就是中央也是满意的。现在，党中央要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而且要到遥远的莫斯科去召开，这就是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中央提名，你们两人就是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蒋云作为知识分子代表，而你朱松寿作为农民代表出席大会。现在，行程迫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

这个巨大的喜讯，包含了党对江阴农民暴动的肯定，对朱松寿、蒋云两人的高度信任，以及肩上将要承受的更重的责任。朱松寿翕动着厚实的嘴唇，正要说什么，蒋云用眼色制止了他，原来面前的这位省委书记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们江苏共有12名代表，我也是其中的一名，还有王若飞、蔡畅、严朴他们。不过我们不能一起走。你们两位作为一个小组。”他从一个黑色的皮包里取出两叠纸币，分别塞到两人的手里，“请注意，这两叠钱中，各有一张美金，无论如何不能花掉，你们到了哈尔滨，找到党的秘密交通站，这是唯一的一张证据，上面的数码，联络站的同志已经知道。”项英伸出手来，握住了他俩的手，说了句“目的地见”，接见就结束了。

江苏省委为了安全，为他们安排了两个不同的住处。离开省委联络点后，朱松寿就和蒋云分了手，跨上了一辆无轨电车，下车后又穿过几条马路，才找到了指定的地点。

这是三楼的一个亭子间，门紧紧地关着。朱松寿轻轻敲了三下，没有反应。又敲了三下，仍是没有反应。他怀疑看错了地址，仔细一核对，并没有错，于是又耐心地敲着，并叫了声：“里边有人吗？”这一声倒起了作用，里面“啪”的一声拉亮了电灯，传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穿衣服、梳头、洗脸。过了一会儿，房门拉开了一条缝隙，朱松寿以为主人开门了，急着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年轻的女子，飘过来一阵香气。他不敢向她的脸部细看，就“哎呀”一声退了出来，向楼下走去。

“这一定是搞错了地方，怎么可以和一个陌生女子住在一起呢？”他的心“咚咚”跳着，正在寻思怎样找到住宿地，亭子间里的那个年轻女子却追了出来，一手拉住了他的臂膀，用劲把他往房间里拖去。楼梯上

没有电灯，彼此看不见面容。朱松寿不便叫喊，只得跟着她向三楼的亭子间走去。进了门，在雪白的电灯光下，朱松寿惊得几乎喊叫起来，这哪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这是已经同周阿桑一起“牺牲”的妻子杨绮云！只见她先前那条乌亮的大独辫不见了，剪成的短发微微卷曲着，像深秋花圃里的一朵大墨菊。苹果绿的旗袍紧紧地裹着她丰满的身子，勾勒出一个年轻女性逗人喜爱的妩媚曲线。脚上穿一双黑色皮鞋，在电灯下闪烁着幽幽的光。这一身打扮，哪里还能找出一个农村少妇的一点痕迹？

朱松寿怔怔地看着，以为是在梦中，杨绮云却再也忍不住炽热的感情，猛地扑到丈夫的怀中，悲喜交集，她那富有弹性的肌肉在剧烈地颤抖。当朱松寿确实实地感知到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奇遇，他的感情，他的渴望，他的作为男子汉的强烈的冲动，像地底下的板块运动积聚起来的巨大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了，他的两页温热的嘴唇，猛地移到杨绮云的嘴边，像荷花池里的两张叶片，在水中紧紧地重合在一起了。

“绮云，你还活着？”过了很久，朱松寿松开手，柔声地说，“在此之前，我总以为你和孩子跟周阿桑一起牺牲了……”

“什么，你说什么，阿桑牺牲了？”杨绮云像六月里的天，刚才还是明朗一片，现在已经是乌云满天了，急忙打断了朱松寿的话发问。

这时的朱松寿已经完全冷静下来，把长寿东巷门挂着周阿桑头颅的事说了一遍。杨绮云痛苦万分，热泪奔涌，因为是夜深人静，又不能大放悲声，更增加了几分压抑和郁闷。她边哭边诉——

那天周阿桑在朱松寿的劝说下，摇了一条木船，把杨绮云母子接了，连夜送到苏州香山，安置妥贴，就要告辞回家。杨绮云要他在香山住一段日子避避风头，阿桑说在外时间久了，要遭到陈祥安他们的怀疑。绮云听他说得有理，就让他走了，想不到竟遭了陈祥安的毒手。过了好多天，朱松寿他们才知道周阿桑从香山回到长寿，已是半夜，被陈祥安自卫团抓获，诬陷他用木船接送朱松寿，阿桑不肯承认，就被自卫团的人杀了。他的妻子见到丈夫的头颅悬挂在外，吓得精神失常，不久就病死了。这是江阴农民暴动期间朱松寿的亲戚受株连的一个典型。就是杨绮云的母亲和妹妹杨银梅，也险遭毒手。那天杨绮云母子刚坐了周阿桑的木船离开村子，陈祥安的自卫团就赶到璜塘乡下，把杨老太太和她的第二个女儿银梅捆绑起来，押往长寿，以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各人抽

打了一顿耳光释放回家。不久，杨家母女就逃往上海去了。

杨绮云母子在苏州香山住了一段日子，就坐火车到了上海。以后通过关系，同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省委书记项英就安排朱松寿夫妇团聚，只是为了增加他见面时的喜悦，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他。

“绮云，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朱松寿为了减轻妻子因周阿桑牺牲带来的悲伤，显得特别轻松地说，“明天，我就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能猜出是哪里吗？”

杨绮云就南京、北京、广州说了几个地名，朱松寿都摇摇头。“你总不会到外国去吧？”她开始有了一点笑容。

“为什么就不能出国呢？我和蒋云要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去。”朱松寿笑笑说，“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无法猜测到的。比如说，苏联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了权，专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这在沙皇统治的年代，谁能想得到呢？”

看到丈夫兴致勃勃，杨绮云只得把深深的离愁别绪埋到心中。一个20多岁的少妇，爱情的激流像春天江河里的水，正一天比一天高地往上涨着呢。江阴闹农暴的时候，丈夫睡坟地宿野岗，很难与自己见面。今天，刚刚聚面，明天又要远去天涯海角，难道他不了解妻子的心吗？不会，丈夫是被另一种更伟大、更高尚、更神圣的爱占据了他的身心。作为妻子，应该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做丈夫献身事业的推动器。她打开一只箱子，取出一件自己新缝制的青布工人服装，上面有两条带子，分别套在左右两只肩膀上，上衣与裤子连在一起，左右各有一只裤袋。朱松寿穿上新衣，增添了几分丰采，更加英气勃勃。杨绮云像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新作一样看了个够。因为明天丈夫就要离开上海进行长途跋涉，就催他早早地熄灯睡了。

1928年5月里的一天，地处祖国北方的哈尔滨，送走了短暂的春天，夏天已带着树木的绿荫和发烫的阳光悄悄地来临了。朱松寿和蒋云下了火车，走出火车站，被灼热的太阳一照，就汗水涔涔了。他们欣赏着北国的风光，发现这里房屋的建筑风格、街道与南方不一样，连火车的式样也从未见过。朱松寿感到新奇。蒋云轻声解释说，这是帝俄时代俄国人建的，是帝俄侵略中国留下的遗迹。朱松寿若有所思地连连点头。

他们要了两辆人力车，车子在曲曲弯弯的小巷子里穿行，把他们带向道里外国四道街。他们记着项英的嘱咐，找到了一家小小的饭店，点

了几个菜，递过去几张纸币。收款人猛然发现了夹在里边的两张美元，抬起头来友善地看了他俩一眼，又低下头去忙他的事了。朱松寿和蒋云吃过饭，就有一位伙计领着，向附近的一家居民走去。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美丽、清秀的少妇，伙计向她低低地说了些什么，少妇频频点头。伙计说完就出去了。

“你们是乘火车来的吗？”少妇温和地问。

“不，我们是先乘海轮到大连，再转乘火车来哈尔滨的。”蒋云用普通话回答，密切地注视着少妇那张月亮般明净的脸。

“老项同你们一起来的吧？”少妇转向朱松寿，“你俩是哪一个县的代表？”

“我们是江阴县的代表，”朱松寿知道这位细心的少妇可能就是哈尔滨联络站的负责同志，“项英同志让我们先走，他和其他代表几天后就能赶到。”

接着，他们又各自报了姓名、职务、文化、年龄、单位，少妇都一一核对清楚，才把那双纤细柔软的手，伸向蒋云和朱松寿。蒋云大大方方地握着，朱松寿稍稍迟疑了一下，少妇笑了，不无幽默地说：

“怎么，还那么封建思想？我们既然是同志，握握手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位少妇的名字叫杨之华，1900年生。她是浙江省萧山人，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也是党的“六大”代表。这次，她是由中央派来哈尔滨协助地下交通站工作的。这时，杨之华带着女儿，住在道里外国四道街阮节庵家里，各地来的代表，与交通站接上关系后，杨之华都要同他们见见面，安排他们在哈城的住宿与生活。而特别重要的是发给代表们前往满洲里的联络暗号。这个工作关系到中共“六大”能否在莫斯科顺利召开和代表们的安全。

为了安全，杨之华让朱松寿和蒋云分两处住下。蒋云住在交通站租用的一幢俄国人房子里，朱松寿则住到南岗的一家旅馆里。进旅馆之前，杨之华贴着朱松寿的耳朵轻声说了几句，朱松寿原本偏黑的脸上泛出一片红光，随即点头同意。

“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呢？”旅馆的伙计问。

“我们是夫妻关系。”杨之华抢先回答。

“你们从哪里来？”

“上海。”

伙计看过朱松寿和杨之华的证件,并不怀疑,就办妥了住宿的手续。当朱松寿住下后,杨之华又回到道里外国四道街阮节庵家里去了。她身上肩负着接待中共“六大”代表的重任,变着法儿不让代表们出一点儿意外。

朱松寿在旅馆住了两天,杨之华就来看他了,带来了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的火车票,又给了他一块制作很精致的短短的竹片儿。朱松寿接过来一看,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正待询问,杨之华嘱咐说:

“朱松寿同志,这是一块号码牌,上面刻着一行很不显眼的数字,任何一个人拿去了,都不会起到作用。但是,它对你却至关重要——你到了满洲里,在北郊有一座小木桥,那里停着一辆俄罗斯马车,车上的编号如果同号码牌上的数字完全一样,你就可以上车,同时把号码牌送给马车夫,他会协助你偷越国境。”

“我明白了。”朱松寿收起火车票和号码牌,主动地与杨之华握手告别,热情洋溢地说,“你放心吧,杨之华同志,我会准时到达莫斯科的,让我们在那儿再见。”



中共江阴县委书记蒋云烈士 (陈元 提供)

当天,朱松寿乘上指定的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只见旁边坐着一个人,正是蒋云。两人分别了两天,好像相隔几个月似的,见到后十分亲热。火车在祖国的北疆奔驰,时而穿过莽莽林海,时而攀越崇山峻岭,时而徜徉在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上。时属初夏,车窗可以打开,沿途的风光可饱览个够。两人的心情就像北方初夏的天空,热烈而又明朗。

终于,火车发出沉闷的长长的喘息声,停在满洲里的火车站上。朱松寿和蒋云提着行李,走出火车站。满洲里由于地处中苏边境的中国境内,知名度挺高,可是地方却并不大,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镇,而且街道、房屋都按苏联的式样建

造，镇上的不少旅馆、商店都由苏联人经营。镇上居民很少，住着许多国民党的士兵，对过往行人盘查很紧。稍有嫌疑，就被士兵抓进军营拷打审问。他们随便寻了一家旅馆住下，就去寻找过境的马车了。

满洲里的四郊，长着一片片森林。森林里边，每隔一段距离，修筑着一个一人多高的碉堡，驻着国民党的军队。来来往往的马车很多，有两匹马的，也有四匹马的，大多是苏联人在国境线上拖运东西，也偶或带人。朱松寿和蒋云慢慢地走到满洲里北郊那座小木桥附近，果然有几辆俄罗斯马车停靠在那里。他们留心着马车上的编号，与号码牌上的数字并不一样，正在暗暗着急，只见远处森林里两匹马拉着一架马车，向这里慢慢地走来。当它靠近的时候，朱松寿看见车上坐着一个白俄牧师，满脸的大胡子，毛茬茬的，像深秋田野里干枯的茅草。当向他车上的编号瞥去时，不由得眼前一亮，果然与杨之华给朱松寿、蒋云的两块号码牌上的数据一模一样。

“先生，你能让我们搭个车吗？”朱松寿上前客气地搭着话，“这是我们的马车钱。”

白俄牧师接过一叠钱，看见里边夹着两块做工精致的竹片儿，就警惕地翻看着上面隐隐约约的一行数字。突然，牧师跳下马车，把钱和竹片儿还给了他们，告诉他们子夜12点钟到小木桥边等候。

朱松寿和蒋云返身就走，一个国民党士兵远远地跟在后边。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向那个士兵迎头走去。

士兵对这两个工人打扮的外地人有所怀疑，只是并没有掌握实质性的把柄，既不能拦阻，又不能盘问，只能暗中监视和盯梢。现在看见他俩向自己走来，只得向别的地方走开了。朱松寿知道那个士兵并没有解除疑虑，现在还不能回到投宿的那个旅馆去，就和蒋云在满洲里狭窄的俄式街道上溜达。当夜幕覆盖着这个边陲小镇的时候，两人就接连穿过几条巷子，看看后面已摆脱了“尾巴”，才迅速地回到旅馆。

他们美美地睡了几个小时，看看白俄牧师约定的时间快到，就收拾行李，走出旅馆。这时满洲里街上黑沉沉的，像失去了光源的地下井道。他俩蹑手蹑脚地走着，不发出一点儿声音。快到小木桥的时候，一辆马车已经停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朱松寿和蒋云轻声报出了号码牌上的数字，白俄牧师一招手，他俩就敏捷地跳上马车。一声鞭响，两匹马拉着车子，向远处黑黝黝的森林驶去。

中苏边境宽阔深邃的森林里，也许为了交通的便利，不知是哪一年代开拓了几条纵横交错的大道，马车可以畅通无阻。朱松寿和蒋云第一次进入这样的境界，心中不免怦怦直跳。这时，天上稀稀疏疏的星星，透过森林的枝叶，落下了斑斑驳驳的光点。隐藏在树木丛中的碉堡，像一个个高高的坟头，悄无声息地伴随着里面的主人。大家都不说一句话，默默地注视着前面的情况。不远处的一个碉堡里还亮着灯光，传出一阵阵士兵争吵的声音。朱松寿的心揪得紧紧的，如果士兵听到马车的声音出来拦截，他们手无寸铁如何抵挡呢？白俄牧师放慢了马的速度，轻轻地向那座碉堡靠拢。当靠得很近的时候，朱松寿听见碉堡里的士兵好像在为一场赌博而争吵。牧师猛抽一鞭，马车飞一般地向前蹿去。后面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枪声，在边境森林里回荡。

朱松寿在黑暗的车厢里，触触蒋云的手，蒋云会意，两人都松了一口气。马车在森林里走了很久，白俄牧师回头告诉他们，前面是中国边境的最后一座碉堡，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沉住气。快到碉堡的时候，一个士兵端着长枪守候在路口。白俄牧师也不答话，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中国纸币，塞到那个士兵的手中。原来，这位担任国际交通工作的牧师，准备了多种应付沿途检查的办法，贿赂是行之有效的一种。作为一个在边陲小镇从戎的国民党士兵，抓住一个偷越国境的人不如得到几张纸币更有实际意义。

天快黎明的时候，马车拉着朱松寿和蒋云，来到苏联境内的一个小镇上，国际交通站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第二天，他们就乘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快车，向着当时誉为世界革命的心脏奔去。

10天后，火车到达莫斯科附近的一个车站，朱松寿和蒋云按照国际交通站的规定下了火车，换乘一辆马车，向莫斯科郊区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奔去。这是一座小镇，朱松寿以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想不到马车并没有在小镇停下，又继续向前驰去。

马车最后在距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停下。朱松寿和蒋云跳下马车，像游子走了千山万水终于回到家一样，一股亲切、温暖、亢奋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们谢了车夫，一步一步地向别墅走去。当他俩居住下来几天以后，才清楚这是沙俄时代一个地主的私有财产，初建的时候十分富丽堂皇。大楼面近公路，楼后是花园，花园过去是小山，山上树木葱茏。山后有条溪流，溪水晶莹。两岸长着高大的树木，时值初夏，遮住了灼热的



图为坐落于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朱松寿与蒋云以正式代表资格参加这次大会。

（原载《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本书由徐振东提供）

阳光，在岸边散步十分凉快。

这座别墅的白色墙壁，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亮，昔日的主人取其意命名为“银色别墅”。银色别墅是一座相当宏大的建筑，底层

由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组成。二楼是装饰华丽、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客厅的周围还有不少房间。三楼是顶楼，由大小不一的房间组成。

这时已是1928年6月上旬，还有些代表没有到齐。朱松寿和蒋云办妥报到手续，就在银色别墅附近散散步。傍晚，跳下山后的溪流，在碧波荡漾的溪水里游泳。从上海到莫斯科一路的紧张、疲劳，很快地消失了。

一天傍晚，朱松寿独个儿爬上银色别墅后面的那座小山，看见浓密的树丛里坐着一个面孔很熟的女同志。他正要走过去，又发现女同志的旁边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面容清矍，却挺有风度。两人靠得很近，指点着莫斯科近郊的景色。朱松寿想起来了，这个女同志就是在哈尔滨交通站见到的杨之华。那旁边依偎着她的那个男人又是谁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见面，自然是不妥当的。他正待转身离开，已经晚了，杨之华发现了他，响起清脆甜润的嗓音喊道：“那是江苏代表朱松寿同志吗？”

“我正是朱松寿，杨之华同志，你好！”朱松寿边说边向他俩坐着的地方走去。

“我介绍一下，”杨之华指了指与她一同站起来的戴眼镜的青年男子，“这是我的爱人瞿秋白同志。”瞿秋白热情地伸出手来，与朱松寿握手。

朱松寿一听是瞿秋白，内心顿时涌起一股崇敬之情。瞿秋白生于

1899年，江苏省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0年，曾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访问过苏联，著有《俄乡纪程》一书。在党的第三次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朱松寿今天能见到自己一直敬仰的党的领导人，感到非常高兴。

“秋白同志，我们江阴全体共产党员，向你问好，”朱松寿第一次见到党的最高领导人，不免有些拘谨，但很快镇静下来了。他细细端详着这位柔和中隐藏着刚强、文弱中渗透着坚定的他心目中敬仰的人。“党的‘八七’会议后，江阴县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指示，”朱松寿又说，“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发动了五次规模很大的农民暴动。”

“江阴的农民暴动，搞得很有起色，这我知道，”瞿秋白的目光又转向莫斯科近郊的田野、村庄、河流，似乎不是与朱松寿说话，而是在同广袤的大地交流着情感，“‘4·12’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发动农民掀起武装暴动，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你们这些来自基层的代表，最有发言权，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总结提高的问题。”

天色暗下来了，朱松寿跟着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慢慢走下山丘。瞿秋白突然回身告诉朱松寿，明天，也就是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就要开幕了，“希望你集中精力开好会。”

朱松寿点点头，望着前面的这对亲昵的革命夫妻，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思考着瞿秋白的嘱咐。

这时，从侧面走过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苏联人，他个子高大，却很消瘦。朱松寿好奇地望着老人手里的一块大黑面包。

“没见过吧？”朱松寿没有想到，苏联老人会用流利的中国话说，“这就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我们苏联人吃的黑面包。”

朱松寿伸手摸摸黑面包，硬邦邦的简直像块大石头。

“这好吃吗？”

“当然没有白面包好吃。”

白面包？朱松寿突然想起，来这里后每天吃的食品。原来，苏联共产党为了招待好这些中国代表，特地拿出了最好的食品，诸如牛排、白面包给他们吃。

“你们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吧？”朱松寿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

“比过去好多了！”

苏联老人滔滔地对朱松寿说开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国内

曾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大饥荒。那时，共产党员从列宁、斯大林开始，每天只领四分之三磅的黑面包。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工人一磅半，士兵两磅。所谓黑面包，所含面粉率只有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而且，这种面粉的质量很差。靠这么点面包生活，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干部一早爬起来，只能喝杯开水去上班，饿得实在无法忍受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切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做午餐，一部分做晚餐。在饥饿的威胁下，每个苏联人似乎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整个苏联挨饿的足有200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就非常困难。购买到了，一定要用军队押送。经过灾区特别严重的地方，粮食常被灾民劫去，运粮的马也被捉去宰杀充饥……

听着苏联革命成功初期的饥荒故事，朱松寿更加深了对革命艰难的认识，也更佩服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并不很长的时期中，领导全苏联人民克服了如此难以想象的困难……

第二天，代表们按照自己的代号，坐到了银色别墅二楼指定的位置上。朱松寿是46号，蒋云是94号，两人并不坐在一块儿。大会主席瞿秋



白宣布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代表们起立，宽敞的二楼大厅响起了国际歌，凝重、悲怆、高亢的旋律，使大会主席团成员到每一个代表，都沉浸在一种肃穆庄严的气氛中。

(原载《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本书由徐振东 提供)

接着，向中共“五大”以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默哀。

“在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大厅上，传出了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开幕词的激越、悲愤、苍凉的声音，“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都一致行动，来压迫我们，屠杀我们，甚至企图集合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

朱松寿第一次听到党的领导人这样高瞻远瞩地分析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听到这样深刻的、生动的、充满哲理的革命理论，第一次知道党内对“八七”会议后由我党煽动起来的农民暴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把这些以前全然不知道的东西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江阴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分析和思考。有些理论，他一时还不能理解。他偶或侧过头去，看见坐在94号位置上的蒋云全神贯注地听着，知道蒋云是知识分子出身，接受理论的能力比他强，真恨自己少年时代蹉跎了许多时光。

瞿秋白作完开幕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长达9个小时的报告，把代表们推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来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虽然，担任翻译的同志尽可能地把布哈林滔滔不绝的谈话译得适合中国代表的胃口，但是，朱松寿仍觉得不容易把握其中深邃的甚至可以说是艰涩的理论。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疑的，布哈林不仅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且指责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及其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

大会进入讨论期间，代表们对“八七”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进行了激烈的甚至是尖锐的争论；一部分代表猛烈地抨击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有代表竭力维护瞿秋白路线的正确性。朱松寿赖以判断瞿秋白路线正确与错误的唯一依据，就是江阴的农民暴动。不过，当朱松寿在1928年4月离开江阴的时候，江阴农暴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特别是县委主要负责人的被捕牺牲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朱松寿所能记忆的恰恰是暴动对农民的广泛发动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沉重打击。因此，他还不能完全接受布哈林在报告中和部分代表在发言中对“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批判。

“老朱，左倾盲动主义是全局性的路线错误，”会后休息的时候，蒋云知道朱松寿思想上有疑虑，解释说，“但并不是说各地的农民暴动都

搞错了，更不是说指挥和组织这些暴动的党和基层领导人都犯了错误。这些道理，随着会议的深入，一定会搞清楚的。今天，我倒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蒋云说到这里，看着朱松寿，等待着他的反应。

“你发现了什么？”朱松寿果然发生了兴趣。

“井冈山出了个朱毛，我们江阴也有个朱茅。”蒋云笑着说。

“你说的是谁呀？”显然，朱松寿的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

“朱松寿和茅学勤，这不是江阴朱茅吗？”蒋云仍是微笑着。

“我们怎么能同毛泽东和朱德相比呢？”朱松寿很是不安地摇着头。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叫江阴朱茅。”蒋云不无自豪地说。

想不到他们的这一番对话，被旁边的几个代表听见了，第二天，在银色别墅的二楼会议室内，不时地听到江阴朱茅领导农民暴动的议论，一时传为美谈。

会议进入讨论目前中国革命是高潮还是低潮的问题。朱松寿离开江阴的时候，正是第三次后膛暴动不久，很难说革命进入了低潮。

“项英同志，为什么大会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形势高潮已经过去，低潮已经来临？”朱松寿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在银色别墅附近的那条溪流边碰到了项英，由于同在一个江苏组学习和讨论，彼此都很熟悉了，就向这位大会主席团成员提出这个问题。

项英对朱松寿在江阴历次农民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忠勇、胆略和智慧十分赏识，而对他由于文化理论偏低和革命实践范围的窄小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局限常常给予耐心的疏导。这位江苏省委书记随手折下一根树枝，在小溪边的沙滩上画了几条波浪形曲线，又在两个浪尖的低谷处任意戳上了几个点点，认真地解释说：“革命的高潮与低潮，是从全国的形势来衡量的。不能因为你们江阴的党员和农民的情绪还挺高涨，就说现在仍处在高潮阶段。从全国来说，这只能算是几朵小小的浪花。而高潮和低潮之间，出现几朵浪花是常有的事。”

这一席话，这一张图，说得朱松寿心悦诚服。在莫斯科银色别墅这一段闪光的生活里，朱松寿和项英产生了深厚的友情，以致11年后，朱松寿在遭受了一系列挫折以后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向当时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请教敌后抗日的若干问题，项英又是拍照留念又是赠送银元，这是后话。

“六大”在继续，朱松寿的革命理论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认

识，也在不断深化。他觉得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同瞿秋白、周恩来、项英等革命前辈相比，充其量还只能算是一个新兵。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发生多大的变化和曲折，自己始终都是党的一名忠实的战士。然而，他在银色别墅富丽堂皇的大厅中，还是在郁郁葱葱的小山上，都没有想到，他回国以后的路正像项英在沙滩上画的那幅浪花图——有高潮，也有低谷，在高潮和低谷之间，出现过几朵浪花……

大会开了20多天，到7月11日结束。这天晚上，朱松寿早早就把行装整理好，等待着回国的通知。回国后怎样投入新的战斗呢？他真正感到了共产党员的重任。

通知下来了，但不是回国，而是参加军事训练。朱松寿欣喜若狂，少年时代蹉跎了光阴，这次可不能错过学习机会了。

朱松寿拿着行旅，与蒋云等“六大”代表一起，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军事教官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都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专家。训练科目有学习使用各国基本武器、巷战、骑马和游击战术等。朱松寿如饥似渴地苦练着各种本领。他白天练动作，夜里啃书本，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以外，其他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训练才一个月，他竟然掉了2公斤肉。可是，一个月的训练，却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充实。教官组织受训人员在银色别墅后面的小山上举行了一次射击比赛，朱松寿居然得了第一名，“江阴朱茅”出手不凡，得到了军事教官和代表们的热情赞扬。

军训结束，代表们急于回到国内真正的战场上去。朱松寿和蒋云以及其他一些代表编为一个小组，乘上西伯利亚快车，行程12天，到达海参崴附近的塞但卡车站，再从塞但卡转车去中苏边境上的五站。在塞但卡和五站的招待所里，国际交通站的同志对代表们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凡是代表们的穿戴同他们准备采取的旅行身份不相称，就要改穿合适的衣服。为了偷越国境时的安全，不许代表们带走苏联制造的一张纸或任何东西。深夜，一辆马车停靠在代表们住宿的五站招待所门口，朱松寿等代表被人叫醒，跳上了马车。当行至中苏边境中国一侧时，车夫让代表们跳下马车，由一名苏联向导领着他们快速而行。不久，他们穿越边界，被带到一家小咖啡馆里——这是苏联人经营的地下交通站。朱松寿喝下一杯热咖啡，吃了一盘快餐，很快地驱除了沿途的紧张与疲劳。天明后，朱松寿、蒋云和同行的江苏代表采用不同的路线乘车向上海进发。

第九节 上海街头的拖板车车夫

1928年冬。上海。

一天，杨绮云正在亭子间搓洗着一盆脏衣服，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她吃了一惊：又是来抓人的？丈夫离家以后，已经多次发生来抓人的事。他们有的是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派来的，也有的是上海特务机关的。幸而丈夫不在家，他们屡次扑空而去。

“我是朱松寿的同志。”来人见杨绮云用怀疑的眼光盯着自己，肯定地说。

杨绮云仍小心翼翼地向来人盘问着丈夫的情况，直到自己认为不会有诈，才抱着儿子鸿坤，跟着来人走出亭子间。

杨绮云跟着来人走进一家旅馆，推开一个房间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七八个人，没有一个是认识的，那里有丈夫的影子？她正想立即离开这里，但从一张张友善、温和、热情的陌生脸上，知道他们不会骗她，更不会有非礼的行动。她继续寻找着。自从丈夫今年5月离她而去，已经七八个月了。在这期间，他既没有一封信，也没有一元钱寄给她。丈夫到苏联去干什么？她并不知道。如果路途上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了真实的身份，那又有谁去营救呢？这是她同朱松寿结婚以后最长时间的分离。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思夫心切，禁不住偷偷地哭泣起来，泪水浸湿了一大片枕巾。

“朱家大嫂天天盼朱大哥回家，现在，朱大哥就在面前，怎么不认识了？”一个大汉挤眉弄眼地冲着杨绮云直笑。

杨绮云满脸通红，再一次用眼睛向房间里扫去，看见角落里坐着一个人，帽子压到眉梢上，身穿一件黑长衫，正偷偷地瞅着她呢。当他们的两道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春蚕吐出的两缕新丝牢牢地粘结住了。这不是朝思暮想的丈夫吗？她恨不得立即冲过去投在他的怀抱里，可是在这么多双眼睛面前，不得不压抑住久别重逢的冲动，一步一步地向丈夫走去……

朱松寿从妻子手里接过儿子鸿坤，携着杨绮云出了旅馆，回到了自己的亭子间。

这一夜，胜似新婚之夜。他们躺在床上，相互倾诉着离别之情。更多的是，朱松寿极其兴奋地向妻子介绍了“六大”确定的中国革命的性质。

质、动力和任务的具体内容，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情景，还谈了自己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感受，以及见到苏共中央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周恩来、项英等著名领导人的心情。

已经是凌晨了。

“绮云，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妻子沉默好久才说，“又是想带兵打仗的事吧？”

“不，通过这次大会，我在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已经踏上了共产主义大船；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大船，就永远不想再退回来了！”

“我也要跟着你，搭着这条大船走到对岸去！”

“那好哇！”

从此，朱松寿投进了更加激烈的革命漩涡之中。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了贯彻党的“六大”精神的会议。

省委决定朱松寿回江阴。就在这时，江阴农民暴动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县委的几个领导人被迫转移到邻县坚持隐蔽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省委改派朱松寿参加中共南通特委。朱松寿在海门参加了南通特委召开的、由六县代表参加的贯彻“六大”精神的联席会议。会上，朱松寿畅谈了自己参加“六大”会议的体会。这次会议，按照“六大”提出的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分配的任务，布置了工作。会后，朱松寿参加了红十四军的组建。1930年3月，朱松寿担任红十四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本书作者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江阴地方史志著作，包括1989年3月31日在毗山树立的“朱松寿烈士纪念碑”，都记载朱松寿在红十四军的职务是支队司令。今查《南通市志》第2025页，所记朱松寿在红十四军的职务是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本书采纳《南通市志》的记载）。1929年7月，中共如皋县委成立，朱松寿又担任如皋县委委员。期间，南通特委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红十四军也遭到强大敌人的围剿而失败，朱松寿奉命撤到上海。面对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朱松寿毫不气馁，化名“老戈”，以表达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心迹。

这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隐蔽，也为了生活，更为了继续革命，朱松寿当了一名纸厂的板车工人。

朱松寿顶着热日，拉着板车，吃力地穿过大世界，沿着马路向外滩走去。板车上叠着高高的纸板，已经很重了，再加顶头风一吹，更是寸步难行。朱松寿已经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朱松寿拉了一趟又一趟，从东方发白拉到西方抹黑。

街上灯光通明。朱松寿拿着老板的工资，进入一个弄堂，摸着黑，走进了一个昏暗的亭子间。

这是一个又窄又矮而又简陋的亭子间，还不及长寿老家一间厢房大。

朱松寿饿极了，一进门就去掀锅盖。

“怎么还没有做饭？”

“等你买米下锅呀！”是呀，这种“等米下锅”的日子已不是头一天。刚到上海那一阵，朱松寿还可以亲自悄悄地回到老家，或托亲友，变卖一些田产，拿些钱来。后来陈祥安把家里的三间两院堂大部拆走了，变卖土地也受到了限制。手头紧，就省吃俭用。上海房租贵，就住在最简陋的亭子间。日子越过越艰难，几个月前就“等米下锅了！”

朱松寿听了妻子的回答，暗暗自责不该这样说话，默默地走了出去，向邻居买了些米。妻子很快煮了一锅稀粥。

朱松寿把一只洗澡盆翻过来，妻子给每人盛好一碗粥，又端来一碗萝卜干。一家数口席地而坐，围着洗澡盆的底盖吃了起来。

吃过晚饭，孩子去睡了。

“松寿，我想帮帮你好吗？”

“帮我什么？”

“我也出去挣点钱。”

“挣钱，孩子怎么办？”

“我带着孩子，不走远。”

杨绮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

朱松寿实在不忍心妻子出去挣钱，但是，总得活下去呀，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朱松寿去拉板车，杨绮云也趁着两个孩子还睡着就来到里弄口。里弄口放着一排还没有倒过的马桶，她迅速地拎着一只马桶，把粪便倒进公共厕所，再洗刷干净，然后放回原处。1只，2只，3只，一直倒了10只马桶。马桶的主人发现了，感激她，主动送给她几分钱。有的主人自己忙，见杨绮云生活艰难，倒的马桶又很干净，就索性把每天倒马桶的事包给她，一月付给她一元钱。

但是，一家生活仍然上顿接不了下顿。一天晚上，杨绮云又说：

“松寿，我想给人家去洗衣服，你看好吗？”

“你太累了。”

“不要紧的。”

朱松寿看看眼前的困境，又只好答应。

从此，杨绮云每天倒好马桶，就到邻居家，或是到附近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抱回来一堆脏衣服。她洗呀，洗呀，手磨破了，淌血了，起茧了。她洗的衣服比谁都干净，晒干，折得整整齐齐的，送到主人手里。她从不开口要钱，更不要高价，而富有同情心的主人，总是主动多给她几个钱。

这样，丈夫拉板车，妻子给人家倒马桶和洗衣服，支撑着一个数口人的家。

1930年10月，蒋云回江阴第三次担任县委书记，负责组建红十七军兼任军长，朱松寿也奉命回到江阴，担任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参与筹建红十七军。1931年5月，江苏省委撤销了红十七军建制，蒋云因参与反对王明宗派主义的斗争，他担任的江阴县委书记也被一起撤销。朱松寿又奉命撤到上海，继续过着一边做工一边进行革命活动的艰苦的生活。

艰苦的生活，没有使朱松寿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反而更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白天，他拉着板车，时而出现在街上的人群里，时而走进工厂的车间，进行革命宣传；晚上，他家小小的亭子间，成了地下党员的“联络点”，策划着革命活动。他们来，杨绮云就到门口放风，或是忙着给他们做饭。

1932年，一天晚上，朱松寿回到亭子间，已是饥肠辘辘，疲劳不堪。可是，他既不掀锅盖，也不逗孩子，只是闷着坐在小凳子上发呆。

“松寿，快吃饭吧。”

“松寿，你不舒服吗？”

只要碰到重大事情，朱松寿就会闷着不说话。杨绮云没有再追问，先安排孩子吃饭、睡觉，才又询问起来。

“你究竟碰上什么事了？”

“他们都牺牲了！”

“他们都是谁？”杨绮云急切地问。

“钱振标他们！”

杨绮云“啊”了一声，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静静地听着丈夫说下去……

孙逊群，1927年10月23日在无锡被捕，11月13日在无锡南校场被敌人残酷杀害；

钱振标，1928年10月18日在常州大成旅馆被捕，11月25日被反动派枪杀于江阴君山南麓；

茅学勤，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大东旅社被捕，2月6日被杀害在君山脚大校场；

陈叔璇，1929年5月在西阳桥开往无锡的轮船上被捕，7月23日牺牲于君山刑场上……

最让朱松寿痛心的是那个装扮成乞丐夜闯后塍镇的女共产党员钱大妹，53岁的人了，一双伶仃小脚，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可是，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却表现得无比的坚强和勇敢。陈祥安豢养的长寿自卫团把她剥得一丝不挂，像屠杀动物一样绑到凳子上，先用烧酒灌她的嘴巴，再用火油灌她的鼻子。钱大妹在难以忍受的耻辱和痛苦面前很快地失去了知觉。然而，敌人不会让她这样死去，又用冷水把她喷醒了。接着，她的手指、脚趾上钉上了一根根锋利的钢针，她的乳房上放上了两枚烧得通红的铜板，一股灼伤皮肤的强烈的焦臭味迅速地弥散于整个房间。然而，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仍不肯招供。红了眼的自卫团丁，就将一根从炉子里抽出来的火星四溅的铁条，猛力戳到那女性最隐蔽也最难以见人的阴道里，随着一声凄厉的石头人听了也会战栗的惨叫，这位江阴人民的优秀女儿就停止了呼吸，再也没有醒来。未几，陈祥安又指使自卫团杀害了她的丈夫汤耀文……

“蒋云也在去年12月被捕了！”朱松寿又痛苦地说。

“什么，老蒋大块头被捕，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现在关在公共租界的提篮桥监狱。”

“老蒋大块头，多好的同志呀！”

杨绮云几乎失声痛哭起来。蒋云生得结实魁伟，杨绮云总是亲切地称他“老蒋大块头”。蒋云在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中共徐海蚌特委书记、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江阴县委书记兼红十七军军长、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蒋云参加了反对王明宗派主义的活动，被王明撤销了在党内的一切职务，被派到上海五金工人委员会任主席。蒋云革命意志坚定，还很会关心人。记得自己生二儿子国强的那天，丈夫出门去开重要会议，不在家，又请不起医生，她就忍受着阵阵剧痛，自己包包扎扎了事。产后，她的身体很虚

弱，多么需要补一补呀！一家人肚子都填不饱，哪来钱买补品呢！丈夫不在家，这日子怎么过哇。就在这时候，蒋云来到她身边，说朱松寿整天跑着开会，出不来，要他来看看她。蒋云看到她这么苦，把自己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才掏出4块钱。他说：“嫂子，我也就这么多钱了，你拿着去买点补品吧。”杨绮云当然不会去买什么补品，孩子还在挨饿哪！他们母子3人，就靠着蒋云的4块钱，度过了最困难的一个月，直到丈夫回来。

“松寿，我们去看看老蒋大块头好吗？”

“我是准备去，但是，你去不得！”

“不，我也要！”

“目标太大，你千万去不得，我代表你去看他就是了。”

朱松寿以一个亲戚的名义，又改名换姓，拎着妻子买来的一罐牛肉和一罐头酱菜到了提篮桥监狱。这两位江阴一起领导农民暴动，以后又一起秘密偷越国境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生死与共的战友，互相默默地对望着，没有一句言语，只有两束灼热的眼光在不时地变换着内容，时或互相安慰，时或互相激励，时或表示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和革命到底的决心。朱松寿轻轻抚摸着蒋云脚上的铁镣，想起杨绮云生第二个儿子国强……正当朱松寿跳进回忆往事的溪流细细体会其中滋味的时候，规定的探监时间到了，两人只得依依惜别。

朱松寿第二次去提篮桥监狱，蒋云已被押送到南京。后来，蒋云秘密写信给他的妻子姜辉麟设法与江苏省委取得联系，被大叛徒顾顺章侦悉。1932年冬，蒋云和新捕进来的姜辉麟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勒死在南京中华门附近一个叫边营的地方，埋在靠古城墙脚下的后院里。

“他们都英勇地倒下了，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可是，江阴的革命之火不会熄灭，共产党不会完。我朱松寿活着一天，就要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天。”每当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与战友，朱松寿心里火灼刀割般地难过，经常暗暗告诫自己，要用百倍的努力、千倍的热情去工作，担负起先烈们未竟之事业。

朱松寿不仅自己用千倍的热情去工作，还引导着妻子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一天，杨绮云根据朱松寿的要求，真的打扮成一个很有钱的阔太太：卷曲的乌发散发着法国高级香水淡淡的幽香，粉红色的紧身丝绸旗袍裹着她那匀称丰满的胴体，一双流行的高跟皮鞋把她原本修长的身子点缀

得更加袅袅婷婷。她高傲地坐在一辆人力车上，两只脚的旁边，各放着一只质地讲究的印着鲜丽图案的皮箱。沿途负责检查路人行李的警察看见如此阔气的女人，猜想一定是挺有来头的哪一位达官贵人的太太，气都不吭一声就放行了。人力车一直拉到上海近郊一个秘密联络点。这时，远远跟在杨绮云后面负责保护的朱松寿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提起沉甸甸的皮箱，交给了按约定来接货的两位地下党同志。

“绮云，你知道白天押送的两只皮箱里，放了些什么东西吗？”晚上，朱松寿向妻子问道。

“这么沉，也许是书籍或文件吧？”杨绮云理了理还留着香水芬芳的秀发，说道。

“两只箱子里，各藏了5把驳壳枪。”朱松寿笑咪咪说出了秘密。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妻子嗔怪道。

“早说了我怕你没有这个胆子送去。”丈夫得意极了。

“为什么那样不相信我呢？你下次再有武器，我仍帮你送去。”杨绮云很不服气。

确实，杨绮云成了朱松寿一个很好的助手。为了丈夫的安全，她跟他约定，窗子外面挂着一只空火柴盒，表示住宅安全；火柴盒没有了，就暗示家里出了问题。他们每过几个月就搬一次家，而那火柴盒，始终都在窗口。朱松寿感激妻子的默契配合，也庆幸自己没有落入敌手。

一天傍晚，朱松寿下班回家，刚走到拐弯处，就习惯地望望窗口。他不觉一惊：空火柴盒不见了！朱松寿一个急转身，立即隐蔽到一条深弄里。一连三天，朱松寿白天拉板车，夜里在亲友家“打游击”。第四个傍晚，他发现窗口上又挂上了空火柴盒，才悄悄地回到家。原来，那天杨绮云发现几个陌生人在附近转悠，才取下那个空火柴盒。

“这么说，敌人已经知道我的住处了，”朱松寿警觉地说。

“很有可能，我们明天就搬家吧！”

“不能等到明天了，马上就搬！”

“马上搬？”杨绮云望望熟睡的孩子。

“必须马上搬，不能再犹豫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住处呀。”

“先住到你妹妹家再说。”

朱松寿很快叫来一辆三轮车，装上一张大床、一捆衣服，以及几件

日用家具，来到了杨绮云的妹妹家。

妹妹家本来就很挤，一间房子，临街的门面做裁缝生意，后面住着妹妹、妹夫、岳母及孩子，突然去了这一家子，哪能住得下？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人挤人了。第二天，朱松寿就出去找房子。房子没找着，却听说原来的房子被人抄了！好险哪！第三天，朱松寿又整整跑了一天，仍没有找着。又找了几天，不是价钱太贵，就是位置不利于隐蔽而没有谈成功。

“老是住在这里怎么办呀！”杨绮云急了，抚摸着隆起来的肚子。

“明天我再去找。”

其实，朱松寿也很着急。现在总还可以人挤人，要是生孩子就怎么也不好办了。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时30分，日本侵略军进攻闸北，未及撤防的十九路军违命抗战，“1·28”战事爆发。

枪炮声断断续续响了一个月。

2月28日夜，枪炮声又密集起来，似乎弹头就在屋顶上呼啸。

“松寿，松寿！”杨绮云怕影响其他人，轻声而又急促地喊着身边的丈夫，“我肚子痛！”

朱松寿没有想到，房子没有找着，妻子却要生孩子了。在这间人挤人的房子里是万万生不得孩子的，朱松寿不顾岳母他们的劝阻，叫来一辆三轮车，装上了简单的行李。

“妈，麻烦你们照管照管鸿坤。”

“你们就放心走吧。”岳母应声说。

他们出了门，走到了街上。这时，枪炮声似乎更响了。三轮车慢慢在前面走着，后面紧紧跟着三个人：朱松寿、杨绮云及二儿子国强。妻子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搀着二儿子；丈夫一手扶着妻子，一手拎着马桶。一个男子汉拎着马桶在街上走多难看，他马上找来一只麻袋，把马桶装进去。

“松寿，我们搬到哪里去呀？”杨绮云捂着越来越痛的肚子问。

搬到哪里去？朱松寿自己也不知道。他是看过几处房子的，但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最后敲定。现在妻子越来越痛，看来很快就要生孩子了。他毅然决定朝着距离最近的一家房东走去。

他敲着房东的门。

门开了，走出来一位老太太。

“大妈，能租一间房子给我们住住吗？”

老太太一见杨绮云那个样子，二话没说，伸手就把她扶进了一间又旧又破的房间。

朱松寿点燃了一盏昏暗的油灯，很快把母子俩安顿下来。二儿子国强已经“呼呼”入睡，妻子杨绮云“哼哼”声一刻不停，“呼”声与“哼”声和着外面的枪炮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乐曲，这奇特的乐曲也把靠在外侧床边的朱松寿送进了梦乡。

“松寿，松寿！”

“怎么了？”朱松寿一跃而起，伸手去摸摸妻子的肚皮，“痛得厉害吗？”

“厉害，很厉害，快，快去请老娘（接生婆）。 ”

“别说傻话了，外面还在打仗，上哪里请老娘！”

说着，朱松寿把妻子扶下床，向马桶边移动。

“不，松寿，你快弄块棉花放到马桶里！”妻子想起了妈妈的嘱咐，呼喊着急着。

朱松寿马上从垫被上撕下一大块棉花，放进了有半桶水的马桶里，然后才轻轻地把妻子扶到马桶上。

杨绮云突然感到一阵剧痛，不久，又感到一阵轻松。

“生了？”朱松寿惊喜地问。

“生了。”杨绮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孩子怎么样？”

“我不要，闷死算了！”

朱松寿不管妻子愿意不愿意，就把她拉起来，迅速从马桶里抱起孩子，把耳朵贴着孩子的胸口和鼻子。坏了，没有气了！他又是拍打，又是摇晃，恨不得痛骂妻子一顿。正要开口，只见孩子张开小嘴巴，哭了起来。

“赶快剪脐带！”杨绮云嘱咐说。

朱松寿这才把孩子放到床上去找剪刀，呀，糟糕，剪子忘掉拿了。突然，他发现一把菜刀。对，就用菜刀吧！他拿着菜刀，轻轻地割断了系在孩子肚脐上的脐带。脐带一断，一股血水直往外冒。

“松寿，快，把脐带扎住！”

朱松寿急忙从妻子鞋肚里拿出一块垫脚的棉花，蘸了一点豆油，往孩子的肚脐上一盖，又找来自己的一条单裤扎牢，这才完成了“接生”任务。

“松寿，是男的还是女的？”杨绮云问道。



建国初，朱梅芳（朱远 后右）和她的两个妹妹朱雪芬（前左）、朱秀芬（前右）、弟弟朱鸿良（后左）合影。（朱远 提供）

朱松寿急忙扒开孩子的两只小腿，看了看，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嘿！嘿！是女的！”

“女的？我不要！”

“你不要，我要！我已经给我们的女儿想了个名字，叫梅芳。”朱松寿也不征求妻子的意见，边说，“我们的女儿

是在枪炮声中出生的，又是生在寒冬腊月里。梅花在冰天雪地里才开放，她耐寒，抗冻，性格顽强；梅花能发出奇异的芳香，香得令人陶醉……我们的梅芳长大时，我或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但是，我想得出她一定长得像妈妈一样美丽，像爸爸一样坚强。当她知道自己出生时的艰难困苦，也一定会为她能够生存下来而唏嘘不已，为拥有一位刚强的父亲和一位坚韧的母亲而感到荣幸和自豪，说不定还能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呢！”

“我有一个预感，不知能不能说出来。”杨绮云试探着说，“梅芳今天能活下来，着实很偶然的，将来的命运，会不会比她的两位哥哥更充满磨难呢？”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一定也是我们朱家的女中豪杰！”朱松寿语气肯定地说。

杨绮云虽然从心里不想要这个女孩，但是看到丈夫如此喜欢，她还能说什么呢。现在，她只有一个愿望：平平安安地熬过眼前的苦日子。

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

苦日子总算勉强熬过来了。

但是，它并不是平平安安的，因为报纸上还不时地刊登着“捉拿朱松寿，赏洋三千元”的通告！

下 篇

抗敌之奇



1938年7月15日，朱松寿率领抗日武装，在江阴县祝塘镇颜家桥伏击从无锡下乡“扫荡”的日本侵略军，一举歼灭日军96名，被誉为江阴抗战史上的奇迹。图为颜家桥伏击战遗址。

(徐泉法 摄)

第一节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伙夫

1935年8月。

一天，朱松寿像往常一样，拉着满满的一板车硬纸。他赤着膊，套板车的绳子深深地嵌进了肩膀的皮肉里。他低垂着头，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着。

突然，他的前面站着一个人穿黑绸短袖的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得不抬起头来，倒抽了一口凉气。这个大汉叫梅光迪，原名梅仁焕，江阴西石桥人，16岁当布店学徒。1927年春参加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东乡农民武装暴动，表现很是勇敢。1928年10月，他在常州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即向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自首，继而参加特务组织，当了国民党江阴县党部特务室助理员，他这次到上海来，正是奉命逮捕朱松寿的。

“朱松寿，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吧。”梅光迪得意地说。

“我也没有想到你今天会落到这般下场！”朱松寿蔑视地说。

“我的下场总比你在大马路上拉板车好吧。”

“卑鄙！无耻！”

“骂人有什么用，还是跟我走吧！”

朱松寿的眼睛迅速扫了一下四周。

“张望什么，你今天是逃不掉了！”

朱松寿的眼睛又迅速扫了一下四周，果然发现前后左右都有持枪的国民党特务。

“梅光迪，这下你可以领到3500元赏钱了吧。”

“这3500元赏钱可不容易拿呀！”

这倒是一句实话。为了捉到朱松寿，不说上海及江阴的特务室机关下了多少工夫，就拿省党部特务来说，也费尽了心机。仅捉拿朱松寿的赏钱一项，就由500元，增加到1000元、2000元、3000元、3500元，多年来所以没有抓到朱松寿，这倒不是那些特务不想要这个赏钱——他们连做梦都在想呢！实在是侦察不到他的行踪。这下可好了，终于抓到了！

梅光迪神采飞扬地押着朱松寿回江阴领赏去了。

梅光迪押着朱松寿刚回到江阴，消息已经传到了镇江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务室。

“快通知江阴：把朱松寿押到省党部来。”

何秘书所以要把朱松寿押送到省党部来是有原因的。何秘书叫何澄，这是他的化名。何澄担任过共青团江阴县委组织部长，当时与朱松寿来往甚密。何澄于1932年在上海共青团中央秘书处担任交通组长和油印组长期间，被叛徒出卖，继而自己也成了叛徒，当上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务室秘书。

此刻，何澄想的是，梅光迪捉到朱松寿，能拿到3500元。赏钱果然是好，但是自己如果能亲自审理这个要犯，使他为国民党服务，这比拿到3500元更有意义，不仅可以发财，还可以升官。自己不就是那样才当上了秘书这个要职的么。于是，何澄当即以省党部特务室名义，起草了一个要江阴立即押送朱松寿到省党部的文件，理由是“朱松寿是共产党要犯，属省党部审理范围”。文件经特务室主任签发送到江阴，开始江阴很不愿意，何澄又以特务室名义，要挟江阴“不得违反纪律，不得擅自审理朱犯”，江阴才把朱松寿押送到镇江监狱。

何澄立即组织审讯，但只是幕后指挥，一则是与朱松寿有过旧情，怕有些话不好当面说；二则如果审讯发生僵持状态，也好有个回旋余地。

何澄把几个参加审讯的特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审讯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何澄问。

“放心，没有问题。”特务答。

“还有，你们一定要紧紧围绕着我们特务室的任务开展审讯。”

说到特务室的任务，特务们都是知道的。特务室有上千人，大都是象何澄这样的人。他们本来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革命队伍里也曾或多或少地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但是后来被捕了，受不住敌人严刑拷打，或受不了金钱美女的引诱，叛变投敌了，出卖了许多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国民党深知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就利用这些共产党的叛徒，专门从事分化瓦解共产党的活动，而这些共产党的叛徒也通过出卖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通过审讯，”何澄强调说，“你们要迫使朱松寿就范，像梅光迪那样自觉自愿地为党国服务。”

提到梅光迪叛变，何澄总是洋洋自得。梅光迪被抓后，不但不供出

共产党的组织及共产党员，反而在狱中进行斗争。后经何澄耐心诱骗，加之严刑拷打，才制服了他，自首叛变，并成了破坏共产党的得力人物。

“是！”几个特务齐声答道。

“还有，你们如果任务完成得出色，我要报请主任大大奖赏你们！”

特务们接受了任务，出了秘书办公室，径直向监狱走去。

这时，关在镇江监狱里的朱松寿，正在反复谋划着如何对付敌人的审讯。想呀想呀，周水平、孙逊群、钱振标、茅学勤、陈叔璇、蒋云，特别是女共产党员钱大妹英勇牺牲的悲壮场面，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自己应该走这条路，也完全能够走这条路。这样的选择一经确定，他觉得全身一阵轻松，一种解脱一切痛苦和磨难的特有的轻松。然而，他很快觉察自己的这种选择，是一种企图以死来为自己的革命生涯划句号的做法，勇则勇矣，但总觉得缺少一点儿谋略，为什么不可以和敌人兜兜圈子耍耍弄弄他们呢？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没有一点可能的。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既被叛徒出卖，是无法隐瞒的，也不需要隐瞒。但是，1928年4月离开江阴后的一系列重要活动，特别是秘密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至关重要的大事，梅光迪不会知道，自己也必须绝对地保守党的秘密。想到这里，他非常自信地等待着敌人的审问。

审问开始了。

“你是朱松寿吗？”

“不错，我叫朱松寿。”他的神态自然而平静，像同人谈着家常。

“你的政治身份是……”

“中国共产党党员。”

“何人介绍你入党？”

“陈叔璇，江阴陈家仓的陈老五。”

“你还认识哪些共产党员？”

“孙逊群、钱振标、茅学勤、蒋云、钱大妹……还有一个梅光迪。”朱松寿又强调了一句，“他们都是江阴共产党的领导人。”

几个特务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朱松寿的回答感到满意。他既没有怒目斥骂和死不认账，也没有审问共产党员时常常遇到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他们预感到今天的审问会获得成功，那花花绿绿的钞票和诱人的升迁就会向他们频频招手。

书记员的金笔在纸上发出一连串的“沙沙”声，洁白的纸上留下了

一行行曲曲弯弯的轨迹。

“你何时离开江阴到上海去的？”特务又问。

“1928年4月。”

“你到上海做了什么？”

“给一家工厂拉板车。”

“你家有田产，为何外出谋生？”

“因为江阴的国民党要捕捉我。”

“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要捕捉你吗？”

“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

何澄听了特务们的汇报。

“你们认为朱松寿的态度怎么样？”何澄问。

“他的回答大体符合事实。”

“你们就这样轻信朱松寿吗？”何澄突然提高了嗓门。

“他除了招供孙逊群、钱振标、茅学勤、蒋云、钱大妹以外，还招供了谁？”

“还有梅光迪。”

何澄是绝不会轻易地放过朱松寿的。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自己就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他要尽一切努力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

“你们要继续审讯朱松寿，”何澄指示说，“在第二次审讯前，你们先到上海及江阴查清两个问题：第一，他招供的共产党员都在哪里，要立即把他们抓起来；第二，1928年4月以后，朱松寿究竟干了些什么。”何澄又强调说，“你们要明白，像朱松寿这样的共产党员，铁棍是撬不开他的嘴巴的，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撬开他的嘴巴。”

特务们走了以后，何澄又通过其他渠道，搜集朱松寿的情况。一个月后，各种情况都送到特务室，派到上海及江阴的特务也回来了。

所有情况都使何澄大失所望。朱松寿招供的共产党员，有的已被国民党杀害，有的早已病故，竟没有一个是活着的。至于朱松寿在1928年4月以后的活动，仍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连一直在追捕朱松寿的梅光迪也说“不知道”。

在事实面前，何澄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不管怎么说，朱松寿毕竟曾经是自己的“战友”，现在既然不能通过他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何不

做个人情呢？何澄决定按照国民党新政策审理朱松寿。国民党的新政策规定，凡是在1930年前脱离共产党的共产党员，只要办理自首手续，就可以从宽处理。何澄把这个建议报告了主任，主任当即批准。

谁知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阴。陈祥安马上打报告给江阴县党部并报省党部，要求把朱松寿押回江阴审理。陈祥安的如意算盘是：只有把朱松寿弄到手，把他千刀万剐，才解心头之恨；留着朱松寿，对自己始终是一个威胁，不如杀掉的好。但是，这个报告被何澄压住了。何澄知道陈祥安的居心，驳回了陈祥安的报告。何澄这样做，一则是为了做个人情，二则也符合国民党的新政策，没有证据，任意杀人，这对今后开展分化瓦解共产党的工作不利。

但是，在要求朱松寿办理自首以前，何澄决定再组织一次审讯。他想，也许朱松寿在审讯中能泄露一点什么呢。

特务们带着何澄的指示，又来到监狱，进行了第三次审讯。但是，审讯结果和前二次完全一样，毫无新内容。

何澄见再也榨不出油水，才决定要朱松寿办理自首手续。

朱松寿听了特务们要他办理自首手续，当即予以拒绝。这是一个关系到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怎么能答应呢。不过，他拒绝的方式，不是激昂慷慨地大骂国民党，而是像平常办事一样地说：“我没有文化，写不了自首书。”

“那你怎样写参加共产党的申请书的？”特务突然逼问。

“我没有写过申请书，是用举手宣誓入党的。”

何澄听了特务们的报告，只得叫人代朱松寿写了一份“自首书”，朱松寿这才通过了审讯。

如何发落朱松寿？如果将他杀掉或坐牢，不利于分化瓦解共产党；但是要把朱松寿放了，日后如果他继续从事推翻国民党的活动，省党部特务室及他这位秘书，也担当不起责任。何澄反复考虑，权衡再三，就报请主任批准，给朱松寿分配一个差事，把他软禁在省党部。

特务们带着何澄的指示，又找朱松寿。

“你有什么爱好和特长吗？”

“自小爱好斗蟋蟀和养鸟。”朱松寿回答说。

“能否做一些合适的事情呢？”

“做工，会拉板车；种田，会赶牛打水，其他什么都不会。”

特务们碰了壁，又回去向何澄报告。还是何澄出主意，叫朱松寿当伙夫，每月12元钱。为了牢牢牵住朱松寿的心，何澄又叫朱松寿把妻子及几个孩子叫到镇江。

——何澄虽然在朱松寿身上没有捞着什么，但是后来在捕捉其他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方面却立了功，因而不断得到晋升，后来还当上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务室中将主任，被共产党列为战犯。解放前夕，他到了香港。在香港，何澄转向共产党，并积极提供重要情报，捕获了一批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人民立了功。解放以后，由廖承志推举，何澄由香港到了北京，在国务院做统战工作，又为人民立了功。目前，何澄已经退休，但仍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1989年12月，本书作者之一陆其明从北京赶到江阴，曾在医院看望了何澄老人。他坦诚地谈了当年审理朱松寿的心境。他说，根据我当时往上爬的迫切心情，很想利用朱松寿的供词达到向上邀功的目的，但是朱松寿欺骗了我，我上了他的当。如果他供出了有价值的情报，我们肯定要委任他重要职务；如果供出自己曾是共产党的“六大”代表，以及后来的活动，我们也非把他杀掉不可！

在莫斯科银色别墅中共“六大”闭幕后的第七个年头，朱松寿被国民党软禁在镇江当了一个伙夫。

每天清晨，朱松寿挑着一副担子，走到民众教育馆附近的菜场，购买新鲜的猪肉及刚从长江里捕起来的活鱼和菜农送进城的沾满着露珠儿的蔬菜。买得差不多了，他弯下高大的身躯，把菜担子放到肩上，迈开大步，向国民党省党部的大院走去。接着，他忙着洗菜、淘米、生炉子，用他那曾经握过厚背大砍刀和驳壳枪的扇子般的大手，熟练地烧饭做菜。当省党部的下级官员吃完饭抹抹嘴离开餐厅的时候，他又投入了一场洗锅涮碗的战斗。终于，餐厅又恢复了原先的整洁和宁静。他带着疲惫、饥饿的身子，迈着沉重的步履向他的“家”走去。

这是一间低矮的小屋子，朱松寿高大的个子必须弯着腰走进去，才不至于碰着头颅。房子里铺着一张床，床上的被面、枕头和帐子都已经破旧了，只是并不脏，整整齐齐的。除那张床外，屋子里所剩的面积就不多了。这时，杨绮云蜷缩在角落里，低着头，用力地搓洗着盆里的衣服；洗衣盆旁边，还堆着许多脏衣服。她看见丈夫回来，急忙把沾满肥皂泡的双手在那堆脏衣服上擦了擦，伸手把落在脸上的一缕头发往后理了理，站起身来，招呼在另一个角落里玩耍的4个孩子——女儿露英、

梅芳、雪芬和第二个儿子国强，说：

“你们别玩了，爸爸回来了，快吃饭吧。”

孩子们“轰”的一声窜了过来。其实他们早就饿得忍不住了，几次吵着要吃饭，妈妈总是因丈夫没有回来不准孩子们先吃。孩子们没法，只得继续沉浸到玩耍中去，借以忘记饥饿的痛苦。梅芳已经在读书了，懂得孝顺，把饭先盛给爸爸，再盛给妈妈，然后再盛给姐姐露英二哥国强和妹妹雪芬。

“妈妈，你说了几次要买肉吃了，为什么总是豆腐烧咸菜呀？”儿子国强吵嚷着，小嘴巴撅得老高。

“二哥，你别瞎说，豆腐咸菜不是挺好吃吗？我吃100年也不厌。”梅芳怕二哥的话惹得爸爸妈妈伤心，赶紧把话引开了。

“我也喜欢吃咸菜。”年龄最大的露英也帮着梅芳说话，她是在生母刘三妹和朱老太太去世以后才到镇江来的。朱松寿瞥了一眼妻子，只见杨绮云眼角湿漉漉的。她赶紧别过脸去，用手将泪水抹去。丈夫在省党部做伙夫，每月才10多元的钱，要养活这一家子人，不勒紧裤带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省党部有一个姓施的下级官员看着他们实在难以生活，就凑合了几个人，把原来包在一家饭店的伙食改请杨绮云代烧，杨绮云从中可以赚几个钱补贴生活。另外，她又为左邻右舍洗衣服，也能得几个小钱。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过得仍挺艰难。杨绮云丰满白皙的汉白玉般的脸，过早地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两只白嫩纤细的手变得粗糙起来，乌黑油亮的头发也失去了先前的光泽。丈夫软禁的处境，四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大儿子鸿坤寄养在上海杨银梅家里）的沉重负担，拥挤不堪的住所，像磨盘石般压在她的身上。但是，朱松寿和孩子们从未听见她的怨恨、叹息和艰难环境下夫妇间常有的争吵。相反，她更以一个女人的温柔去体贴和照顾丈夫，关心和抚育孩子。她心里明白，丈夫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了拯救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才落到这般地步的，这没有什么耻辱和不光彩。只是看到孩子们瘦弱多病和丈夫整天沉默不语，才偷偷地掉几滴眼泪。

朱松寿呢，自软禁镇江以后，像一头从丛林中被捕获来的猛虎关在人工堆砌的虎山里一样，虽然还保留了一点儿活动的权利，但是，已经无法逾越四面高耸的山墙了。他为失去了为党的事业冲锋陷阵的机会而

痛苦，为得不到党的指示，听不到同志们的声音而度日如年，因此，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同一家人蜷缩在这间小屋子里的时候，他都默然无语。只有当妻子和孩子们都入睡以后，他那思维的小舢板才快活地在人生的大海上航行，享受斗争的快乐，也咀嚼着失败的困惑，期待着像猛虎那样回到属于自己的深山密林中去……

一天，妻子看到丈夫拖着疲困不堪的身子走进屋来，又禁不住暗暗地流泪。

“你应该为我高兴，”朱松寿安慰妻子说，“我在敌人眼里，一无文化，二无志向，三无爱好和特长，只是一个伙夫的料子，这样他们就不会严密地监视我。我在镇江等待机会，一旦找到共产党的关系，就可以回到那里继续为党工作。”停了片刻，他又讲了《三国演义》中刘备用韬晦之计瞒过了曹操的故事。杨绮云也觉得用计谋比硬顶硬撞更有利于斗争，于是陪着丈夫，带着孩子，为人家洗衣做饭，过起了屈辱、困苦、压抑的软禁生活。

1937年秋，杨绮云又怀了第五个孩子，挺着大肚子到处去收脏衣服洗，行动非常艰难。朱松寿看不过眼，一定要妻子休息。杨绮云拗不过丈夫，就不再去为人家洗衣了。这样，朱家一边在加重负担，一边在减少收入，到秋冬之际，一碗咸菜烧豆腐都要分成两半，中饭吃半碗，晚饭再吃半碗。朱松寿看着被饥饿、贫困、监禁三条毒蛇缠绕得日益消瘦的妻子和孩子们，心情十分沉重，只因心中的希望之光没有熄灭，他才每天重复着买菜、烧饭这枯燥乏味并带着惩罚意义的劳动。

11月下旬的一天，朱松寿仍像往常一样，挑着一副担子，到民众教育馆附近的菜场去买菜。菜场空荡荡的，偶或看到一两个菜农，也都神色慌张地在收拾着菜担，无心像以前那样斤斤计较的了。他感到奇怪，向旁边的大街上看去，只见一辆辆的汽车、马车、人力车，都装着家具细软和惊恐失色的主人，在马路上狂奔。有一辆载着几个国民党官员的卡车，由于车速太快和驾驶员的慌乱失神，与迎面而来的一辆人力车相撞，把人力车掀翻在地，车上的一对夫妻跌得头破血流，丈夫揪住卡车司机不放，妻子发疯般地把泼散在地到处乱滚的银元扒向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是奔逃着的失魂落魄的人群，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

朱松寿悄悄地问了几个街道上的老人，才知道日军已经攻陷上海，正长驱西进，不日即要抵达镇江和南京。他顾不得再买菜了，把菜担子

往旁边一丢，向居住的小屋奔去。

“绮云，日军打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朱松寿气喘吁吁地说。

“那些人能放我们走吗？”妻子犹豫着。

“国民党省党部的大小官员，昨夜逃之一空，已经没有人管我们了。现在，大街小巷都是逃难的人群，再不走，恐怕就走不掉了！”在大事面前，他显得十分坚决和果断。

半个小时以后，朱松寿带着怀孕的妻子和4个孩子向长途汽车站走去，费了好大的劲，才买到开往江阴的车票。一家人上了汽车，像越出了笼子的雄鹰，像割掉了羁绊的奔马，像冲决了堤岸的江流，他们的心，早已超越了汽车的速度，飞到了故乡那一片熟悉的土地上……

第二节 毗山大王庙的人影

朱松寿回到江阴，鬼子还没有占领县城，长寿朱家巷家园已毁，母



抗日战争初期，朱松寿（右）与大儿子朱鸿坤合影。（杨绮云 提供）

亲和刘三妹已逝，又不摸高深，不敢贸然回家，他就把妻小暂时安排在云亭季庄三姐家里。三姐看见弟弟、弟媳带着一群孩子平安地回到家里，心中喜悦，两行热泪从眼眶中滴落下来。“松寿官，”三姐忙用衣袖揩干了泪水，叫着以前习惯了的称呼，“你们一去10年，叫我们盼穿了眼睛，愁短了肠子。这下子可好了，你们一家都回来了，大家欢欢喜喜地过日子。那年妈去的时候，口口声声喊着松寿官，想不到你还是回来了，如果妈还活着，那该多好！”

“三姐，这10年苦了你们，连累了你们。”朱松寿看着三姐脸上苍老了许多，感慨地说，“我和绮

云在外面，也常常想着你们，挂念着妈妈。革命革到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地步，可是我仍不后悔，还有，我要提醒三姐知道的，现在还不是欢喜喜过日子的时候，也许，你们已经听到了日本侵略军的炮声、枪声、马蹄声，他们是一伙国际强盗，并不比10年前的土豪劣绅、警察特务善良。恐怕，将要发生的战斗，要比当年的农民暴动激烈得多，人民付出的牺牲，也会比10年前惨重。”

三姐原本沉浸在骨肉团聚的欢乐之中，把几天前日夜担忧的日军就要过来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了，听朱松寿这么一说，心头马上沉重起来。她知道这位在外革命了10年的弟弟这次回家，绝不会在侵略军屠杀和骚扰面前袖手旁观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次的敌人要比农民暴动时的敌人凶狠得多，弟弟的命运与上次相比又是如何呢？

吃过晚饭，朱松寿就出去了，三姐担心弟弟出事，就和嫂嫂一起守在房中等着，直至半夜，还未回来，心中不免着急起来。绮云安慰道：

“三姐，松寿的脾气我知道，他再关10年，也不会改变他的革命信念。他是豁出去了，我也早跟着他豁出去了。在镇江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些日本人打上海的消息，他就同我说过，要回江阴打游击，因为国民党省党部的人管着，自然不能随便离开。今天早上，他上街买菜，才知道省党部的大小官员一夜之间都走光了，我们也就回来了。现在，大批日军就要过来，你用绳子把他绑在家里也没用，还不如让他闯去吧。他人挺机灵，也有经验，三姐，你放心，他不会出事的。”

姑嫂俩正说着话，朱松寿回来了，脸上露着笑容。他告诉她们说，他去找了几个10年前一起闹农暴的人，大家都等着他回来，领导家乡的人民抗日。有一个农民把冒着杀头的危险藏了10年的一支驳壳枪和20粒子弹，送给了他。朱松寿重新握到了锃亮的手枪，像打了几十年光棍的老汉突然娶了美丽的新娘一样兴奋、着迷。三姐看到弟弟回来，也就放了心，走出他们的房间休息去了。

朱松寿和杨绮云刚上床，就从常熟方向传来了沉闷的枪声。他无法预测常熟国民党守军的防御能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军凭借自己的强大火力和狂妄气焰，一定会攻陷常熟，向江阴方向铺天盖地而来。第二天，炮声和枪声愈来愈近，还不时听到飞机在空中发出的尖啸声。人心慌乱起来，纷纷收拾家什，挑着棉被和衣食品，携儿带女，外出逃难。

平时很少出远门的乡下人，凭着直觉，选择着逃难的方向。日军从东面过来，他们就向西逃去。江阴县城是不能去的，日军首先抢占的是城镇。铁路、公路沿线也是不能去的，鬼子的装甲车、坦克、汽车都是沿着交通干线前进的。人们经过一番选择，看中了江阴、无锡、武进三县交界的芙蓉圩、新安这块地区，它离三个县城都很远，而且地势低洼，交通不便，敌人长驱西进时，抽不出兵力到那里来杀人放火。

朱松寿一家和他们三姐都没有走，一则绮云即将临盆，行动不便，二则逃难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松寿自己在家又坐不住，便穿了件青布长衫，戴了顶罗宋帽，藏着驳壳枪，从季庄往南一路观察打击敌人的地势。

走到一个地方，看见麦田的角落里坐着几个逃难的人，一个中年妇女正在为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擦着额头的汗水，替他揉着肩膀。旁边，还坐着一个20刚出头的美丽姑娘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后生。

“你们从哪个村出来呀？”朱松寿弯下腰，温和地问道。

“长寿孔家。”中年妇女答道。

“你家的男人呢？”朱松寿显得十分关切。

“男人几年前去世了。”中年妇女沉默了一会，诉说道，“那日本人也真是坏透了心肠，你看我们孤儿寡妇的，怎样去逃难呀？孩子们都是嫩肩嫩膀的，如何背得动东西，走得了远路？我又是一副小脚，也不作硬，不得不每个孩子都分摊着背一包东西。刚才，这个小儿子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可是不走怎么行呢？”

朱松寿很同情这家人，只是帮不了忙，便要问个姓名，日后也好联系。中年妇女刚说了句“我夫家姓耿，我姓吴，大男孩叫忠……”，就被那个姑娘用眼色制止了，只听她气嘟嘟地说道：

“如果朱家巷的那个朱司令还在，我们也用不到去逃难了，他会双枪，一枪一个鬼子，敌人还敢来吗？我小时候见过他，模样儿同你差不多，也喜欢穿一件青布长衫，就是比你这位叔叔长得高，还神气，也年轻英俊得多，背挺得很直，我还摸过他腰里的手枪呢！”

“要是那个朱司令回来，我就跟他当兵去！”大男孩来了精神，抢着说话。

“我也去！”小男孩不甘服输，仰起圆乎乎的结实的脑袋，两只乌黑的眼珠瞪得圆圆的。

“大叔，”中年妇女叹了口气，“听着鬼子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大家都在盼朱松寿回来，可是不知他在哪一座监狱里正吃着苦呢！”说着，又帮两个大孩子系好包袱，喊了声：“汝娣，忠义，你们姐弟俩帮忠刚弟弟背一段，我们上路吧。”

朱松寿目送着这一家子上了路，眼睛有些湿润。刚才母子4人的这一段对话，不是告诉自己：家乡人民的心目中，还装着我朱松寿吗！他们盼着自己回来组织人民抗击侵略者，保卫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可是，刚才他还没有勇气告诉这一家人，自己就是朱松寿。因为，凭他目前一个人一条枪，是无法阻挡鬼子进军步伐的，也没有力量保护这些孤儿寡女不去逃难，这不能不让这家人失望。



1937年11月下旬，朱松寿在毗山玉皇殿狙击日军。图为坐落于毗山西山头的玉皇殿。

(徐泉法 摄)

他又走了很多路，对云亭、峭岐、璜塘、长寿、祝塘、文林一带的大路、河道、山丘都熟记于心中。当他走到毗山西山头的时候，被这里独特的地形吸引住

了——从祝塘、长寿往北去江

阴，一条大路像雨后的彩虹爬上毗山的西山头，然后再逶迤下山。大路东侧起伏的山脊上，长着疏疏落落的松树、柏树和其他杂木，虽然并不郁郁葱葱，但躲藏一两个人却是绰绰有余的。紧靠大路，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玉皇殿，殿中坐着玉皇大帝像。殿前有一片广场，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是玉皇殿节场，附近的人们抬着名目繁多的泥菩萨来见玉皇大帝的驾。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宗教活动，却给一些颇有商业头脑的人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这里的茶馆、药店、牛场、赌场开得红红火火的。这几天敌人的枪声一紧，开在玉皇殿附近的店家带走了店中最值钱的东西，关上店门逃难去了。因此，西山头一片冷冷清清，连一个和尚都看不见。

两天后，朱松寿只身躲在玉皇殿中，等候着从长寿方面开来的日军队伍——日军重藤支队在11月19日攻占常熟县城后，途经顾山、长泾、祝塘等镇，象山洪般卷着浑浊的浪头一路滚滚而来，国民党驻军虽然拼死抵抗，但都无济于事。现在，有一支日军部队，正踏着长寿到江阴的大路，向毗山西山头挺进。

鬼子如一群疯狂的蝗虫，正躬着头爬山。这些淞沪战役中见过大世面的日军官兵，在他们眼里就根本没有这座山，也不相信在这弹丸之地的山丘上会设有伏兵，更不敢承认只身单枪会有胆量在此狙击日本天皇的神兵。因此，他们像在自己国土的假山上散步一样轻松，像在春天外出郊游一样悠闲……

“砰！”一声枪响，为首的一个鬼子头目应声倒下，滚下山脚去了。

“砰！”又一声枪响，另一个骑在马背上的鬼子跌下马来，马受惊吓，飞一般地奔窜而去。

接着，一连响过几声枪响，枪枪打中目标，敌人这才认真起来，像芝麻般散开卧倒在山坡上，向玉皇殿猛烈射击。密集的子弹把墙壁咬得像马蜂窝一般，旁边的一家商店被子弹打穿了火油箱，腾地飞起一团火焰，房子着了火，愈烧愈旺。一个多小时以后，鬼子见玉皇殿并无动静，才慢慢地包抄过去，搜遍各个角落，除拣到七八颗驳壳枪的子弹壳外，别无一个人影。正诧异间，从毗山的松树林中又射出一梭子弹，又有几个鬼子中弹倒地。这时敌人才如梦初醒，狙击他们这支天皇神兵的只是一个人，如果驱动全军去抓这个狙击者，犹如在一堆碎砖石中寻找一只蚂蚁，抓住了也没有实际意义，而在此弹丸小山，滞留了整整两个小时，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鬼子走了以后很久，朱松寿才向毗山东山头走去，到了大王庙，靠在一棵银杏树下，远眺着山南的朱家巷和水墩庵，10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现在，房子毁了，母亲死了，连他的前妻刘三妹也离开了人间。而这家破人亡的悲剧同一个人——这就是10年前的宿敌陈祥安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陈祥安随着逃难的人群躲避战乱去了，可总有一天要回到长寿来，这欠下的一笔笔账，该如何去算呢？

他返身向大王庙走去，仅存的一个看门老和尚为他开了门。景物依旧，大王菩萨和观音神像依然笑容可掬地迎接着他，只是庙内到处张着蜘蛛网，泥菩萨的身上也金漆剥落，看样子这座庙宇年久失修，来烧香

拜佛的人也日渐稀少了。淞沪战争爆发至今3个多月来，毗山一带的农民人心惶惶，也顾不得来孝敬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了。他突然发觉这个冷落、偏僻、幽静的庙宇，是他聚集江阴东乡人民揭竿抗日的理想场所：白天，大王庙四周浓荫蔽日，无论从天上或是从山下都不容易发现这里齐集的人群；晚上，这里远离村庄，更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像考古学家发现了夏朝的遗址般满足和快活，趁着太阳还在天上，高高兴兴地下山去了。

数天后，朱松寿来到大王庙，见与人约定的时间还早，就与老和尚攀谈起来。老和尚告诉他，毗山算不上名山，山上却建有三庙，山下藏着二宝。那三庙朱松寿是知道的，就是玉皇殿、中山寺、大王庙，那二宝却不甚明了。老和尚见朱松寿有兴趣，就会声绘色地说了起来：

“中山寺上面的那座山峰叫鹁鸪顶，先辈传下来，说鹁鸪顶里有一对玉鹁鸪，一雌一雄，每逢深秋大雾天，毗山附近的人能听到玉鹁鸪的啼叫，其声悲怆凄凉，为终年被深压山中而鸣着不平。”

“那第二宝呢？”朱松寿又问道。

“鹁鸪顶东面有一山坳，坳中埋有金车银轴……”老和尚正说得有劲，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他只得出去开门。进来一个50多岁商人模样的人，穿一件灰色棉袍子，系一条黑色羊毛围巾，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朱松寿一看，连忙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了商人的手，像粘住了一般久久没有松开。

“施主，你要不要听那金车银轴的故事了？”老和尚见朱松寿转移了兴趣，很有些扫兴。

“不听了，不听了！”朱松寿一边说着，一边拉着那个商人的手，向第三进的观音殿走去，那个小伙子也紧紧跟在后面。

这位商人模样的人，就是10年前朱松寿闹农民暴动时的战友吴子卿。1928年春末农暴失败，国民党在江阴实行血腥镇压，有人劝吴子卿外出躲避，子卿以为在农暴中从未抛头露面，敌人没有证据不会轻易抓人，而外逃反会给反动派抓住把柄，因此照样在镇上一家布庄里做着买卖。谁知这年冬天，陈祥安指使长寿自卫团包围了吴家住宅，将吴子卿逮捕押往江阴投入监狱。

反动派抓吴子卿，确实没有依据，他们知道吴家是长寿镇上的富商，都想从他身上榨取一笔钱财。刚进监狱之时，正是数九寒天，吴姓典狱长命令狱卒不给稻草，不铺木板，只丢给他一条破烂草席，一条破老棉

絮。吴子卿平生从未冻过饿过，这般虐待，如何忍受得了？吴家暗暗送给吴典狱长一笔款子，才准许吴子卿自费买一张木床睡觉和吴家派人送饭。子卿有二个女儿，适在县城读书，每天都去送饭探监，得悉典狱长有四个儿子而没有女儿，为了讨得这位掌握父亲生死大权者的欢心，瞒着父亲，认了典狱长为义父。但是，反动派仍不答应释放吴子卿，吴家百般无奈，倾其全部家私，以两万银元的巨额贿赂打通了上海警备司令的关节，吴子卿才在第二年夏天回到长寿老家。这时吴家已一贫如洗，身无立锥之地了，只得举家迁往上海另谋生路。淞沪战争爆发后，眼看上海要成为日军统治的天地，吴子卿又愤而回到长寿。不久，日军前锋部队冲到长寿附近，国民党守军广东军83军156师奉命抵抗，死伤甚巨，最终丢失了阵地。吴子卿看到156师官兵在侵略者面前还有骨气，战后，就率先出头把战死官兵的尸体收集起来，埋在附近方家大坟。前天晚上，朱松寿来到吴家找他商量组织游击队抗日，正合他的心意。今天一早，就遵约来到大王庙与朱松寿见面了。

“三先生，你还带了个保镖在身边？”朱松寿瞥了一眼吴子卿身后的小伙子，“这是你的公子还是小姐呀？”

“这是我的第五个孩子吴增颖，”吴子卿含糊地说，“今年16岁了，跟在我身边长长见识。增颖，快叫朱叔叔。”

“朱叔叔。”吴增颖轻轻地叫了一声，嫩净的面皮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像是初夏时节刚刚探出水面的一朵芙蓉花。朱松寿细细辨认了一番，从她那脆生生的声音，嫩花花的脸面，微微隆起的胸脯，已经明白了个大概。但他装作糊涂，并不当面点明，只是含蓄地朗声大笑道：“我说三先生如果这是位女公子，真是二八妙龄，花枝招展，可惜错投男胎，埋没了这等苗条身材。”

“叔叔，你……”吴增颖一扭那纤细的身子，到外面望风去了。

“这孩子有志做点工作，我劝过几次，都是没用。我想把他留在身边，做些文牍秘书工作。总不会惹出是非来吧？”吴子卿以商量的口气征求朱松寿的意见。

“不会，不会。你我随时留心，多予关照。古时候还有花木兰代父从军呢，何况现在。”朱松寿肯定地说。

吴子卿见朱松寿这么说，就放下心来。接着互叙了农暴失败以后的遭遇，吴子卿咬牙切齿地说道：“陈祥安不除，难以告慰被他屠杀的烈

士的英魂。就是你我两家，也被这条恶狗整得倾家荡产。你母亲卧病在床，他都不肯放过。”

“三先生，陈祥安犯下的罪行，确是万恶不赦。”朱松寿耐心地分析说，“周阿桑的头颅，钱大妹的毒刑，人们都历历在目。说到我们两家，也更是一言难尽。可是，这些都是10年前的旧账了。旧账固然要算，不算人心不服，天理难容。但算账也要瞅准时机，如果现在我们摆开架子同陈祥安算账，那么，各镇各乡的地主豪绅就会勾结起来，同我们作对，逼急了还会投到日本鬼子的怀抱里去。这同当前的主要任务——抗击侵略者不相一致。三先生，你看呢？”

三先生沉吟不语，良久才说道：“我就不相信像陈祥安这样的人会抗日。如果日后我们拉起抗日队伍，也得讲个阶级阵线，不能让陈祥安这一类人混进来，否则他们一旦站住脚跟，与我们翻起脸来，岂不要遭他们的暗算？”

“子卿，我们曾经都是共产党员，虽然现在脱离了党组织，但是，我们还应该按照党的理论和策略去干。”朱松寿推心置腹地说，“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党的路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这条路线，像陈祥安这种在农民暴动中屠杀过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大地主、大土豪，只要他赞成抗日，也应该团结起来，而不应该排斥他们。”

吴子卿觉得朱松寿分析得虽然有道理，但是这样的尺寸就难掌握了，而且陈祥安这一类人都会做假，把真相隐藏起来，朱松寿为人正直，不容易识破，只是今天初次讨论揭竿抗日大事，不宜在陈祥安的问题上耽搁过多的时间，于是接口说道：“即使陈祥安赞成抗日，也要防止他背地里使坏。”

“陈祥安是一条咬死过人的狗，我们现在不处死他，那是因为来了狼群，怎么可能真正相信他呢？”朱松寿很同意吴子卿的意见。

朱、吴两人商量聚众抗日的时候，日军前锋部队刚刚经过长寿，江阴县城沦陷才几天。这时国民党的县、区、乡政权机构和人员作鸟兽散，空无一人；国民党的正规部队103师、112师、156师因为认真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奉命撤往南京参加保卫战去了；从城镇到乡村，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涌向锡澄公路以西，京沪铁路以北这一块三角地带逃难去了；而日军在占领江阴县城和主要集镇后，又抽出大部分兵力向西进攻镇江、

南京去了。江阴共产党的组织，早在30年代中期就不复存在。虽然还有像朱松寿、吴子卿这样忠心耿耿的党员，但由于早已与组织失去联系，像离群的孤雁不知往哪里飞翔才好。因此，这一段时间，在政治上几乎处在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朱、吴凭借农暴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道要抗日就要有人有枪。他们把目标盯在当年参加暴动的农民身上，于是分头去联络。

正当朱松寿日夜奔波，忙得恨不得一人撕成两半用的时候，杨绮云在季庄三姐家里，产下一个女孩。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个女孩来得是多么不适时啊！丈夫一天到晚不回家，三三两两的鬼子又常常下乡抓花姑娘，留着这孩子，无论对丈夫，对自己还是对松寿的三姐，都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杨绮云狠狠心，任婴儿在马桶中哇哇哭叫，闭着眼睛加上了盖，哭声愈来愈小，愈来愈低，这位做母亲的心像被猫爪撕得鲜血淋漓，难过地滴下了几滴眼泪。

“嫂嫂，孩子呢？”三姐推进房门，没有看见婴孩，不放心地问着，转过脸来见杨绮云在流泪，凭着一个女人敏感的心，知道嫂嫂把婴孩溺死了。她急忙打开马桶盖子，快要窒息的婴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又恢复了活力，嘶哑地哭叫起来。“孩子有什么罪呢？她爸爸最喜欢女儿，说不定长大后跟着她爸爸走南闯北地干一番宏伟事业呢。嫂嫂不要，我要。”三姐弯下身子从马桶中抱出孩子，熟练地替她洗干净了身子，急忙用衣服包了，自言自语地说。

“嫂嫂，你看这孩子，这一双眼睛多大呀，这一张小嘴巴多好看呀，这么灵秀乖巧的女孩，就叫她秀芬吧。”

正说着，朱松寿在外游说农民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回到家里，听三姐说了情况，抱过孩子，用他那宽阔的额头亲了亲小秀芬那粉皮般的嫩脸，诙谐地说道：“快些让我补补过失，否则孩子长大后，要对我这个做爸爸的有意见啰。说来也够惭愧，绮云生孩子，我在她身边的机会很少很少。三姐，这次就拜托你多照顾了。”

1937年底，毗山大王庙里又热闹起来了，每到晚上，庙里各个殿上都有人，他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在磨刀，有的在交流侦察到的敌人军事情报，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在悄悄地成长，他们处在原始的萌芽的状态，没有番号，没有编制，没有军饷，也没有经过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然而，他们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江阴人民勇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

历史见证，他们将按照自身的规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壮大。

这支队伍的创建人就是10年前江阴农暴领袖之一的朱松寿。

快要过旧历新年了，鬼子的入侵给江阴城乡蒙上的战争阴影和萧条、恐怖、凄冷的景象，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有所减弱。被鬼子烧毁的村庄袒露着一片枯木断砖，惨死在敌人枪炮刺刀之下新添的一座座坟茔，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田间垄头，平添了一层悲哀气氛。看到这一个个坟头，朱松寿禁不住想起母亲，老人逝世的时候，做儿子的因为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没有顾得上回家看望她老人家，更没有妥善地将她安葬，她睡的那一口棺材，还浮厝在祖坟上。现在趁与日军还没有正式接战，将母亲的灵柩葬了，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尽了做儿子的孝道。他把这个想法同吴子卿说了，三先生沉吟半晌，突然一拍大腿跳了起来，倒把朱松寿着着实实地吓了一跳。

第三节 在母亲的葬礼上

吴子卿在朱松寿耳边如此这般，把朱松寿说得连连点头，越发敬重这位足智多谋的三先生。

春节前夕，朱松寿带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孩子们回到了离开整整10年的长寿朱家巷。啊！这就是日思夜想的家园，这就是生他育他的故居，哪里还有原来的一点风貌呢？原先那一座整洁典雅的农家大院，连同整囤的白米，成套的家具，一箱箱的衣服，都不见了。站立在凛冽北风中迎接他们的是3间孤零零的瓦房，门窗都被人撬掉了，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冷风和沙尘直向里面灌去。屋子里张挂着一张张蜘蛛网，一群群老鼠见人走进屋来，在几寸厚的尘土上奔跑，卷起的灰尘在屋子里飞扬弥漫开来，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杨绮云触景生情，暗暗伤感起来。这样的房子连破庙宇都不如，怎么可以住人呢？

“妈妈，你们不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房子吗？那些房子都到哪里去了呢？”大女儿朱梅芳张着乌黑明亮的眸子，天真地问着。

“我们的房子被一个叫陈祥安的反动派拆去了。”杨绮云流下了眼泪。

“那爸爸为什么不找他去算账呢？”幼小纯洁的心灵无法理解这复杂

的世界，梅芳又向妈妈发问。

“我们不住这里。妈妈，我们仍住三姑姑家去。”二儿子朱国强抱住妈妈的衣襟，要离开这破败和肮脏不堪的孤零零的屋子。

朱松寿像一尊石刻的雕像矗立在地上一动不动，面前这破烂的家和孩子们的说话，像带着钢针的鞭子，抽打在他的心上。他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整个身子都在颤抖。这使他想起母亲在世时对他一遍又一遍训导过的话，特别是那次未满周岁的大儿子鸿坤蹒跚学步，母亲和几个姐姐都预测将来朱家要遭到没有立足之地的灾祸，难道现在真的变成现实了吗？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不都是因为自己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路，参加革命所造成的结果吗？那么，正在发生的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打击日寇这样重大的革命活动，对自己和对整个家庭又会带来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呢？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觉得沿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宽阔胸怀和牺牲精神了，也就是丧失了革命者的本质了。如果用个人利益的标尺去对待革命，那么，江阴革命的先驱者周水平、孙逊群、钱振标、蒋云、茅学勤、陈叔璇他们岂不要后悔自己白白丢失了火一般的年华和生命吗？那么中国革命的车轮特别是迫在眉睫的抗日战争，又有谁来推动和将这一战争进行到底呢？想到这里，他清醒了许多，立刻振作起来，把杨绮云母子安排在邻居家休息，自己走进老屋紧张地打扫起来。村邻们见朱松寿夫妇回到了阔别10年的老家，都赶来帮着打扫和收拾房间，又请来了几个木匠和泥水工，赶做门窗和粉刷墙壁。一些先前得到过朱家资助的人还搬来了桌、椅、床、橱等生活必需品。朱松寿又紧急卖掉了几亩田，却并不用在添置家具和购买过年用品上，而是为着一件大事——安葬母亲。

农历正月初一，在江阴东乡的传统习惯上是不走亲戚的。但是，1938年的农历正月第一天里，朱松寿的四个姐姐和姐夫都早早地赶到了朱家巷，帮着杀猪、宰鸭、捕鱼，又分头去通知亲朋好友，定在年初五为母亲举行隆重的落葬仪式。消息传出，长寿、云亭、周庄一带的农民都欢欣鼓舞，凡是带有一些亲戚关系或者在毗山大王庙聚过头的人，像小伙子盼着相亲一样，都盼着这一天快快到来。10年前参加过农民暴动在大王庙还没有联系上的人也都跃跃欲试，要见一见这位传奇般的暴动英雄。

年初五这天，天气十分寒冷，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北风吹到人们裸露的地方，刀割般地疼痛。年前下过一场雪，还没有融化干净，放眼看去，毗山的斜坡上和长着越冬小麦的田野里，像飘着一朵朵白云。苍白的太阳，磨磨蹭蹭地像从冰凉的被窝里探出头来，把一片没有暖意的光亮洒到江南水乡的村庄上。

朱家巷上一早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每人带来了一个红纸包，红纸上写着各人的名字和村子，里面包着一元钱。朱松寿问明原因，他们都是来拜先生的，这钱是见面礼。朱松寿哪里肯收？心想自己是共产党员，虽然现在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也要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拜先生收徒弟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万万行不得，因此都一一辞掉。

“共产党员为什么就不能收徒弟呢？”吴子卿把朱松寿拉到一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这不失为争取群众的一种可取的形式。青红帮的老头子收徒弟，那是他们为了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你收徒弟，同他们不一样，是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击侵略者。”

朱松寿点头同意，凡是交红包的人都一一收下，接受了叩拜之礼。

这时村边走过来一群年轻人，走在前头的那人长得很高大，穿着一件对襟中式黑布棉袄，显得精悍而有勇力。他叫余炳德（1916~1943），只见他走上几步，同身穿孝服的朱松寿见了面，坐在一边，只是叹息。

“小伙子可有什么不顺心之事，这般长吁短叹？”朱松寿关切地问。

“鬼子铁蹄践踏江山，杀人放火奸淫妇女之事每天都有所闻，人民生活于倒悬之中。”那个穿黑布对襟棉袄的小伙子不满地瞥了一眼朱松寿，“值此国难之际，有力应该用到打鬼子上去，有钱也应该花



余炳德，1938年2月加入朱松寿抗日游击队，历任警卫班长、排长和长寿区常备大队长等职，1943年4月6日在无锡被日军杀害。图为余炳德和他怀孕中的妻子钱素芬。（余静芬提供）

在抗击侵略军上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恕我直言，你今天为了安葬母亲，不惜钱财，大办宴席，仅图一个虚名罢了，岂不令人失望。”

这一席话，把一起来的其他几个人吓得面孔失色，又是眨眼又是咂嘴，示意他不要耍性子得罪这位颇有威望的朱松寿。可是朱松寿却哈哈大笑，连声夸奖说得好，倒把这个小伙子弄了个大红脸。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子上的人？”朱松寿和颜悦色地问。

“我叫余炳德，长寿十八亩桥人。”穿黑棉袄的人回答。

“你见了鬼子怕不怕？”朱松寿好像对余炳德很感兴趣。

“怕鬼子，就不是我余炳德！”年轻人朗声大叫。

“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朱松寿用手势做了砍头的动作，“家里还有父母妻儿，谁赡养和抚育他们？”

“做了亡国奴，还顾得那么多呀！”余炳德狠狠地说，“再说，你不打鬼子，鬼子也得杀你。河塘街上有个叫严寿菊的姑娘，鬼子剥光了她的衣服，排着队上去糟蹋她。她的父亲和弟弟看不过眼，跪在鬼子的面前苦苦哀求，鬼子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照干他们的丑事。结束了，又把一家3人重叠在一起，一刺刀杀害了3条人命。看着这样的惨剧，听着这样的故事，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即使平平安安地活着，那又有多大意义呢？”

“小余说得好，我朱松寿就喜欢你这样有骨气的年轻人。今天，我要尽人子之责，把母亲葬了，晚上，我们再深谈。”朱松寿一把握住余炳德的手，炳德隐隐作痛，然而很快领悟了其中的深意，喜滋滋地走到砖场的一角转悠去了。

吴子卿待余炳德走远，低声对朱松寿说：“余炳德祖籍安徽，他的父亲做木头生意，在十八亩桥开了一家木行店，从此生下根来，娶妻生子。余炳德是老大，此人刚直忠勇，又有谋略，在抗日游击队中，可以安排一个职位。”

朱松寿点了点头，正想谈谈对余炳德的感想，忽然面前走来一个胖胖的汉子，满脸怒容，好像是跟谁来算账似的。朱松寿定神细看，猛然想起第一次后膛暴动时，在法水庵遇到胖巡士，双方都张大着黑色的枪口，后经自己一番言语陈明利害，胖巡士丢下枪支夺门而出。一晃10年未见，今日莫非是来报仇的吗，他霍地站起，伸手去腰间摸枪。坐在旁边的吴子卿见状，也吃了一惊，这是他预先谋划中所没有考虑到的，正

欲帮助朱松寿擒拿刺客，只听“扑通”一声，胖巡士跪倒在地。

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更把朱松寿和吴子卿弄糊涂了，在场的人也莫不惊讶万分，迅速围成一个厚厚实实的圈子，观看着事态的发展。

“朱司令，我阿胖跟你去打鬼子，虽万死而不辞。”胖巡士大声直叫。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坐着慢慢地说。”朱松寿见胖巡士并无行刺恶意，忙把他搀扶起来。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要说我们到屋子里去。”胖巡士站了起来，却不愿坐下。

朱松寿朝吴子卿瞥了一眼，就带着胖巡士向屋里走去。

原来，胖巡士在第一次后塍暴动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朱松寿缴了武器，被公安分局的一个小头目发现，农暴失败后，遭到揭发。那时，国民党江阴当局一手镇压参加暴动的赤色群众，不惜错杀千人，不肯放过一个；一手清洗内部同情暴动农民的不坚定分子。胖巡士立即被捕，打入大牢，随时都会丢掉脑袋。为了保住生命，靠经商发了财的父亲忍痛从藏在地底下的罐头里挖出白花花亮铮铮的银元，成百地往县党部和公安局的衙门送去。当他家里被榨取得一文不剩的时候，胖巡士才从牢里放出，后塍公安分局自然不要他了。父亲因为他葬送了全家的积蓄，冷言冷语冷面冷常给他受。他那里忍受得了？病了一年多才慢慢恢复了元气。后来他也走上了一条从商的道路，几年经营也有了一些积蓄。眼看家庭复苏，胖巡士脸上有了笑容，父亲也改变了原先冷待的态度。

1937年12月初，江阴沦于敌手，胖巡士是受过牢狱之苦的人，不想在战乱之际再惹祸水，严令一家人闭门不出。这时他父母已逝，一个独养儿子在沦陷前刚刚结婚，媳妇是城内一个读书人家的女儿，生得俏丽贤淑，颇有才华，小夫妻十分恩爱。胖巡士却生出一份忧愁——如此花玉一般的新娘，不被鬼子发现则已，一旦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阴历年底的一日傍晚，有几个鬼子喝得醉醺醺地出来找大姑娘，他的媳妇正在屋边的井里打水，不幸被鬼子看见。鬼子像饿豹发现小白兔般地追逐过去，媳妇返身往家里逃去，鬼子砸破大门直冲进屋，抓住她就按倒在地。鬼子来不及解开她纽扣，用刺刀挑破上衣和裤子，露出霜雪一般的肌肤。媳妇绝望地大声呼救，胖巡士的儿子抢过一把菜刀，从屋里赶出来，向压在妻子身上的鬼子头上砍去。另一名鬼子见状立即抽出军刀，向他拦腰一刀，儿子惨叫一声，跌倒在血泊中。妻子看见丈夫被鬼子杀死，向

鬼子的脸上狠咬一口，受伤的鬼子从媳妇身上滚下来，抓住丢在地上的刺刀，向她的腹部猛刺，并向上挑去，可怜媳妇胸腹全被剖开，地上殷红一片。正从屋里冲出来的胖巡士看到这副惨景，无法支持，昏厥倒地。几天后，他安葬了儿子和媳妇，准备冲进驻在县城高巷吴家的日军警备队部拼命，冷静一想，这是白白地往虎口里送去一条性命。这时他听说长寿朱松寿出头组织抗日游击队，心里一动，就奔星追月般地赶到朱家巷来了。

“如果朱司令对10年前后滕法水庵那一件不愉快的事不再计较的话，那么，请收下我吧，我愿意把这腔热血洒在抗日的前沿阵地上。”胖巡士叙述完自己的遭遇，两颗暴突的眼珠子喷射着灼人的火焰，如果面前站着一个鬼子，他会用十根钢铁般的手指把敌人活活地卡死。

“阿胖，你就别提法水庵的那件事了，现在鬼子蹂躏乡里，玉石俱焚，我们应该同心同德，杀敌报国，也为自己惨死的亲人报仇。”朱松寿为胖巡士的坎坷命运愤愤不平，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当然，我们不但需要誓言，更需要在战场上的行动。”

这时，外面砖场上站满了人，要见朱松寿，其中大多是当年的农暴战友，也有慕名来一睹丰采的，有趁机吃一顿丰盛丧宴的，有难民想请朱松寿安置的，有商人想得到朱松寿抗日游击队保护的，各色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动机。如果朱松寿能吸引住这些人，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游击队来，那么，这比一个一个地去动员劝说好得多，也更有声势，更有气魄，更能震撼人的心灵。这就是吴子卿为朱松寿出的计策，在母亲的落葬仪式上做足文章，鬼子不会过多猜疑，四乡的群众也可放心地前来看个热闹。朱松寿早就备足酒菜，不论是谁，一律招待。砖场上人声沸腾，自沦陷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热气腾腾的群众聚会的场面。

突然，砖场上拥挤拥挤的人群鸦雀无声，眼光一齐向从村口走来的一个人身上扫去。朱松寿顺着众人的眼光看去，见是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头戴一顶青褐色皮帽子，两块绒毛很长的遮耳毛皮像猪耳朵似的耷拉在两边，身穿一身黑色毛料制成的呢袍子，又粗又短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用白羊毛编织成的围巾，两粒细小的眼珠子藏在一副讲究的金丝眼镜的后面，一闪一闪地向砖场上的人群瞅着。他的左手腕上躲着一只毛色油亮的鹰，右手夹着一支纸烟，高傲地挺着头，一步一摇地向朱松寿身边走来。他的身后，紧跟着二三个随从。

气氛陡地紧张起来，像是羊群中突然出现了一只狼，是团结起来把它打死呢，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它把其中的一只或几只羊咬死拖走呢？人们的眼光迅速地从来者的身上转移到朱松寿这边，因为事态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朱的身上，他的一句话，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色都可以把来者包括随从们打成肉泥。

朱松寿的心猛地紧缩起来，血液在全身汹涌澎湃地奔流，呼吸也急促得使他觉得有点儿难受。10年来，他梦中都想得到的这个江阴农民暴动的仇敌也是自己的宿敌走到朱家巷来了，他好像隐隐地听到孙逊群、钱振标、蒋云、茅学勤、陈叔璇在此起彼伏地呼喊；“朱松寿，你快抓住他，他的身上沾满着革命烈士的鲜血，今天，要用他的血来偿还！”朱松寿竭力镇静着自己，可是没用，他的母亲在哭泣，钱大妹在呻吟，周阿桑在申诉，连刘三妹也在指着这个人的脊梁骨大声斥骂……

1928年4月，朱松寿和蒋云接到江苏省委的通知离开江阴到了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莫斯科的银色别墅，陈祥安以为朱松寿潜逃在外，就准备捣毁朱家大院。有人提醒说：农民暴动的力量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如果拆房激怒了农民，发动长寿暴动，岂非因小失大？陈祥安才答应延缓一段时间。到了这年的6月，陈祥安再也等不住了，就亲自带领长寿自卫团，四周架着枪支，逼令朱家巷农民全部动手拆毁朱家大院。这时正值农忙时节，农民们都在田里灌水插秧，那个愿意去做反动派的帮凶？这个农民被团丁拉上了岸，那个农民又下田去了。陈祥安恼羞成怒，亲自赶到田间，向空中打了三枪，声言谁不上岸谁就是农民暴动的同情支持者，要与共匪同罪。农民们迫于重压，不得不一个个上了岸，带着满腿泥浆，心情沉重地向朱家大院走去。

朱老太太听见外面人声嘈杂，提着一双三寸金莲，走出院子，看见陈祥安撑着一把黑阳伞，正指挥团丁和农民爬上屋去，揭着瓦片，知道大祸就要临头，自己是一个孤老婆子，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阻挡得住？儿子、媳妇又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这座三进两院堂的好端端的大院毁于今日，日后松寿官回到朱家巷如何生活？自己死后如何去见丈夫文魁的面？她像中了邪似地双膝跪倒地上，像当年在毗山大王庙向观音菩萨求子一样地叩着响头，直到额头撞破，殷红的血沿着她核桃壳般凸凸凹凹的脸向下流着，她仍毫不松懈地叩着……

这时，刘三妹带着女儿朱露英也出来了，看到虎狼般凶恶的陈祥安

和满脸鲜血的朱老太太，一切都明白了。虽然她对朱松寿不无情绪和意见，不过那是爱情上的矛盾，自从毗山水墩庵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以后，她也就死了这条心，只指望能够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现在，她看着屋上的瓦片一张一张地揭去，被粗暴地掷成碎片，就像自己身上的皮被一块一块地剥去，她痛苦地



大哭起来，拉着女儿的手，一齐跪倒在陈祥安的面前。

闻讯赶回朱家巷的朱老太太的4个女儿，有3个跪伏在陈祥安脚下，只有一个不跪，那就是嫁在云亭季庄的三女儿。她把快要昏迷过去的老母亲搀扶起来，又劝刘三妹和朱露英不要再白白地向仇人叩求了，咬铁嚼钢地狠狠说道：“拆吧，让陈先生统统都拆去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朱家有能耐，今后还可以再建造。我兄弟最恨没骨气地向别人求饶，要知道，光靠叩头是叩不出房子来的。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陈先生如果不把退路堵死，总会留几间让你们住的。如果他把事情做绝，那么，就让他统统都拆去吧！”

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听了她这一番激昂慷慨的话，都从地上爬了起来，愤怒地围着陈祥安，一个个都要扑上去拼命。屋上拆房的农民也大半回到地上，不肯动手。陈祥安恐众怒难犯，才下令给朱老太太和刘三妹母女留下6间正房和2间原为长工们居住的侧厢，其余的仍限期拆毁。这一场冲突，把原本胆子很小的刘三妹折磨得一病不起，两年后病情加重。1931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29日）晚上，她把女儿朱露英叫到床前，摘下一只金戒指和一副金环子，塞到露英小手里，嘱咐说：“你还小，这两样东西要交给你的舅婆保管。”又向露英要了一根竹竿，艰难地从床

朱露英是朱松寿和前妻刘三妹的亲生女儿，1990年4月接受本书作者之一徐泉法采访时，回忆了她父母亲大量生平资料。1996年9月不幸逝世。（徐永琴 提供）

上爬了起来，颤颤巍巍地向室外走去，又嘱咐说：“你在家等着，我去烧茶给你吃。”不一会工夫，村上的狗都叫了起来，邻居知道出了事，到处寻找刘三妹，朱老太太也要出去，被人拦住了。很快，邻居们在村前的一条小河沟里找到了三妹的尸体，因为河里没有水，三妹把头深埋泥浆里活活闷死了。朱老太太抱着尸体恸哭，露英也哭，整个屋里都是哭声一片。第二天，季庄的朱松寿三姐回来帮着办理了刘三妹的丧事。这一年，刘三妹33岁，朱露英才9岁。

刘三妹死后的第二年，朱老太太也染病躺倒床上。一日黄昏，房间里点起了一盏小棉油灯，昏黄的灯光弥散开来。老人拉着三女儿的手，涕泪横流：“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呢？”老太太止住哭声，想在这个最贴心的三女儿面前说说心中老是憋着的话：“没有儿子的时候，受尽了你爷爷奶奶和你爸爸的白眼。以后到毗山大王庙观音菩萨面前求来了你的弟弟松寿官，他小的时候，愈调皮愈觉得可爱，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可是后来就不可爱了，参加了造反，我整天提心吊胆。”

老人说得多了，直喘粗气，脸上涌起一片潮红，三女儿连忙为她捶背，递过去一碗温开水，帮她喝了两口。“妈，你有话就留着以后慢慢说吧。”三女儿劝慰着母亲。

“后来，松寿官带着你嫂嫂、侄儿逃到外面去了，三进两院堂房子也给人家拆去了，田地也充了公，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给松寿官败掉了。”朱老太太猛烈地咳嗽起来，脸上蒙上了灰暗的色彩，嘴角在抽搐着，三女儿知道母亲不行了，也就不再劝阻，任老人断断续续地说下去。

“现在，我老了，松寿官也不回来看看妈妈。他要了什么共产主义，连娘也不要了，家也丢了。”老太太临终前看不到儿子，人生最后的欲望没有满足，不甘心闭眼。

外面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弥留之际的朱老太太以为儿子赶回来了，挣扎着要坐起来，三女儿听声音不对头，连忙把她劝住，自己走出房间看个究竟。这时大门已经砸开，第一个冲进来的是戴金丝眼镜的陈祥安，声言要抓朱松寿。三女儿急忙低声告诉他，弟弟不在家，妈妈快要死了，千万不要去惊动老人。陈祥安冷笑一声说：“这就对了，娘要死，做儿子的哪有不回来送终之理？”

三女儿遮挡不住，陈祥安已经闯进幽暗的房间，见朱老太太坐在床上，厉声喝问道：“快把你儿子交出来，否则把你这老太婆抓去抵押！”

朱老太太仰着头，盯着陈祥安，似乎在辨认是不是自己的儿子松寿官。

“不要装死，不交出朱松寿，我一把大火把这三间房子烧成灰烬！”陈祥安沉不住气，咆哮起来。

朱老太太还是仰着头，没有任何反应。陈祥安气得暴跳如雷，心想你一个快要进入棺材的死老婆子也敢蔑视我，一步冲上去，抓住老人一只拐杖般粗细的胳膊，用劲往外一提，可怜老人久卧病床，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被陈祥安摔到地上，仍保持着仰卧的姿势，一动不动。

三女儿看到母亲这般模样，像疯了似地扑到老人的身上，呼天抢地大放悲声——原来，当朱老太太满怀希望想最后看上儿子一面的时候，冲进她房间的竟是儿子的仇人，也是她的仇人——陈祥安，失望、痛苦、愤恨像三条毒蛇一齐向她袭击，她终于离开了这个像她的病房一样昏暗的世间。

陈祥安见朱老太太已死，就命令他带来的长寿自卫团丁里里外外地搜寻朱松寿，闹了半夜，没有结果。朱家巷的村邻过了很久，才知道陈祥安下乡抓人的原委——这天下午，吴巷里有一个吴姓农民，同朱松寿是至交，听说朱母病重，前来探望。眼线以为是朱松寿回家探母，报告了陈祥安，陈祥安就带了30多个自卫团丁，下乡抓人。

几天后，朱老太太出殡的时候，陈祥安还派来了自卫团，准备捕捉朱松寿。不拔除肉中的这根刺，不摘去眼里的这根钉，陈祥安食之无味，寝之不安，色之不悦！

……

陈祥安万万想不到朱松寿仍活着回到长寿，而且，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已经失去了带着自卫团下乡抓人的气候和条件了。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克江阴前夕，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县政府、县公安局以及大大小小的机构的官员，都逃之一空，国民党军队也撤得不剩一兵一卒，就连他一手经营的长寿自卫团也作鸟兽散。相反，朱松寿的势力却与日俱增，不只是当年参加暴动的农民革命军、共产党员都支持他，就是一些因日军的到来在安全与财产上受到威胁的商人、地主、知识分子都主动向他靠拢。因此，现在的局势与10年前正好颠了个倒，只要朱松寿记着那些仇恨，就随时可以带着一二百农民冲进他家的府邸，把他抓去千刀万剐。他曾经有计划逃到外地去生活，可是丢下这数百亩田地和农民暴动后新造的一座小洋房又心中不甘。

过了旧历新年，陈祥安听说朱松寿要为数年前死去的母亲落葬，心里一动，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应该亲自去走一趟。在这种场合，朱松寿不会为难他。虽然自己有失身份，但是，这恰恰是成就大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素质。你心里恨着一个人，表面上一丝儿不能流露，还常常请吃请喝，称兄道弟，一旦抓住时机，就拼命地往死里整，毫不怜惜。人被你整死了，还得去隆重吊丧，抚棺痛哭，局外人看不出一点儿蛛丝马迹。这才是真本事。为了表示诚意，他买了两条高级丝绸被面，写了斗大的两个“奠”字，又置上陈祥安的名字，作为挽幛，叫随从带着。

“朱司令久违了，一向可好？”陈祥安欠了欠身子，与朱松寿见了面。

“承蒙陈先生把朱某时刻牵挂在心，老母病重之际，先生亲自探望，这一恩德，不会轻易遗忘。”朱松寿站起来，也欠了欠身子。

“小弟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以前素有冒犯，万请恕罪。现在日寇入侵，生灵涂炭，吾等理应共商抗日大事，过去之事，大可不必再提，朱司令以为如何？”陈祥安巧舌如簧，以守为攻。

“朱某昔日之所为，亦非为一己之私利。陈先生屡屡逼迫，我亦不记往心里去。如以先生之气量，朱某本可将先生抓来朱家巷，让你也尝一尝灌火油、烙生殖器之滋味。朱某抛却旧冤，意欲团结志士仁人共同抗日，未知先生意下如何？”朱松寿两道利剑般锋利的目光停留在陈祥安发烧似的胖脸上。

“对、对，国难当头，抗日第一，朱司令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组织抗日游击队，这是功垂千秋之大业，令人钦佩之至。如果司令不计前嫌，我陈祥安也算一个，虽不能上阵杀敌，还可帮着谋划；陈家虽称不上万贯家私，但也积聚几个小钱，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嘛。”陈祥安擦着额角的汗珠，虚情假意地说着。

朱松寿深知陈祥安不会真心抗日，只是为了让各镇的地主、豪绅、国民党官员等上层分子，知道自己并不计较10年前的旧账，就连陈祥安这样的死对头都能宽容，从而吸引各界人士都投到他的旗帜下共同抗日。因此，他认真地点了头。陈祥安像判了死刑突然遇到大赦一般，连连称是，向后退去，忽又想起所带挽幛，忙向随从要过礼品，当众向朱松寿呈上。朱松寿知道，收下陈祥安的东西，不只是母亲在地下不会安宁，而且必然冷落了许许多多真心抗日的群众，于是大声说道：

“陈先生，母亲逝世多年，用不到过重的礼节。目前难民甚多，你就

把这份礼物转赠给难民收容所吧，未知尊意如何？”

“那就不必了。”陈祥安急忙收回丝质被面，“我家里正要添置新被，这些东西用得着。”

场上的群众目睹这一幕，脸上无不露出鄙夷之神色。

快要吃中饭了，朱松寿命人在砖场上摆开桌面，按照实际人数，约有80余桌，而所准备之酒菜，不过50余桌，正在为难之际，村南拥来一群难民，携老带小，不下100余人。朱家巷的农民急忙拦住难民，不许他们入内。难民哪里肯依，双方冲突起来，有几个难民带来的小孩，跌倒在地，哇哇啼哭。朱松寿听得争吵声，赶到村边，一问情况，当机立断，难民全部入席，所缺酒菜，立即派人筹办。难民感动得纷纷落泪。

午后两点，100余桌酒席同时摆开，大部集中在朱家的砖场上，小部分散到邻居场上。朱松寿一身白衣白裤，头戴白帽，足穿白鞋，站在场子中央，端起一碗烈性高粱烧酒，两目炯炯地看着大家，朗声说道：

“我提议，这第一碗白酒，敬献给在江阴战场上抵抗日军入侵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们，以及被侵略军残酷杀害的无辜群众。我的这一身衣服，首先是为他们穿的。”

说毕，把酒庄重地泼在他所坐桌子的四周。砖场上所有的人都学着他的样子，把酒洒到地上。

“乡亲们，同胞们，大家都知道我朱松寿今天为母亲落葬。不错，我母亲在几年前逝世，而且死的时候也不得安宁，有人趁危做着很缺德的事情。”他说到这里，砖场上大部分人的眼光都落到陈祥安的身上，陈祥安把皮帽子拉向眉际，低着头只顾吃着酒菜，并不理会众人的反应。

“这些往事，乡亲们都知道，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已经过去的事再纠缠下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日本侵略军的刺刀已经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只要鬼子什么时候这么一抹，我们都会成为新鬼。”他很自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当前沦陷后的时局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应有态度上去了。

“我想，我们与其被鬼子的刺刀抹死、挑死，不如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把敌人杀死，劈死！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像长寿镇上的陈祥安先生，他就愿意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敌人斗争。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都能昂起头来，走上抗日的前沿阵地。”朱松寿停下话头，目光落向附近桌子上吃酒人的脸上。

“我们难民携家带小，奔东走西，朱司令肯收下我们吗？”一个难民站起来，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我要告诉难民兄弟们，你们不要为生活为孩子为老人去发愁，我们准备在朱家巷、十八亩桥等村子举办难民收容所，解决你们目前的衣食住行问题，腾出手来打鬼子，行吗？”朱松寿离开自己的桌子，向难民集中坐的桌子附近走去。

“行呀！”不少难民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朱松寿这次借为母亲落葬，鼓动群众起来抗日，是成功的。参加这次葬礼的800多人中，当场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壮年愿意参加朱松寿发起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暂时不愿参加的人中，对朱松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深表钦佩，打算在道义和经济上支持朱松寿抗日。也有少数人私下以为朱松寿难以担当此大业。而陈祥安此行的全部目的，就是缓和与这位10年前的老冤家，现在正在走红的抗日司令的矛盾，日后双方力量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仍不会放过朱松寿，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

人们边吃酒边议论。一时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一些年轻人恨不得立即就干。正热情高涨之时，从季庄方向飞奔过来一个年轻农民，大汗淋漓地冲到朱松寿身边，断断续续地报告说：“季庄方向发现有两个鬼子，骑着高头大洋马，正向这边飞驰而来。”

砖场上立刻出现了恐惧的尖叫声，有一人顺势钻到了桌子底下，以为桌面可以抵挡子弹，保护他宝贵的生命。

第四节 轻取敌枪

朱松寿低头一看，躲在桌子底下的就是刚才唇枪舌剑较量过的陈祥安。由于陈的过度惊慌，加剧了丧宴的混乱，心中对其十分鄙视与厌恶。他“啪”地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各位乡亲和同胞，大家不必惊慌。对今天的安全，我早在前几天就做过周密考虑，在岷山和其他主要路口，都设了伏兵，就是打起仗来，战场也不会在这里。”

大家听朱松寿这么一说，都镇静下来，各自回到座位上，继续喝酒。陈祥安钻在桌子下面，知道没事，一头钻了出来，拍拍呢质长袍上的尘

土，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自嘲地说：

“朱司令的酒果然厉害。我陈某平日以豪饮闻名于长寿，今天才喝了第二杯，就醉得不能自己。见笑，见笑。”

“恐怕不是酒厉害，而是鬼子厉害。”坐在陈祥安邻桌吃酒的余炳德揶揄地说，“如果见到鬼子，我想陈先生不吃酒也会醉的。”

“这是哪里话？”陈祥安见一年轻后生当众挖苦他，觉得有损自己的名誉，不挽回损失，日后如何在地方继续称王称霸？“江阴素有忠义之邦之称，对外敌入侵一向同心协力抵抗之。明末清初，以江阴孤城之力，尚能抗清81天，虽全城被屠而不悔。去年县城新陷，以章星白为首的杜康巷红十字江阴分会11位工作同志宁可遭鬼子枪杀，也不愿出面组织维持会。江阴人民自古忠烈，难道唯我陈祥安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吗？”

朱松寿听了这一番酸溜溜的话，心中暗忖，像陈祥安这一类人，要嘴皮子是英雄，搞阴谋诡计是好汉，搬弄是非生机勃勃，要叫他们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实干，就是狗熊和软骨虫了。这些人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如果不加以防范，必然会干出拉帮结派，分化离间，腐蚀抗日队伍的丑事来。于是顺着陈祥安的话借题发挥说：“陈先生说得对，江阴人民自古以来都是忠烈好汉，哪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在这块土地上横行？不过，我们不只要说得响亮，更要紧的是干得漂亮！不只是一个人要干得好，还要团结全乡全县的人民一起去干！”

陈祥安听出朱松寿的话是针对他的，站起来正要回敬几句，看见又有一人从村西飞奔而来，知道一定又是为鬼子袭击的事，这里不可久留，不如趁早离开。才走出村子一两条田岸，听见朱家巷的大砖场上欢声雷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不便转回，只得带着一肚子的狐疑回长寿去了。

原来江阴城里的鬼子听得汉奸的报告，知道朱松寿为母亲落葬聚集了数百人，担心趁机攻击日军，派出两个士兵，骑了两匹高头大洋马，向朱家巷奔来。由于路途不熟，经过云亭季庄时，走进了一个弯兜，一条河流拦住去路。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一座小木桥，一块窄窄的木板横在河面上。两个鬼子在马上狠抽一鞭，企图逼迫它们窜过桥去。可是，这两匹马望桥生畏，不肯过去，鬼子逼得又急，就“扑通”一声跳入河中。潜伏在附近的几名抗日游击队员立即冲杀出来，向河中射击。一名鬼子以马作为屏障，在水上还击，游击队员就将马和鬼子一起打死。另一个鬼子丢下马匹，潜水到河边，刚探出头来，就被岸上的游击队员一

枪打死。消灭了敌人，他们跳下冰凉的河水，擒住了那匹马，摘下两支枪，胜利返归。一个游击队员飞奔着跑到朱家巷，向朱松寿报告了喜讯，场上吃酒的人都欢腾起来。

片刻工夫，几个游击队员牵着一匹大白马，背着两支乌黑的长枪，走到人群中间，大家争着围过来观看。朱松寿要各位继续吃酒，余炳德摸着枪支，恋恋不舍，不肯退去。

“乡亲们，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干下去，我们还可以缴到更多的枪，夺回更多的马，打死更多的鬼子，鬼子也就不敢小看我们！”

这时从村边走来两个身穿重孝的妇女，靠到朱松寿的身边。只听一个年龄稍大的低声说：“松寿官，今天花了这么多钱，为妈落葬，你一天到晚在场上同人说话、喝酒，妈的坟地你也没有去看一看。妈就生你一个儿子，你没有为妈送终，这也怪不得你。现在，妈的棺木就要放进墓穴里去了，你是不是去看看妈的棺木，就算尽了一份孝心，妈在地下也会高兴的。”说着，就落下泪来。

“大姐，”朱松寿安慰道，“你不要为妈难过了，你看见过谁家出殡落葬，有七八百人围聚一起热热闹闹的？妈如果在天有灵，她也会满足的了。再说现在国难临头，是活人重要还是死人重要？人们都希望我出头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鬼子，保卫家乡，这样的重任在肩，我如何还能脱出身来去看望母亲的灵柩，如果妈知道我为了大家的事忙不过来，也不会计较的。再说，有你们四位姐姐在坟地上照料着，妈也不会觉得寂寞的了。”“松寿官说得也挺有道理，”随大姐一起来的三姐说，“办事都得看什么时候。弟弟为了抗日救国，哪顾得上照看妈的事？我们回去对着妈的棺木说明情况就是了。妈生前最喜欢松寿官，死后也不会生气的。”

太阳西斜，朱家巷砖场上的丧宴还没有散席，直到暮色苍茫的时候，大家才依依不舍地与朱松寿告别。朱松寿让吴子卿、余炳德以及吴子卿的那位形影不离的公子留了下来，商量抗日大事。

1938年春节前后，朱松寿的抗日游击队还处在初创阶段，既需要大力扩充部队，又迫切需要培养干部和充实武器。吴子卿推荐余炳德担任警卫班班长，筹建一支短枪队，平时做警卫和搜集情报的工作，战时充任战斗队。余炳德也不推辞，欣然答应，想起十八亩桥有个叫张厚生的年轻农民，读过私塾，颇有心计，又喜交际，可以协助朱松寿做后勤经济

工作，筹集军饷。

“我要搞一批武器，”朱松寿因为母亲落葬仪式扩大了影响，情绪挺高涨，“目前武器少，我们还不能编队和训练。打鬼子同当年搞农民暴动不一样，现在的敌人是外国侵略者，敌人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武器精良，我们成千成万的人扑上去，敌人机枪一响，都得倒下去。事实上，当年农暴的失败，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武器不足。武器哪里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现在武器的来源，同1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吴子卿挺有把握地说，“去年11月底，国民党广东军156师一部在长寿附近曾同敌人打过一仗，双方各有死伤。鬼子临走时把战死的同伴全部焚化了，留着国民党军队的尸体无人问讯。我拉了几个帮手去掩埋尸体，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弹药遍地都是。我当时想得浅，不敢要。但是，这些散落的武器不会飞走，一定还在老百姓的手里，有的可能被丢到河里、井里、乱草丛里。我们想个办法，可以得到很多武器。”

坐在吴子卿旁边那个英俊而又妩媚的吴增颖，低着头做着记录。余炳德瞥了他一眼，见吴增颖没有反应，也就集中注意力想那枪支弹药去了。吴子卿的话给了他启发，他眯了眯两颗偏小的然而十分明亮有神的眼睛，对朱松寿、吴子卿等人说道：“既然国民党军队在长寿一带丢下不少武器，那么，在常熟、无锡以及整个江阴城乡也一定会有许多武器散落在那里。我们何不暗中做个宣传，交来一支枪，给多少钱，自然有人乐意做这样的事。”

正商量着，坐月子的杨绮云端出来几碗热气腾腾的团子，要大家聊作充饥。吴子卿看到朱松寿的几个孩子除大儿子鸿坤外，都在身边，出于爱护，对朱松寿说道：“如果我们得到较多武器，队伍就要拉出来作战，你我的影响一定会传出去，鬼子、汉奸岂肯放过我们？我建议等杨绮云满月以后，请她把孩子送往外地亲戚家去，这样既有利于孩子不受鬼子威胁，又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你们以为怎样？”

这话说到朱、杨夫妇心里去了。只是从镇江回到江阴以后，每天都像打仗一般地过日子，这些事还排不到日程上去。经三先生一提醒，他们才着急起来。过了一段时间，由杨绮云带着，包括那个诞生不久的小秀芬，到了上海，托人照料。安排妥当，杨绮云又乘船回到长寿，协助丈夫工作。

当晚，朱松寿汇集了各人的建议，采用购买、搜集和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等多种办法，以解决武器问题。讨论结束，几人一起走出屋外，忽听得一声长啸，朱松寿吃了一惊，猛然想起白天缴获的那匹马，关在朱家巷的一家牛棚里，何不趁着星光试骑一下呢？他让吴子卿等人在旁边站着，自己钻进牛棚，解下缰绳，翻身上马，轻扬一鞭，那匹东洋大白马就撒开四蹄奔跑起来。也许马通人性，它知道跨在自己背上的并不是原来熟悉的主人，不甘心任其驾驭，在猛跑一段距离后，突然收步，企图把背上的陌生人甩下地来。朱松寿在莫斯科银色别墅受过严格的骑马训练，虽然时隔10年，却并未荒疏。当即夹紧马背，猛抓马鬃，稳稳地坐在马背上。

那马没有得逞，又改变了花样，蹲伏躺倒地上，接连翻着滚儿，想压死朱松寿。朱松寿早有防备，当马蹲下的时候，早已跳下马背，握紧缰绳。当大白马明白此招已经失灵的时候，干脆躺着不肯起来。朱松寿出其不意地跨上马背，猛抽一鞭，马受到强烈的刺激，腾地跃起，像一团白色的烟雾滚滚而去……

吴子卿、余炳德和吴增颖等人，远远站着，看见朱松寿制服白马，禁不住叫起好来。过了几分钟，白马回到朱家巷，缓缓地停下，朱松寿从马背上跳下来，余炳德跃跃欲试，朱松寿笑笑说：“让马也歇歇吧，今天它受的刺激也够多的了。日后有机会，我一定让你骑个痛快！”

第二天，有一个周庄农民，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绑着两大捆甘蔗，他却以种种借口，并不肯出手货色。独轮车推到朱家巷，他的叫卖声喊得更响了。朱松寿正与杨绮云说着昨天落葬仪式上的事，听得叫声，觉得好生耳熟，急忙走出门来，见是一个卖甘蔗的农民，穿得破破烂烂，头上的旧毡帽压到眉毛上，看上去似乎在哪里见过，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买5根甘蔗，一个孩子一根，让他们新年煞个嘴馋。”朱松寿要杨绮云进屋去取钱。

“秀芬生下还未满月，少买一根吧。”杨绮云接着说。

“5根不卖。”卖甘蔗的推车要走。

“你多少才能成交呢？”朱松寿不解地问。

“两捆一起买去，才能成交。”

“那好，我就买你两捆。多少钱一捆呢？”

“你看看货色再出钱吧。”

卖甘蔗的帮着解下甘蔗，与朱松寿一人一捆抱进屋里。“好沉。”朱松寿心里犯着疑，知道这甘蔗里边一定有着蹊跷。他轻轻放下，松开密密匝匝的绳子，5根乌黑发亮的长枪裹在甘蔗里边。打开另一捆，也是如此。

“你是……”朱松寿惊喜参半。

“我是……”卖甘蔗的一把扯下旧毡帽，脱下破棉袄。“我是谁，该不会不相识吧？”

“承小纹！”朱松寿在对方的厚实肩膀上狠狠地砸了一拳，“想不到10年后我们都还健在，只是彼此苍老了许多。怎么，昨天我为母亲落葬，你没有来？这10支长枪，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要多少钱？”

“你是孝子，为母亲办理后事，这是人之常情，虽兵荒马乱也不能免也。”承小纹诡谲地一笑，“不过，你能瞒住别人，可瞒不住我。煽动群众跟你打鬼子，这才是你昨天那件大事的实质。我当然要来，就是为了那两捆啃不动的甘蔗。”

承小纹叙述说，他听一个老人说过，鬼子进攻定山的时候，国民党的103师一部凭着山险作了英勇的抗击，一连打了几天几夜。有一个叫夏民安的连长，丢了阵地，带着残兵去见他的上司。上司暴跳如雷，要将这个连长就地正法。经别人劝解，才准许他戴罪夺回阵地。夏民安没有了退路，只得率领士兵反攻山头，经过一场苦战，阵地是夺回来了，连长和大部分士兵都英勇牺牲了。战斗结束后，老人就在傍晚时分，从一具具尸体上摘下枪支，丢进定山脚下的一条溪水里。先后拾到几十支长枪，后来被人知道了秘密，大部分被偷偷地摸走了。昨天，承小纹喝了两瓶烧酒，跳进结着薄冰的溪水里，捞了半天，才摸到这10支长枪。白天挑着送来太露眼，才装进甘蔗里，推着独轮车送到了朱家巷。

朱松寿收起枪支，从屋里取出一笔钱，塞到承小纹的衣袋里，坦率地说：“我知道你冒着彻骨寒冷，去打捞枪支，完全是为着打鬼子，你把枪送来，这就是最好的见面礼。你自然可留下来和我一起谋事。不过，这些钱你还是要收下，一则下水捞枪太伤身体，应该滋补滋补；二则你家里一向困难，你出来抗日，也要有个安排；三则那个到山上收拾枪支的有心老汉你也应该给他几个钱，表表心意。”

承小纹在农暴期间曾经将捐到的款子占为私有，被茅学勤批评过，朱松寿为此对他一度失去了信任。在朱松寿急需枪支弹药打鬼子的时候

候，承小纹送来了10支崭新的长枪，朱松寿把原来心中对他的不满驱赶到爪哇国里去了，不久即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

朱松寿并不满足这些零打碎敲，朝思暮想要从鬼子里直接夺取一批武器，只是他的游击队初成雏形，还没有力量与敌人正面作战，武器自然也搞不到。再说与鬼子硬拼打消耗战，会挫伤游击队的自信心，这对巩固和发展队伍不利。他想呀，等呀，这一天终于来了机会——

江阴南城门，一边站着一个鬼子，端着长枪，在中国的国土上威严地检查着进进出出的中国公民。人们手里捏着良民证，惶惶诚恐地走近鬼子的身边，像向大王庙里的菩萨一样深深地鞠躬。当鬼子检查完毕，认为对他们没有威胁的时候，用手一挥，人们才可以进城或出城。想不到江阴人民历经数十代建筑起来赖以抵御外敌的古城墙，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成了日本侵略军奴役自己的工具。

有姑嫂两人结伴向城外去看望患重病的亲戚，走过南城门的时候，鬼子看过了她们的良民证，可是却不放她们出城。

“你的假的良民。”一个鬼子抓住了那个姑娘，满脸堆起了邪恶的淫笑，“你的身上藏了炸弹的没有？让我检查检查的！”

“没有，太君，我身上什么都没有！”那个姑娘慌了，差点哭了起来。

“那高高挺立着的，”鬼子比划着指了指姑娘丰满的前胸，“不是炸弹又是什么？”说着，伸出毛茸茸的手，从姑娘的腰际插了进去，在里面掏摸着。

“啪！”那个姑娘漂亮的脸蛋涨得通红，狠狠地给了鬼子一记耳光。鬼子遭到突然的袭击，一时愣在那儿。姑娘发疯一般地向前飞奔着，刚走出几步，鬼子端起长枪，“砰”的一声，那个姑娘应声倒地。

嫂嫂丢下手中的一盒礼品，扑向血泊中的姑娘，呼天抢地悲号起来。另一个鬼子冲过去，用刺刀猛戳她的身体，只听得凄厉的一声大叫，她的手和脚痛苦地抽搐着，不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

南城门的这两个鬼子，用他们罪恶的武器，杀死了两个善良美丽的的女性，回到岗位上，嘻嘻地笑着，用叽里呱啦的日语交换着侮辱和杀戮中国妇女的感受。

他们抬起头来，看见不远的地方正走来七八个农民，为首的一个长得十分结实魁伟，由于过于顾长，脊背似乎有些微驼。其余的都带着扁担、麻袋一类东西，似乎是挑运粮食一类的脚夫。他们注目着还没有完

全僵硬、正淌着热血的两具女尸，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向两个鬼子靠拢过来。

鬼子倒抽了一口冷气，害怕刚才的暴行激怒了这群壮实如牛的种田人，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枪尖上的刺刀在苍白的太阳光下发出寒冷的青光。

那个脊背有些微驼的高个子农民挺了挺腰，向站岗的鬼子一步步逼近。一场针尖对麦芒般的冲突，眼看无法避免的了。

可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两名鬼子像见到日本天皇似的肃然起敬起来，双脚“啪”的一声立得笔直，原本冲着农民的长枪立即调换了方向，枪尖朝天，双手握枪，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两眼平视，目光中透露出温和、恭敬、肃穆的神色，向农民们行了一个军礼。

脊背微驼的中年农民向鬼子微微点了点头，作为还礼，向后面的农民招了招手，就昂首挺胸地通过了南城门。

站岗的鬼子紧张的神情马上松弛下来，他们为这一群有来头的农民没有因为目睹惨杀两个女同胞滋衅闹事而感到得意。看着这一群人向城里走去，鬼子吹胡子瞪眼睛又恢复了豺狼一般的本性，向进出城门的中国同胞作威作福起来。

这个伟岸高大而脊背微驼的中年农民正是朱松寿。他和他的游击队员们有什么魔法能如此受到鬼子的敬重顺利进城呢？原来，朱松寿得到了一个“宝贝”——

几天前，朱松寿带着余炳德一行人住在长寿泗河口村，动员群众把收集到的枪支弹药交给抗日游击队使用。有个叫徐根生的农民对朱松寿说：“有个宝贝，你如果得到它，何愁没有枪支弹药？”

“是埋在毗山底下的那对玉鹁鸽？还是金车银轴？”朱松寿想起大王庙里老和尚讲过的神话，开着玩笑说。

“不是玉鹁鸽，也不是金车银轴。”徐根生说，“它只是一条布带儿，用它换糖，还得不到一根糖棍儿，可是，在鬼子面前，它很有分量……”

朱松寿收敛起笑容，认真地听着这个“宝贝”的由来。

原来，泗河口汤洪翔父子为了保护村子不受日军烧杀抢掠之灾，去年11月底，当鬼子前锋部队进村时，忍辱负重地带着8个村民到村口跪接鬼子。鬼子进村后，又让汤氏父子领着，挨家挨户地搜查，所得酒、鸡、蛋尽数被鬼子带去。这队鬼子自进入江阴境内，第一次遇到这样温和顺

从的农民，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个江阴人都应该做这样的“好良民”。当鬼子撤走的时候，一个军官从衣袋里取出一段白布，别在汤洪翔的左手衣袖上。汤洪翔低头一看，见白布上印着一个血红的太阳旗，下面是一行黑色小字：日本×师团第五派系军要太郎。军官嘱咐说：以后如有日军进村，只要把这段白布挂在门前，就会受到保护。遇事进城，把白布别在衣袖上，日军不会阻拦和检查。这是鬼子树立的“好良民”的典型。年轻的汤洪翔曾把这段白布缝在衣袖上，走出村子就被人指指戳戳，骂汤家父子是汉奸卖国贼。汤洪翔受不了，一气之下要将白布条儿撕掉，又害怕鬼子什么时候来索还时交不出这玩意儿遭到杀戮之灾，于是就藏到了自家的瓦片底下。

“小汤，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朱松寿把汤洪翔找来，“就是那段白布带，我要派用处。”

汤洪翔有些犹豫，害怕鬼子找他算账。朱松寿开导他说：“10年前，你的祖父汤耀文，祖母钱大妹，在土豪劣绅面前视死如归，何等英勇？你是他们的孙子，理应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眼下，鬼子横行，铁蹄践踏，比当年的地主豪绅凶恶十倍。我们这批农民暴动参加者不奋起抗日，会被子孙后代指着脊梁骨骂一辈子，就是死后，也无面目见早年牺牲的先辈们！”

这一番话，把汤洪翔引到1928年农暴失败后腥风血雨的年代，眼前出现了祖父母惨不忍睹的尸体。他二话没说，拿了一张木梯，靠到后屋檐，轻手轻脚地爬了上去，揭开瓦片，取出一个油纸小包，又小心翼翼地回到地上，把油纸包打开，那段白布带安然无恙，还是那么一个血红的太阳旗和一行小字。汤洪翔双手递给朱松寿。

“小汤，你立了大功。”朱松寿像挖到了岷山底下的玉天鹅一样激动，“怎么样？你就跟着这宝贝一起参加抗日行列吧。”自此，汤洪翔成了朱松寿手下的一名年轻的游击战士。

朱松寿得了此“宝”，先靠它混进了青阳镇，杀死了一个看守盐库的鬼子，与他一起进镇的10多个游击队员每人挑走一大包食盐，运到峭岐，卖给一家商店，得了一笔款子，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

今天，朱松寿等人凭借这“宝贝”的保护，进了江阴城。他们不是要盐了，而是要向鬼子夺取一批武器。因为事先派人侦察过，朱松寿大步向一个碉堡走去，守堡的鬼子看见他左手衣袖上佩戴的白布带，就诚

惶诚恐地持枪向他行着军礼，紧跟在朱松寿后面的余炳德像豹子扑食般地冲过去，紧紧地往后腰抱住了鬼子，另一个游击队员猛地按住了鬼子的嘴巴，第三个人从随身携带的小铁罐中取出浸透火油的棉絮，把鬼子的嘴死死地塞住，接着把他从头到脚绑个结实。“军火库在哪里？”粗通日语的余炳德威严地喝问道。

鬼子不能说话，用手向附近的几间屋子指了指。朱松寿命人将鬼子押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绑在一棵树上，自己迅即向那间军火仓库走去。看门的鬼子看到朱松寿佩着的白布带，立正向他敬礼。朱松寿顺势伸出两只很长的臂膀，将鬼子面对面地一把抱住。鬼子人矮，他的嘴巴正好对着朱松寿的咽喉，猛地张口就咬。朱松寿一急，松开双手，用尽全力向鬼子的前胸推去。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右脚像钉子一样把鬼子的两只脚牢牢地踏住不放。这样，鬼子上身向后跌去，两脚却不能移动，这一跤差点把鬼子摔死。余炳德一拥而上，把火油棉絮塞进鬼子的嘴巴，旋即将他绑了，拖到一边的小弄堂里。

朱松寿一脚将军火库大门踢开。里面没有鬼子，就让余炳德在外面望风，自己带了余下的游击队员涌进库里。这是一个很小的军火仓库，里面放着一挺重机枪、12箱子弹。他们立即把重机枪拆散，用随身携带的麻袋装了，把子弹箱也各自装入布袋内，系好绳子。陈朱松寿外，各人挑了一小担，穿街走巷，向东城门走去。

快要接近东城门时，江阴城内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东城门下的站岗鬼子，知道城内出了大事，抢着把城门关闭。朱松寿惊出一身冷汗，他们这七八人挑着担子在城内乱窜，必定会被鬼子发现而抓去。丢掉手的武器，他实在又舍不得，而局势又不允许他有一分钟的犹豫，实在为难极了。

第五节 抗日救亡剧团的年轻人

在极其紧张的时刻，一个名字跳入了朱松寿记忆的屏幕上，立即转忧为喜，大踏步地向城东北角走去。他们来到城墙脚下的一排瓦房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没有反应，似乎家里无人。朱松寿从门缝中细看里面的动静，见一个很胖的汉子坐在天井里晒着太阳，似乎在判断外面谁

在敲门？要不要打开？朱松寿又急促地敲了几下，里边的人终于向这边走了过来，打开门闩，两边的人都好惊诧。

“朱司令，想不到是你们，快进快进。刚才警报声响个不停，我知道鬼子又在抓人了，所以听到敲门声，也不敢贸然来开。”屋里的人边说边挽着朱松寿的手，热情地向屋内拉去。其余的人鱼贯而入，死寂的天井里一下子增加了几分热闹和生气。

“阿胖，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朱松寿显得十分轻松和自然，好像江阴城里的警报声同他们毫无关系似的，“兵荒马乱的，我们几个穷兄弟进城做些小本生意，刚走到东城门，鬼子突然戒严，今天出不了城，要麻烦你在这里过夜了。怎么样，家里还方便吧？”

“朱司令别把我当外人了。”胖巡士笑笑说，“年初五你为母亲落葬，我就到朱家巷找过你，表示了我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决心。既然我是你领导的一名游击队员，那么，就应该任你调遣，何况到我家住一夜呢？”

大家放下心来，胖巡士安排吃了晚饭。外面警车声叫个不停，一队队鬼子的皮靴敲打着大街小巷碎石块铺成的路面，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胖巡士不放心，悄悄地出门探听消息，不一会儿就回到家里，对朱松寿他们说：

“外面都在传言，有一支游击队袭击了鬼子的军火库，日军宪兵队和警备队一齐出动，封闭四城门，正逐街逐巷挨家挨户地搜查呢！”

“阿胖，那支游击队就是我们，”朱松寿觉得事情十分严重，要得到胖巡士的配合掩护，不能不把实情告诉他。“如果鬼子来你家搜查，你怎样保护我们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就是你们袭击军火库的。”胖巡士狡黠地眨着眼睛，“我家有一个秘密房间，可容10多个人，是利用房屋的互相交错设计的，外面绝对看不出来。进去的时候，要爬上屋顶，上面有一扇小门。从小门下去，有一个黑洞，洞里放着一张木梯。顺着木梯下去，就是一个狭长的小房间。这是我父亲经商发财后在江阴城里造房时精心设计的。他说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晚清以来，凡是发了财的大商人大企业家，都不放心在江阴这块烽火地上世代代居住下去，而是想方设法往无锡、苏州、上海等大中城市迁移。我家还算不上发大财，就搞了个秘密的小房间，以备战乱时躲藏。去年冬天江阴沦陷的时候，我的儿子和媳妇在里边住了半个多月。可是终不能长年住在里边呀，

城里稍稍稳定点儿，他俩就住到外面来了，结果惨死在鬼子的手里。这个秘密房间，我父亲告诫过我，除儿子媳妇外，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今天，朱司令和各位兄弟就是我的亲人，我就什么都对你们说了。”

朱松寿他们听到这里，都很感动，各人背着子弹和机枪零件，用木梯爬到屋面上，打开小木门，鱼贯钻了进去，顺着里面的梯子进入那间秘密处所。里边收拾得很整洁，铺着一张小木床，旁边放着几张小凳子，角落里还放着一个马桶。显然这是胖巡士保留了儿子和媳妇居住时的摆设，心灵深处聊以纪念。

半夜过后，鬼子并没有进来搜查，朱松寿走出令人窒息的秘密房间，同胖巡士商量，准备趁着夜深人静潜出城外，胖巡士一口答应。等大家都爬出来后，他准备了几条结实的绳子，领着一行人向城墙东北角走去。这里鬼子防备较松，内壁已经塌陷，容易爬上城墙。朱松寿、胖巡士站在上面，分别拉住绳子的一端，另一端系着游击队员和弹药箱子，慢慢地放松绳子，直到城外的地上。最后，城墙上只剩了朱松寿和胖巡士。东城门的鬼子有所觉察，一溜黑影向这边窜来。朱松寿急忙抓住绳头，来不及结牢身子，就慢慢滑下城墙，刚到地上，就丢下绳子向走在前面的余炳德他们追去。会面后，大家松了口气。忽听得城内枪声齐鸣，显然，鬼子发现了胖巡士的行动，正在围而歼之。

“胖巡士今夜完了。”朱松寿叹了一口气，大家都心情沉重，肩上的担子像压上了千斤重量，脚步也像在沼泽地里走路，每移动一步，都十分艰难。

到了1938年2月，朱松寿发动、组织和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已经有400余人枪，在澄锡虞三县边区是力量最大、成立最早、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群众抗日武装。但是，要狠狠打击凶恶的日本侵略军，单凭这些武装还不够。朱松寿带了警卫班长余炳德，到锡澄公路沿线、澄虞交界、沙洲沿江一带做了一番考察，发现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如腊月二十四傍晚的茅柴火（江阴农村的风俗，每逢腊月二十四日的傍晚，农民们将野外枯黄的茅草点燃，称为放茅柴）在漆黑的夜空闪闪烁烁，星星点点，一股群众抗日的浪潮正在掀起——

青阳有个章晓光，苏州中山体专毕业，曾在国民党军队当球术指导员。抗战爆发，章晓光回到家乡。青阳沦陷前夕，章晓光同镇上难民一起到武进县芙蓉圩避难。这年冬天，章晓光看到如果拉起一支游击队，

既有现成的枪支，又有大批难民可以提供兵员，借以保卫地方的生命财产，无论地主豪绅还是贫苦民众都会支持拥护，说不定可以干一番大业而名垂青史。主意既定，他找到原先青阳商团的一些成员，在呈彩桥发起成立“澄南自卫团”，自任团长。初起10多人枪，到1938年2月，发展到七八十人枪，在青阳、月城一带已是一支颇有影响的游击队。

江阴与常熟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集镇叫恬庄，镇上有杨春华的无业游民，沦陷后只身步行到常熟白茆一带，搜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下的枪支弹药，悄悄运回常熟家乡，高价出售。后来觉得靠卖枪得几个钱没劲，不如自己直接拉起武装，既得到地方上的尊重，又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力量渐渐强大起来，又动用武力把卖出去的武器悉数夺回。杨春华为他的游击队起了个番号叫“恬庄自卫团”，自任团长。镇上有了武装，三个两个鬼子不敢轻易进去骚扰。杨部虽然军纪较差，偶有侵犯群众利益，但同鬼子相比，毕竟不滥杀狂烧，附近农民自愿参加者，日渐增加。

沙洲沿江陆尔康、陈楚书、李善生等人，原是农暴时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陆尔康，1927年9月，奉中共江阴县委之命，前往靖江秘密组建中共靖江独立支部，同年12月改建为中共靖江特别支部，陆尔康都担任负责人。抗战爆发，陆尔康等人自动串联有志抗日者，组成“横河大队”，陆尔康任大队长，有300余人枪，屡屡袭击日寇。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武装都是为着抗日，诸如河塘的郁福和、郁锡如部，长泾的王炳珊部，张泾桥的周振刚部，刘家桥的包福年、包福衍部，则是利用沦陷初期政治上的混乱，抓住枪杆子，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强迫老百姓缴款纳税，有的甚至干出打家劫舍的勾当，群众畏之如虎，但又莫可奈何。

朱松寿、余炳德回到长寿，找到吴子卿，一起商量如何把那些有志抗日的游击队联合起来。

“现在，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和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军。”朱松寿在听了吴子卿和余炳德的发言后，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洁则无友。我们不能对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人过多的挑剔和责难，不能用要求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否则，我们的抗日力量就难以得到发展，抗日的行动就无法得到配合和策应。”

“章晓光此人虚伪而无信，骁勇而少谋，是个有奶就是娘的小人，像《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曹操、刘备都不肯用他。如果朱司令真要用他，恐怕日后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靠不住的。”余炳德从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肚里有话都要如实地说出来，供领导人决策时取舍。

第二天，吴子卿在余炳德的陪同下，前往青阳、月城、恬庄、沙洲沿江一带联络各地游击队。由于朱松寿在农暴时期的影响和宽以待人的胸怀，章晓光、杨春华、陆尔康、陈楚书、李善生等人领导的游击队都愿意集合在他的抗日旗帜下，陈祥安等人组织的各镇地主抗日武装与朱松寿保持平等而互相支持的关系。

这样，属于朱松寿领导和指挥的各地抗日群众武装，已达2000余人枪。1938年4月初，朱松寿成立游击队司令部，朱为司令，吴子卿为副司令兼参谋长。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设三个中队。一大队长翟嗣泉，二大队长杨春华，三大队长章晓光。一大队跟随司令部活动，二大队仍回恬庄，三大队也回锡澄公路沿线驻扎。又设特务中队，直接归朱松寿指挥。那位早年参加农暴的承小纹为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余炳德继续担任警卫班长，负责保卫朱松寿、吴子卿的安全。陆尔康领导的横河大队，驻地仍在沙洲沿江地带。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重新组阁江阴县党部和县政府的班子，驻地长寿乡下缪巷上，六七月间，县党部又迁往周庄茂墅桥。县党部和县政府的重新露面，一些避乱在乡的国民党员，像夏天被太阳晒得枯萎了的庄稼突然淋了一场透雨似的舒叶展枝起来，纷纷向缪巷上聚集。陈祥安每天带着鹰，兴致勃勃地走到县党部和县政府去，要到傍晚才回长寿。

不久，与陈祥安气味相投的高明澄、房其林要求加入朱松寿部队。高原系国民党南京政府官员，国民党中央政府内迁重庆山城时，回家乡长寿避难。房其林是江阴县城的一位中学老师，执教时曾因批判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学生陈伟斯的反诘。陈伟斯说：“房老师，你既没有读过《资本论》，又没有研究过《共产党宣言》，怎么知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呢？”房其林回答不上来，学生们哄堂大笑。县城沦陷，他回到家乡祝塘镇。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虽然还没有力量，但是在房其林的心中无疑是东方出现了一缕曙光，经过与这两个机构的几次接触，他像一个崇拜上帝的信徒终于得到悟性一样，觉得很有必要参加朱松寿的游击队了。

这一天，高明澄与房其林恰巧走到一起，两人心照不宣，挤眉弄眼地向设在长寿蚩行的朱松寿游击队司令部走去，出乎意料的是，朱松寿不但没有拒绝他们，而且诚恳地说：“共产党的中央与国民党的中央早已组成第二次合作，我们地方上为什么还要为10年前的那场暴风骤雨而影响团结抗战呢？我相信你们两人到我这里来，是为了抗日，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因为我这里既没有钱，也没有官位给你们。”

高明澄、房其林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由房其林开口说道：“朱司令是理解我们的，国难当头，自然应该共同对敌。我俩虽然都是国民党员，但是，只要谁是真正抗日的，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都真心拥护，真心参加，真心抗日。”

他们的这次谈话，杨绮云都听见了。当这两个国民党员走后，杨绮云立即告诫丈夫道：“真心说得最多的人，往往他们的心并不真。10年前的那一笔旧账，你和吴子卿能够一笔勾销，可陈祥安和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未必都能一笔勾销！”

“这我知道，”朱松寿安慰妻子道，“我会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果发现破坏抗日和团结的行为，我会狠狠地惩治他们的。”

朱松寿把监视的任务，交给了警卫班长余炳德。

1938年4月的一天，朱松寿正在长寿蚩行的楼上与吴子卿讨论部队扩展的事，忽听得楼下来了一群年轻人，正与人辩着理，闹嚷嚷的，声音又尖又细。

“走，三先生，我们下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朱松寿拉着吴子卿的手，一起向楼下走去。

一到楼下，就冲上来两个嫩生生的姑娘，拦住了朱松寿和吴子卿，其中一个气呼呼地说道，

“同志，你认识朱司令吗？我们是吴县乡村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听人说江阴有个朱松寿，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组织了一支几千人的抗日部队，这可把我们乐坏了。我们自己凑集了路费，把学校礼堂里的幕布也带来了，成立一个抗日救亡剧团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会唱，会跳，会编，会演，我们的老师，不，应该说是救亡剧团的团长，就是那个高挑个儿的青年人。”那个姑娘用手指了一下正与高明澄争论的青年教师，继续说下去，“他叫王桢，还是个画家呢，刘海粟的高徒，上海美专西洋画系毕业的，你要画什么，他就画什么。可是，你们

的那个人，”她又指了指高明橙，“却说我们派不了用处，不会打仗，光动嘴巴有什么用？我们要见朱司令，他又不让我们去见，说朱司令最不喜欢唱唱闹闹的，他只喜欢打仗，你们会打仗吗？我们就同他吵了起来。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见到朱司令。同志，你能带我们去见朱司令吗？”说着，她拉住朱松寿粗大的手臂摇晃起来，眼角还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我就是朱松寿。”他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直截了当地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扬。”她一下子擦掉了挂在腮边的两颗泪珠，高兴得蹦跳起来，“你就是朱司令，那太好啦，你答应收下我们吧。”

朱松寿没有直接表态。打鬼子与唱唱跳跳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没有深刻地思考过。再说，游击队在沦陷区不可能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呆着，常常需要行军转移，而且一般都在晚上，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人能吃得消吗？他没有这个经验。记得10年前闹农暴的时候，就是靠觉悟了的农民们拿着大刀长矛去冲杀，并没有宣传队一类组织。再说，这班娃娃们到底能有多少能耐呢？最好能亲眼看看他们的节目，再决定取舍。

当朱松寿回过神来准备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谈的时候，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姑娘不见了，正要寻找，只见离他几步远的一块场地上，围着一个不大的圆圈，圈子里面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正在演戏。他感到新奇，便走前几步，站在圈子外面观看，使他吃了一惊的是，那个姑娘正是刚才与他说话的李扬，他改变了主意，决定看个究竟再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不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的，秩序井然，观看的人没有一点儿声音，因为圈子里面的故事，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

这是父女俩，早年流浪在外，靠女儿一路卖唱为生。两人相依为命，体贴照顾。可是，今天女儿却因演唱过度，歌儿唱到一半，喉咙嘶哑，任凭如何用劲，都唱不出圆润哀婉的歌声来，她的漂亮的额头上急得渗出密密集集的汗珠，两颗水灵灵的眸子乞求般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好像是要得到他的体谅和安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父，何尝不知道女儿的甘苦呢？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正是需要父母疼爱的时候，而她却跟着自己到处流浪，到处卖唱。可是，眼下面对着这么多观众，女儿唱不下去，如何对得起大家的捧场和捐助呢，老人狠狠心，高高地举起鞭子，向女儿的身上抽去……

这时，从围着的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挡住了老人的皮鞭，指责他

不该鞭打自己的亲生女儿，并询问老人为什么流浪在外受这般煎熬？老人和女儿泪流满面地诉说，他们的家在东北松花江边，“9·18”事变爆发后，鬼子杀害了他们的亲人，烧毁了他们的家园，他们被迫流浪在外。为了能活下去，女儿不得不每天卖唱不停，得几个小钱，过着非人的生活。由于过度的劳累，女儿的嗓子哑了，父亲常常吐血，这种亡国奴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说到这里，那老人和姑娘，忍不住失声悲泣……

这戏演得真实、自然，好像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人们联想起去年冬天沦陷以来所看到的、听到的鬼子暴行，自己和亲人的不幸遭遇，感情的潮水再也无法关闭，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展，到后来，那些观看的婆婆，媳妇和姑娘们，禁不住发出一片呜咽声。有一个老太太，她的丈夫和儿子被鬼子杀死了，想起自己的不幸，放声大哭起来。就是那些心肠刚烈的汉子们，眼圈也湿润起来，有的偷偷地用衣袖拭着眼梢的泪花。

站在一边看着演戏的朱松寿，也被剧情所感染，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文艺宣传还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是刀和枪所无法替代的。现在，他领导了一支20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散布在江阴、沙洲和澄虞交界的地方，如何把游击战士的思想集中到抗击日寇上，这支抗日救亡剧团不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吗？再说，游击队不能脱离群众的支持与信赖，在动员、宣传、组织群众抗战上，救亡剧团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想到这里，他大踏步地去找那位叫李扬的姑娘，正好李扬演完戏和救亡剧团团长王桢一起来见朱松寿。

“你们演得很好，很感动人，”朱松寿夸奖说，“我们抗日游击队非常需要你们这样一群生机勃勃的热血知识青年。只是游击队流动性大，生活很苦，你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能吃得下这样的苦吗？”

“你们打鬼子连牺牲都不怕，我们还怕苦吗？”救亡剧团团长王桢说。其实，他也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四五岁年龄，瘦长的个子，蓄着长发，颇有艺术家的气质。

“这么说，朱司令收下我们了？那么，请接受一个抗日救亡剧团宣传战士的敬礼！”李扬俏皮地紧绷着脸，纤细的手指并得紧紧的，高高地举过头顶。暮春的暖风抚摸着她乌黑油亮的短发，金色的阳光映红了她俏丽妩媚的脸庞，修长挺拔的身材流动着少女诱人的曲线。朱松寿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朱松寿安排救亡剧团住宿在茧行的楼底下。第二天一早，团员们就起来，纷纷跑到大河边洗脸刷牙。他们有说有笑的，感觉到一种全新的集体生活的快乐，河边洒下了一串串清脆的笑声。

吃过中饭，大河里划过来一条小木船，走上来一位同朱松寿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要找朱司令。朱松寿听到声音，急忙从茧行的楼上走下来。

“原来是你呀，”朱松寿高兴地说，“想不到只用了3个多月时间，就拉起了一支2000余人的抗日武装，许多工作等着要做呀，这里人手不够。老王，你来得正好，快帮我一把吧。”

“我早帮你出了一把大力。”老王眯着眼睛笑着，“可是你并不感谢我，叫我如何还有积极性呢？”

“此话从何而讲？”朱松寿正色问道。

“昨天下午，长寿不是来了一支抗日救亡剧团吗？这就是我和陆富全、陆步清等人在吴县乡师组织来的，他们要我坐他们的木船一起走，我说你们还是自己去闯路子，不要打出我的牌子，这才算真本领。”老王说着，露出一种很成熟的神色，看着朱松寿。

“我还险些把他们拒之门外呢，”朱松寿有些抱歉，“后来他们就地演了一个街头剧，我才感到他们的节目很有教育意义和鼓动作用，就接收了他们。老王，既然是你组织的，为什么不让他们早说呢？”

这个叫老王的中年人，名志方，吴县黄埭人，也是农民暴动时期加入共产党的，以后暴动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就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同朱松寿彼此都很了解，也很赞成朱松寿揭竿抗日，昨天来的那一群年轻人，算是他献给朱松寿的一份见面礼。

王志方在朱松寿的陪同下，走进救亡剧团的住室。大家正在各自整理刚刚发下的宽边草帽、帆布挎包和简要的生活用品，看见朱、王两人，立即把他们围个水泄不通。李扬冲着王志方神秘地一笑，不无得意地说：“怎么样？我们昨天一句都没有提你的名字，朱司令不是高高兴兴地收下我们了吗？我们这位王团长，还是挺有办法的。”

茧行的楼底下，传出了一阵胜利者爽朗的笑声。

两天以后，救亡剧团就在长寿镇上和附近的农村里宣传开了，《放下你的鞭子》百演不衰，《打回老家去》深得群众的欢迎，还有独唱、合唱、演讲、绘画，内容都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歌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如何英勇善战，开辟了华北、华中大片抗

日根据地，含蓄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错误政策。救亡剧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高明澄、房其林以及陈祥安等各镇地主武装的头目，却本能地抵制和反对救亡剧团的宣传演出。只是由于朱松寿、吴子卿等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与撑腰，救亡剧团的歌声才得以在江阴各镇和乡村的上空飘扬。

抗日救亡剧团像一团火活跃着朱松寿游击队的军旅生活。他们与战士们一起行军，一起住宿，一起吃饭，除了夜间转移绝对需要安静外，平时都是热热闹闹的。1938年初夏的一天，朱松寿传下命令：今晚紧急转移，路上要绕过江阴县城，如果与城里的鬼子发生战斗，救亡剧团就履行战地救护团的责任，抢救和抬运伤员。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些年轻人从没有上过战场，要真刀真枪地与鬼子干，心中未免怦怦直跳。太阳刚下山，天色还没有全暗，救亡剧团团长王桢检查了每一个团员的装束，然后用低沉、威严的语调点着名：



抗日救亡剧团女团员李国芬
(1920~1942)烈士 (乔家霖 提供)

“李关玉、李国芬、金泰来、陈英、岳聆、王燕浪、朱家眉、闻时宪、王兆元、程第耀、李国钧、朱觉、朱桂冠、费瑛、林英、李宾、陈鹤、陈伊、朱燕来、李扬……”

20多个团员都站得整整齐齐的，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宽边草帽，肩上斜背着帆布挎包，各人分工带着演出用具，连王桢自己也背着几幅油画作品，静静地站立着，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西天收去了最后一抹余光，一队队穿着土布服装的游击队员，肩上背着长短不齐的枪，向夜色的幕帘中钻去。救亡剧团没有武器，遇到敌人时没有战斗力，朱松寿就让他们跟随司令部一起行军。刚走出几里路，天就下起雨来。开始淅淅沥沥，头上的宽边草帽还能管用。可是，当下起瓢泼大雨时，草帽再也挡不住雨水，救亡剧团的团员们都像从水里浸泡过似的，薄薄的衣衫紧紧地贴着青春的肉体，男团员的壮实与粗犷，女团员的妩媚与丰满，都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了。好在有夜幕的遮护，人们还无法

窥视他们的秘密。女团员们这时害怕的倒不是鬼子，而是突然亮起一道光芒，把少女身上的高峰和深谷，裸露在人们的面前，那有多羞呀！

队伍从长寿出发，经过峭岐、南闸一直插向西石桥，因为下雨，县城里的鬼子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游击队就在西石桥附近的一个村子上宿下营来。

救亡剧团的团员们，雨水伴着汗水、泥水，全身上下湿淋淋的，又累又渴。这时天快拂晓，从睡梦中被叫醒过来的房东们，看见这些操着苏州口音的年轻人被雨淋成这个样子，热情地为他们借来了干衣服，挑水烧浴锅，洗个热水浴，再痛痛快快地睡一觉，那该多好！

不一会儿，浴锅烧好了，一个房东大嫂就到堂屋里喊人洗澡。李扬正被湿衣服折磨得难受，第一个应声跟了进去。浴锅砌在与堂屋紧紧毗连的一间小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旁边是猪圈，一只老母猪哼哼着睡得正香，它的怀里簇拥着一群雪白的小猪仔，争吸着奶汁。李扬自小生在苏州城里，感到新鲜，一时忘了洗浴。

“浴锅在这边，姑娘快去洗吧。”大嫂提醒她说。

李扬这才回过头来，朝大嫂莞尔一笑。她仔细打量着这乡间浴室，它的底座是用砖头砌成的，上面是一只直径很大的铁锅，铁锅里盛着大半锅温水，大铁锅的下面可以添柴烧水。在烧火人与大铁锅之间，用砖坯砌着一堵矮墙，墙上粉着石灰，借以隔断视线，保护洗浴人赤身裸体的秘密。

“这铁锅能洗浴吗？”李扬转过身来，试探着问道。

“能洗，我们乡下人都洗这样的浴锅。”大嫂解释说。

李扬不好再问，可总是放不下心。如果大铁锅什么时候破裂了，自己不是要掉到锅底下去吗？下面是灼热的火焰，而自己是裸露着的肌肤，可是，自己被湿衣裹着实在难受，心里的疑团说出来，又怕人讥笑。她慢慢地脱着衣服，慢慢地爬上锅台，慢慢地把身子沉入水中。

温热宜人的浴水立刻没过她的雪白的颈项，她轻手轻脚地擦洗着，一阵从未体验过的轻松、欢悦、惬意的感觉涌遍她的全身，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大铁锅中洗澡。突然，她的脚底下一阵灼热，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烙了一下似的。几乎同时，她的臀部、背部、大腿，凡是与大铁锅直接接触的肌肤，都烫得忍受不了。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丢进油锅中的一条美人鱼，不一会儿就会被铁锅煎黄。她先是忍受着，额角上大汗淋漓。

当她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不得不“哗啦”一声跳出浴锅，慌急间忘了羞涩，忘了全身完全赤裸着的水淋淋的肌肤，像一只受惊的雪白的羔羊，直向外面奔去。当她看到正在为她添火的房东大嫂时，才怯怯地退回锅台。

大嫂差一点笑将起来，一问才知道李扬在她添火时没有把圆木板垫好，把身体与铁锅隔离一段距离，才闹出了笑话。这个大嫂是村上有名的快嘴，把这事迅速地传播开了，弄得李扬第二天见到人，挺不好意思的，暗暗发誓宁可身上脏，再也不在大铁锅中洗浴了。

第二天下午，初夏的太阳像千百盆火一样烤着大地，把道路、砖场、田野烤得发烫，庄稼、树木低垂着头，叶子像抽搐似的蜷曲着。经过半天休整的救亡剧团的团员们，纷纷走出房东家，向野外一条宽阔的河流走去。男团员脱去上衣，“扑通”跳入河中洗个痛快。李扬等女团员们在河边洗洗脚、擦擦脸，享受着河水的阴凉。

有一个在《放下你的鞭子》中演父亲的男团员朱燕来，因为有事迟走了几步，当他急腾腾地走出村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吴子卿的公子吴增颖。朱燕来知道他是司令部里的文书，拉住他问道：“你看见剧团的李扬他们到哪里去了？”

“那边不是吗，”吴增颖用手指着河边的一群人，“他们在洗冷水澡呢！”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去。”朱燕来热情地拉住吴增颖的手，不容他答应与否，就拉着他一起向那边走去。

吴增颖跟着走到河边，这里河水清明，碧波轻扬，男团员们在河面上往返穿行，自由自在。女团员们赤着足，裤子卷得高高的，露出新藕一般细腻白皙的小腿来，站在浅水里嬉戏，身上的衣服差不多全湿了，就是不肯下河真洗。朱燕来已经脱去衣服，只留着裤衩，走到吴增颖的面前，热情地要为他脱衣服，要他一起下水游泳。吴增颖躲闪着，不让朱燕来靠拢。朱燕来是个奔放开朗的青年，非要吴增颖下水，一把抓住吴的胳膊，拖着他一步步向河边走去。正在河中洗澡的救亡剧团的团员们，看到这一幕情景，一个个欢呼起来。吴增颖体小力弱，眼看被朱燕来快要拉到河边，白嫩的脸蛋涨得通红，像夏末秋初一束红艳照人的美人蕉。

事有凑巧，朱松寿骑着白马经过河边，看到吴增颖的窘相，急忙跳下马来，大声说道：

“小吴，司令部要开一个会议，我们正等着你呢，想不到你在这里看救亡剧团游泳散心，还不同我一起回去。”

“我就来了。”吴增颖说着，挣脱了朱燕来的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飞身向朱松寿那边奔去，后边传来了这位男团员求饶似的话：“小吴，你千万不要在朱司令面前说我的坏话！”

“你怎么没有勇气下水呢？”朱松寿嘿嘿地笑着，牵着马慢慢地走，对与他并肩走着的吴增颖不无揶揄地说。

“下水了，我这个花木兰不是要露馅了吗？”吴增颖镇静下来，脸上的红云早已烟消云散，“朱司令，我报告你一件新鲜事，救亡剧团的女团员不会在浴锅洗澡，昨天，有个姑娘还从浴锅里跳出来呢！”

朱松寿原本偏长的脸立刻沉静下来，他认真地听着吴增颖的叙述，一直到司令部，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第六节 这步棋走错了

第二天，朱松寿来到抗日救亡剧团的住地，和团员们说起洗浴的事。李扬的脸上—会儿红，—会儿白，团长王桢也很不自然，心想朱司令一定要狠狠地批评他们是一群小布尔乔亚了。室内的空气有些紧张，大家的眼睛集中在朱松寿偏长的脸上，而那个调皮的朱燕来，却盯着李扬的俊脸，欣赏着暴风雨来临之前这张脸上的大幅度的变化。

“我是向救亡剧团的团长和团员们检讨来的。”朱松寿说话的声音嗡嗡响，态度十分诚恳，“我作为这支抗日游击队的司令，没有很好关心你们的生活。你们大多是吴县乡师的学生，以前都在城镇生活，特别是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城里生活，每个同学都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你们才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城镇，来到江阴的乡村，做一名光荣的游击队战士。”

这几句话，王桢和团员们听了，像春风抚摸着他们的脸庞，像山泉流进他们的心房，暖乎乎甜丝丝的。团员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像顽皮的儿女坐到父亲的膝盖上，享受着慈父的疼爱 and 温暖。朱松寿稍停片刻，又亲切地说了下去：“因此，我这个做司令的，更有责任爱护你们，关怀你们。比如说，自小生长在苏州城里的团员，当然，特别是姑娘们，不能适应在江阴人习以为常的浴锅里洗澡，闹出了一些笑话，这就是我的过失，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向你们宣布，从今天起，救亡剧团女

团员的洗澡，都由司令部里搞后勤工作的同志负责向农民借用木盆，不能再让你们去冒这个风险了。”

男女团员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不过，大家可能都知道，”朱松寿继续着他的谈话，“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们搞救亡宣传，也不是暑假里到乡村去度假，住上一周半月就能回到城里去的。我们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因此，从城镇下来的知识青年，一定要适应农村的生活，养成艰苦奋斗的习惯。大家都会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那么，跳进大铁锅子洗浴，到底会牺牲什么呢？我十分郑重地告诉你们，这铁家伙一定不会欺侮来自城里的姑娘。从浴锅里掉到下面的火坑里，我可以保证，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姑娘们大可不必担心。”

团员们笑得前仰后合，李扬眼眶里溢出了热泪。他们觉得，在朱松寿身边做抗日工作，不只是思想上能够长进，就是在生活上也得到体贴入微的关怀与照顾。只要鬼子不从中国滚出去，他们愿意跟着朱司令年复一年地干下去。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朱司令在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以致在这支部队遭到国民党特务武装袭击而失败的时候，不得不挥泪告别，这是后话。

1938年春夏之交，朱松寿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峰。3个大队呈三角形分布在澄东、虞西和澄南的土地上，横河大队活动在沙洲沿江地带，他们各自独立活动而受朱松寿的节制。朱松寿直接指挥的一大队和特务中队，由于纪律严明，抗日宗旨明确，每到一地，都受到农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拥护。为了解决部队的开支，朱松寿在主要河道、大路、集镇设卡收税。往来商贾也愿意纳税，请朱部保护他们的行商自由和安全。由于朱部军事、经济力量的雄厚，长寿、峭岐、云亭、周庄诸镇的地主武装，频频与朱松寿联系，主动消除10年前由于农民暴动和国民党武装的镇压所产生的严重对立情绪，双方在大敌面前似乎得到了谅解。设立在长寿缪巷上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也常常派人到朱部来，请求得到他们的保护，好像往日统治全县人民的威风已不复存在。朱松寿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现象只是在局部地区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暂时现象，而误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会和和睦睦地联合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国土上赶出去，从而放松了对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以及各镇地主武装的防范与警惕。

也就在这个时候，朱松寿把司令部迁往云亭、周庄、长寿3乡交界的邬墩村。邬墩村系村东的邬墩而出名。邬墩是一个小山墩，原名西墩，山之南麓建有一座西墩庵。庵的周围有一片30余亩的大竹园，园中央长着高耸入云的大栗树。树叶和竹叶组成的浓荫把阳光遮挡住了，夏天走进大竹园，凉飕飕的俨然是一个避暑胜地。由于地处偏僻，远离集镇，这片大竹园又是十分理想的屯兵之地。离邬墩村和西墩庵不远，有一条可通轮船的应天河，数条河浜像主动脉上的微血管似的延伸到村前村后。

“我们应该备条船，”朱松寿带了杨绮云，沿着村子和小山丘察看地形，当发现这里水路交通特别便利的时候，便想到了船，“你和我可以住在船上，遇到情况，把船划往应天河。应天河两岸到处都是小河浜，我们往小河浜里一躲，敌人到哪里去找我们？”

“这办法是好。”杨绮云赞成丈夫的主张，“我可以帮你划船，在敌人追捕的时候，也可以配合着打几枪。农暴的时候，你教我打枪，想不到10年后还有用处。”这时，杨绮云已经把几个孩子都送到上海居住，连最小的孩子秀芬也寄养给了人家，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一心一意协助着朱松寿领兵抗日。

朱松寿很快搞到了一条小快船。这种木质快船，两头儿尖尖的，中间稍宽，船的两侧装着木板，上面是用芦苇编织涂着厚厚一层桐油的船盖，可防日晒雨淋。朱松寿夫妇就住在这条小快船里，有时也请吴子卿等人来船舱里讨论军机大事。小快船行动秘密，普通游击队员都无法知道它的行踪，鬼子、汉奸就更莫测高深了。

可是，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和县政府却在打着这支抗日游击队的主意，企图控制在他们的手里，成为由他们随意驾驭的一支别动队。他们的阴谋第一步，就是把国民党政府避难在家的官员和忠实于“党国”的三教九流，通过不同的途径混入朱松寿的游击队，高明澄、房其林等人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阴谋的第二步，他们千方百计要把朱松寿的部队变成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或者是有隶属关系的一支武装，改变或影响这支部队的性质。当第一步计划实施后，县党部和县政府的这种进攻就迫不及待的了，这是单靠小快船的隐蔽与灵活所无法防范与抗衡的。

由于部队的迅速扩大，军费的开支与日俱增，设卡收税跟不上庞大的开支。这个矛盾，在抗战初期应运而生的各种游击队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相当数量的游击队，就把负担转嫁到当地的老百姓身上，更

有甚者，纵容士兵掳掠村庄，打家劫舍。这样的游击队，虽然有时看见鬼子也打几枪，但是，他们的性质已沦为土匪武装而遭到群众的切齿痛恨，斥之为“游吃队”了。

朱松寿坚决不能这样做。他曾经是一位中共党员，到过莫斯科参加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也无从知道党组织到底在哪里。但是，他仍自觉地按照党员的标准去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能去干。在军饷紧张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财产。房屋大部分被陈祥安拆去了，当然已榨不出什么油水。田地也卖过几次，可仍有相当可观的数字，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留着它又有什么用呢？杨绮云也竭力支持卖田。于是靠着卖田款又维持了一段时间。

不久，活动在虞西的二大队和活动在澄南的三大队也频频告急：军饷紧缺，军心不稳。要维持这支2000余人的抗日武装的军费开支，单靠一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朱松寿与吴子卿一起找过党组织，可是毫无踪影。一片厚厚的阴云，蒙在朱松寿的心头。

一天，朱松寿坐在邬墩司令部，正思虑着如何解决庞大的军饷问题，高明澄走了进来，还未坐下，就大声嚷嚷起来：

“朱司令，我有办法克服军饷上的困难，就是看你愿意不愿意去做。”

“只要能拿出军饷还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呢？”朱松寿精神为之一振。

“要养活2000余人的部队，数额巨大，离开政府的帮助，是不可能的。”高明澄说，“我去上海，曾听一位同事说过，政府的军队在撤离上海的时候，组织过一支武装，名叫忠义救国军，下面有几个支队，最高负责人是军统局长戴笠。上海沦陷后，戴笠让周伟龙负责收集旧部，扩大武装，忠义救国军的领导机构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

“你不要说下去了。”朱松寿制止了高明澄的话头，“戴笠是什么人？周伟龙又是什么人？他们是共产党的敌人！按照你说的去做，就是搞到了军饷，却葬送了这支抗日游击队。”

“朱司令，你说戴笠、周伟龙是共产党的敌人，不错，他们曾经是共产党的敌人。可是，这是以前的事了。国共既已合作，怎么还能这样看问题呢？这么说来，我高明澄也是共产党的敌人了，因为，我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秘书室的一位官员。还有，房其林、陈祥安以及县党部的书记长徐炎，县长张品泉，他们都是你的敌人了。这么多敌人在你部队里，你怎么好端端的没有一点儿危险呢？”高明澄紧紧逼问着，不让朱松寿留

一点儿喘息的时间。

“明澄，你不要这样生搬硬扯。如果要扯起来，”朱松寿很不满地瞥了他一眼，“就要扯到10年前的那一场风暴，扯到风暴过后对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的血腥镇压，那么，有10个张品泉的头恐怕都要保不住的。当然，我的司令部里，也就不会有你和这么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出出进进了，你以为如何呢？”

高明澄一时无言以对。他知道江阴沦陷后，国民党在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力量，就是县党部、县政府也是在朱松寿的游击队保护下蜷缩在长寿乡下的一个村子里。很明显，现在不是与朱松寿在实力上进行较量，而是要把这支武装纳入他们所设想的轨道上去。于是，他转换了口气，说道：“朱司令何必这样认真呢？国共合作，自然不会再去算那笔陈账了，谁是谁非，留待后人去评说。再说我们商量的是如何解决军饷的问题，兵不厌诈，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两全之策，既搞到军饷，又不跟着国民党的指挥棒转呢？说穿了，也只是给这支游击队挂上一个‘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实际的指挥权仍在你朱司令的手里。你知道我是国民党员，按理不应该出这样的主意，只是为了朱司令的抗日大业，我什么都顾不上了。”

朱松寿见高明澄口气缓和下来，以为他真心为军饷问题着急，于是也以商量的口气问道，“我们拿国民党的军饷，怎么能不受他们的节制呢？他们要派官员来怎么办？要将游击队整编调到别的地区去怎么办？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到那时恐怕就身不由己了。”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如果忠义救国军方面不答应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不理睬他们，仍不会带来任何损失。”高明澄似乎完全站到游击队的立场上说话了，而朱松寿对他的怀疑也正在逐步减少。

“不派官员，不整编外调，不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摩擦，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朱松寿伸出3个手指头，“只要其中的任何一条不答应，我们就不会打出‘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当然也不接受他们的军饷。不过，这样重大的问题，我还得同人商量商量，等几天再给你回音。”

高明澄退出了邬墩司令部。

这几天，朱松寿坐卧不安。接受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固然解决了军饷之忧，枪支弹药也可以得到补偿，无疑，这对坚持在家乡抗日是有利的。然而，这样的选择不仅在感情上存在障碍，而且说不定是引狼入室之举。对朱松寿来说，把抗日武装交给共产党领导，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惜在1938年春夏之际，新四军的一、二支队刚刚到达茅山，它的影响和势力自然还来不及扩大到澄锡虞地区。而1937年10月在上海成立的江苏省委，虽然已经知道朱松寿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并且准备派共产党员王承业到江阴同朱松寿取得联系，可惜在行动上慢了一步，当王承业赶到无锡，朱部已经打出了忠义救国军的番号。

朱松寿犹豫迟疑了几天，仍没有做出决定，而吴子卿外出联络还没有回来，无法同他商量。他下面的3个大队长，都是抗战中崛起的青年人，不仅缺乏磨炼，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朱松寿自己呢，由于与党失去联系多年，只知道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不知道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和“统一”到什么样的程度。正当他徘徊不定的时候，游击队军饷又一次出现危机，高明澄又来催逼，朱松寿才决定带了承小纹、房其林、高明澄等人，到上海与忠义救国军方面的人见面洽谈。

上海扬子饭店，国民党军统局周伟龙接见了朱松寿一行。双方就番号、编制、经费、人员等进入商谈。朱松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三不”作为首要条件，房其林、高明澄在一旁附和。周伟龙说：“如果收编成功，朱司令就是这支部队的名正言顺的司令长官，一切权力都在你的手里，无论作战、奖赏、任免官员，自然都由你一人决定，派不派官员都无关紧要。当然，作为一支正规部队，必须要有正规的编制，要有电台，你那里恐怕没有专门人才，我们可以帮助你。”

朱松寿认真地听着周伟龙的话，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派官员是第一条防线，必须坚持的。他宁可不要军饷，也不能让这个步。因为国民党的军政人物一到他的部队，势必要影响到这支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他知道国民党的官员打鬼子不一定卖力，可是搞起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却挺生气勃勃的，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地方武装，志在保卫江阴的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略者的蹂躏和侵犯。因此，没有必要像正规部队那样配套齐全。再说，军事人才和管理人员，包括电台的报务员，我们自己也可以培养。至于说到军饷，我们游击队守卫的是政府国土的一部分，理应由政府发给，难道要让我们的游击队员自己带了粮食来打鬼子吗？”

周伟龙自然不肯让步。事实上，戴笠等人发起组织忠义救国军的主要宗旨并不是真心抗日，而是要控制京沪（南京—上海）沿线沦陷区的局面，防止和打击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向这一地区的渗透和发

展。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党看到江南出现了很多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就派出官员四处活动，通过各种手腕收编这些武装。活动在沙洲十一圩港的杨行方游击队和锡北张泾桥、顾山一带的周振刚游击队，都已派人员策划收编事宜。而朱松寿的游击队在澄锡虞地区成立最早，力量最强，影响最大，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自然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捕猎目标而狠下了一番工夫，现在猎物已在眼前，怎么会轻易让它离开呢？周伟龙以退为攻地说：“朱司令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不要紧，我们可以慢慢地谈。不过，抗日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是决不会胜利的。一个真正为着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去冲锋陷阵的个人或集体，都没有理由排斥和拒绝党国领导。如果借着抗日另有所图，那另当别论。不过，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

朱松寿还是不肯答应派官员到游击队来。他对周伟龙用高帽子压人十分反感，忍不住反唇相讥地说：“周先生说得对，抗日救国确实是大事。可是，当国土沦陷人民遭难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派几个官员来组织民众抗日呢？而当人民自己起来保卫生命财产的时候，政府却非要派官员到游击队才放得下心呢？这不是‘另有所图’又是什么呢？既然如此，我们还在这里磨蹭又有什么意义呢？”

周伟龙把朱松寿和他的游击队看作是一块肉，既要吃它，又不能吞之太快梗了咽喉。现在看见朱松寿不想谈下去的样子，急忙改换了口气，请朱松寿他们在上海多住几天，一切都可以商量。朱松寿只得带着随行人员在扬子饭店住下。第二天，周伟龙没有来。第三天，还是没有来，只托人带来一个口信：近日公务缠身，要朱松寿他们耐心等着。事有凑巧，这天江阴方面派人来找朱松寿，报告说日军集中兵力“扫荡”朱部，情势紧急，要朱司令立即返乡。

朱松寿决定立即回江阴，并要前来参加谈判的高明澄等人一起离开上海。高明澄哪里肯走？愿意留下代表朱司令继续谈判，朱松寿放心不下，高明澄信誓旦旦地说：“朱司令的三条原则，我哪一条不记得？你不肯退让，我自然也不会让步，国民党的那一套玩意儿，我比你熟悉。只要谈得好，我们既可得到军饷和弹药，又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如果什么地方不符合你的心愿，你也可以不予承认。我是完全看在同乡的面上，才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朱司令谋事。如果朱司令还不放心我，那么，我再

在你那里待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让我乘船去重庆复职，省却许多烦恼。”

朱松寿自1926年参加革命，12年来磨炼出了刚强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支抗日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还存在着一个弱点，就是在别人的软磨面前容易让步。这次他终于答应让高明澄等人留在上海与周伟龙继续谈判，这给他的游击队 and 个人的命运就埋伏了危机和蒙上了阴影。

高明澄得到了朱松寿的许可，暗自得意，每天都去找周伟龙。可是原来的机关整天紧闭着门，哪里见得到周伟龙的影子？那时上海是鬼子的世界，高明澄作为国民党的官员并进行频繁的活动，也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当他想到这是江阴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密托和为党国收编一支数目可观的地方武装，事成之后，无论为党国和地方都立了大功，就把被鬼子捕获的危险置之脑后了。后来，他终于从一个同僚的嘴里得悉，国民党中央政府留在上海法租界的大小秘密机关，都被租界当局破获，周伟龙亦遭拘禁。后经国民党政府向法国政府交涉，才予以获释，周伟龙遭此厄难，早把朱松寿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高明澄费尽周折，找到周伟龙，周才如梦初醒，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办好。

周伟龙向高明澄详细了解了朱松寿的革命历史和组建抗日游击队的经过，说出了自己的收编打算，高明澄连连点头称好。第二天，高明澄带着几位官员回到江阴，在邬墩司令部见到了朱松寿。这时，朱松寿已经击退了鬼子的几路“扫荡”，还把后塍附近骚扰地方为非作歹的小股武装柴茂林部击溃，正在总结战斗的经验，看见高明澄喜滋滋地来找他，两人就走到一间房子里会晤。

高明澄首先叙述了在上海谈判的一番艰难，接着揭示了谈判的结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收编朱松寿部为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任命朱松寿为五支队司令，全权指挥部队的一切行动。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周伟龙让余贤至、李安、朱熙元、吴唯一4人到朱部帮助工作，分别担任参谋主任、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和报务员，他们都已到齐，正在外面等候司令的接见。至于军饷和武器弹药，都由忠义救国军总部供给。

朱松寿沉默着，到这时他才后悔不该让高明澄留在上海去谈判。好在3个大队长和特务中队长没有更换，他控制这支队伍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这时吴子卿已经回到司令部，朱松寿把上海谈判的事告诉了他。吴

子卿见木已成舟，不便多予指责，也就同意了。接着，朱松寿同上海下来的人一一见了面，承认了他们的职位，又向全体人员传达了接受收编的事宜。从此，朱松寿打出了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的番号，同时也埋下了被人夺取指挥权和改变部队抗日宗旨的祸根。

1938年6月，当朱松寿指挥一大队和三大队在锡澄公路拆毁了数座桥梁回到邬墩时，忠义救国军总部又派来了一位军事专员袁亚承。朱松寿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拒绝这位军事专员，总部就有理由宣布五支队背叛国民党而加以讨伐，势必陷入互相厮杀的局面而把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放在一边，就有可能失去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接受袁亚承，时间一长，在五支队内部就会滋生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不仅对他的司令地位有着明显的威胁，而且对这支抗日队伍的前途也笼罩着一层灰暗的色彩。他决定与吴子卿商量一个妥善之策。

“其实，国民党看上的并不是你和我两位正副司令，10年前，我俩都是共产党员，都与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翻过脸，农暴失败以后，都坐过国民党的班房。可以说，我们与国民党都有夙仇旧怨。”吴子卿冷静地分析着，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担忧，“国民党看中的是什么呢？那就是3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的兵力、武器以及这支部队在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现在，总部不断地派官员来，这是一个很不利的先兆。除非我们现在就与他们翻脸，否则就没有理由把这些官员拒之门外。我琢磨了一个办法，就是要冒一些风险。”“只要对抗日有利，什么风险不可以冒呢？”朱松寿诚恳地说。

“我想，让余炳德暗中监视袁亚承和其他几个人的活动，只要抓住把柄，我们就有理由把这些人驱逐出去！”吴子卿紧握着拳头，狠狠地捶在桌子上，小桌子猛地跳动起来，发出冬冬的响声。

“子卿，就照你说的去做。不过，我们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要尽快找到党组织。10年前，我们都是党的赤子，现在，是回到党的怀抱中去的时候了。”朱松寿深情地说。

可是，党组织又在哪里呢？

第七节 从县党部来了一位指导干事

袁亚承初来的时候，朱松寿怎么也看不惯他。此人三十五六岁的年龄，长得油头粉面，五短身材，细小的眼睛给人增加了几分狡黠的感觉。

他喜欢穿黑色香云纱短衫和短裤，与游击队战士普遍穿着的粗布两短打衣裤相比，显得有几分油滑和轻浮。他说话很快，快得思维无法跟上说话的速度，因而常常“轧子”，句子中往往夹带着一连串的“这个，这个”，叫人听了像吃饭时嚼到沙子一样难受。听人说他是浙江嵊县人，又名阮清源，早年学过理发，后来考上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一头投入了国民党的热炕头，加入了中统，又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由于对他的防范和警惕，朱松寿很少与他呆在一起，部队中重大事情的处理，也极少与他商量。

可是，袁亚承却并不计较朱松寿对他的冷淡与轻视，行军打仗，提着一支驳壳枪，常常走在队伍的前面。部队一到驻地，就关心着战士们的宿营和休息。稍有空隙时间，喜欢找大队长、中队长了解情况，不露痕迹地鼓吹朱松寿是五支队的创始人，一切行动都应该听从朱司令的命令。说到江阴，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情，赞叹忠义之邦的人民历来都有抵抗外来侵略的革命传统，去年江南沦陷，江阴人民最早行动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朱松寿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和民族英雄，他的抗日业绩与明末清初的阎应元抗清相比，意义要大得多，在江阴的史册上必然会占着重要的一页。袁亚承甚至说：“抗战胜利后我要亲自写一篇几万字的大文章，题目也想好了，就叫《朱松寿与江阴抗战》，记载朱司令的抗日功绩。”

这些话自然要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朱松寿的耳朵里，这倒让朱松寿难辨真伪了。自从去年冬天拉起队伍抗日以来，朱松寿偶或也听到一些赞扬的话，可是，都是片言只语断断续续的，评价也没有这样高。不管这位军事专员出于何种目的，这些话对提高自己的威信和维护自己的指挥权都是有益的，这总要比那些当面说好话背后拆台的人好得多。朱松寿决定进一步观察袁亚承的行动。负责监视袁亚承的余炳德回来汇报说：

“袁专员在二大队、三大队的官兵面前，都说上面派来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来协助朱司令工作的，什么时间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他们这些人都要回到总部去。”

朱松寿满意地笑着说：

“这还差不多，本来就用不到他们来说三道四的。”

“你能相信袁专员的话？”余炳德狐疑地说，“我看靠不住，这恐怕有诈。”

“辨别真假要有依据。”朱松寿已经没有袁亚承初来时的那种高度警觉了。

“一味奉承人，恐怕不安好心。”余炳德似乎对袁亚承有着很深的成见，“自古至今，凡是最肉麻恭维他人的人，都没有好心，他看上的是人家手里掌握的权力和利益。”

朱松寿没有回答。余炳德对袁亚承及其一行人员的怀疑，并没有什么证据。如果说他们在背后奉承人也作为不安好心的依据的话，那么，让他们讲什么话好呢？不过，他对袁亚承觉得不好理解，他花那么大的劲是想给我看呢，还是给战士们看呢？袁亚承口口声声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那是为了打鬼子，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呢？对朱松寿来说，只要袁亚承这些人不搞蛋，不做小动作，他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到打鬼子、发展队伍上去了。

自从游击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以后，县城和地方上的国民党人员像铁屑遇到磁石一样纷纷加入到部队中来。这些人既有文化，又有见识，参谋、副官、军需、书记一类职务大半被他们占去，五支队的部分权力就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渐渐地，这些沦陷后失去依附的国民党人士，像太空中的尘埃一样向最大的颗粒靠拢和凝聚，这最大的颗粒就是袁亚承。

袁亚承到五支队不到一个月，力量的对比逐渐地向有利于袁专员的方面发展。但是，袁亚承并不就此满足，暗暗研究了朱松寿在江阴农民暴动中的历史，发现这位10年前的农暴英雄，与各镇的地主武装和县党部，县政府的主要头目，有着深刻的仇恨。现在，他们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主要是日本侵略军近在咫尺，身家性命每时每刻都受到鬼子的威胁。如果稍加煽动，必然结成一支反朱同盟军，那么，五支队的指挥大权就稳稳地落到袁亚承的手里了。

他是一位惯于玩弄两面手法的政客。在公开的场合，他把朱松寿捧到天上。他知道，只要有一个人把这些话传到朱松寿的耳朵里，它产生的效果比当面阿谀强上十倍。可是每当与陈祥安、张品泉这些人个别接触的时候，他就把朱松寿描绘成洪水猛兽，以增加这些人对朱的仇恨与恐惧。这一套还果然有效，朱松寿虽然说不上对袁亚承亲近或友善，但是对他的戒备心理减弱了。而在黑暗中，袁亚承的力量正在一步步发展与壮大，犹如蜷缩在灌木丛中一只饿虎，张着贪婪的大口，等待着猎

物的到来。

不过，袁亚承为一件事很恼火，那就是房其林被朱松寿所拘禁。房其林在五支队任谍报参谋，他忠实于袁亚承，袁也很器重他，每次单独晤面，都要启发他为党国效劳。房其林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这位专员是绝不会屈从于朱松寿的，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为了争个头功，他在司令部里公开为袁亚承鼓吹，为袁收买人心。当着一些参谋、副官、军需的面，散布攻击朱松寿的舆论。结果，被暗中监视的余炳德觉察，报告了朱松寿。

这时，朱松寿才知道五支队内部并不平静，为了杀一儆百，命令警卫班将房其林逮捕，以破坏上层团结之罪，决心将其处死。袁亚承闻讯，暗吃一惊，立即赶到邬墩司令部，向朱松寿问道：

“听说朱司令抓了房参谋，关了禁闭，那是为什么事呀？”

“这位谍报参谋，他把谍报做到我的头上来了。”朱松寿气呼呼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我赞成治军要严，有功者奖，有过者罚。”袁亚承眯起细小的眼睛，细心挑拣着词语说话，“房参谋离间领导，挑拨是非，朱司令予以严罚，我完全赞成。以后出现类似问题，都应根据军法严肃处理。不过我部初建，法令尚未健全，责任在我，我理应承担责任的。房参谋原系教师出身，一介书生，对军营规矩，知之甚少。朱司令将其禁闭，令其反省，也是应该的。”

朱松寿见袁亚承为房其林说话，不便与这位专员翻脸，也就改变了原先的决定。他从此事得到启发，对国民党官员一定要谨慎录用，不能让这些人在部队中扰乱了阵线。

袁亚承见朱松寿不再坚持处死房其林，也就放下心来告辞走了。不一会儿，余炳德进来报告说：外面有一位县党部的指导干事要见朱司令。朱松寿为房其林的事正烦恼着，听说又有县党部里来的人，猜想一定是来谋差事的，这类人司令部里太多了，将来非闹出事来不可。他生气地对余炳德说：“我正忙着呢，请他改日再来吧。”

余炳德出去了，却没有回来，外面响起了争吵声。朱松寿心中感到蹊跷，轻步向外走去。

只听余炳德说：“朱司令正在与人商量军机大事，没有时间接待你，你这人却不懂军营重地，非要进去，我余炳德就偏不让你进去！”

“我见朱司令，也有重要事情相告。误了时机，你能担当得起吗？再说，你让我进去，朱司令也决不会责怪你失职，我们是多年老熟人了。”那位县党部的指导干事分辩说。

朱松寿一听，那声音好熟，急忙走出门外，见是一个长得极其魁伟的30多岁的大汉，轮廓分明的脸上渗透着劈风击浪般的刚毅神色，两颗黑亮的眸子闪射着利剑似的光芒。朱松寿一阵喜悦，大步冲过去，一手抓住他的胳膊，一手握成拳头，轻轻地砸在他的宽阔坚实的胸膛上，朗声喊道：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老牛！炳德，你不要拦阻他了，让他进去，我们多年未见，好好叙谈叙谈。”

老牛淡淡地一笑，一半亲昵一半揶揄地说：“长脚，你是做了大司令了，我这个小事要见你也难啦，你看你的警卫多尽职，没有半点儿松动。要不是你亲自出来，今天我只能吃闭门羹了！”

余炳德微微红着脸，抱歉地说：“牛同志，我炳德不识尊颜，请勿介意。不过，你自己也该报个名字，以便通报。”

“哈哈，”老牛仰头大笑，“好，好，我从今天起，就姓牛了，你看见我就说牛同志来了！”

朱松寿和老牛肩并着肩走进司令部，两人喝着茶，谈着10年前的往事，不免一番唏嘘。

原来，这位老牛姓郑，叫潮涌，江阴城郊人，最近改名张志强，老牛只是他的绰号，在亲近的几个熟人中叫着。朱松寿第一次认识他，还是在1927年1月17日周水平被杀那天，在江阴县署照壁血淋淋的人头下面，有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学生在批评几位嘻嘻哈哈的人“麻木不仁”，最后留下一串颇有英雄气概的话：“怎么样？你想抓人？我叫郑潮涌……”不久，在江阴农民暴动的大潮推动和影响下，老牛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去。1928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过中共江阴县委宣传部长。30年代前期，江阴地区的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老牛于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入狱而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他就离开了江阴，到外地谋生去了。江阴沦陷以后，家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1938年6月老牛又回到了江阴。这时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老牛就到县党部谋了一个指导干事的差事。最近听说朱松寿的抗日游击队改番号为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就只身一人来到邬墩与朱松寿见面，以

叙旧情，也同老朋友探讨当前的抗日局势。

朱松寿眼睛一亮，暗忖这位老牛说不定已接上了共产党的关系，只要有党的指导，就像远离母亲的孩子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心里就踏实和有了主张。老牛却绝口不提这方面的事，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他在县党部里的所见所闻和县党部与县政府的矛盾，这让朱松寿感到失望。出于对10年前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尊重，这位司令没有在外表上流露出来，只是话语越来越少，老牛已明显地感觉到其中的冷淡和疏远。

临分手的时候，老牛压低声音说：

“朱司令，我们既然已经见面，理应常常坐在一起谈谈。两天后，我到你的小快船坐坐，怎么样？”

“好哇。”朱松寿站了起来，送客出门。

傍晚，朱松寿回到停泊在邬墩村后河浜里的小快船上，对杨绮云说起了老牛的来访，因为不知道老牛葫芦里卖什么药，心中忐忑不安。联想到老牛目前的身份，如果与五支队的袁亚承等国民党官员勾结起来，岂不又增加了一份袁的力量。杨绮云分析说，按照老牛以前的秉性，还不至于完全投到国民党的阵营里去。不过人都在变化着，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看待。比如西石桥的梅光迪，农暴时何等英雄，可是被敌人逮捕后，经不起考验，就叛变投敌了。为了讨好国民党，不惜把你都出卖了。这样的人，我真看不起他。想不到抗战爆发后，梅光迪在澄西也搞起了一支游击队，打起鬼子来了。杨绮云的结论是：同老牛要谈，但要多一个心眼儿。

两天后的傍晚，老牛按照约定，准时来到朱松寿夫妇的快船上。杨绮云就坐到船头上纳凉，一边做着警卫工作，注视着可疑的行人；一边细听着船舱里两人的谈话。

船舱里，传出了两人低低的谈话声，虽然不能全部听清，但从两人和谐的气氛上，可以断定，原先的担忧是多余的了。

“自你同忠义救国军挂钩起，我一直以为你长脚是想做官哩，”老牛坦率地说，抓过一把扇子，用力扇着，“所以上次不敢同你说实话，只是探个虚实。”

“你这老牛，什么时候也学着转弯抹角了？”朱松寿轻松地笑着，用湿毛巾擦了一把额角上的汗水，“老实说，我还以为你要到五支队来插一手呢！”

“有一点我想明说的。”老牛两只神采奕奕的眼睛盯着朱松寿偏长的脸，神情十分严肃，“国民党只是利用你在澄锡虞一带的影响和在战士们中的威望，以利抓住这支2000余人的抗日武装，为他们所用。他们并不会真心地信任你，因为你以前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农民暴动的领导人。至于做官，更没有你的份。你既没有进过黄埔，也没有跨入高等学府之门，论学历，你只能算是个初中生，国民党里做官，讲究背景，讲究学历，像你这样的身份，会轮到你吗？”

“哈哈……”朱松寿禁不住放声大笑，这笑声是友善的，轻松的，“老牛，我们分别不到10年，怎么已经这样看待我了？我拉队伍是为了抗日，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挂钩也是为了抗日，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做官呀，当然，更谈不上到国民党里去做官。抗战胜利了，我就回到朱家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其他还奢望什么呢？”

“恐怕，国民党不会让你抗日到胜利的，”老牛的话像一把快刀，无情地做着解剖，“比如那个新来的专员袁亚承，他就用尽心计窥视着你的那个位置，而你的指挥权一旦落到他的手里，那么，你要当一个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民都难以办到了。现在五支队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一席话让朱松寿陷入了深深的沉默。这些问题，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总觉得没有这么严重。现在老牛都那么看，可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只是袁亚承并没有明显的把柄抓到手，贸然动手如何向整个支队交待呢？再说，与忠义救国军决裂，势必会得罪国民党，而共产党又找不到，部队受到鬼子和忠义救国军的两面夹击，能不能生存下去呢？他把心中的疑虑同老牛说了。老牛向他靠了靠，两人几乎紧贴着坐在一起。

“我已经找到了党组织。”老牛的声音低得第三个人都无法听见，可是朱松寿听起来却像春雷在耳边轰响，他两眼扑闪着惊喜的光芒，那偏长脸上的肌肉在突突地战栗，如果不是因为在窄小的小快船的座舱里，他一定抱着老牛转几个圈儿，以宣泄胸中过分膨胀的喜悦。他正要仔细听老牛说下去，河边响起了警卫班长余炳德的声音。他从船舱中钻出来，余炳德已经跳到了船头上。

“吴副司令有紧急事找你。”余炳德气喘吁吁地说。

“老牛，你在船舱里坐着，我去去就来。”朱松寿回过头去打了个招

呼，就跟着余炳德上了岸，向邬墩司令部走去。

朱松寿走后，老牛在船舱里坐不住，弯着腰走到船头上，见杨绮云还坐在那里。这时天色早就黑了，老牛估计朱松寿一时回不到小快船来，自己在船上久等有所不便，于是对杨绮云说道：“大嫂，我先走了，三天后还要到邬墩司令部来，待会朱司令回来了，你替我向他说一声就是了。”

说罢，老牛跳上河岸，消失在墨黑的夜色中。

再说朱松寿在司令部见到吴子卿，吴子卿告诉他说：

“今天傍晚时分，被禁闭的房其林趁看守的战士不注意，砸开窗子逃跑了。如果就他本人而言，走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挖出一张隐藏在灰暗角落里的黑网来。仓促间，我带了几个警卫员就去追，没有追上。回来的路上，遭到一伙歹徒的袭击，奇怪的是，子弹专向我打来。由于警卫员的拼命掩护，我才得以脱险。”

朱松寿这才注意到吴子卿灰白的头发蓬乱着，过早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愤怒与惊诧的神色。“房其林没有工具，窗子怎能砸开呢？”朱松寿自言自语，又像是与吴子卿探讨着，“这里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许是有人蓄意安排把他劫夺去了。子卿，我们去看看。”

果然不出所料，禁闭房其林的房子十分坚固，窗子也有粗实的铁条挡着，如果没有人事前将铁窗子砸松，凭房其林一介书生，是无法越窗而逃的。可是，到底是谁把房其林劫夺出去的呢？这个谜一时无法破解。

“在五支队内外，有一股潜伏着的敌性势力，他们的目的是要改变五支队抗日的性质，把它变成一支反人民的武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弄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把我偷偷地干掉，这是这股敌性势力的一个目标。因为我的存在，是他们篡夺五支队领导权的一个障碍。我想，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有一天遭到不幸……”吴子卿抬起刻满岁月风尘的脸，似乎在征询朱松寿的意见。

“我一定为你报仇！”朱松寿狠狠地说，“把凶手和幕后指使的人都推上断头台。”

“仇，自然要报，”吴子卿用手指梳理着头上稀疏的乱发，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如果遭到暗害，这支队伍的担子就全部落到了你的身上。现在，我们已经走错了一步棋，国民党方面的人进入队伍的越来越

多，什么时候他们的势力强大起来，就会把你逼走。也许，我们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武装会向我们自己进攻。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党组织，我们和这支队伍，才会有光明和希望。”

“我同你想到一起去了。现在，我们是回到党的怀抱中去的时候了，我想，这样的日子不会很久了。”朱松寿没有把张志强的事告诉他，因为此事还刚刚露出了一个萌芽，什么时候有了眉目，再详细地同吴子卿说个明白。

第二天一早，吴子卿带了张汝明、张俊宝、黄锡春、顾浩根等4个警卫员和2个战士，分坐两条木船，向第二大队活动的恬庄摇去，一是加强与杨春华的联系，防止被袁亚承那帮国民党人士争夺了去；二是按照原定计划要去运一批枪支弹药，加强朱松寿直接控制的一大队与特务中队的武装力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以保卫朱松寿和司令部。朱松寿亲自把吴子卿等人送到船上。想不到这一去，朱松寿从此失去了一个最可靠的挚友与最得力的助手。

3天后，老牛如期又向邬墩司令部走来。他在以前的几次出现，已引起了袁亚承的注意。袁亚承曾派人到县党部了解，县党部内确有张志强其人，不过，张在土地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与朱松寿有过密切的联系，最近频频来找朱松寿，行踪不定，行动诡秘，是不是共产党打进五支队来与朱松寿联系上了呢？袁亚承越想越不对头，立即部署心腹暗中监视张志强。

张志强发现身后有人跟踪就向西墩庵走去。在庵中稍坐片刻，见庵后有一片竹林，浓荫蔽日，凉风习习，向庵内和尚打了个招呼，独个儿走向竹林里。他抬头一看，园中的竹子有碗口儿粗细，裸露着少女般光滑的身子，勇敢地把头穿破由树叶和竹叶组成的巨盖，去争得一分阳光和雨露。栗树粗犷地挺直着男子汉似的坚实的躯体，很霸道地占着一块不小的地盘，它的枝头，开着一朵朵白色的花儿，在碧绿组成的世界里，煞是惹眼与好看。

突然，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奇起来，有棵栗树的半腰挂着一只小棺材，木板已很破旧，系棺材的绳子也快要断裂了。他无法猜测里面有没有尸体。然而，更让他惊奇的是，这片竹林里并不只是一只小棺材，有的还是刚挂上去不久，木板和绳子都是新的，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腐尸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竹林里人迹罕至，很有些阴森和恐怖

的气氛。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无法知道。他慢慢地走着，梳理着纷乱的思绪。五支队像一座火山，由于内部矛盾积聚起来的能量，很快就会猛烈地爆发。他必须抓紧做好工作，让这口火山向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方面爆发。可是，自己已经受到袁亚承的注意和监视，怎样才能和朱松寿尽快接头呢？

这时，张志强看见竹林中闪过一条人影，立刻紧张起来，急忙去掏手枪。可是，出乎他意外的是，这条人影就是他急于要见面的朱松寿。原来朱松寿按照3天前的约定，正等着老牛，余炳德报告说老牛往西墩庵后面的大竹林里去了。朱松寿感到诧异，就从竹林四周的竹篱笆找到一个缺口，弯腰钻了进去。

“朱司令，我已经被别人注意上了，”老牛低声说，“西墩庵附近，还留着尾巴呢。看来，袁亚承已经在抓紧行动了。”

“有个国民党员叫房其林的，因为公开挑拨袁亚承和我的矛盾，被我关了禁闭。”朱松寿也感到形势很紧张，“3天前被人策应逃了出去。吴子卿带人去追捕，险遭他们的暗害。现在，我们最最迫切的就是要找到党组织。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同我直说，用不着绕弯子了。”

老牛环视四周，竹林中依旧十分幽静清凉，四周没有一个人影，这是谈话的极好时机。“我上次告诉过你，我已经找到了党组织。”老牛说，“有一次，我到西石桥去，见到了梅光迪。老梅这个人怎么样，我们暂不去评价。他那里也搞了一支100余人的队伍，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梅光迪对我说，从上海派来了3个人都是党中央特科的。我一听眼睛一亮，立刻追问派来的那些同志他们现在哪里？梅光迪说，有一个叫何克希，有一个叫刘史明，还有一个叫吕平，正在办一个青年训练班。我说我要去找他们，梅光迪就给我写了个介绍信，让我去见刘史明。那天，刘史明住在大岸上，就是瞿秋白舅公舅婆的那个村上……”

朱松寿静声屏息地听着，唯恐漏过一个字，由于环境的险恶，张志强又不能高声说话，他们边走边谈，前面出现一棵一围多粗的大栗树，两人干脆坐在树根边，低低地说着话。

“刘史明是山东人。”老牛继续说下去，“他看过介绍信，弯着舌头儿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地主？山东人直性子，说话干脆脆的。我们连忙说：我们不是地主，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共产党员。刘史明听了高兴极了，大声说道：好啊，现在我们是抗日，打鬼子，你们知道吧？地不

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就把澄锡虞地区的抗日形势作了汇报，刘史明知道了你的近况，十分关心，欢迎你回到党的怀抱中去。”

老牛说到这里，停住了口，显然，他在等待朱松寿的反应。朱松寿霍地跳了起来，像饥渴的人看到了甘泉，像迷航的人发现了灯塔，像走失的孩子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呼唤，这种时候，语言往往是贫乏的，难以表达丰富、复杂、炽热的情感，只有蹦跳、欢呼、眼泪、拥抱等猛烈的动作，才能与内心的冲动相符。朱松寿既不能高喊，也不能拥抱，只是伸出铁锤子一般有力的拳头，“呼”的一声向身边的那棵大栗树砸去。栗树微微摇晃着，忽然“哗啦”一声巨响，从树枝上落下一包东西，朱松寿和张志强都吃了一惊，以为敌人丢下了什么东西伤害他们，下意识地 toward 腰间掏出手枪。

第八节 三先生遇刺

两人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口小棺材，因悬挂的绳子年久腐朽，受到震动，落了下来，木板已经裂开了缝，看得见里面的头颅和白骨。张志强就把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朱松寿对他说，邬墩附近，周庄、长寿、云亭三乡有一个习俗，没有成年的孩子夭折后，是不能埋葬的，必须用小棺材盛着尸体，在夜间抬到西墩庵竹林里，用绳子挂起来，称为挂葬。有的人家做不起棺材，就用柴草编成棺材模样，同样地挂到竹林里来。每年清明节，夭折孩子的父母亲来到竹林里，把隔年或前年挂在这里的小棺材用火烧掉。这一天，竹林里从早到晚弥漫着团团浓烟和臭气。也有的任其自腐。人们为什么这样做？据说可以让后来出生的孩子健康长大。

张志强听朱松寿说罢，也不去深究，又回到主题上，准备讨论怎样对付袁亚承和怎样将五支队官兵纳入党领导的轨道上去。朱松寿正要说话，这时竹林猛烈地摇晃起来，叶子哗哗直响，紧接着，天空布满了厚厚的乌云，东南方向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闪电挤过密密的叶片，给黑沉沉阴森森的大竹园送来了一线光亮。

“朱司令，眼看暴雨就要来临，我们明天再谈吧。我常来这里会招来麻烦，是不是约好一个村子，我们准时到村上碰头，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张志强征询着朱的意见。

“天不作美，可见办成一件事并不那么容易，何况是大事呢？”朱松寿感慨地说。两人决定第二天上午在邬墩南面的一个小村子上再继续讨论下去。

这一夜，朱松寿住在小快船上，辗转反侧，巴不得立刻就天明。吃过早饭，他把船划到小村子附近的河浜，由杨绮云守着小船，自己就向约定的村子走去。

走不多远，前面走过来一个面目姣嫩秀美的小伙子，跨着急促的步子，脸上汗水涔涔。“这不是吴增颖吗，”朱松寿终于认出来了，看见她阴沉着脸，好像有满腹的委屈，就故意和她说几句笑话，逗逗她开心。“那天在澄西，人家抗日救亡剧团的小伙子邀请你去河里游泳，你为什么不去了？我不知道古时候的花木兰，代父从军12年，是怎样混过来的？要不，你就恢复你的女儿妆，反而从容、自在，用不到提心吊胆的了！”

“朱叔叔，”吴增颖轻轻地叫了一声，两颗黑黑的眸子就浸泡在晶莹的泪水中了，接着就悲切地呜咽起来，两只丰满浑圆的肩膀剧烈地战栗着。

“小吴，你怎么啦？”朱松寿倒糊涂起来了。但是很快地明白了，一定是救亡剧团那个活泼而调皮的朱燕来识破了她的秘密，纠缠或欺负她了，“你别难过，让我找他们的团长王桢谈谈，要他手下的团员们尊重你。不过，这些事，你也用不着伤心，你父亲知道了，一定又要责怪你太软弱了！”

吴增颖原来只是低声呜咽，听朱松寿说到这里，忍不住大放悲声，失去控制地扑到朱松寿的身上，伏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泪水顺着漂亮的脸蛋滴到朱松寿单薄的粗布衣服上，不一会儿，已经湿漉漉的了。

“朱叔叔，我爸爸，他……”吴增颖似乎没有勇气再说下去了。

“你爸爸怎么啦？”朱松寿已经预感到问题的严重决不会是救亡剧团的团员欺负她的程度了。

“我爸爸……被敌人……杀害了！”吴增颖终于鼓足勇气向朱松寿报告了令人震惊的噩耗。

朱松寿觉得听到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块巨石砸破了他的头顶，或是一把刺刀砍去了他的一只臂膀，或是一股强电流通过了他的全身，他那高大而微驼的身躯剧烈地摇晃着，两颗粗大的泪珠沿着他偏长黑瘦的脸滚落下来。他竭力镇定自己，尤其在一个年轻人面前更加需要这样。

“子卿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他的遗体呢？”朱松寿哽咽着，问着吴增颖。

“今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我们还没有起床，”吴增颖哭诉着，“妈妈就听见了急促的敲门声，我急忙穿衣出来，来不及梳洗和穿上男装，就去开了门。进来的人自称是船夫，我有些认识他。这时妈也起来了，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吴先生昨天下午在栏杆桥被潜伏在岸上的土匪杀害了，与他一起遇难的还有他的4个警卫员。我们问他是谁杀死的，尸体在哪儿？他什么都没有回答，就离开了我们的家。船夫能来报讯，算是不错的了。也许再细说下去，会危及他的生命。我和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哭成一个泪人儿。我想应该把凶讯告诉朱叔叔，劝慰了妈妈几句，就向邬墩司令部走来了，想不到在半路上碰到了你。”

出了人命大事，又是朱松寿的战友和同志、这支队伍的副司令和参谋长，原定同张志强商量的事只得推迟了，他和吴增颖一起回到邬墩司令部，袁亚承看见朱松寿脸色不好，连忙起立迎进屋去，问道，“朱司令，今天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惹你生气？”

朱松寿就把吴子卿在栏杆桥遇害的事如实说了一遍，袁亚承听了十分悲伤，好言安慰道：

“这位就是吴子卿的公子吴增颖吧，请你转告你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们，我们五支队是在朱司令和三先生的奔走呼号下组建起来的，敌人杀害三先生，也就是企图推翻五支队。这样的仇不报，我袁亚承还有脸面担当这个支队的专员吗？我相信，朱司令也一定会帮你报这杀父之仇的。”

吴增颖泪流满面，不住地点头感谢。

“我想，第一步要把吴子卿的遗体运回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第二步应该查清这次谋杀事件的真相，严惩凶手。第三步，抚恤烈士家属。”朱松寿咬钉嚼铁地说着，原来偏长的脸变得更长了。“我们还要教育五支队的全体将士，不仅要能对付公开的敌人，还要能识破和对付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敌人往往就潜伏在革命队伍的内部，他们比公开的敌人更阴险、更狡猾、更有危险性！”

袁亚承表示同意，并关切地嘱咐朱松寿说：“抗日斗争是一场复杂的民族解放斗争，它的战场不只是在阵地上，而且会在会议桌上，行军路上，宿营地上，日军特务随时随地都会暗杀抗日将士，尤其是影响深

远的领导人。作为五支队的司令长官，光靠一个警卫班是远远不够的，我建议成立警卫排，专门保护你的安全。”

朱松寿仔细咀嚼着袁亚承的话，他是要人们把视线转向日军特务上去，不要怀疑五支队内部会干出杀害副司令的事来。因为自己没有明显的证据，现在同袁亚承去争论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这位专员提出成立警卫排，这倒是可以采纳的。于是简要地同袁亚承讨论了一下人事问题，余炳德任警卫排长，负责保卫司令部特别是朱松寿的安全。

第二天凌晨3点，朱松寿骑了那匹缴获的东洋大白马，离开了邬墩司令部，他佩带双枪，戴着宽边大草帽，一条结实的牛皮皮带，把他青蓝色的土布短褂束在腰际，显得朴实而威风。余炳德率领新成立的警卫排，紧紧跟在朱松寿的后面。他们赶到栏杆桥出事地点，只见5只棺材一字儿排在那里，棺材一端，用墨笔写着遇害人的名字和日期，朱松寿依次看过去，有吴子卿、张汝明、张俊宝、黄锡春、顾浩根，遇害日期都是1938年7月10日。

“这棺材是谁出钱买的？”朱松寿向附近正在赶牛打水的一个老农民问道。

“你是……”老农喝令牛停止了走动，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朱松寿。

“我叫朱松寿，这些遇害的人是我们的战友与同志。”朱松寿温和地说，尽量不让这位老农受到惊恐。

“你就是朱司令，”老农从水车盘上走下来，站在朱松寿的面前，竟然矮了一大截，不得不仰着头说话，“昨天上午出事以后，匪徒们都走了，从船上走出来一个面目白净的年轻人，走到我们村上，给了我们一笔钱，又在纸上写了5个人的姓名，并领人同死者一一对上了号，嘱咐做5口棺材，写上各人的名字，要求搁在原地。临走时对我们说，这些牺牲的都是朱松寿部队的人，过上一两天，朱司令会派人来运回去的。我们连忙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摇摇头就走开了。”

“这个出钱做棺材收尸的年轻人是谁呢？”朱松寿在心里问着自己。他让这个赶水的老农出面，向村上租了一条木船，雇了几个船夫，把5口棺材抬到船上，运回邬墩司令部。

吴子卿遇害的事被周庄泰清寺的和尚知道了，派人来找朱松寿，愿意捐出一块山地，安葬这位抗日英雄和其他4位烈士。朱松寿考虑到泰清寺的所在地龙砂山是一块好地，从江阴到杨舍的公路，沿着龙砂山的南

山脚穿过。而泰清寺的香火又极盛，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的庙会，漫山遍野都是拥拥挤挤的人群。三先生能够长眠于此，得到后人的敬仰与怀念，虽死而犹生。

安葬结束后，五支队内外群情激愤，议论纷纷，都感到事情蹊跷，吴子卿等人乘坐的那条木船，既无枪支，又无货物，更无巨款，土匪抢劫此船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内线通出风声，匪徒们又怎么知道吴子卿会在这条船内呢？那么，又是谁把消息向匪徒告密的呢？吴子卿致力于抗日，这伙匪徒与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朱松寿决定为吴子卿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提醒人们密切注意五支队内部的生死斗争。袁亚承见军心震怒，不便阻拦。追悼会设在长寿茧行的楼底下，正中挂着吴子卿的遗像，两边各挂着一幅针对性极强的对联：

是抗日救国的请进来，
为升官发财的滚出去。

下面，坐着五支队班长以上的军官和部分士兵代表以及地方代表。大家静静地听着朱松寿追述吴子卿的生平经历和斗争业绩，想到吴子卿为着组建这支抗日游击队，50多岁的人了，还像年轻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奔波于外，忙碌于内，弃家抛子，最后竟然不明不白地惨死在一伙面目不清的匪徒手里，禁不住肃然起敬。最后，只听朱松寿激昂慷慨地说：

“敌人把我们的三先生杀死了，把紧跟他的4个警卫员杀死了，因此，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伙敌人是谁，为什么要杀死他？但是，我们从三先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敌人杀死三先生，就是害怕他抗日，尤其害怕他团结和联合一切真正抗日的部队共同对敌，害怕他把五支队2000余官兵凝合成一个人一样，害怕他那双能洞察别人阴谋诡计的眼睛。现在，人们尊敬的三先生不幸牺牲了，大家都很悲痛，然而，只要我们每一个官兵都能像三先生那样去做，像厌恶苍蝇一样去厌恶那些挑唆分裂的人，那些把抗日挂在口头上而热衷于争权夺利的人，那些当着人面甜言蜜语而背后欲置人于死地的人，那么，五支队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细细品味着朱松寿为吴子卿所作悼词的内核，知道五支队上层领导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多数官兵的心是倾向朱松寿的，对袁亚承后来出现的分裂现象有所不满，他们希望朱松寿有办法战胜袁亚承，把五支队引到光明的地方去。

突然，人们被一个男人的哭声吸引住了，数百双眼睛一齐向那个男人望去，原来是长寿镇上的大地主陈祥安。这时，他哭得伤心极了，涕泪纵横，哽哽咽咽，一些人也跟着他流泪，跟着他抽泣。哭毕，他向吴子卿的遗像默默地鞠躬志哀，久久地不肯抬起头来。

站在一边的朱松寿看着陈祥安在众人面前的表演，心下狐疑起来。要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陈祥安与吴子卿素来不合，而且听人说，自三先生遇刺以后，陈祥安关着门天天饮酒，颇有幸灾乐祸之嫌。今天为什么反而做作起来，莫非天底下的恶人都会这一手——私下里咬牙切齿地把人往死里整，而在一切公开场合又称兄道弟热乎异常。

“陈先生注意节哀。”朱松寿弯下微驼的背挽扶着陈祥安，“三先生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活着的人，唯有继承三先生生前之事业，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还有，杀害三先生的凶手，至今未有下落，三先生地下有知，也不甘心闭目。陈先生既是三先生的知己好友，理应协助我们捕捉凶犯。抓到凶犯，顺藤摸瓜，可以查出谁是策划这次谋杀事件的元凶，到时真相大白于天下，再在三先生灵前痛哭一场，比现在流泪要好得多。”

陈祥安缓缓抬起头来，红肿的眼睛虽然浸没在泪水里，可是却看不出一点儿悲伤。“杀害三先生，天理不容，人情不容，法制不容，当千刀万剐，千刀万剐……”他嘴里啜嚅着，慢慢地退回自己的位置上。

追悼会结束后，会场里的人陆续退出茧行，五支队的战士以中队为单位，背着长枪，踏着整齐的步伐，“嚓，嚓，嚓”，沉重而有节奏的脚步声在屋子里震荡。走到吴子卿遗像前，战士们默默地鞠躬，宣誓。一个中队走出去，另一个中队再走进来，周而复始。一种肃穆、悲怆和急于复仇的情绪萦绕在战士们的心头，他们恨不得立即和鬼子打一仗，把胸中的仇恨、怀疑和悲伤，随着发烫的子弹一股脑儿地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

悼念活动一连进行了3天。第四天上午，朱松寿带了一笔款子到吴子卿家慰问。走到吴家门前，大门紧闭着。他绕到后门，后门也关着，可是从里面传出一阵阵妇女压抑的哭泣声。朱松寿担心吴子卿的妻子悲伤过度而出事，于是用力推了进去。屋子里坐着一个年轻人，看见朱松寿，扭身就往房间里躲去。吴妻和男装打扮的吴增颖扭头一看，见是朱司令，连忙叫住年轻人，要他不必躲避。吴增颖介绍说：“这位就是朱司令，是我爸爸生前的战友。”

年轻人返身回来，握住朱松寿的大手，用力地晃动着，神情十分激动。“我终于找到你了！”年轻人声音都有些颤抖，“我姓叶，吴副司令牺牲前的几分钟，嘱咐我一定要找到你，有一句重要的话非亲自对你说不可。今天，总算见到你了！”

“三先生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朱松寿急于知道吴子卿的遗言，打断了对方的话头。

“朱司令，还是顺着事情发展的次序向你报告吧，那天……”

那天，吴子卿在恬庄镇上领到了一批枪支，本该随同装武器的船一起回到长寿。可是，他发现恬庄镇上已经有人注意他了。为了保护这批武器，就在半夜悄悄地另雇了一条大木船，把枪支弹药搬到这条大船上。第二天吴子卿让2个战士押着武器先走了，自己和张汝明、张俊宝、黄锡春、顾浩根等4个警卫员留在恬庄。他这样做，想用自己吸引敌人，让那批武器安全抵达司令部。

小叶是第二大队长杨春华部下的一名中层干部，因为他不满杨春华和袁亚承勾搭搞分裂活动，借着押运武器的名义，跟随吴子卿上了船。吴子卿在恬庄逗留了一天，才开船向长寿进发。这时，岸上既无可疑的人跟踪，河上也没有船只盯梢，吴子卿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木船摇至离栏杆桥一里多路的地方，河道愈来愈窄，岸头却愈来愈高，两岸长着一堆堆灌木丛和长长的茅草。吴子卿走出船舱，向两边仰头一看，催促船夫拼命向前。小叶低声问其原因，吴子卿回答说：“兵荒马乱的年头，过这样的水道最危险，倘有土匪强盗埋伏两岸灌木丛中，丢丢石块就可以把木船砸烂，所以我要船夫快走。”

吴子卿刚进船舱，两岸灌木丛中一齐发枪，子弹都向这条木船打去，情势万分危急。张汝明第一个钻出船舱，看见一边河岸上站着一个人，正在指挥向船上射击。张汝明认识这人，他叫陈志长，长寿乡下人，心中大喜，高声叫道：“志长兄，快别打了，我们都是长寿人，快叫兄弟们下船喝杯酒吧。”

“张汝明弟，”陈志长调笑说，“我们今天见面真不是时候，请你不要见怪，兄弟公务在身，快叫长寿镇上的吴子卿出来说话，我们仍可客客气气，否则不要怪我们手下无情！”

“船上没有三先生，”张汝明分辨说，“他仍留在恬庄。再说，三先生也与志长兄无冤无仇，他是堂堂正正的一条抗日好汉，你们要与他过

不去，不是要被天下人骂祖宗八代吗？”

“汝明，你死到临头，人家骂不骂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陈志长冷笑一声，命令两岸的匪徒开枪射击。几乎与此同时，张汝明手中的枪响了，站在陈志长旁边的一个匪徒中弹倒下滚入河中。张汝明也身中数弹，横倒在船头上。其余3个警卫员先后冲出来开枪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和处于劣势地位，都英勇牺牲了。

这时，吴子卿拉过小叶，神态极其镇静，轻声嘱咐说：“小叶，敌人要的是我，他们不认识你，你只要咬准中途上的船，不会杀你。我死之后，请你出些钱要地方父老把我等收殓入棺，各棺写上死者的姓名和牺牲的时间，尔后迅速去找朱松寿，报告这次事件的经过。这伙匪徒中的陈志长我认识，他是陈祥安方面的人。陈祥安若没有人支持，没有胆量敢这样做。你对朱司令说：贼已上门，贼不除，难安宁，也打不成鬼子。”

说罢，吴子卿让小叶和船夫一起上了岸，走到陈志长身边，陈志长以为他们3人是来拼命的，连连向后退去，边退边举枪射击。只听吴子卿像命令一般不容置辩地说道：“慢！我有话说。”

陈志长的扳机没有立即扣下。“我认识你陈志长，”吴子卿像异乡见到老熟人一样和颜悦色地说，“老实说，我吴子卿和你没有怨，也没有仇，你陈志长对我也一定恨不起来。今天，你是受命于人，主动权不在你之手。我自参加抗战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不过，死在你的手里未免有些遗憾。我死之后，日后你倘或跪在我的墓前，请你务必转告行刑者，不要让你的血流在我墓地的泥土里污染我的一抔净土！还有，跟我上来的一位是船工，一位是半途上船的客人，他们与我无缘无亲，你不能无故加害他们。”吴子卿说完，闭目待刑。陈志长扣下扳机，一梭子弹射入吴子卿的躯体，这位为中国革命奔波了10余年的坚定的革命者，英勇地结束了51岁的生命。

吴子卿死后，陈志长审查了船工和这位客人，当确信与朱部无关后，才将他俩释放了。船工当天就赶到长寿向吴家报告了凶讯，小叶把吴子卿等5具尸体收殓入棺后，星夜奔到长寿，终于见到了朱松寿。

小叶叙述完毕，朱松寿的两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一拳猛地砸在桌子上，失声喊道：“陈志长？这位风流公子，怎么卷到陈祥安的污泥浊浪中去了？莫不是为了一个妓女，死心塌地效劳于陈祥安的鞍前，当了忠实的走狗与鹰犬？”

这需要从陈祥安的一段风流轶事说起。

陈祥安原姓盛，生父是长寿盛巷上的农民，因缺田少地，在长寿镇上谋了个扫街的职业。每天上街，喜欢把儿子祥安带到街上，坐在街头看着自己清扫街道。忙完了手里的活，就搀着儿子进茶店喝茶。有一天，长寿东街一个叫陈鹤年的老财主，看见盛祥安长得眉目清秀，乌黑的小眼珠透露出一股机灵劲儿，就对这位扫街的说道：“我挺喜欢这个孩子，你就让他做我的孙子吧。”

扫街的农民听说此话，连连叩头，这是小老鼠跳进白米囤的好事，他正巴不得呢！原来陈鹤年早年在长寿开粮行发了大财，买地建房，成了镇上数一数二的暴发户。可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陈鹤年的儿子到了40多岁的年纪，仍然膝下无子。眼看就要绝嗣，这位老财主就打定主意领养一个，想不到竟然看中了这个扫街农民的儿子！

盛祥安进了陈家，就改姓陈，自此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公子哥儿的生活，环境变了，渐渐地看不起穷人，连他的生父母都很少往来，讨厌他们的穷酸劲儿和害怕影响自己在陈家的地位。可是，他也有不如意的事，由他爷爷陈鹤年做主，要把皋岸一个麻子姑娘许配他做妻子。陈祥安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婚姻，陈鹤年死不答应，他只得认了命，成婚后，陈祥安与麻子姑娘睡觉，好像抱着一团荆棘一样难受。

好不容易熬到陈家的爷爷去世，又过了几年，继父母也过了世，陈祥安不仅掌握了陈家的全部财产，而且也掌握了自己的婚姻。有一次，陈祥安到苏州城里游玩，在一条小巷子里，有一个艳丽轻佻的年轻女子向他挤眉弄眼，卖弄风骚。陈祥安从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哪能抵挡得住？就跟着女子进了屋，仗着自己有钱，笑吟吟地开口说道：“你既然喜欢我，就跟我到乡下做我的妻子如何？”

“这做不到。”风骚女子扬着漂亮的脸蛋儿说，“你也许已经猜到我的身份，只要有钱，我们在一起亲热几天不要紧。要我跟着你去，你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

“那为什么？”陈祥安被激怒了。

“要我这样的风尘女子为妻，世人议论，你能仍爱我吗？”她做了一个迷人的笑脸。

陈祥安点点头。

“把我从妓院赎出去，要花许多钱。不要说你没有这些钱，就是有

了，你舍得吗？”

陈祥安又点点头。

妓女伸展洁白的玉臂，像蛇似的把陈祥安整个盘绕在自己的怀里，一阵狂吻，在这位年轻嫖客的脸上、唇上、脖子上留下了密密的吻迹。陈祥安把怀中的妓女同家里的麻子老婆从年龄、姿色、风流、文化诸方面作了对比，觉得妓女胜过老婆何止千倍万倍！于是当即与妓院老板成交，花了一笔巨款，喜滋滋地领回长寿家中。麻子老婆虽然醋性大发，无奈陈家大权全在丈夫手中，闹了一阵，也就认了命。

这个妓女姓陆，名桂香，这年才16岁。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像这个年轻的风流母亲一样，雪白的皮肤，大大的眸子，俊俏的脸蛋。陈祥安结婚多年，大老婆并没有给他添一子半女，现在喜得贵子，百倍宠爱。一日偶得感冒，陈祥安以为是儿子受凉所致，让桂香从衣柜里取出一条崭新的鸭绒被，盖在儿子的身上。当时正值盛夏，才几个月的婴儿如何承受得了？当陆桂香为儿子喂奶时，揭开鸭绒被，孩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没有了一丝儿热气。

陆桂香一急就得了大病，吵着要回苏州治疗。陈祥安到苏州买了一幢房子，让桂香住着。病情痊愈后，桂香不愿回长寿去住。陈祥安不放心，就找到了在苏州城里工作的小同乡陈志长，要他代为照顾陆桂香的生活，自己就回乡下去了。不料这位陈志长看着桂香美貌，垂涎欲滴，每天都来献着殷勤。陆桂香毕竟是妓女出身，不会把男女之事看得过于认真，很快就勾搭成奸，形影不离的了。当陈祥安赶到苏州，看着他俩眉目传情，嬉笑取乐，倒把自己冷落一边，如何能容忍陈志长夺己所爱？立即将这位情敌告了，不惜花钱，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陈志长眼看要银铛入狱，生命难保，跪在陈祥安面前苦苦哀求说：“志长无知，冒犯先生，本当服罪，死而无怨也。不过，陈先生与其这样杀死我，不如留我一条性命，日后如有用得到我处，志长不惜肝脑涂地，为你效劳！”

陈祥安沉吟不语。陆桂香也在一旁苦苦相劝。陈志长又说道：“当年荆轲杀了人，燕太子丹仍能收容他，日后果然不惜舍身相报。如果陈先生能饶恕我，我亦愿效仿荆轲，任先生驱遣。”

一句话提醒了陈祥安，农民暴动的风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但是朱松寿、吴子卿等一大批农暴领袖还活着，俗话说“十年世界三反复”，如果日后朱、吴死灰复燃，像陈志长这样的人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想到这里，扶起跪着的陈志长，好言抚慰，又花了些钱与陆桂香脱离了关系。从此，陈志长就与陈祥安形影不离，成了一条忠实的驯犬。

朱松寿讲完陈祥安的这段风流轶事，吴子卿妻子、吴增颖和小叶都肯定地说杀害三先生的幕后策划者是陈祥安无疑，主张把陈抓起来审问。朱松寿摆摆手说：“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首先要抓的是陈志长，凶手一旦落网，不怕挖不到幕后策划人。现在看来，陈祥安的后面还有人。三先生牺牲前托小叶同志转告的‘贼已进门’那句话很有寻味。谁是进门的贼呢？”

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袁亚承，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

小叶还把袁亚承到恬庄拉拢杨春华的活动数说了一遍，朱松寿吃了一惊，如果第二大队被袁亚承拉拢过去，那么，五支队就吃紧了。他想去见张志强，决定加快摆脱忠义救国军的控制。于是安慰了三先生的妻子儿女，就匆匆地离开了吴家。

第九节 颜家桥伏击战

朱松寿离开吴家，向邬墩司令部走去。一路上，他满脑子还在想着吴子卿说的那句“贼已进门”的话。正想着，突然迎面遇上了余炳德。

“朱司令，我正有事找你呢！”

“有事以后再说不行吗？”

“不行，有紧急军事情报，必须立即向你报告！”

“那好吧。”

余炳德跟着朱松寿来到邬墩司令部。他用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端起杯子，舀了一杯凉在缸里的乌黑的大麦茶，咕嘟咕嘟喝个爽快。他用手抹抹嘴巴，抓起一张树床凳，坐到朱松寿的旁边，神情紧张地说：

“今天，从无锡城里开来4船鬼子，每船40多人，停靠在祝塘镇码头上。现在鬼子已经上船，是专为扫荡我们五支队来的。”

这让朱松寿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两百个鬼子，冲着五支队而来，这是对这支游击队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指挥不当，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必须全力以赴粉碎敌人的“扫荡”。然而，由于袁亚承的到来，五支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而且势必激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冲突。吴子卿已

经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生命。眼下，他刻不容缓的是要与张志强商量如何摆脱忠义救国军的控制，回到党的队伍中去。让朱松寿为难的是，这两件大事要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沉思片刻，他决定将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不粉碎鬼子的大“扫荡”，不保住这支抗日队伍，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一会儿，余炳德把袁亚承找来了，朱松寿就把4船鬼子“扫荡”的事向袁说了一遍。袁在大敌压境面前显得不知如何是好。朱松寿不得不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鬼子是专为我部而来，在枪支弹药等方面一定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我们迎上去，好像是小白兔向狼群走去。不如避其锋芒，让敌人瞎捣鼓一通，再瞅准机会狠狠揍它。”

袁亚承以军事专员的名义到五支队以来其实并没有考虑过打鬼子的事，他的全部兴趣和注意力不在这里。他也深知戴笠组建忠义救国军的宗旨并不是真的为了“抗日”，因此他常暗中嘲弄那些“同鬼子干几下”的同僚们书卷气太重。可是，他不打鬼子，大队的鬼子却打他来了。刚才听了朱松寿的话，觉得挺有道理，就点头同意了。

再说这4船鬼子，在祝塘上了岸，先是抢夺掳掠、奸淫烧杀一番，接着就寻找朱松寿的游击队作战。侵华日军无锡宪兵司令部在做了一番细密的情报分析后，认为日军进驻江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案件，诸如毗山狙击日军前锋部队，季庄打死两个鬼子，江阴县城夺枪等等，无不与朱松寿和他领导的游击队有关。宪兵司令部认为在这支游击队还没有足够强大起来之前，必须集中力量把它全部歼灭。可是，鬼子到了祝塘，却看不到朱松寿和他的游击队的影子，于是又向祝塘的四邻出击，仍然无法找到游击队。在接连碰了几次壁以后，不得不准备乘船回无锡巢穴里去。

朱松寿的侦察员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4船鬼子在7月15日上午沿祝塘大河回无锡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就调兵遣将要去打伏击战。袁亚承私下暗付，如果伏击成功，势必扩大朱松寿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在五支队中的威信，不利于自己夺取指挥权。可是，反对朱松寿去打鬼子，这要脱离群众，那该怎么办呢？他的小眼珠子一转，一个馊主意就像从臭水池里冒出来的水泡跳了出来，他用连珠炮似的频率嚷道：“这次伏击鬼子，是五支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与日军正式作战，成败与否关系到五支队的名誉和地位。因此，我们派出的兵将一定要是精兵良将。一大队长不懂军

事，不宜指挥和参加伏击战。”

“谁去指挥合适呢？”朱松寿试探地问道。

“三大队长章晓光，英勇善战，胆识俱全，这次伏击战的指挥非他莫属。”袁亚承说。

“由我指挥伏击战，你以为如何呢？”朱松寿看着表上的时针已划到晚上9点，心中急躁起来。

“我们先不去确定哪个人指挥的问题，我总觉得一大队长懦弱无能，目光短浅，应将他撤了，提拔有用之才替代他。”袁亚承一步步地进攻过来。

“袁专员，”朱松寿额角上渗出了一片汗珠，“现在大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为什么非要撤掉一大队长不可呢？历史上有哪支部队在战前撤换将领的呢？再说，大队长的任免，最终决定权在我，你凭什么非要把一大队长搞下去呢？”

“能者上，无能者下，这正是激励将士用命的主要办法，至于战前还是战后撤换和任命，主动权在我，何必到历史上去找先例呢？”袁亚承没有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

到这时，朱松寿才明白袁亚承利用战前的短暂时间，要挟自己撤换一大队长。如果不答应他的这一无理要求，他就会纠缠得你无法做好战斗准备而延误战机。这正像吴子卿牺牲前所说的那样：“贼已进门，贼不除，难安宁，也打不成鬼子。”自己做了东郭先生引狼入室，最终被狼吃掉，这是咎由自取。可是，这打鬼子的事是民族的大事，人民的大事，无论怎样不能在自己手里丢失战机呀。他咬了咬牙，忍辱负重地说：“祝塘的鬼子不能不打，而且，准备的时间不多了。袁专员，你一定要在战前撤换一大队长，我依你。不过，一大队还得参战，我去阵地指挥。”

“行啊，”袁亚承终于达到了目的，兴致盎然地说，“副官主任李安，素通军事，可继任一大队长。参战部队除一大队外，是否还可请近期在长寿活动的国民革命军独立45旅派一个连配合作战？”

朱松寿走出郭墩司令部，已是7月14日子夜12点了，在门口等候的余炳德埋怨地说：“再过几个小时，鬼子开船走了，莫不是叫我们去欢送他们吗？”

“莫说怪话。”朱松寿命令说，“立即通知一大队紧急集合，并告诉独立45旅旅长贾广文，请借一个连协同作战。”

这是1938年7月15日的凌晨，灿烂的银河斜斜地悬挂在深邃的天空，

像镶嵌在黑色天幕上挨挨挤挤的宝石，被炽烈的阳光晒烤了一天的大地，任凭带着凉意的夜风轻轻吹拂。祝塘大河袒裸着乳白色的胸怀，逶迤曲折地向着无锡古城延伸。在祝塘镇和西阳桥中间，有一座用木头架设的桥，呈东西方向横跨在河岸上，它就是颜家桥。这里大河两岸长着茂盛的荳棵，一簇簇，一丛丛，像刀子般锋利的荳棵叶子在夜风中摇曳，发出一阵阵“沙——沙——沙”的响声。

朱松寿和他的一大队官兵就潜伏在颜家桥两岸的荳棵丛中，独立45旅的一个连则在离河稍远一些的稻田里。成群的蚊虫端着尖尖的长嘴巴，向战士们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在他们的腿上、手上、脸上留下一个个肿块。荳棵划破了他们的皮肤，鲜血和着热汗往下流淌。战士们似乎什么都没有发觉，唯有一双双眼睛直直地盯着坦荡荡的河面，警惕地注视着动静。

突然，河面上传来了一阵阵划水的声音，三四只木船的轮廓出现在潜伏者的眼帘，船上隐隐约约坐着一个个鬼子，他们圆不溜秋的脑袋一个挨一个紧紧地挤在一起。余炳德拉拉朱松寿的衣襟，暗示他鬼子的船队到了射程之内，是否下命令开枪？

朱松寿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察看着木船上的情景。“吱呀，吱呀”，木橹划动河水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船上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一个说：“星稀稀，汗滴滴。今天一定又是个大热天。”另一个说：“卖炭老翁愿天寒，我们卖西瓜的人恰恰相反，天越热越能卖得好价钱。”第三个说：“如果碰到鬼子，不是白送他们吃？天再热也不肯出一个钱。”

啊！这是4条装西瓜的船？朱松寿再仔细一看，这时天色渐亮，船上的人和瓜已很分明了。他惊出一身冷汗来，如果糊里糊涂把船上的人打了，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余炳德把舌头伸得老长，向朱松寿做了个鬼脸，算是检讨了自己的冒失。

东方渐渐发白，一抹晨曦撕破了层层叠叠的黑夜羽翼，把美丽、洁净、素雅的江南夏天原原本本地交还给生活在这里的人民。颜家桥西桥堍，坐落着一座名叫颜家桥的村庄，三三两两的农夫肩头扛着长长的耖，向长着碧绿稻苗的田野走去。村子上，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了淡淡的炊烟。一个俊美的少妇坐在矮矮的木凳子上，用力地搓洗着浸泡在木盆里的衣服。刚刚学会走路的胖胖的男孩，蹒跚地走到她的身边，用小手去扯她胸前的衣服。洗衣少妇擦了擦湿漉漉的手，解开衣衫，露出白莲花

般胀鼓鼓的奶子，小心地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生活就是美”。可是，在日本铁蹄下生活着的善良的颜家桥村民，这样的美能持久吗？

太阳渐渐升高，田野里又升腾着灼人的热浪。埋伏在签棵丛中的游击战士们，一个个大汗淋漓，汗水沿着通红的脸皮，流进眼睛和嘴巴，煞是难受。

“朱司令，”一个胖战士用眼睛同朱松寿说着话，“鬼子怕是不走了吧？我们在这里干等，用一句粗话说，那是痴汉等婆娘，还不如趁早撤离算了！”

“不行！”朱松寿也用眼睛回答着，“就是等到晚上，我们也不能离开这里。这是难得遇到的好机会，送上枪口的鬼子，绝不能便宜他们！”

“是！”胖战士的注意力立即又转向颜家桥东侧的河面上去了。此人就是在江阴县城接应朱松寿劫枪的胖巡士。那天午夜，朱松寿、余炳德等人在胖巡士的协助下，爬上江阴的东门城墙，人、枪刚刚安全到达城外，夜巡的鬼子闻声赶了过来，城内一时枪声大作，朱松寿他们以为胖巡士一定完了！半个月后，胖巡士却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胖巡士在敌人密集的子弹射击下，腿部负了伤，血流不止。他没有立即奔逃，这样做，敌人会循着血迹追踪过来。他敏捷地往旁边的一条小弄里躲去，解下衣衫，把伤口紧紧包扎，又把浸着血迹的鞋子脱下，带在身边。仗着地形熟悉，他很快地潜进自己的家门。他的这一段经历在朱部传开后，大家就给了他一个“打勿煞”的绰号。朱松寿也挺佩服他的勇敢和胆略，几次要提拔他为中队长，都被袁亚承阻止了。

就在朱松寿和胖巡士用眼睛对话的时候，从东面的河面上传来了一阵低低的机器的轰鸣声，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不一会儿，3条铁壳方头船就出现在战士们的视野里。不错，是鬼子，看得清船头上架着的机枪和鬼子目空一切的神色。

与朱松寿埋伏地点靠得很近的战士们，无不把一道道请战的目光穿过签棵叶子的间隙送到朱松寿的面前。可是，朱松寿没有立即下令打。一方面他要让鬼子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子弹和手榴弹发挥最大的威力。另一方面，他还在等着第四条铁壳船，如果提早开火，就会让它溜了。

令人遗憾的是，第四条铁壳船迟迟没有露面，而前三条铁壳船已经

完全进入绝对射程之内，再不开火，就会错过最好的战机。朱松寿大喝一声：“打！”他的两支驳壳枪同时射出了两梭子弹。一时间，埋伏在两岸荃棵岗里的战士们，把憋足愤怒的子弹、手榴弹、掷弹筒，一股脑儿地泼向三条铁壳船里。有的战士是第一次上战场与鬼子真干，看到这个场面，从荃棵岗里站立起来，大叫大嚷：“打中了，打中了！”

这3船鬼子是专门来“扫荡”朱松寿游击队的，可是他们做梦都想不都在这里以这样的形式与这支游击队见面。铁壳子船是滑头船，上面没有船盖，船上的鬼子都裸露在游击队的眼皮底下，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当敌人醒过神来，已有一半以上的鬼子中弹毙命，船上东倒西歪地躺着许多尸体，船舱里、船头上像泼翻了红色油漆桶似的猩红一片。鬼子并不甘心这样全军覆灭，他们迅速地用尸体堆起简易掩体，架起机枪和步枪向岸上还击。刚才那个站立起来呼叫的游击队战士，首先作为鬼子的射击目标，“砰，砰”几声枪响，身上中了子弹，带着激动和微笑，慢慢地倒在河边……

看到自己的战士牺牲，朱松寿一边大声呼喊“卧倒”，一边猛烈地向敌人扫射。他是双枪并使，子弹打得又稳又准。他发现船上两挺吼叫着

的机枪，对两岸的游击队威胁极大，他把两支驳壳枪轻轻一点，两名敌机枪射手都像抽断筋骨似的瘫软在机枪旁边。有几名鬼子带枪跳进河中，潜入河底，当他们在河边刚露出一缕黑发，朱松寿驳壳枪射出的子弹就飞进了他们的头颅……

朱松寿的双枪技法是10年前在江阴农民暴动过程中学会的，在莫斯科银色别墅的军训中又得到了提高，两手可以不停顿地射



2012年12月18日，祝塘镇史志工作者李中林（左）在颜家桥伏击战遗址向当地农民杨富全了解当年战斗情况。（徐泉法 摄）

击。当他右手驳壳枪的子弹打完以后，就迅速地把枪夹到左膝盖里，单手上弹，然后把枪插在腰里冷却，顺手抽出战前就插在腰里的备用驳壳枪，继续向敌人射击。而他在上弹、换枪的当儿，他左手的驳壳枪从没有停止过吼叫。当左手的子弹打完以后，他同样地靠单手上弹、换枪。现在，他凭借着浓密荃棵的遮护，向船上的敌人打得正欢。就在这时，他看见胖巡士纵身一跃，直向敌人的一条船上跳去，他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咚”的一声，胖巡士重重地落在铁壳船的甲板上，稍一摇晃，就站住了，正要端起快机向躲在船角落里的鬼子扫射，一个鬼子以闪电般的速度向他猛扑过去，雪亮的刺刀快要抵到他的胸部了，胖巡士躲闪不及，忙用左手去夺枪，鬼子猛地后缩，锋利的刺刀割断了他的四个手指头。胖巡士大怒，举起右手的快机向那个鬼子头上奋力砸去，鬼子立即脑浆迸裂而死。胖巡士不解恨，又将鬼子的头颅割下，一脚将其踢到河边，像西瓜一般滚到河里去了。接着，又举枪向跳入河中逃命的鬼子开火。

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有一个排跳出荃棵岗，向东面疾走。游击队战士们不知底细，也不知战场上是千变万化的，以为他们临阵脱逃，纷纷投去鄙视的一瞥。这个排的人忍受不了这种误会，吵着要回阵地，只见排长生铁一般的脸色，才嘟嘟囔囔地走了。

这时从大河西面二三里路的地方，冲过来一支生力军，朱松寿以为是袁亚承听见枪声派来的援军，当他们走近颜家桥阵地，才看清是王桢领着抗日救亡剧团赶来了。

“朱司令，我们来晚了，快分配任务吧。”团长王桢找到朱松寿，请求着要上战场。

“准备担架，抢救伤员！”朱松寿平时笑眯眯的面容早到爪哇国里去了，严肃、果断地说。

王桢带着男女团员投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

两个男团员扛着一个伤员向后方飞跑而去。

两个女团员正跪伏在田岸边为伤员包扎伤口。

王桢的背上驮着一个受伤的战士，向附近的村子疾步送去。

又一个战士负伤了，两个男团员抢上去背下火线。李扬好不容易才轮到一名伤员，急忙打开急救包，取出了纱布，可是一时无法确定伤口的部位，而伤员早已昏迷过去了。她慌了手脚，想为伤员解开衣衫去查

伤口，于是一个纽扣一个纽扣地解着，当快要解到最后一个纽扣的时候，伤员突然醒了过来。李扬高兴极了，掏出手帕去擦伤员脸上的血迹，伤员却把脸别了过去。李扬决定继续为他包扎伤口，可是伤员一个鲤鱼翻身坐了起来。“给我枪，让我冲上去！”他声嘶力竭地呼喊。李扬明白了伤员的意图，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身上。“同志，你受伤了，流了很多血，我以救护人员的名义不允许你再上火线去。”李扬绷紧着脸，佯装生气地教训着。“战士的责任在前线！”伤员趁着李扬一不留神，就推开她的身子向前线阵地颤颤巍巍地冲去……

“余炳德！”朱松寿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为警卫排长的舍生忘死精神暗暗叫好，他想制止余排长带着重伤再上火线，余炳德听到朱司令的叫声，向他咧咧嘴表示回答，一刹那钻到荃棵丛中，端起牺牲战友遗下的枪支，又向敌人送去了一批批的“礼物”。

李扬单薄的身上、手上、脸上都沾满了鲜血，救亡剧团的团员以为她挂了彩，抬来担架要她躺上去，她急得流出了眼泪，分辩说：“我没受伤，真的，这血是从伤员身上染到的，他的名字叫余炳德！”

吴增颖也被颜家桥激烈的枪声吸引住了，她自个儿来到离阵地不远的一块荒地上，才想起身边没有带枪，看见救亡剧团的男女青年忙着救护伤员，就向他们走去，准备凑合着做些事。他下意识地走到一个女团员的旁边，地上躺着一个伤员。正当他弯腰去为伤员包扎的时候，觉得有人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捶了一拳，“你是战士，应像余炳德一样上前线去！”明显带有轻蔑和揶揄的成分。她急忙转过身去，与那个男团员打了个照面。

“我们真是有缘，今天又见面啦。”这个男团员就是在澄西拉着吴增颖一起去游泳的朱燕来。战场遇知己，说不出有多少的激动与亢奋，他张开双臂，猛地抱住了吴增颖娇小的躯体，“这位兄弟，来，今天我与你搭档抬伤员……”

吴增颖脸上一阵发烧，对这位男团员的热情和亲切真是又恨又恼，可也怪不得人家呀，谁叫你遮去自己的女儿身，硬要做出须眉样来呢？她只得虚晃一下手指，哄骗道：“你看，鬼子来了！”

朱燕来松开两手，向不远处的河边一看，果然有十几个鬼子正在向岸边爬上来，失声叫道：“鬼子真的来了！”

不错，真的鬼子来了，吴增颖知道救亡剧团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

力，必须立即撤离战场，而团长王桢又背伤员去了，于是尖声说道：

“救亡剧团的同志们，跟我立即撤退！”

从河边爬上来的鬼子嗷嗷叫着，向我阵地打着枪，枪法挺准，游击队已经有几个战士中弹牺牲了。不一会儿，从河边又钻出一小队鬼子，向这边匍匐而来。看样子，这些鬼子不像是3条船上爬起来的残兵败将，而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约有40余人的援兵。颜家桥两岸，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然而，朱松寿却并不着急，指挥队伍调整枪口阻击鬼子的援兵。鬼子气高趾扬地向这边一步步逼近过来，当快要到达河东岸一块坟地的时候，乱坟岗中排枪齐鸣，鬼子纷纷倒下。朱松寿趁着这个当儿，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当鬼子重新组合队伍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朱松寿的部队已全部安全转移，鬼子恨得牙根发痒，驱军追赶，又遭到独立45旅贾广文一个连的阻击，双方各有死伤。鬼子不再追击，收拾残余人马匆匆地坐船回无锡去了。

当时参战的人员都不知道在阻击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支鬼子的生力军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朱松寿是知道的。当战斗开始的时候，他就为河面上只出现3船鬼子而有所防范，派出一个排的兵力设伏在附近的荒坟上。同时通知独立45旅的那个连轻易不要上阵，当第四船鬼子反扑过来的时候，再狠狠地进行打击，力求全歼。那么，鬼子的第四只铁壳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当这只铁壳船跟随其他3船一起开离祝塘镇的时候，机器突然出现故障，就停靠在河边修理。不久，颜家桥一带传出激烈的枪声，狡猾的鬼子知道前面遇到了游击队的伏兵。这时船的故障已经排除，鬼子坐船开了一段距离，就悄悄上了岸，准备对游击队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想不到反中了朱松寿设下的埋伏。

这天下午，朱松寿率领参战队伍回到长寿泗河口，表彰了余炳德、胖巡士等人的功绩，安排他俩和其他伤员养伤休息，并把缴获的枪支弹药分发给一大队参战部队和独立45旅的那个连使用。为了激励士兵英勇作战，朱松寿提拔胖巡士为中队长，袁亚承虽然心中不悦，但实在没有理由反对。

颜家桥伏击战共击毙鬼子96名，打伤数十人，缴获前3条铁壳船上的全部轻重武器。有两名鬼子侥幸从河中脱逃，惊慌失措地向无锡方向奔跑，走到文林包家湾迷了路，强逼村民领路。村民不愿，鬼子扑上去就

打，激怒了全村农民，抡起钉耙铁铲把两名鬼子团团围住。鬼子没有武器，处于劣势，叩头求饶，两个农民从背后抡起钉耙将鬼子活活砸死，挖个土坑埋了。这次战斗，是苏南地区游击队8年抗战中歼灭日寇最多的一次战斗，是江阴人民引以自豪的一次战斗。

第二天，大队日军从无锡经陆路来到颜家桥，寻找朱部报复。可是哪里有游击队的影子！一位腰佩指挥刀的鬼子头目，站在颜家桥顶上，用手在额前架起凉棚，向四处眺望，看见一块四五亩面积的西瓜地里滚着青褐色的大西瓜，在烈日下向干渴的鬼子发出无声的嘲弄。这位头目猛地抽出指挥刀，在空中打了一个弧形的闪电，300多个鬼子就像一群疯狂的蝗虫落到了西瓜地里，等待着采摘的命令。

“这些满地滚着的大西瓜，一个个都是朱松寿游击队的头颅，统统的给我斯啦斯啦的！”鬼子头目失去理智地嚎叫着，举起指挥刀向面前的一颗西瓜劈去，随即飞起一脚，通红的瓜瓢碎了一地。满田的鬼子争相仿效，刀劈枪刺，足踢拳砸，把昨日失败的怨恨全部发泄到无辜的西瓜上。

距离西瓜地几百米远的颜家桥村民，像受到了骚扰的一窝蜜蜂，趁敌人砸西瓜的当儿，倾巢而出向村北奔逃。昨天那个洗衣少妇因为丈夫不在家，只得一手抱着喂奶的婴儿，一手拉着四五岁的男孩，慢慢地落后下来。她不得不用另一只手去抱那个稍大的孩子。这时，有几个老头儿从逃难的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往村中走去。其中一个看见少妇满头大汗拖着两个孩子很不方便，就好心地劝慰说：“我看鬼子也要得民心的，他们宁可把打败仗的气出在西瓜身上，也不来伤害老百姓。你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如何走得快？不如跟我们返回村里去吧。”

洗衣少妇向西瓜地里的鬼子瞥了一眼，脸都吓得白了，连忙说：“你们千万回去不得，鬼子糟蹋完西瓜，就会糟蹋我们村子的。快走！”

说完，也顾不得老人走不走，自己抱着两个孩子径自向北逃去。

再说那300多个鬼子在西瓜地里尽情发泄完，抬眼看见不远处的颜家桥村，就嚎叫着向村里涌去，正遇上几个老头儿返回村里，也没问话，就举着刺刀向他们的胸膛戳去，老人就像几截枯树似的倒在路边。这时，鬼子发现了前面的逃难人群，拉起枪就打。枪声带着血腥的恐怖在七月流火的空气中四散蔓延，村民们慌不择路地向前奔跑，已经有几个人中弹倒在路边的水稻田里，把发烫的稻田水染得通红。

鬼子的枪声还在响着，一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尸体。

抱着两个孩子的洗衣少妇憋着一口气猛跑，枪弹在她的头顶和左右呼啸而过。终于走到一条低坝上，摆脱了鬼子的射击。她庆幸在这次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坐在路边喘着粗气。

“妈妈，血，你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血！”大男孩惊叫起来。

少妇低头一看，下腹部已经猩红一片，鲜血渗过薄薄的裤子，正一滴一滴地掉到地上。她惨叫一声，手中的婴孩抛得老远，倒在地上翻滚、喘息、战栗着。当大男孩抱着他的弟弟爬到母亲的身边，她已经通体僵硬了。

鬼子又举火焚村，颜家桥畔一片火海。

——据亲历劫难的徐利生老人回忆，这次颜家桥惨案，被鬼子打死12人，打伤1人，烧毁民房60余间，这年冬天，冻死小孩2人……

第十节 郇墩兵变

朱松寿知道颜家桥村民遭受鬼子的疯狂报复，心里像油煎般地难受。可是，他不能感情用事，这是一个有出息的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与被失败激怒的强大敌人正面较量，那么这正中鬼子的奸计而必然遭到严重的挫折。

无锡的鬼子接连下乡报复，都没有找到朱松寿的游击队，就改用江阴城里的鬼子下乡“扫荡”。县城的鬼子联合澄东各据点的日军一齐出动，企图一举将东乡的抗日烈火扑灭，形势十分紧急，朱松寿决定率部跳出敌人的“扫荡”圈子。凑巧京沪沿线的抗日游击队采取联合行动，集中力量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干线，派人与朱松寿联系。朱松寿一口答应，连夜率领一大队及特务中队、警卫排、抗日救亡剧团向苏州外跨塘进发。临走前，朱松寿把余炳德、胖巡士隐蔽在群众家中养伤，并向他们密嘱一番。袁亚承和司令部里的其他大小官员则分散隐蔽在周庄、长寿乡村。

第二天，袁亚承带着他的贴身警卫黄文虎到了第三大队驻地璜塘乡下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大队长章晓光。

“朱司令带着一大队执行任务去了，我想用这段时间，帮你整训部队，提高战斗力。”袁亚承亲热地说。

“袁专员是党国的栋梁之才，事必躬亲，五支队一定能常打胜仗，发展壮大。”章晓光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球术指导员，知道要得到上司的青睐与器重，打不打胜仗是极其次要的，最要紧的是看你奉承的功夫如何。

“章大队长，”袁亚承叹了口气，“戴笠将军派我到五支队担任专员，我也有过雄心壮志，想把五支队带成一支能征善战之师，以尽抗敌守土之责。可是，人心不往一处想呀，有人要把好端端的这支游击队往分裂主义的泥坑里拉去。”

章晓光一听话中有因，赶忙站起来去上了门锁，并嘱咐警卫人员说：“没有我的话，你们不要走进室内。”他又坐到袁亚承面前，正色问道：“袁专员，此话怎讲？眼下大敌当前，国难深重，谁搞分裂，谁就没有好下场。”

“有人喜欢培植亲信势力，我就不赞成。比如说，这次颜家桥打鬼子，我主张让你们三大队参加，可是没有通过。昨天，京沪沿线游击队联合行动，要炸铁路，我又提出带你们三大队一起出去锻炼锻炼，有人就是不赞成。”袁亚承数说着，显得十分生气，“还有，颜家桥一仗缴到多少武器？我认为应该三个大队三一三余一地分配，结果呢，全部肥了一大队。”

章晓光被刺激得坐不下去了，像一条盛怒的猎狗，在屋子里转着圆圈，嘴里呼呼喘着粗气。

“照这样下去，你这个大队长早晚被他撤了。我虽是个专员，可是司令专横跋扈，到时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呢？”袁亚承双手一摊，显得十分为难，“再说，这位司令你们不是不了解，10年前，他曾率领成千上万的农民造过反，攻打过政府的公安局，焚烧过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的府邸，知道政府最终不会容他，正与澄西、无锡方面的共产党勾勾搭搭。说不准什么时候把队伍往共产党那里一拉，我们等着坐牢与杀头就是了！”

章晓光见袁亚承已经把问题点明，就试探着说道：“既然跟着朱司令不会有好结果，我们不如趁早散了？”

“这是没有志气的话。”袁亚承把头凑了过去，用很低的声音咬着耳朵。不要说外面的人听不到，就是章晓光也只能听明白个大概。

这位三大队大队长脸上没有表情，莫名其妙地沉默起来。其实，他也是一位颇有心计的人。既然你袁亚承要利用我章晓光的力量，那么，你也应该给我一份相应的报酬。总不能为了你袁亚承的成功，让我白白

地为你奔波、冒险和卖命。如果现在不提出来，到时你还会想到我吗？

袁亚承看见章晓光默然不语，知道这是他在向自己要价，慨然说道：“我袁某是中央派来的人，历来说话算数，只要章大队长肝胆相照，同除共患，事成之日，你就是五支队的副司令兼三大队大队长，怎么样？分量不轻吧？”

章晓光这才春风荡漾起来，恢复了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的本相，开门大声喊道：“副官备酒，为袁专员接风，通知小队长以上全部参加。”

“国难当头，不必过于铺张。”袁亚承心里异常痛快，“与兄弟们见见面，叙叙衷肠，是我袁某之愿也，清茶一杯足矣！”

朱松寿带着400多人的队伍，悄悄地行走在江南水乡的田间小路上。夜色朦胧，人影绰绰，裹着凉意的晚风扑到身上，像姑娘温馨的手帕轻轻擦去他们身上的汗珠。救亡剧团的青年们今晚特别兴奋，因为队伍是向他们母校的所在地靠拢。李扬开始走得挺有劲儿，到了后半夜，慢慢地支持不住。她咬紧着牙，不吭一声，因为朱司令骑着大白马就走在她的前面。在跳越一个水沟时，李扬一摇晃，摔倒在水沟里。朱松寿听到声音，回头一看，急忙跳下马来，把李扬抱上马背，自己走在马侧，扶着她的后背，缓缓前行。

黎明时分，朱部到达无锡县方桥驻扎下来。下午，朱松寿把救亡剧团团长王桢找到身边，询问黄埭镇的敌人驻扎情况，王桢一一据实相告。

“你反映的情况与我派人侦察到的完全一样，”朱松寿夸奖说，“王文灿这个人以前做过水警，现在当上了伪军。不过，只要他能识时务，允许我部通过黄埭镇，那么，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如果敢与我军作对，我们也绝不客气与手软。王团长，请你把这个意思面陈王文灿，而且需要马上就走，傍晚前回到方桥驻地。怎么样？有困难吗？”

“朱司令，”王桢受到信任，信心百倍地说，“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虽然没有士的胆识与谋略，但有士的热血与忠诚。傍晚请听我的好音。”

果然，王桢在傍晚回到方桥驻地，报告王文灿答应互不相犯。朱松寿立即率部向黄埭进军。夜半时分，当朱部接近黄埭时，王文灿翻脸不认账，沿街埋伏重兵，架着机枪，摆出一副决战的模样。朱松寿大惑不解。王桢为没有完成任务而羞愧满面，愿意再次与王文灿谈判。“王团长二进虎口务必小心在意。”朱松寿嘱咐说。王桢早把性命置之度外从容而去。

王文灿看见王桢走进他的办公室，立即命卫兵将其绑了，怒气冲冲地斥责道：

“你王桢原是吴县乡师的一个美术教师，为什么吃里爬外，带了朱松寿的部队，来抢占我的地盘，缴夺我的枪械？今天让你知道我王文灿的厉害！”说罢就命人将王桢拉出去杀了。

正在危急之际，吴县乡师一位姓计的老先生闻声闯了进来，喝住了刽子手，又问王文灿何故杀人，王文灿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原来计老先生德高望重，王文灿也怕他几分，只得将王桢松了绑，答应朱松寿游击队通过黄埭镇。

朱松寿骑在高头大马上，他的头几乎与两边街道的屋檐齐平。马蹄敲打着花岗石板铺成的窄小的街道，发出清脆的“得得”声。队伍肃然无声地穿过黑糊糊的黄埭镇。战士们并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他们知道，真正的战场还在铁路边，那是真要付出代价的。

袁亚承在三大队整整活动了一天，从三大队长章晓光到警卫人员，都用封官许愿一套卑劣的手法，拉到自己的手里。他很满意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早年在浙江省警官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注意收集历史上靠挑拨离间成就大业的资料颇得其中的奥秘。他认为这是飞黄腾达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因而鄙视那些埋头实干而幻想成就事业的人，认为这是实足的傻瓜。就说朱松寿吧，从打鬼子这一点说，他也佩服其专注和执着，抛头流血，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如果给朱松寿一个抗日英雄的头衔，也并不过分。可是，他断言朱松寿不会成功，太正直、太善良、太厚道，而且还有一个信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弱点，这是成就大事业在性格上的重大障碍。如果他们换了一个位置，这个专员早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因此，他很有信心战胜朱松寿而取而代之。杀吴子卿是向朱松寿进攻的第一步，他成功了。撤换一大队长是第二步，把心腹李安安插到了朱松寿的身边，也成功了。现在走的是第三步，就是把章晓光拉到自己的身边，果然一拍就合。而杨春华则早是他的人了，那是吴子卿死后，袁亚承赶到恬庄，诡称朱司令要查你私通土匪、谋杀三先生之罪，如果不是袁某暗中保护，你杨春华早成为屈鬼了。关键时候的几句话，比馈赠黄金珠宝还有用，稳稳地把一个人拉为心腹，就要看你的能耐了。现在，他还必须同陈祥安等人挑明利害关系，组成最广泛的反朱战线。时机一到，他就要挽起袖子大干了。

“陈先生，事情明摆着，五支队的前途，像一块跷跷板，不是朱松寿那头翘起来，就是我袁某人的这头翘起来，就看你投向哪一边了。”袁亚承在警卫黄文虎的护卫下，离开璜塘到了长寿，见到陈祥安，开门见山地说。

“袁专员，这还用说吗？10年前，我同朱松寿就较量过了，在长寿，有了他，就没有我陈祥安的立锥之地。今年年初，朱松寿借着抗日，拥兵自重，我等低声下气，那是敷衍着他。现在有袁专员撑腰，我陈祥安也不是好欺侮的，比如杀吴子卿……”说到这里，陈祥安看见袁亚承接连眨着眼睛，也就收住了话头。

“这我知道，”袁亚承抢着说，“我要的是你公开站出来，领着队伍，象10年前围剿暴动农民那样去打，去杀，去烧！在各镇由当年自卫团改编组成的武装中，你陈先生应该带个头，这样，云亭、周庄、峭岐、长泾等地的武装也会纷纷响应，何愁朱松寿不除呢。”

“我担心……”陈祥安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苦。

“你担心什么？”袁亚承两眼紧紧地盯着他那张城府极深的脸。

“杀朱松寿，我不怕，这样的人，杀得越多越好，越多越解恨。可是，朱松寿以前是共产党的人，日后共产党同我算起账来，我有几个脑袋可以抵账啊？你们部队说走就走，我是和我的房屋、田产、账簿、长工、老婆联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些，我一天都活不下去。”陈祥安不无忧虑地数说着自己的难处。

“大丈夫闯荡天下，就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勇气，像陈先生这样患得患失，何异于弱女子呀，到了这个地步，你干不干可由不得你了，到时得听我的命令行事。我们有言在先，我是军事专员，一切得按军队的章程办。军法我想陈先生也是懂的。”

……

朱松寿带着部队安全通过黄埭镇，黎明前，又在偏僻的村子里隐蔽宿营。当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朱松寿做了简短动员，部队就像草原上的黑色马群，越过苏（州）常（熟）公路，向苏州东郊外跨塘奔去。

这时，京沪沿线的几支游击队已经集结在外跨塘，朱部的任务是和甘露镇的杨筱南游击队一起扒铁轨，炸火车，其余的游击队设伏外跨塘东西两侧，阻击从苏州或昆山出来的日伪军。

朱松寿和杨筱南各自指挥部队爬到铁轨上，取出随身携带的榔头、

扳头、铁棍，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朱部有一个从未见过火车是何物的青年农民，摸着冰冷平滑的铁轨，以为它就是火车了，像小孩玩木马那样坐到铁轨上，说什么也不肯下来。朱松寿走近他的身边，告诉他这是铁轨，火车是在铁轨上滑动的。

“朱司令，我在铁轨上坐了好一会儿，怎么没有滑动半步呢？”青年农民好奇地问。

“火车有轮子，人怎么能和火车相比呢？”朱松寿感到他问得有趣，可又不能当着众人的面讥笑他。

“朱司令……”那个农民似乎不搞清楚火车与铁轨的关系不肯动手拆轨。

“现在不是研究学问的时候，”朱松寿不得不打断了他的问话，“当打败了鬼子，我介绍你当一个铁路工人，让你一天到晚看火车，摸铁轨。”

青年农民才满意地跟着拧松铁轨上的螺丝，扒去枕木上的石子，用肩膀抵着铁棍和大家一起去撬沉重的铁轨。朱松寿看着他们一时无法松动，就帮着干起来。只听他像闷雷一般吼叫一声，陡地一用力，铁轨就极不愿意地缓缓离开了路基。众人再一齐使力，一节长长的表面被车轮摩擦得雪亮雪亮的铁轨，被抛到路基旁边。

杨筱南来找朱松寿，请求帮助埋烈性炸药。朱松寿欣然前往，三下两下就埋好了。杨筱南极其钦佩地说：“可惜甘露与长寿相距太远，我们倘能经常在一起，杨某能从你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该有多好！”

“杨司令，你我齐心抗日，志向相同，即使相隔千里万里，心也是靠近的。”朱松寿言真词切地说，“如果什么时候想不到一起去了，那就不想看，我也讨厌见你，常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罢，两人拱手告辞。这时已是后半夜。外跨塘附近的铁轨被游击队拆得支离破散，又埋下了不少炸药，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各自散去。当朱松寿领着队伍撤离外跨塘不远，后面传来了“轰隆隆”数声巨响，一列装满弹药的鬼子军用火车越出轨道，发生爆炸，引起连锁反应，把整列火车炸成废铁一堆，冲起的火光把外跨塘映得通红一片。

……

这几天，袁亚承紧锣密鼓地频繁活动着。朱松寿和朱的嫡系武装的外出，余炳德和胖巡士的养伤，为他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制造分裂的环境。他一天中要走几个乡镇，争分夺秒地找五支队的下属头目和地主武装的

领导人谈话，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他发现，五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包汉生是个人才，在气质上很接近他，此人心狠手辣，喜怒不露于脸，不仅陈祥安无法与其相比，就是章晓光、杨春华等辈，都相形见绌。美中不足的是包汉生已经40余岁，年龄偏大了些。尽管如此，此人还是有很大利用价值。

现在，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要与司令部里的一班人，诸如参谋副官、军需、书记、军法官、报务员等统一思想和行动。这些人中，大多是袁亚承从上海带来的国民党方面的人物，有一部分是本地人，也大多是倾向国民党政府的知识分子。然而，要让他们与朱松寿决裂，特别是要拿着刀举着枪向朱松寿及其一大队大规模地公开杀人，恐怕还有些问题。吃过中饭，这些人都到齐了，袁亚承躊躇满志地扫视着与会的司令部人员，一改先前说话急急巴巴的陋习，用极其平缓，极其郑重的语调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我们这个会议，是关系到五支队的命运和前途的会议，是与朱松寿决裂……”

“报告，朱司令和一大队回到司令部。”警卫黄文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像冬瓜上落下一层浓霜。

袁亚承立刻停止了话头，宣布散会，迎接朱司令凯旋。自己笑嘻嘻地离开座位，向宅外走去，看见朱松寿骑着白马，像滚动着的一朵白云飞奔而来，片刻工夫，已奔到场角。朱松寿翻身落马，紧走几步，与袁亚承握手，向站在场上的司令部人员挥手致意。

“朱司令，这次参与京沪沿线游击队的联合行动，大功告成，劳苦功高，我代表五支队司令部全体官员向你致敬。”袁亚承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

“抗抗日寇，保国守土，这是我创建游击队的初衷，自然也是五支队的宗旨。这次外跨塘破路，规模空前，群情激愤，附近民众冒着危险送瓜送茶，我和一大队、特务中队的战士都大开眼界，这告诉我们：抗日，就能得到人民拥护；不抗日，就会被人民抛弃。”朱松寿侃侃而谈，袁亚承才知道这位司令对他这段时间的阴谋活动依然蒙在鼓里，于是放下心来。傍晚时分，参加外跨塘破路的全体战士回到郇墩，袁亚承都一一予以慰问。

朱松寿突然回到郇墩，并非出于偶然。临去外跨塘破路前夕，他知道自己离开司令部，袁亚承就会乘虚而入，拉帮结派，扰乱阵线，这对

自己是不利的，尤其对带着队伍回到党的怀抱会带来更多的阻力。可是，他实在无法放弃这次抗击日寇的机会。在他心目中，抗日是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大事，无论什么力量哪怕是毁灭生命都不能改变他的这个宗旨。再说，那一段时间颜家桥战斗后，江阴城里的鬼子天天追踪他和一大队的行动，避一避敌人的锋芒也是必需的。为了暗中监视袁亚承的阴谋活动，他让正在养伤的余炳德和胖巡士暗中注意袁的一言一行。这样，袁亚承的频繁活动都落入了他们两人的眼里。而第二、第三大队也并非都是铁板一块，有一部分人对朱松寿有着很深的感情，不满意袁亚承的分裂活动，也就把这一段时间的不正常现象暗中捅给余炳德等人。

余炳德闻讯猛吃一惊，准备连夜去找朱松寿。转念一想，说不定自己的行动也已被袁亚承派出的眼线注意上了，自己一走，只会促使他们立即背叛朱司令。正在左右为难之标，杨绮云提了一包点心来慰问伤员。余炳德顾不得致谢，急忙把袁亚承的分裂阴谋告诉了杨绮云。

其实，杨绮云也是朱松寿临走时周密安排的，他知道余炳德、胖巡士的行动会受到限制，而杨绮云去探问伤员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接着，杨绮云又去看望了胖巡士，得到了袁亚承许多新的消息，立即派人向朱松寿报告。朱松寿当机立断取消了去常熟与任天石领导的“民抗”联系的计划，迅速率部返回。为了尽快赶到邬墩司令部，他决定让队伍白天行军，自己骑着东洋大白马，像一颗流星，在碧绿的江南原野中飞驰，只用了几个小时，就从苏州北郊赶回邬墩。

当晚，朱松寿召集司令部人员在邬墩开会，报告了颜家桥伏击战和外跨塘破路的经过，诚恳地告诉大家：“由于这两次活动的成功，五支队在江阴甚至澄锡虞三县人民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五支队做出了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人民就不会忘记我们，历史就会给我们留下光荣的记载。相反，如果我们的眼睛不是盯着侵略者，不是千方百计地去消灭他们，而是千方百计地在内部制造摩擦，酝酿分裂，打击同志，做一个内斗的英雄好汉，那么，即使一时能够得逞，可是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历史也会给这些人记下可耻的一页！”

袁亚承坦然自若地坐在朱松寿的旁边，油光光的脸上没有一丝反应，两束阴沉沉的目光不时地在与会者的脸上往返移动着。他发现一些人既不敢正视朱松寿，也不敢正视自己，好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耷拉着脑袋。他不满地撇了撇嘴，继续听着朱松寿的报告，分析着字里行间深刻的内

涵，琢磨着应付的对策。

散会后，朱松寿回到停泊在村后河浜里的小快船里，余炳德、胖巡士和一大队的中队长承小纹等人早已等候在船舱里，小船受到超重的压力，船身沉得很低。他们是奉朱松寿的命令前来集中的。朱松寿还要安排警卫员去周庄茂墅桥县党部驻地找张志强，要张前来一起研究驱袁大事，没有找到，只得作罢。

朱松寿历数了袁亚承进入五支队以来的分裂活动，话未说完，余炳德抢先说道：“朱司令，袁贼的所作所为，在座的都是清清楚楚的，还重复什么？我看，今晚就把他杀了，再整顿队伍，清除余孽，这支队伍还是我们的！”

余炳德的话像冰棍丢进油锅里，刺激了大家的神经，引起了一阵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捕，有的主张软禁。朱松寿冷静地听了各种议论，平静地说：“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虽然袁亚承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但我们不能首开杀戒。而且杀了袁亚承，第二、第三大队会不会情急生变？袁在司令部里的亲信会不会狗急跳墙？群众会不会以为我们在搞内江而有所非议和失望？”

“杀戒不是我们开的，”余炳德有些沉不住气了，“三先生是怎样死的？还不是袁亚承勾结陈祥安，指使陈志长把他杀死的！三先生生前曾要我监视和观察袁亚承，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所为。朱司令，容情必有害！在此危急存亡关头，应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请下命令吧。”

余炳德急火攻心，汗水浸湿了粗布短褂，他猛地脱下短褂，抓把扇子使劲摇着。杨绮云看着他这副样子，用手遮住脸面窃笑。朱松寿借着快船内那盏昏暗的小桅灯，看见余炳德右胸膛和左胸下侧两个鲜红的伤疤，不禁心里一紧。右胸的那个疤还敞开着血红的口，显然是颜家桥伏击战中新挂的彩。而左胸下端是个老疤，朱松寿记忆犹新，那是余炳德为救他而负的伤。

这是今年割麦时节的事，朱松寿带着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去袭击澄杨公路上的一队日军，结果被敌人包围在云亭横村桥附近的田野里。敌人一边让翻译喊话，要朱松寿投降，一边紧缩着包围圈。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余炳德悄声对朱松寿说：“你把白马让我骑，青布短衫让我穿，再借一支短枪给我，让我装成你的样子冲出去，鬼子必然前来追我而放松对这里的包围，或许大家都能活下去。”朱松寿不忍心余炳德去冒此风

险，余炳德就去夺马，朱也只得依他。果然，余炳德骑着白马一冲出麦地，鬼子都向他打枪，余把身子藏到马肚下，躲着敌人的子弹。鬼子见伤不着他，恼羞成怒，驱动全队人马去追他。余炳德见敌人追得紧了，抽出身边匕首，向马腿上刺了一刀，自己滚入一条河中，潜在水下。白马受了伤，疯狂似的向前飞奔，背上没有了负担，速度就更快了。结果，朱松寿、余炳德和30余人队伍都安然脱险。不幸的是余炳德左胸下端中了枪弹，那匹心爱的白马也丢了。几天以后，白马回到了郇墩司令部。自此以后，朱松寿对余炳德视同儿子一般，每有建议，都注重采纳。

可是，这次余炳德力主要杀袁亚承，朱松寿却犹豫不决，唯恐影响了江阴地区的国共合作，对抗日不利，于是下决心道：

“袁亚承还是不能杀他，但要抓住他，作为人质，逼迫袁的亲信交出兵权，退出五支队。抓袁的重任，就交余排长去执行。”

“抓人哪有杀人痛快？”余炳德很不满朱松寿的婆婆妈妈，只是军令如山，不能打半点折扣，于是领命而去。朱松寿和其他人在船里坐等消息。

这时已经黄昏9点多钟，袁亚承从司令部出来后，沉思半晌，以为朱松寿对他最近一段时间的阴谋活动依然蒙在鼓里，也看不出朱松寿有重大举动的迹象，才放下心来，让黄文虎站着岗，自己走进堂屋后面的浴室。这时，村上有一个外地来走亲戚的姑娘，已经站在浴锅前，正要脱衣下水，看见袁亚承进来，羞红了脸连忙退出，却把带来准备替换的旗袍、内衣忘在里边的矮墙上。

余炳德带着七八个警卫战士到这家农民的堂屋里，黄文虎连忙拦住，余炳德说：“朱司令让我找袁专员，有急事相商。”

黄文虎说：“袁专员在洗澡呢。”

“那我去催一催他。”余炳德抢着要冲进去。

“有事明天再说吧。”黄文虎竭力阻止着。

“军情如火，一分钟都等不得。”余炳德面露愠色，再次要冲，黄文虎知道有变，故意大吵大嚷道：

“军情再急，也要让人穿着衣服出来。你总不能把袁专员从浴锅里拉出来，去见朱司令吧？如果着实要紧，朱司令也可以直接来谈，为什么非要让专员去见他不成？”

“黄文虎，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朱司令请不动袁专员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司令不是要让专员兼了吗？”余炳德知道再争吵下去会惊

动司令部里的人，用眼示意同来的警卫战士冲进去抓人。就在此时，大门外走进来四五个人，一个是高明澄，其余几个是副官和军需。黄文虎连忙向他们眨着眼睛，高明澄就来拦余炳德，其余几个就去拦警卫战士。这种场合，如果余炳德大喝一声，拔出手枪，击毙几个，再冲进浴室，抓住袁亚承，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可惜他没有这样做，拘泥地执行着朱松寿的命令。正在吵吵嚷嚷之际，从后面浴室里走出来一个胖胖的姑娘，头上堆着花衣服，身上穿着碎花旗袍，低着头，很害羞地从堂屋里的男人群中穿过。余炳德感到纳闷，浴室里不是袁亚承在洗澡吗？怎么走出了一个胖姑娘？正欲仔细辨认，堂前的一盏煤油灯被高明澄打翻了，一片漆黑，房东家急忙出来点火，一时又擦不着火柴。费了好大的劲，才点亮了灯。

余炳德侧耳一听，后边浴室里仍旧响着劈劈啪啪的声音，才放心下来。堂屋里的人越来越多，再晚就无法执行逮捕袁亚承的任务了。余炳德趁人不注意，闪到后面的浴室里。这里亮着一盏很暗的灯，浴锅里依然传出洗澡人的拍水声。“袁贼，你今天能躲得了吗？”他在心里骂道，一个箭步冲到浴锅前，伸出两只铁钳似的大手，往浴锅去抓人。结果抓住一条臂膀和一条小腿，就用力提出水面，往地上放去。因室内光线过暗，余炳德低头一看，竟是一个滑溜溜水灵灵的姑娘，两手死死地捂着两个丰腴坚挺的奶子，张着惊恐的眼睛，似乎在发问：‘你这小伙子到底要怎么样？’她又不肯大声咋呼，因为她知道一咋呼堂前的男人都会围过来看热闹，说不定还会提着灯来照她身上几处最羞见人的部位呢！

“袁亚承到哪里去了？”余炳德压低声音问着，也是担心堂前的人挤过来不好收拾。

“我不认识圆鸭方鸭的，今天才来邬墩走亲戚。”姑娘也低声回答。

“那你怎样走进浴室洗澡的？”余炳德说着，侧过脸把她的衣服丢了过去。

“今晚9点左右，我到这里来洗澡，正要脱衣，有一个胖胖的穿香云纱短衫短裤的男人走进浴室，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我就让给了他。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再到这里来，堂前站着许多男人，灯却熄着，我就趁机挤了进来，走到浴室听听没有声音，我就脱衣下了浴锅。不一会儿，就被你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看你也不像坏人，我就不计较你了。”姑娘一边背着余炳德穿着衣服，一边解释着。突然，她发现这是刚脱下的脏

衣服，急忙用它遮着雪白的前胸和下腹，去找放在矮墙上的碎花旗袍和内衣内裤，却找不到了。“我的衣服被人偷光了！”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余炳德一切来龙去脉都明白了，刚才走出去的那个胖胖的姑娘，就是袁亚承偷穿了这姑娘的衣服化装逃出去的，堂前的那盏煤油灯是高明澄在发现了改妆的袁亚承以后故意打翻的，而眼前的这位姑娘，却是无辜的。他赶忙向她赔礼道歉，走到堂前，把带来的七八个警卫战士叫出门外，飞奔到村后的小快船上，向朱松寿报告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检查了自己的失职和鲁莽。

朱松寿没有批评余炳德。第一，他清楚袁亚承的脱逃与其说是余炳德的过失，还不如说是自己的责任，既不允许开枪杀人，又没有采取更为严密的部署，让袁亚承钻了空子。第二，他压根儿没有把袁亚承的脱逃看作是对他和五支队的严重威胁，因而采取诸项紧急措施。这同他没有真正认识袁亚承和没有从根本上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他对小快船上的一大队骨干和心腹干部说：“袁亚承只是个野贼，他能发出什么威来呢？就是拉走章晓光 and 杨春华，也没啥了不起。我们的部队只会更纯净，更团结，也更有战斗力。你们也许都知道，10年前我是共产党的人，后来与党失去了联系。现在，我们还应该回到党的怀抱里去。只有这样，我们的部队才有出路，才有方向。”

他停下话头，观察着大家的情绪变化。船舱里的人都下意识地向他挤过去，手里的扇子都凝固在空气中似的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急促起来。他很满意，继续说了下去：“前一段时间，我们犯了错误，这主要是我的错，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过分地相信了国民党，相信了袁亚承这个人，挂了个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的番号，这叫引狼入室，这责任自然在我。这些人一进来，讨论抗日，打鬼子，他们别着头，架着二郎腿，半点儿都不感兴趣。可是，背着我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一个个都生气勃勃，精神焕发的。他们甚至勾结土匪搞暗杀活动，可以肯定地说，吴子卿就是被袁亚承、陈祥安一类人杀害的，他们欠下了一大笔血债。”

这时夜已深了，朱松寿来不及讨论袁亚承脱逃后五支队的去向等一系列问题，就散了会。临走时，要求大家明天一早赶到鄞墩司令部集合，以对付紧急事宜。

第二天凌晨。朱松寿就早早地到了司令部。不一会儿，昨晚小快船

上的几个人除杨绮云外都到齐了。正要商量袁亚承的事，一个警卫进来报告说：“袁亚承派人来找朱司令，正在外面等着。”朱松寿就让他进来说话。

来人就是黄文虎。昨晚，余炳德没有抓住袁亚承，就带着警卫战士离开了那里，黄文虎和高明澄等人，就迅速通知分住在邬墩农民家里的袁亚承的骨干连夜撤走。朱松寿暗付：袁亚承搞分裂拉走了一部分人枪，又派黄文虎来做什么文章呢？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黄文虎在朱松寿对面坐下，毫不在乎地说，“昨晚余炳德来找袁专员，这本来是挺正常的事，我却想到别的方面去了，双方就争执起来，后来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袁专员以为有变，就提前离开了浴室。我们看见他走了，也一哄而散离开了邬墩。现在，袁专员很后悔，觉得不该这样鲁莽行事，伤了朱司令的感情。”

“那袁专员为什么不回到司令部来呀？”朱松寿问道。

“误会一经发生，双方都会产生一些芥蒂。”黄文虎辩解道，“袁专员现在在三大队长那里，他让我来司令部，一是向朱司令负荆请罪，二是请朱司令派个代表，双方就消除误会，加强团结，共同抗日等问题，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谈。朱司令和在座各位认为如何？”

“我们欢迎袁专员和跟他一起出走的司令部里的人一同回到邬墩来，我们不计较他的轻率和鲁莽。至于要说清楚问题，也可以嘛，袁专员到五支队两三个月，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朱松寿一针见血地说，“他自己能说清楚，这说明他有诚意。他不愿意说清楚，那也不要紧，反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

这时的朱松寿以为已经认识了袁亚承，其实只是认识了他的一半，他的另一半，是在继续的较量中认识的，而且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黄文虎临走的时候，朱松寿让十八亩桥能言善辩的张厚生随其同往。虽然没有任何想法企图凭借谈判解决问题，更没有奢望袁亚承会同他言归于好，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从谈判桌上可以揭露袁亚承的卑劣手法和分裂阴谋这一角度考虑的。他把张厚生拉到一边，轻声嘱咐道：

“你不要怕袁亚承，也不要怕县党部、县政府方面的人。真理在我们这边。谈判桌上的这一场斗争，就全权托付你了。我相信你能击败对手，不辱使命。”

朱松寿待张厚生、黄文虎走后，又提出回到党的队伍去的问题，因

为具体联系这件事的张志强不在场，一些具体的问题无法深入讨论下去，只得再派人去寻张志强。

公正地说，朱松寿在这成败得失的关键时刻，没有看到主要的威胁来自袁亚承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好像从铁笼子里逃出去了一只猛兽，损失的不仅是丢失了多少钱，而是要吃人，包括要吃铁笼子的主人。

这一天对朱松寿来说，就这么轻易地过去了。当袁亚承从浴室脱逃的第二个黎明到来的时候，五支队的司令部邬墩村被黑压压的部队包围了。令人遗憾的是，一大队长李安命令部下不准抵抗，战士们自然不能容忍敌人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捕去，愤而抗击。但是，一边是蓄谋已久的兵变，一边是逼不得已的反抗；一边是反革命阵营的大联合，一边是孤军奋战；一边是袁亚承亲临前线指挥和督战，一边是朱松寿不在军前……虽然真理在朱松寿一边，但是在具体的战场上赢得战争的主要依据还是力量强弱的对比和指挥的正确与否，而不是哪一个占理，哪一个不占理。

邬墩的枪声仍在响着，硝烟仍在弥漫。袁亚承好像一个导演正在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得意地等待着最精彩一幕的出现——他的部下押着五花大绑的朱松寿、杨绮云来到自己面前，听候自己审问、宣判和处决……

朱松寿和余炳德被枪声惊醒，急忙叫起杨绮云，出门向邬墩瞭望。只见村前村后墩上墩下，都是密密麻麻的士兵。朱松寿无法理解袁亚承何以能够驱动这么多人来进攻自己，更无法理解袁亚承昨天还派黄文虎来司令部要派人谈判，今天就兵戎相见！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理清这些问题了，他住宿的云亭塘湾村距邬墩不远，袁亚承在邬墩抓不到他，必然派兵四出搜寻。果然，村西出现一支队伍，正向塘湾急速逼近。

朱松寿、余炳德和杨绮云急忙向村西走去。一条河流挡住他们的去路，杨绮云不会游水，朱松寿左手挟住妻子，右手划动河水，向对岸游去。爬上岸刚走过几条田岸，又是一条河拦在面前，他们又跳入河中。这样一连蹚过几条河，朱松寿已精疲力竭，余炳德伤口未愈，浸了河水，隐隐作痛。3人身上都湿淋淋的，正要找个村子休息一下，突然前面窜出一支队伍，约摸30余人，看样子在此已等候多时。余炳德大叫一声，拔出短枪，正欲冲上去拼命，被朱松寿轻声喝住，他自己双手握着驳壳枪、两眼喷着灼人的烈火，一步步向前走去。

第十一节 朱、袁九思街对阵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眼看就要爆发一场近在咫尺的枪战，这时，敌军阵营中有一人把枪丢在地上，向朱松寿迎来。朱松寿以为有诈，仍紧握驳壳枪不放。两人越走越近。余炳德和杨绮云的心快要蹦出胸膛了。

“朱司令，你还认识我吗？”那人率先说了话。

“你是……”朱松寿警惕地问。

“我是黑皮呀，就是十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和几位穷兄弟帮着你把一船稻摇到无锡，你把卖稻的钱都送给了我母亲治病。自此以后，母亲天天念叨着你，说你是救命恩人，要我日后一定报答你的恩情。”黑皮的话显然是诚恳的，感情是真挚的。

“你现在是……”朱松寿记起来了，是有这件事，以后还去动员过黑皮参加区农民协会，只是没有答应。

“后来，我母亲死了，正愁无法生活，云亭镇上招募税收工作人员，我去报了名。后来才知道上了当，这是一支游击队，而且是受袁亚承领导的。我把不满情绪埋在心里，当上了一个小队头目。昨晚，袁亚承有通知来，要我们设伏在这里，说谁抓住朱松寿夫妇，奖金3500元。我一听，心里很反感，你出7000元，我也不愿干。后来想通了，如果能与你见面，不是报答你的极好机会吗？想不到果真在这里见到了你！”黑皮很高兴地说着，像异乡遇到了知己，如果不是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他会毫不含糊地拉朱松寿3人去酒馆喝酒的。

朱松寿为今天的奇遇惊诧不已。年轻时候读《三国演义》，当看到华容道关公放曹操这一段，常恨关公因私情而误了刘备的大事；而现在，不是也需要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掩护他一下吗？他回过头去，向杨绮云和余炳德使了一个眼色，3人就像上街喝茶买菜的农民，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前面的游击队并不认识朱松寿，见自己的头目与此人这样亲近，就让出一条路来。

他们3人走出不远，后面枪声大作。朱松寿以为黑皮反悔了，回头一看，见枪口都朝着青天，在放空枪呢！朱松寿才知道黑皮用心良苦，这

枪声是用来欺骗袁亚承的。尽管如此，朱松寿仍担心黑皮以后的处境，后来听说黑皮借故离开了这支游击队，他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郇墩兵变的第二天，朱松寿让杨绮云到了上海。

这一天，张志强在周庄茂墅桥县党部听到郇墩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知道事情起了变化。自7月中旬朱松寿向他明确表示脱离忠义救国军，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后，他一直关心着事态的发展。可是，紧接着朱松寿就率部伏击了颜家桥的鬼子，以后又到了苏州外跨塘破坏京沪铁路，脱离一事始终排不到日程上来。这几天来，他一直为此事费着心机。他相信和了解朱松寿，知道这个人民族意识很强，绝不会随意放弃一个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机会，虽然朱松寿自己受到打着“合作”旗号的、以朋友面目出现的一伙人的严重威胁。张志强一直想提醒朱松寿，抗日战争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局部的地区和特定的环境里，也不能放松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进攻。这同10年前农民暴动时的形势是不一样的，那时国共决裂，敌我阵线分明。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袁亚承抢先向朱松寿发动了武装进攻。他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在郇墩兵变的第三天在沙洲九思街找到了朱松寿。

“我太麻痹了，”朱松寿悔恨交集地对张志强说，“我总是用国共合作的眼光来看待袁亚承和倾向于他的那些地主武装，可是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善良，他们日夜想着夺取我们的部队，夺取我们的生命！”

“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张志强劝慰说，“我们应该把郇墩兵变中打散的部队收集起来，请何克希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与忠义救国军划清界线，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江阴抗战的中坚力量。”

朱松寿简要叙述了事后才搞清楚的郇墩兵变的主要经过——袁亚承那天从浴室逃走后，黄文虎和司令部里的国民党官员先后尾随而去。他们到了璜塘三大队驻地，准备第二天凌晨发兵进攻郇墩。正巧三大队放假，兵员来不及集中。袁亚承害怕朱松寿天明后兴兵问罪，就派黄文虎来到郇墩，以互派代表为幌子，稳住朱松寿。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以章晓光的三大队、杨春华的二大队为主力，包括长泾包汉生的教导大队以及长寿陈祥安、云亭曹遇良、周庄缪伦千、峭岐吴聚波的地主武装共计1000余人，分三路包围了郇墩司令部。这次兵变，两个大队公开叛变了朱松寿，各镇地主武装也投向了袁亚承的怀抱，一大

队和特务中队损失步枪100余支，一部分士兵被袁部俘去。个别人改换了门庭，特别不能理解的是朱松寿的亲信中队长胖巡士，居然自己走到袁亚承那里而“照旧供职”，一大队战士都骂胖巡士是没有骨气的软骨虫。此外，抗日救亡剧团也与朱松寿失去了联系……

“就这样，一支2000余人的抗日队伍，被袁亚承分裂去了一大半。”朱松寿痛苦地说，“现在，我们还有一大队特务中队、警卫排以及横河大队，昨天作了整顿，编成7个连1个排。这次兵变遭受的巨大损失，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这支部队，是右倾错误的必然结果。”

张志强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西石桥的何克希（1906~1982）。何克希感到事情紧急，跟着来人追星赶月般地来到九思街，详细听取了朱松寿关于袁亚承发动鄂墩兵变篡夺五支队的汇报，又察看了九思街到张家港一带的地理形势，然后召集朱松寿、张志强以及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他很威武地站着，左手撑着腰，右手在空中划着弧形的和直线的动作，以增强说话的分量：“国民党奉行的政策，一向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袁亚承排挤、暗算、坑害你们，这是很必然的事情，你们能公开地同忠义救国军决裂，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代表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热烈地欢迎你们！”

“袁亚承搞兵变得了手，尝到了甜头，决不会就此甘休，他的眼睛一定会盯着这7个连1个排的武装。他可以不打鬼子，不扒铁轨，不炸桥梁，但是，他不能不同我们搞摩擦。摩擦、内斗是这伙人的嗜好，受过专门的训练，有着特殊的技巧，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很有手腕，因此，我们在狠很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了对这伙人的防范与警惕！”

“现在我代表党组织，授予你们‘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任命朱松寿为司令，张志强为政治部主任。其余同志的职务，原来是中队长的，还是中队长，原来是大队长的，还是大队长。”

会场上响起了有力的掌声。朱松寿两眼闪烁着明亮的光芒，他像在夜色茫茫的原始森林中迷失了方向，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住了何克希的手，上下摇晃着，大声地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和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每一个战士，一定珍惜党给我们的荣誉，好好总结教训，在抵抗侵略军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把部队壮大起来，发展起来！”

中队长承小纹问何克希：“我们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接受共产党的

领导，大家都感到有了出路，有了奔头。我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问何书记，这支700多人的部队，军饷如何着落呢？”

朱松寿连忙向承小纹眨着眼睛，示意他不要随便提问题，可是何克希却热情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好。部队要吃饭，要穿衣，要购置军需武器，这都离不开钱，这钱从哪里来呢？我已经作了一番调查，九思街离张家港不远，那里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商港，每月税收有五六十万元，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可以在这里设卡收税，这是合理负担，商人和群众都不会有意见。这样，你们还愁没有军饷吗？”

大家都拍手赞成。何克希也不征求朱松寿和张志强的意见，当即对兵力作了部署：把700多人枪分成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从泗港到张家港；第二道防线沿河布防，直到张家港口；第三道防线九思街，司令部就设在九思街。

朱松寿听了何克希的兵力部署，觉得3道防线对保护税收是无懈可击，奸商要逃税，小股匪徒要抢劫，都难以逾越3道防线的屏障。可是，如果鬼子或袁亚承率部前来袭击，兵力分散容易被敌人击败。他把这个想法如实地提了出来，何克希解释说：“朱司令，你应该相信我，在军事上，我是科班出身，年轻的时候毕业于宜宾军事政治学校，怎样布防，怎样出击都懂得一些。不错，三道防线会分散兵力，但防线不是死的，凝固的，根据战斗的需要，随时可以集中起来，这中间，情报工作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书记何克希，授予朱松寿部“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图为何克希。

（原载《何克希诞辰百年纪念集》）

何克希原姓和，四川峨眉县人，父亲是做白蜡生意的，终年往来于四川和云南之间，把云南生产白蜡的虫子，运到四川去繁殖和生产白蜡。经过多年经营，在峨眉县城有了一幢一上一下的街面房子，在近郊置有10多亩土地。5岁那年，母亲因妯娌之间的矛盾，一手抱着何克希，一手抱着弟弟何允恭，悲悲切切痛哭一场后服毒

自杀了。这件事对幼年的何克希刺激很深，长大后才知这是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折射，因此十分痛恨那时社会的黑暗。高中毕业后，父亲利用旧式借贷搭了一个会，收了一笔会钱，千叮万嘱送他上路去北京投考大学。还没有离开四川，他的路费被人偷去了。正当他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宜宾军事政治学校招生，他就去报考，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被学校录取。1929年，车耀先在成都介绍何克希加入共产党。1935年1月27日在家乡峨眉县城组织暴动失败，又在车耀先的介绍下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8年5月，上海党组织派他到江阴澄西地区争取梅光迪抗日。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澄东的朱松寿，当张志强同他接上关系后，就派张志强到朱部工作。现在，朱松寿终于回到了党的队伍，何克希在军事部署上自然会尽力帮着这支新生的地方抗日武装。

朱松寿不再说什么，按照何克希的指示部署了兵力。果然不出几天，张家港的税收数额可观，比挂五支队番号时的军饷多出了几倍，军心大振，士气高涨。何克希看到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生机勃勃，向朱松寿、张志强嘱咐一番，就回到了西石桥梅光迪部队。

1938年9月某日，朱松寿和张志强正在九思街司令部坐着，讨论如何扩建武装的问题，忽报有人求见。朱松寿刚刚答应，那人就跨着大步闯了进来，司令部里回荡着嗡嗡的响声：

“我说朱司令这么难找啊，原来到九思街来了，那周庄郭墩，可是个卧虎藏龙之地，朱司令怎么轻易放弃呢？你不可惜，我还为你惋惜呢！”朱松寿抬头一看，原来是江阴青洪帮的一个大头目，原名黄秉忠，绰号黄鬚，叫他绰号的人多了，真名反倒被人遗忘。此人抗战前做过国民党江阴县侦缉队长，捕捉过共产党员和农民暴动的骨干分子，同朱松寿从来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说过话。今天，他是负有什么使命来的呢？

“郭墩固然好，可是有人不让我朱某待下去了，8月那场兵变，你也不会不知道。我是诚心待人，他们却以怨报德。与这些人共事，何异于同禽兽共处？”朱松寿提起郭墩兵变，一股愤恨直冲上来。

“朱司令，那我就直说了。”黄鬚的粗嗓门像敲着一面破锣，“袁公郭墩动兵，内部厮杀，固是不妥。不过事出有因，袁公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局势，已不能同10年前你们搞农民暴动相比了。国共合作，是国民党领导抗日。你也许知道，共产党的正规军，都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改编和指挥，北方的叫八路军，南方的叫新四军，何况你们这是自发组织起

来的民众武装，更没有理由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我看朱司令应该三思而行，回到五支队去为上策。袁公气量大度，答应给你上校参议之职，朱司令以为如何？”

“我朱某组织武装，并不是为求一官半职，而是为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朱松寿毫不让步，针锋相对，“如果袁亚承能够认识邬墩兵变乃是叛逆行为，那么，他应该前来负荆请罪才是。你也许不会忘记，我是五支队司令……”

“这是以前的事了，”黄懋得意地抢着说，“自邬墩发生冲突，忠义救国军总部已撤销了你五支队司令之职，委任袁公为司令，章公为副司令，新建了一大队，编制职务，都作了变动。听说你也有了新的番号，新的上司。我以为你跟着共产党，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10年前是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你已饱尝滋味。10年后的今天，如果你仍执迷不悟，结果一定更糟。”

听着黄懋这一连串威胁利诱的话，朱松寿仰头大笑道：

“我朱某参加革命，无论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都是为了图民众之解放，让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不受土豪劣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何曾考虑过一己之私利？不过，我这颗头长在自己肩上，也不是轻易让人取去的！”

黄懋还要纠缠下去，朱松寿高喝一声：“送客！”余炳德走进司令部，敦促其快走，黄懋没有完成袁亚承的任务，只得悻悻而去。

第二天，袁亚承又派人来劝降，朱松寿一口回绝。一连几天，劝降的人踏破了九思街司令部的门槛，虽遭到严词斥责，仍嬉皮笑脸赖着不走。朱松寿突然醒悟，这是袁亚承进攻前的一种预兆，企图借此分散朱的注意力和干扰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战备。可是已经晚了，袁亚承指挥队伍突破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铺天盖地向九思街卷来。这次比邬墩兵变动员了更多的兵员，计有：“忠救”五支队、十支队，澄东各镇地主武装，共有2000余人枪，超过朱松寿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3倍兵力，且朱部仍分布在张家港等3道防线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朱松寿提着双枪，亲临前线指挥。九思街防线的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见朱司令如此英勇，增加了克敌制胜的信心和勇气，凭借街道房屋，奋力抵抗，双方兵刃相见，进入激烈的巷战。沿街商店，居民群众，见两军厮杀，虽然心里向着朱松寿，却帮不上忙，只得将店门关闭。朱松

寿一连击毙几个“忠救”，被袁军发现，呼喊着他包围过来。正在紧急之际，余炳德率领警卫排冲散“忠救”的包围圈。有一名顽军端着长枪向朱松寿瞄准，被余炳德看见，慌急之间，他左手猛推朱松寿，右手向那个顽军射击，顽军饮弹倒下，可顽军的那颗子弹却已飞出枪膛，由于朱松寿已被推向一边，子弹直向后面的一个士兵射去。那个士兵只觉胯下被什么东西搔动了一下，用手一摸，像伸进血浆库似的染得通红，才知道自己的阴囊中了枪弹，痛得没命地嚎叫起来。朱松寿见敌我强弱悬殊，命令抗日自卫军撤退，九思街防线崩溃。朱松寿两次兵败，心痛欲裂，现在该到何处立住脚跟，以求东山再起呢？

“锦丰镇的杨行方，昔日与我交情甚厚，可去暂时栖身，以图发展。”朱松寿对张志强说。

“杨行方是忠义救国军第六支队司令，我们到他那里岂非自投虎口？”张志强担心地问。

“我深知杨行方为人，虽为忠义救国军，但决不会出卖我。我们一边争取他摆脱‘忠救’控制，一边收拾九思街失散兵员，两军联合起来，力量就强大了。”朱松寿依然十分自信，毫无气馁之色。

朱松寿与杨行方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原来杨行方的伯父杨在田，父亲杨在山，兄弟两人在锦丰镇上是很有名望的大财主。朱松寿年轻的时候，曾拜杨在田为干爹，彼此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杨行方一直是干兄弟相称。抗战爆发后，杨行方依仗家庭的雄厚经济实力与社会基础，组织起了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藉以保护杨氏家业，也伺机打击日寇。1938年春夏之交，就在朱松寿的游击队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收编为五支队的时候，杨行方的武装被编为六支队，杨被任命为六支队司令。可是，国民党并不真心解决这些地方武装的军饷，组织他们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而是从这些游击队司令手里夺取兵权，把游击队蜕变为国民党控制的特务武装。杨行方眼看着“忠救”总部派来的专员林云江一步步地借“训练”为名，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心中十分恼怒与不安。正在这时，朱松寿带着张志强、余炳德等人，到了锦丰镇杨家大院。

杨行方看见朱松寿等人走进大院，立即出迎，命家人摆下酒席。寒暄毕，就向朱松寿问起邬墩兵变的前因后果，朱松寿叹了口气说：

“行方兄，我们都是知己，彼此可以说说心里话。我们都上了国民党的当，被人耍了。忠义救国军派来的专员和其他官员，一个个都是特务。

他们当着你的面司令长司令短，叫得怪热乎的，同日寇接仗，偶有小胜，更把你吹得天花乱坠，民族英雄，名垂史册，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出来。更有甚者，这些人还喜欢研究你的嗜好，迎着你的胃口向你家里送甜的辣的。”朱松寿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酒，夹起一块红烧鸡肉向嘴里送去，细细咀嚼，似乎在回忆当初受奉承时的个中滋味。

“朱司令，你慢慢地说，我们是一根藤上的瓜，命运最终一样的。六支队有个专员林云江，刚到锦丰，人地生疏，那时要巴结我，什么好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这种人，最不值钱，是特务、流氓、娼妓。”杨行方肚里也有着气，两人很快就说到一起去了。

“可是，他们背着你，又在干什么呢？”朱松寿把一块鸡肉咽下肚去，狠狠地说，“他们挑拨关系，封官许愿，经济收买，绑架暗杀，世界上的一切丑事都干得有滋有味。我是认识了这些人，看透了这些人的本质。杨司令，你也许有着同样的体会吧？”

接着，朱松寿从同忠义救国军接洽谈起，到吴子卿在栏杆桥被暗杀，郭墩兵变以及九思街兵败，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杨行方也把军事专员林云江在六支队的分裂、篡权活动告诉了朱松寿、张志强等人

“这是故伎重演。”张志强愤愤地说，“杨司令，请恕我直说，照此下去，朱司令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我看与其被这批人蚕食六支队，不如杨司令先下手为强，把林专员抓了，宣布脱离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结为友军。你们这里有条十一圩港，税收不亚于张家港，可以自己解决军饷问题。杨司令以为如何？”

杨行方自幼嗣给伯父杨在田，受到百般宠爱，过着公子哥儿式的优裕生活，没有在艰苦的环境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受磨炼，遇事常常犹豫动摇。说话可以激昂慷慨，真要他下决心干的时候，又瞻前顾后的了。朱松寿见杨行方没有接张志强的口，知道不能强求于人，先住下来再说，杨行方忙安排他们食宿。

第二天，杨行方的六支队司令部门前来了几个人，未经通报，就向里走去。杨行方很不高兴，忙问他们是哪里人？来人气高趾扬地说：

“我们是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司令袁公派来的，据可靠情报，朱松寿昨天从九思街逃往锦丰镇，藏匿在六支队司令部。袁司令知道你们不了解朱松寿底细，故不予追究。但是，必须把朱松寿擒拿归案，送交五支队司令部，否则一切后果均由杨司令负责。”

杨行方无法理解，昨晚的事情，袁亚承怎么知道得如此之快？莫非是那个专员林云江把消息捅了出去？如果真是这样，再犹豫徘徊就没有他的路走了。五支队的来人一走，杨行方就把此事告诉了朱松寿和张志强。

“行方兄，事到如今，只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了。”朱松寿显得格外平静，大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条，就是把我朱某扭送给袁亚承，作为你晋升的垫脚石；一条，就是把那个林专员软禁起来，公开宣布与忠义救国军割断关系，我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真正做一番抗日救国的宏伟大业。”

“朱司令，你把我看成是何等样人了？出卖朋友，以图一己之安逸，这不是杨某的个性。事到如今，我不得不铤而走险，扣压林云江，与忠义救国军反目。”杨行方终于下定了决心，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立即命人带了足够的兵力逮捕林云江。

林云江被软禁以后，六支队的形势立刻紧张起来。杨行方日夜同朱松寿、张志强商量如何整顿队伍，肃清内奸，并聘请张志强做了六支队的作战参谋。这时，朱松寿在九思街打散的人员陆续来到锦丰镇。据这些归队士兵说，九思街那一仗，横河大队损失并不大，很快又集结起来，驻守在金童、仓廩、三甲里、占文桥一线，袁亚承一面派人带了任命书到各中队劝降，一面暗中侦察兵力部署。劝降未成，一夜之间就把横河大队全部缴了械。江阴东乡已成了袁亚承的一统天下。大小据点里的鬼子见游击队互相火拼，坐山观虎斗。袁亚承则同日军取得默契，眉来眼去，一心扑在鲸吞共产党领导或倾向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上。

朱松寿听了归队人员的汇报，感到形势极其严峻。袁亚承的势力与日俱增，必然不能容忍六支队跟着共产党走，也不能容忍自己和仅存的200余人的队伍去发展壮大，一场规模更大的决战是无法避免的。他也想到远在西石桥的中共澄锡虞工委书记何克希。可是，他那里也只是梅光迪拉起来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和青训班的几十个学员，无暇顾及澄东的形势。朱松寿无法理解在大敌面前袁亚承等辈竟置日军于不顾，却津津有味地干着削弱抗日力量的丑事，他们日后如何向人民交账呢？他也不能理解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为什么不赶快开拔过来，而让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在敌后抢占地盘，为非作歹？

果然不出所料，袁亚承见杨行方不愿献出朱松寿，释放林专员，又纠集澄东和锡北地区忠义救国军和地主武装的全部力量，约数千人枪，

偷袭锦丰镇。为了刺激参战人员卖命，袁亚承许下诺言——攻下该镇，各部尽情掳掠，不予追究。朱松寿、张志强和杨行方率部迎敌，无奈六支队都是地方子弟，平时又缺少严格训练，一听枪声，无心作战，四散隐蔽去了。朱松寿的200余人枪，虽然屡次与袁亚承交战，颇为英勇，终究寡不敌众，也被顽军打散了。袁亚承的“忠救”联军很快占领了锦丰镇，纷纷冲进商店和居民家中，有物抢物，有钱抢钱，参战的包汉生部，抢得许多香烟和名酒，扛回长泾老巢挥霍享用去了。

这是朱松寿第三次与袁亚承作战，身边已无一兵一卒，只得同张志强、杨行方在十一圩港乘船去上海，找杨在田商量。杨在田同其弟杨在山，年轻时在长江边靠雇用民工围筑沙田成了暴发户。这时在上海大通轮船公司做董事长，既有资财，又有势力。当他听了朱松寿、杨行方的叙说，虽然对袁亚承的卑劣手法颇为不满，对朱、杨的处境深为同情，可是却不赞成自己的侄儿和干儿子跟共产党走，认为只有跟着国民党才有出路和前途。朱松寿碰了壁，和张志强商量，让他先回江阴派人收集旧部人员，再去澄西向党组织汇报，朱松寿找到杨绮云的住地，暂时住下等待江阴方面的消息。

1938年10月上旬的一天，朱松寿在上海盼着张志强的消息，心中焦躁，便在住宅附近的马路边遛达，忽然看见前面两个挺熟悉的背影，紧走几步。那两人见后面有人跟他，回过头来，3人都惊奇万分，原来这两人是救亡剧团的团员，一个是朱燕来，另一个是李扬。朱松寿像见到亲朋好友似的邀请他俩走进一家饭店，找了个雅座，点了几个菜两瓶酒，边吃边叙谈起来。

朱燕来和李扬互相补充，把邬墩兵变后抗日救亡剧团的遭遇向朱松寿作了详细汇报：

那天，抗日救亡剧团住在距离邬墩较远的村子里，天快亮的时候，听到邬墩方向枪声不断，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七上八下跳个不停。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袁亚承穿着一身短袖无领的黑香云纱衫，紧绷着油光光的脸，两颗小眼珠闪烁着狡黠的光，走到抗日救亡剧团的驻地。团长王桢迎了上去，紧张地问道：“袁专员，今天早上邬墩司令部响了那么久的枪声，出了什么事呀？”

“你们大家都坐下，”袁亚承伸出两只胖胖的保养得极好的手招呼着，等团员们都围着他坐定后，才极其严肃地说了下去，“告诉你们一件很

遗憾的也是无法想象的事，我们这个支队的司令长官朱松寿同志，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原因，今天凌晨，带着一大队、特务中队和警卫排，突然袭击了驻在司令部附近的二、三大队，打死打伤数十个战士。当时我感到非常气愤，鬼子还在屠杀我国同胞，可说是大敌当前，国难深重，朱司令这样做不是有失众望吗？不过，我严令二、三大队不准开枪，自己人厮杀，不是让鬼子笑话吗？朱司令在糟蹋了一批抗日战士后，就带着部队杀气腾腾地向东去了。”

袁亚承的两束眼光在每一个救亡剧团团员的脸上扫去，似乎在观察有没有人怀疑他说话的真实性，见大家都是一片迷惘之色，于是又继续演说下去：“我说过，朱司令这样搞分裂活动，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袁专员不在场，也一定不会相信。我还希望朱司令能回心转意，回到五支队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五支队的同志，都不要去议论这件事，更不要去指责朱司令，对朱司令原来重用过的干部，我们更不能冷待他们，而是应该继续信任他们，重用他们，爱护他们。如果朱司令什么时候回到五支队，他还是司令长官，五支队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还应该拥护他，支持他，信任他。”

抗日救亡剧团的团员们陷入了五里雾中。他们知道，这支队伍是朱松寿和吴子卿一手组织起来的，宗旨就是抗击日寇，保卫家乡，而且已经用一系列的行动证明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那么，朱司令为什么要自己分裂自己的队伍呢，这好像一个正常的人自己去分割自己的肌体一样不可思议。是不是这位袁专员在暗中搞鬼把朱司令排挤出去了呢？可是，从刚才的一番话中，好像袁亚承对朱司令并没有太深的仇恨，相反倒还很宽容的呢。因此，这些年轻的团员们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能在搞清了事情的真相以后再决定怎么办。

袁亚承见团员们对他的谈话没有反应，又热情鼓励大家在五支队要长期干下去，不管朱司令回来不回来，他是不会亏待这些有志抗日又有专长的知识青年的，以后一批一批地都要送他们到大后方的大学里去深造，成为党国的栋梁之才。

言语再甜再美，总是无法掩饰赤裸裸的事实。几天以后，王桢和团员们逐渐地了解了郭墩兵变的真相，对袁亚承就由原来的疏远、淡漠发展为憎恶和愤怒了。他们想离开袁亚承到朱松寿的部队去，由于控制很紧，无法脱身。不久，袁亚承自己当上了支队司令，又接连两次出兵，

攻打朱松寿的部队。朱松寿失败后，袁亚承认为对自己的威胁已经解除，就着手清理五支队内部倾向朱松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每天都有人被袁亚承抓起来，无缘无故地处决了。

这几天，抗日救亡剧团在暗暗议论着胖巡士，担心着他的命运。有人说，胖巡士是主动投靠袁亚承的，不会杀他。也有人说，胖巡士不像真心投靠，说不定是朱松寿让他隐蔽在袁亚承身边的。大家都关心着事态的发展。1938年10月初的一天，袁亚承带着部队向虞西地带进发，傍晚时分驻在一个小镇上。半夜里，镇上响起一片乒乒乓乓的砸门声，许多商店和居民被抢，妇女被奸，哭喊声闹成一团，在寂静的秋夜传得很远。凌晨，袁亚承把五支队紧急集合在镇里的一块大操场上，四周架着机枪。操场的另一边，三三两两地站着几十个镇上的居民，他们是被袁亚承的兵士强行拉来的。救亡剧团站在部队的前边，带着凉意的夜风吹拂到他们只穿单衣的身上，禁不住一阵战栗。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夜里，我们居住的这个镇上，发生了抢劫事件，给乡亲们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现在已经查清，这件丑事，就是我们五支队干的。”袁亚承说到这里，部队和居民都叽叽喳喳议论起来，纷纷猜测着到底是谁干的？袁亚承厉声制止住了说话声，继续说了下去。“这是有人存心在破坏我们五支队的声誉，我们决不能饶恕他们。不过，绝大多数人是受人利用的，我们要严惩的只是首恶分子。卫士们，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即把这次抢劫事件的为首者抓出来。”

操场上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大家借着朦胧的晨光，看着卫士冲到中队长胖巡士的前面，以极其迅速的动作把他捆绑得结结实实，连呼吸都很艰难，强行让他跪到地上。偏偏巧得很，这里离救亡剧团才三四步远。

胖巡士知道今日必死，可是，对袁亚承把组织抢劫的污水泼到他的头上，他是不甘心的。他竭力挣扎着，喊叫着，只是喉咙口被绳子扣得死死的，难以发出高亢、清晰的声音。然而，距离他只有几步远的抗日救亡剧团的团员们却听得清清楚楚：“……袁亚承要杀我，不是因为我策划了这次抢劫事件，而是因为我是朱司令的人。袁亚承搞鄂豫兵变，破坏抗日，我对他恨死了。所以才担着投靠袁亚承的污名，自个儿做主，到了袁亚承的身边。在九思街和锦丰镇两次进攻朱松寿的战斗中，我都向袁亚承打了黑枪，可惜没有成功。袁亚承发觉我要杀他，因为没有证据，就把抢劫事件的责任转嫁到我身上。其实真正策划抢劫的，就是这

个人面兽心的袁亚承……”

“为了整肃军纪，本司令宣布将策划和制造这次抢劫事件的中队长胖巡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袁亚承远远地听见胖巡士在噤忍着什么，虽然无法辨析说话的内容，但是，他害怕被行刑的人和离胖巡士很近的人听出个子丑寅卯来，败露他谋害这位功劳卓著的中队长的底细，在没有审讯、没有口供、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把胖巡士杀害了！

袁亚承的反动面目在抗日救亡剧团面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天都不能再在五支队待下去，于是今天两个、明天三个地借故离开了袁亚承，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脱离了忠义救国军。朱燕来和李扬是最后一批离开的，昨晚才到上海，想不到今天就碰上了日夜思念的朱司令。

朱松寿听到这里，想到胖巡士的遇难和抗日救亡剧团的星散，想到两千余人的抗日武装被他人所篡夺而自己流落在外，流下了两行冰凉的眼泪……

第十二节 三先生墓前的清算

朱燕来和李扬原想跟朱松寿再干下去，知道现在他只身一人在上海，留下来反而加重了他的负担，只得起身告辞。以后，朱、李两人以及绝大多数抗日救亡剧团的团员，先后又参加了革命队伍，锻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朱松寿在上海又住了几天，仍得不到张志强的消息，寝食不安起来。他像一匹在无边的草原上奔驰的烈马，一旦拴在马棚里，安逸反而折磨着他的灵魂。他夜夜想，天天盼，恨不得一步赶回江阴，重整队伍，再干上捣据点打鬼子的壮举，另外要与袁亚承算清一笔笔血账。正当他渴望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的亭子间响起了熟悉的敲门声。杨绮云把门打开，原来是余炳德来了。朱松寿像在冰雪中挨冻数日突然看到熊熊的火光一样，三脚两步地向余炳德冲过来，连声问道：“炳德，你快告诉我，江阴的抗日形势怎么样了？张志强找到党的队伍没有？”

“朱司令，你赶快回到江阴去，新四军的一支部队开到江阴来了，张志强和他们天天在一起。”余炳德一迭声地回答。

“好哇！”朱松寿激动起来，“炳德，我们乘火车回去，马上就走！”

“松寿，你可以饿着回江阴，总不能让客人也饿着赶路吧？”杨绮云笑着阻拦着丈夫。

朱松寿这才想起事情再急，也不能亏待了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警卫排长，再说，自己也确实饿了，家里不吃饭，旅途上还得吃，于是催促妻子赶快烧饭。杨绮云手脚也快，不一会儿，就把饭菜端出来，摆到小桌子上，一家人围着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

当天，朱松寿带着余炳德上了火车，在无锡转乘轮船到了峭岐，一打听，新四军的部队还在镇上，抓了大地主吴聚波，据说还要杀头呢！

“新四军一到，澄东的形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朱松寿对余炳德感慨地说，两人一起去找张志强。

“朱司令，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张志强兴致勃勃地说，“陈毅司令员对澄锡虞地区的抗日形势极为关心，这次派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一个营从茅山出发，经丹阳、武进到澄东、锡北等地，搞侦察东进。我从上海回到江阴，就遇上了他们。何克希要我跟部队走，我就让余炳德赶到上海来找你，想不到你们回来得这么快。昨天，我们同吴聚波谈判，要他出钱出枪，支援新四军抗日。这家伙狡猾得很，整天打着哈哈，就是不拨一毛。没办法，我们把他拘禁起来，峭岐镇上就传说新四军要杀吴聚波，巴不得他千刀万剐呢！”

“邬墩兵变，吴聚波也派出他的武装攻打过我们，杀他并不过分！”朱松寿一提邬墩兵变，心里就有气。

“杀不杀，这要王必成参谋长做主。”张志强说。

正说着话，从长寿方向走过来一支队伍，肩上背着枪支，走近一看，原来是承小纹收拾在邬墩、九思街、锦丰等三次战斗中失散的朱部战士，前来峭岐寻找新四军的，彼此见了面，惊喜不已。朱松寿一看站在面前的失散战士，约有50余人，一个想法跳入脑际，为什么不趁新四军在澄东的有利时机，到长寿、周庄、云亭一带去继续收集余部呢？就由张志强领了头，走进王必成设在峭岐的临时指挥部，同王必成、何克希、梅光迪等人一一见了面。朱松寿自梅光迪3年前在上海将他出卖被捕到现在，第一次与梅光迪见面，此时的感受，好像被奸污的少女遇上糟蹋过她的色狼一样，痛苦、怨恨、愤怒，各种情感充塞他的心头，只是碍着指挥部里坐着许多领导人，他只得忍了。

王必成很支持朱松寿的设想，就让张志强继续留在新四军，协助与

吴聚波谈判解决捐款捐枪的问题，由朱松寿带着余炳德、承小纹以及归队的50余名战士，前往长寿一带活动。

袁亚承知道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的一个营这几天流动在峭岐一带，极度恐慌。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澄东地区第一次出现新四军的正规部队。他知道新四军是由3年游击战争时期分布在南方8省的红军改编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英勇顽强的战场老手，无论从指挥作战的经验、历史、胆略和士兵的素质，袁亚承和他眼下指挥的“忠救”五支队，都无法与之相比。他只得带着队伍远远地躲着，窥探着下手的机会。袁亚承一走，陈祥安和他控制的一部分武装，也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长寿镇。

朱松寿回到长寿，一些在战斗中失散而遭到袁亚承、陈祥安迫害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像孤雁看到自己的雁群一样，纷纷回到朱松寿的身边。朱松寿想起3个月前遇难的战友吴子卿，就带了余炳德去探望三先生的家属。吴增颖自邹墩兵变发生后，就离开朱松寿回到了家里，恢复了自己的女儿装。现在看见朱司令，想起朱部的失败和父亲的牺牲，两颗明亮秀丽的眸子浸泡在晶莹的泪水之中。她的母亲听见声音从房间里走出来，见是朱松寿，就走到丈夫的灵前，颤声嘱咐道：“三先生，朱司令看你来了。你生前所追求的抗日大业，又有希望了。如果你在夭有灵，应该继续帮助朱司令，让他把抗日部队再度整顿和发展起来。还有，请你在冥冥之中指点朱司令，把杀害你的凶手抓起来，为你报仇！”

吴增颖见母亲说得伤心，几个月来压抑在胸中的痛苦化作一泓汹涌的泉水，夺眶而出，继而就失声哭了起来。朱松寿在一边陪着垂泪。

“朱叔叔，”吴增颖掏出一块手帕抹着挂在脸上的泪水，“我几乎把大事忘了，前几天，杀害父亲的凶手陈志长从外地回到了长寿，陈祥安还请他喝酒呢。后来，峭岐来了一支新四军，陈祥安一家就坐了一条木船，从水路逃走了。陈志长要乘他们家的船，陈祥安不许，几乎翻了脸。说不定陈志长还潜伏在长寿，叔叔快把他抓住，为我父亲报仇！”

“我知道了。什么时候抓住了陈志长，我一定随时告诉你和母亲，我们一起来审问他。”朱松寿在三先生灵前默哀致礼，又安慰了吴增颖母女，就退了出去，在附近找到了站着暗岗的余炳德，悄声说着陈志长的事，要余炳德多留个心眼儿，设法抓住这个凶手。

没有几天，朱松寿在长寿、周庄、云亭一带，收集到了70多个失散的士兵，连同原来收集到的50多人，已有一个连的兵力。这时有人向他

报告，国民党江阴县政府有40余石白米，是为袁亚承的忠义救国军准备的军粮，袁部走了，粮食没有来得及带走。朱松寿赶到县政府驻地缪巷上一看，果然围着几大囤白米。

“这粮食是从长寿老百姓口中刮来的，不能喂饱了忠义救国军去打新四军，应该还给长寿的人民。”朱松寿对动员前来领粮的贫苦农民说，他笑眯眯地指挥着部下分配着这批粮食。一些正闹着秋荒的农民看到白花的大米灌进自己的米袋，一家的生命有了延续下去的希望，跪在朱松寿面前叩头。朱松寿一个个把他们搀扶起来，安慰和鼓励他们说：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打败了日本鬼子，跟着共产党搞社会主义，这些贫困、饥饿、战争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就再也不存在了，大家都能过上安定、幸福、自由的生活。”

“共产党不是失败了吗？”一个跪着的农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满脸惶惑地问。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会有挫折、低潮和牺牲，但是，最终是失败不了的。你们也许不知道吧，峭岐就开来了一支新四军。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他们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不一样，是领导人民打鬼子保家乡的部队，是拯救中华民族不让中国人做亡国奴的部队。”朱松寿抓住时机，做着宣传工作。

场面十分踊跃，一些年轻力壮的农民立即报了名，要求随朱松寿参加新四军，一些年龄稍大的还在犹豫。朱松寿正要再做些说服工作，村外来了一阵妇女的哭声，大家循着声音看过去，只见有两个妇女，一老一少，争先恐后地向一个人的头、脸上打去，边打边骂、边骂边哭。而那个被打的人，低垂着头，流着血，双手反绑着，拖着一条绳子，绳头紧握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

“余炳德！”朱松寿大声叫着，“你手里牵着的俘虏是谁呀？”

“你自己看吧！”余炳德用黑色的驳壳枪枪杆顶了一下俘虏的背脊，催促他向前走去。

“朱司令，请你做主，为我丈夫报仇！”那个年老的妇女跌跌撞撞地走到朱松寿的身边，一头灰白的头发披散着，如果不是凭着熟悉的声音，朱松寿真难认出她就是吴子卿的妻子，自然，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吴增颖了。

朱松寿已经意识到什么，敦促前来领米的农民背着粮食赶快回去。

当农民们走散后，他命令聚集起来的那一个连的武装立刻开往龙砂山泰清寺吴子卿墓地，让余炳德押着俘虏也迅速赶去。

一路上，余炳德告诉朱松寿，他断定陈志长还隐藏在长寿街上，而且说不定仍在陈祥安的家里藏匿着。因为陈志长在栏杆桥杀害吴子卿，在长寿几乎家喻户晓，所以很想坐陈祥安的木船逃出去，可以避免被人看见。谁知陈祥安把他当作解便用的马桶，需要他的时候，一点异味儿都没有，而当腹中的废物排出来以后，再与马桶紧挨在一起，就觉得臭烘烘的不能忍受了。

余炳德带了几个战士敲开陈祥安家的门，家里只有一个管家在看着。里里外外搜了个遍，那里有陈志长的影子？余炳德感到奇怪，退出陈家高厅大屋的时候，猛然间发现院子里有一间低矮的小屋，一扇木门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一只母鸡在安静地寻觅着垃圾中的小虫。

他示意一个战士去看看。那个战士向小屋瞥了一眼，用眼色做了回答：“这样的地方能藏人吗？”

余炳德就自己走过去，张着枪口，似乎随时都会发生紧张的战斗。走到里面一看，只有两三捆稻草堆在角落里，余炳德一脚将稻草踢开，下面蜷缩着一个人，正是陈志长。

原来陈志长是个善用心机的人，既然陈祥安家引人注目，就越要潜伏在这里，人们想不到陈家会藏人。这间小屋敞露在院子里，又没有门遮拦，陈志长就觉得这里安全，以为大家不会相信有哪一个傻子会躲在眼皮底下！可是，狡猾的陈志长今天却失算了，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个例外。

龙砂山像个沉默的历史老人，仰卧在澄杨公路的北侧，观看着人间的风云变幻和一幕幕悲剧的产生、发展和结束。3个月前，在他深厚的怀抱里，静静地躺着一位抗日志士的遗体。墓地上，已经长出了一根根坚韧的马攀茎草，覆盖着土黄色的坟头。

朱松寿领着队伍爬上山头，让战士们排成整齐的三列横队，向吴子卿志哀。接着，命令陈志长面向坟头跪着，交代杀害吴子卿的经过和幕后策划的人。吴增颖母女泪流满面，在坟头的另一边坐着。

“我自干了这件事，就不想与任何人再去细说它的经过。”陈志长抬起苍白的脸，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坟头，像塞进眼眶里的两颗死鱼的眼珠子。“可是，今天，我却改变了初衷，我要说，我要大声地诉说！因

为，陈祥安只把我看作一条狗，猎物衔回了家，就把我宰了。虽然，我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只是想告诫世人，受人利用去伤害善良的人，最终伤害的还是他自己！”

墓前静悄悄的，中秋节过后的风，已带着凉意，吹着快要枯黄的草，像游丝般地颤动。朱松寿和吴增颖母女以及一个连的战士，都注视着坟头前那个跪着的丑类，在揭开一层遮盖在吴子卿谋杀案上的面纱——

陈志长在苏州同陈祥安用钱买来的那个妓女通奸以后，留下了一个致命的把柄，只要陈祥安愿意，他随时都可以被推上断头台。1938年6月，陈祥安把陈志长叫到家里，用好酒好菜招待他。陈志长以为有什么要事差遣他了，酒足饭饱后听候吩咐。可是，一连三天的好吃好喝，陈祥安并不让他去干什么。陈志长反倒不安起来，知道吃喝得愈多，陈祥安要他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也就愈大。

这时陈祥安已经又娶了一个小老婆，是个唱评弹的年轻女子，比先前买来的妓女更俏丽和妩媚。这时正值夏天，这年轻女子洗过浴后在院子里纳凉，那白嫩的脖子，尖挺的乳峰，修长的大腿，把好色的陈志长挑逗得火烧火燎地难受。他要接近这个评弹女子，但碍着陈祥安就近在咫尺，再说与那个妓女的风流债还没有偿还。不去瞅她吧，他又不甘心。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陈祥安找他摊牌了：“几年前苏州的那件事，你可能不会忘记吧。你不干不净地插了那一手，我不得不花钱与那个小女子划断了关系。虽说她出身青楼，可我喜欢她。那时，你为此事答应过为我效劳。现在，我正用得上你，未知肯否实践你的诺言？”

“陈先生，你就直言相告吧，我一定舍命去完成你的嘱托。”陈志长大有一番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

“有志气，我就喜欢这样的年轻人。”陈祥安笑容可掬地夸奖说，“志长，你也许已经知道我要你干的事了。10年前，朱家巷的那小子煽动农民起来暴动，和我结下了血海深仇。10年后，偏偏这个小子会利用人心，打起了抗日的旗号，一呼百应，成了什么鸟司令。你想，如果这个小子得势，会让我陈祥安有好日子过吗？”

“你是要我干掉朱松寿？”陈志长急不可耐地问道。

“还不到时机。”陈祥安诡谲地说，“我要你干掉他的那个主要助手——吴子卿！三先生一死，朱松寿还能蹦跳几年？我已经为你谋划过了，吴子卿喜欢东跑西颠地与外界联系，这给你完成任务提供了一个有

利的条件。还有，现在各地游击队司令多如牛毛，相互火拼的事时有发生。你只要看准机会，做个引线的工作，杀人的事由别人去干，谁能怀疑到你身上？”

“如果朱司令或袁专员追查起来，岂不露了馅儿？”陈志长不合时宜地追问了一句。

“你哪能考虑得这么多呢？”陈祥安不悦地斥责道，“不冒风险，那能办成大事？再说袁专员……”他压低声音像蚊子般嗡嗡着，说得陈志长打消了一切顾虑。既然陈祥安已经说明白暗杀吴子卿就是袁专员的主意，那么，陈志长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呢？

到了7月8日，袁亚承把吴子卿要去常熟恬庄装运枪支的秘密捅给了陈祥安，陈祥安又告诉了陈志长。陈志长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长泾王炳珊那里。王炳珊原是长泾镇上的一个流氓，江阴沦陷后纠集一批地痞无赖，组成一支土匪武装，趁机打家劫舍，扰得长泾、河塘、张泾桥一带民不安生。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十支队第三大队，王炳珊做了大队长，更有恃无恐，日夜抢夺，拼命扩大地盘。当陈志长把吴子卿去恬庄装运武器的事捅给了王炳珊，王炳珊哪有不干之理？他担心陈志长使坏，要陈志长领着匪徒们一起干。陈志长无奈，只得硬着脖子铤而走险。没有想到吴子卿在恬庄另用木船装上枪支先走，因此，7月10日那天，他们杀害了吴子卿等5人，却没有捞到那一船枪支。这使王炳珊大为恼火，疑心被陈志长当猴子耍了，要杀陈志长解气。陈志长得到信息，连夜溜了，逃得了性命。可是，才3个月，又落到了朱松寿的手里。

朱松寿听陈志长说到这里，转过脸去对站在旁边的余炳德说：

“炳德，鄞墩兵变前两天，你力主要杀袁亚承，几乎与我吵翻，那时我还以为不要率先酿成流血事件，造成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影响。可是，袁亚承却早于我动了手。此错铸成大错。好端端的一支队伍，被袁亚承杀的杀了，夺的夺了，散的散了，此仇此恨，何时能报？炳德，现在不杀陈志长，还等待什么？”

第十三节 陈毅请朱司令上山

“慢，我还有一句话，”陈志长乞求说，“3个月前，三先生从船上起来，对我说过：‘日后倘或跪在我的墓前，请你务必转告行刑者，不要

让你的血流在我墓前的泥土里，以免污染我的一抔净土’。我想，你们就照三先生的话做吧。”

朱松寿这才想起，那个在场的叶同志后来找到吴子卿家，在叙述三先生遇害经过时，也是这么说的，于是嘱咐几个战士，寻来一根绳子。陈志长看着绳子，不禁哀叹一声：“我之死，最早的根子还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叫陆桂香……”

陈志长话未说完，就被几个战士用绳子勒死在吴子卿的墓前。

——陈祥安是逃掉了，而且在解放前夕逃到了香港。他虽然没有遭到共产党的枪杀，但死得却很无奈和凄怆。他过惯了寄生虫生活，无依无靠，只好沿街求乞，后来终于受不了贫困和屈辱而自杀身死。

吴增颖母女报了杀夫杀父之仇，又哭祭了一番，跟着朱松寿一行下山回长寿去了。

傍晚时分，朱松寿带着连队回到驻地峭岐镇。张志强看到朱松寿到长寿、周庄、云亭等乡活动才几天，就聚集到70多人枪，还带回了挺机枪，心情像10月的天空，开阔而又明朗。他也绘声绘色地讲开了吴聚波被迫捐枪捐款的经过：

吴聚波一抓起来，就慌了神，外面又谣传着新四军要杀他。可是这位大财主又死要面子，硬是让人把县党部的书记长徐炎找来，从中周旋。最后，吴聚波像割掉身上几斤肉似的交出一挺轻机枪，几千发子弹，3000元法币。这家伙，家中有的是钱和弹药，为什么这样小家子气呢，王必成参谋长后来解开了这个谜：第一，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吴聚波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有着芥蒂，感情上疙疙瘩瘩，自然不愿把东西送给我们。第二，澄东地区现在是忠义救国军五支队的地盘，新四军一走，袁亚承自然要责问他，这不是捐助越多越要得罪国民党吗？他把县党部书记长请来，责任就有人分担了一半。这个吴聚波，你看有多狡猾。”

“新四军二团如果到澄锡虞各地去发动群众，收获一定更大。”朱松寿满有把握地说。

“明天我们直接同王参谋长、何书记去说说，那样打开澄锡虞的抗日局面就快了。”张志强也很兴奋。

第二天，朱松寿、张志强去见王必成、何克希。王必成爽朗地说道：

“行啊，由你们地方武装的领导人带路，地形熟，关系多，我们一路

增加见识，这对日后新四军东进，打开澄锡虞甚至整个京沪线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很有好处嘛。”

“朱司令，你和袁亚承的那一段斗争，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我已听张志强同志谈了不少。这次王参谋长奉命侦察东进，任务很重。总结的工作，我们放到后段去做。”何克希诚恳地说，朱松寿心里觉得很温暖。

这次侦察东进，在澄锡虞三县抗战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王必成处理好峭岐吴聚波捐枪捐款的事后，就带着部队和朱松寿、梅光迪的地方武装继续向东，途经璜塘、西阳桥，进驻寨门，听取了当地负责干部关于无锡地区抗日地方武装及日寇、顽军兵力分布情况的汇报。新四军二团的军事活动，不仅引起了澄锡虞边区日伪驻军的严重注意，而且袁亚承也不能容忍新四军进入澄东和锡北活动，立即命令忠义救国军五、十支队前堵后截。由于兵力悬殊，王必成出其不意地率部西撤，在青阳顺手伏击了日寇的军用汽车；进入武进地界后，袭击了国民党保九旅张少华的弟弟张来顺部。在此稍前，张少华向同我有联系的承寿根抗日游击队开了刀，将承寿根秘密杀害。这样，朱松寿、梅光迪的两支地方抗日武装处在国民党顽军和日伪的夹击之中，在澄东和澄西都难以立足。王必成、何克希向在茅山的陈毅汇报了情况，陈司令员果断决定，请朱松寿、梅光迪上山，把两支地方部队带去整训。

离开澄东时，朱松寿让余炳德回到长寿，暗中继续收拾失散人员。余炳德欣然而去。

这一天，朱松寿在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丹阳四家大村附近的小山丘散步，梳理着自己的思想脉络。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他无法回避的事实，为什么一支有2000余人枪的地方抗日武装，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打交道才半年，只剩下一个连的力量呢？这固然同客观的环境有关系——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没有及时地深入到澄东地区，把土地革命时期一大批在特殊环境下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引导到党的轨道上来。另外，新四军主力来澄东的时间太晚，而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钻了空子，抢先一步收编了沦陷区的绝大部分群众武装，朱松寿在力量上占了劣势。可是，自己的主观思想有没有问题呢？与党失去联系多年，形势瞬息万变，思想落后客观实际，怎么会不犯错误呢？追根溯源，他痛苦地想到1935年上海被捕的那一幕，对梅光迪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怨恨乃至仇恨。

真是巧得很，梅光迪正从另一条小路上爬上山来。梅光迪自奉命逮捕朱松寿后，又先后在无锡、宝应、宿迁、丹阳等县国民党特务室担任特务员，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继续进行监视和迫害。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江阴后，梅光迪回到家乡，接过西石桥镇上富商的枪支，组成了一支有30余人的武装，后发展到100多人枪，自命为澄西抗日游击队，下设3个中队，自任大队长。1938年春，他与中共中央特科取得联系，特科派何克希等人来梅光迪部工作。

梅光迪身高体胖，爬得直喘粗气。当梅光迪走近后，朱松寿委婉地指责说，“老梅，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走到一条战线上来了，真是有缘分呀！10年前，我们那时还年轻，举着大刀长矛，向土豪劣绅宣战，可以说是一条战壕里的同志与战友。暴动失败后，你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也许是一个太寂寞，把我也拉了进去。这件事，老梅我总忘不了呀！”

梅光迪知道朱松寿对他有着成见，那次在峭岐见面，他就看出来了，只是因为王必成和何克希在场，朱松寿不便发作。适才朱松寿的话中，含有指责和不满，于是反唇相讥道：“古人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认住一条路走到底，还有现在的梅光迪吗？抗战开始后，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共产党，想方设法与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取得了联系，特科派人来指导我的抗日游击队，现在，发展不是很快吗？不错，几年前是我把你拖进监狱的，可是你又丢掉了什么呢？抗战一开始，你成了抗日英雄，手下有那么多部队听你调遣，现在又剩下多少呢？你没有了本钱，新四军会承认你的地位吗？朱老兄，你再那样死心眼下，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失败的教训应该要记取，”朱松寿沉痛地说，“我的队伍输给了袁亚承，这教训够深刻的。可是，我还有信心去再发展。如果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去说假话，去坑害别人，去做出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我朱松寿是不干的！”

两人话犹未尽，不说出来是不痛快的。梅光迪正待反驳，一支队司令部里的一个参谋来叫朱松寿。朱松寿跟着走了。梅光迪气恨恨地说：“农民习气太重，愚昧，狭隘，古板，对往事耿耿于怀，这样的人成不了气候！”

朱松寿走进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一个军人站起来，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充满着温和的光芒，棱角分明的脸上洋溢着亲切的笑意，说话声

音洪亮而富有感染力：“我是陈毅呀，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朱司令也许不熟悉吧？可我早听到你的大名了，刚才，何克希同志单独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我听了挺钦佩。他说你是10年前的农暴英雄，手握双枪，百发百中，我真想听听你的故事呢！对了，老何还说你是‘江阴朱茅’这是怎么回事呀？”

朱松寿望望眼前的这位将军，谦逊地说：“还提这些往事做什么？我叫朱松寿，江阴农暴运动中有位领导人叫茅学勤，这不是巧合吗？不过，这个巧合以前我们并不在意。1928年夏天。我和蒋云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云第一个发现了这个巧合，议论时被别的代表听见了，就传出去了。”

陈毅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那个茅学勤呢？”他关切地问。

“茅学勤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10年前一起领导江阴农民暴动的钱振标、陈叔璇、蒋云，先后也都牺牲了。”朱松寿一提起这些倒下的江阴革命的先驱者，心情就无比沉重。

“这倒给了我一个启发，”陈毅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一大口，缓缓地吐出一团乳白色的烟雾，“江阴地区的国民党，对‘朱茅’有着刻骨大恨，杀了一个‘茅’，怎么会放过一个‘朱’呢？你以为抗战了，大家枪口一致对外了，张品泉、陈祥安这些人会同你拉起手来，一心一意打鬼子了。没有这么简单。这好比蒋介石决不会放心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轰轰烈烈干下去。我们失去这个警惕，就会被国民党一口吞了。你的部队，就是被陈祥安、张品泉这一类人的代表人物——袁亚承一口吞了！”

“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朱松寿接口说。

陈毅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不过，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吃了点亏就不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了。这也不行。统一战线要一直讲下去，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就是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还愿意同共产党‘统一’，我们还要同他们统一下去。在统一战线中，也要讲斗争。如果袁亚承带着忠义救国军的几个支队，来袭击我们新四军，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消灭他们！”朱松寿抢着回答。

“对，在这种场合，我们只能斗争了。要狠狠地揍他们一下，煞掉他们的气焰和威风。在战场上是不能手软的，手软就是葬送自己。因此，

新四军和你们地方抗日部队，不只要抗日，还要肩负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反顽就无法抗日，不反顽就无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顽我们也无法生存。”

朱松寿听着陈毅的讲话，像倒塌的矿井里的工人看到了一缕曙光，像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漂泊的小舟发现了一处可供歇息的港湾，像绝境中的部队听到了援军越来越近的军号声……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微驼的脊背前倾着，那张偏长黑瘦的脸上闪耀着照人的光彩。



1938年10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茅山组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原载《新四军将帅传奇》）招待你们。”

听着陈毅的话，大家很轻松地举起了筷子。

“你们的队伍都上山了，是不是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便于指挥和领导，也有利于发展。”陈毅很快就转入正题。

“陈司令员，我们要用一个新四军的番号，才能打开抗日局面。”何克希想了想，放下筷子，很庄重地说。

“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用这样的番号，群众更拥护我们。”朱松寿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怎么能用新四军的番号呢？”陈毅站起来，把刚夹起的一块红烧肉

陈毅还要说下去，炊事班来催开饭了。陈毅拉着朱松寿向旁边的一间房子走去，何克希、梅光迪、张志强等人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得出，这是陈司令员早就准备着慰劳来自江阴的抗日同志。漆得通红的八仙桌上，摆着一盆盆丰盛的菜肴，有红烧肉、白斩鸡、清蒸鱼。热气缭绕中，一阵阵诱人的香味飘进大家的鼻子。梅光迪趁着别人不注意，用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这是我用积聚了几个月的津贴费买的几道家常小菜。”陈毅友善地笑笑说，“你们几位都来自抗日第一线，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都像样样地较量过，我做司令的应该

也放了下去，“国民党对新四军什么都有限制，钱受限制，武器受限制，人和地盘也受限制。用了新四军番号不是自己限制自己吗？”

大家一想陈司令员说得有道理。何克希想了想，高兴得直跳起来：“几年前，有一支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全国很有影响。我们能不能就称江南抗日义勇军呢？”

“这个名字好！”陈毅很赞赏地说，“那就叫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吧，简称就是江抗三路。我看，司令就让梅先生担任，老何任副司令，吕平任政治部主任。你们看怎么样啊？”

梅光迪得意地冲朱松寿一笑，飘过去一个眼色，意思是说：怎么样呀？你老朱刚才还酸溜溜地指责我坑害别人，可是，我当上了司令，你呢？

——历史是无情的，这时颇为得意的梅光迪以后的经历却并不美妙。他到新四军教导队高干班学习过，曾担任“江抗”西路司令兼澄武锡三县抗敌委员会主任。后来，他不服从组织分配，开小差避居上海，被日军逮捕，投敌叛变，充当了常州汪伪“青年救国军”司令，又任汪伪“清乡”委员会镇江税务查缉分处主任。1945年，他见形势对日不利，即潜往苏北隐蔽。日本投降后去上海经商。1948年，他当上“首都卫戍司令部”少将参议，遭到怀疑，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他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他又通过共产党的间接关系，组成“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自任司令并策动国民党的一些部队起义、投诚，组成纵队下辖的三个支队，约200人，打算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时做内应。但很快被国民党发现逮捕，枪杀于上海宋公园。

朱松寿听到陈毅宣布的任职名单，心中不由一怔，又看到梅光迪那得意的神色，心中狐疑起来，莫不是陈司令对自己的失败有看法呢？

第十四节 袁亚承兵败祝塘镇

陈毅觉察出了朱、梅两人脸色的细微变化，往朱松寿的饭碗上夹去一块肥硕的鸡腿，连忙说：

“我还没有说完呢。朱司令原有2000余人的武装，被袁亚承插了一手，现在，这些人大体有几种去向：一是跟袁亚承走了，二是上了茅山，三是散失在农村里。这第三部分为数还不算少。把这一部分收集起来，是你朱司令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担当了职务，那就有很多不便。只要

队伍扩大了，以后还要编江抗四路、五路，我陈毅能让朱司令空闲起来吗？”

朱松寿这才转疑为喜，把陈毅夹到他碗上的鸡腿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

当太阳压到树梢的时候，大地像一块渐渐冷却下来的铸铁，没有了中午时分那灼人肌肤的热浪。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井里打来几桶水，泼洒到尚有余热的砖地上，然后把小桌子搬到场上，呼孙唤儿地准备吃晚饭了。

这时，村子东头一块高地上，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人，用手在额前搭成凉棚，向着村北面3里多路的祝塘镇眺望。也许是站在高处的缘故，抑或他身子就挺颀长，给人一种高大伟岸的感觉。村子里今早来了一支队伍，穿着一色的灰色军装。可是这位高个子却与别人不一样，青布褂子，青布裤子，上下一身青，与当地的农民差不离儿。随着太阳与地平线的距离越来越短，他的心像棉絮遭到了雨淋愈来愈沉重。“也许，他们三个年轻人出事了！”他在心里推测着，并从最坏的方面做好了准备。

这人就是朱松寿。半年前，他在茅山接受了陈毅司令员的任务，回到江阴东乡继续收集被袁亚承打散的队伍。因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在澄锡虞三县边区的力量日益强大，澄东有袁亚承的五支队，锡北有周振刚的十支队，沙洲有郭墨涛的六支队，人们畏惧顽军，很少站出来跟朱松寿走，所以半年时间收效寥寥。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苏南，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准备，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扩大抗日力量。陈毅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以梅光迪为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为副总指挥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他们从武进芙蓉圩出发东进抗日，越过锡澄公路，5月8日到了锡东梅村。朱松寿得到消息，立即带了余炳德等一行人去见梅、叶、何、吴四位正副指挥。梅光迪虽然当了总指挥，实际上并没有指挥权。叶飞、何克希看到朱松寿前来总指挥部，十分亲热，安排他跟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

5月30日，“江抗”在锡澄交界的黄土塘打败了鬼子的袭击，副总指挥叶飞对朱松寿说：“朱司令，我们的部队准备开到澄东去，那是袁亚

承经营了近一年的老窝，可能会发生战事，到时，得请你多多帮助我们。”朱松寿自然高兴，连连点头答应。叶飞说干就干，一个晚上就把1000多名指战员拉到距祝塘3里多路的大村子上宿营下来。袁亚承对“江抗”东进这一军事行动早就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新四军抢夺忠救军地盘的心怀叵测的举动，当“江抗”在梅村突然改变方向北进澄东的时候，立即驱动五支队，以祝塘为中心作了严密的布防，企图把“江抗”扼杀在祝塘这座古镇上。为了掌握顽军在祝塘的兵力部署，朱松寿建议叶飞派于玲、陈鹤、杨木荫3个青年去实地侦察。他们都是江阴人，陈鹤就是同老师房其林辩论的陈伟斯，去年夏秋曾在朱松寿的抗日救亡剧团工作过，有一定的军队生活经验。叶飞一口答应了，并限定他们下午要回到总指挥部。可是，太阳快要下山了，还不见他们3人的影子，能叫朱松寿不着急？

天断黑前，杨木荫回来了，告诉朱松寿说，于玲跑到长寿去了，陈鹤不知下落，只听祝塘镇上的人说，今天抓到一个“江抗”的探子，袁亚承要亲手宰了他，以示同“江抗”势不两立的决心。

朱松寿吃了一惊，莫不是陈鹤被捕了？他的一颗心揪得紧紧的，抗日救亡剧团二三十个生机勃勃的男女团员，现在参加“江抗”的，就陈鹤等一两个人了，实在舍不得有个三长两短的。直到夜幕遮住了他的视线，他才回到“江抗”总指挥部。

半夜里，朱松寿被一阵狗叫声惊醒了，侧耳一听，有人在外面敲门。他跳下床，把驳壳枪抓在手里，迅捷地打开了大门，一个人影在面前闪过。“谁？”他轻声问道。

“是我呀，朱司令。”从声音很容易辨别，进来的正是派出去侦察敌情的陈鹤。朱松寿很高兴，借着煤油灯光端详着这位年轻人的脸色，看到他脸上红扑扑的，知道没有受到伤害，才放下心来，正要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陈鹤抢先一步说：“朱司令，门外还站着一位县党部的书记长，你看……”

这倒让朱松寿着着实实吃了一惊，总指挥部是派你去侦察忠救军在祝塘的兵力布防的，你怎么带来了一位同顽军一鼻孔出气的国民党江阴县党部的书记长呢？陈鹤见朱松寿在生疑，压低声音在他耳边悄声诉说着——

原来，祝塘镇上流传的抓到“江抗”的一个探子，就是指的陈鹤。

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陈鹤骑着自行车向祝塘驶去，刚到南街梢，就被袁亚承的两个哨兵拦住了。正在争执间，从南边的大路上推过来一辆独轮车，车上坐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挺苗条的身材还颇有风流韵味，白净的脸上残留着几分妩媚，高高耸立着的乳峰对男性世界仍有着诱惑力。陈鹤因身处险境，无心去留意这个女人的风骚，可是女人却向他一步步走过来，“他是江抗的奸细！”她尖声呼叫起来，“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在前面那个村子上同江抗的哨兵说话，快把他抓起来！”

陈鹤被押到设在祝塘北面数里路的忠救军五支队司令部，等待着厄运的降临。半夜里，他被人叫起来，看见一个矮胖肥硕的中年人走进他被关押的房间。“袁亚承！”他心中一凉，知道这趟是无法活着回去了。可是袁亚承却似乎无意杀他，倒显出一副惊恐的样子对陈鹤说道：“我们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江阴城里的鬼子明天一早全部出动。‘忠救’和‘江抗’，都是敌人所仇恨而要歼灭的对象，如果大敌在前，你我还在互相残杀，不只让敌人笑话，而且会加快抗日力量的被消灭。你赶快连夜回去，向叶司令，对，还有朱司令，报告这个紧急消息。为了表示诚意，我让徐炎书记长跟你一起走一趟，大家诚心诚意坐下来谈判，和则两利，战则双亡！”

不管陈鹤愿意不愿意，袁亚承催着徐炎和陈鹤一起摸黑上路了。进了“江抗”总指挥部驻扎的村子，陈鹤让徐炎远远站着，自己去敲响总指挥部的门……

“叶司令和何克希他们在召开一个党内会议。”朱松寿听了陈鹤的报告，沉吟半晌说，“徐炎既然跟着你来了，不让他进来坐坐不礼貌，你快叫他进来。”

不一会儿，徐炎走进屋里，朱松寿起身迎接。

“刚才，我已经听陈鹤讲了袁司令派你来的用意。”朱松寿爽朗地说，“谈判和撤军的事，这自然要叶司令亲自决定的，不过，依我的个人浅见，既然江阴城里的日军有大动作，‘江抗’和‘忠救’理应化干戈为玉帛，停止磨擦，一致抗日，何况袁司令早有此诚意！至于我和袁司令个人之间有什么恩怨，这在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朱司令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把抗日放在首位，我徐某深为钦佩之至，钦佩之至！”徐炎似乎受到了朱松寿宽阔胸怀的感染，连连点头哈

腰，竭尽恭维之能事，“江阴人民能有朱司令，真是抗日有望，团结有望，百姓安居乐业之生活，就在眼前，就在眼前……”

这时大门“吱呀”一声推开了，叶飞、何克希走了进来，看见陈鹤平安无事地回到总指挥部，也都挺高兴，正要询问顽军情况，回头看见旁边站着一个陌生人，就把目光一齐投向朱松寿。朱松寿简单地汇报了袁亚承派人来谈判的事宜，叶飞略一点头，嘱咐陈鹤说道：“你立即把徐书记长领到副官那里安置休息，至于谈判嘛，那是明天的事，今晚远道而来，一定要休息好！”

徐炎走后，叶飞、何克希对谈判一事征求朱松寿的意见。朱松寿把刚才同徐炎的谈话向两位副总指挥重新说了一遍，叶飞始则一愣，继而仰头大笑起来：“朱司令，你回答得好哇！古语说，为人必须忠诚老实，这是古训，我们自然不能违背，在同志之间，朋友之间，亲人之间，这是维系感情和友谊的一条重要准则。可是，孙子兵法上也说过兵不厌诈呀！我们对付日寇，对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那就要用得上这一条了，何况我们是从袁亚承那里学来的呢！”

叶飞停止了笑声。叶飞，福建省安南县人。1928年参加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等职。抗战初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团长，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此刻，叶飞听了朱松寿的介绍，十分认真和严肃地说：“袁亚承已经做好了向‘江抗’进军的一切准备，在这节骨眼上，派个书记长来谈判，这是麻痹我们的神经。如果我们轻信了他的话，那就上了他的大当。现在，我军必须抢在他们进攻之前，向盘踞在祝塘镇及附近农村的忠救军第五支队发起猛烈的进攻，时间，就定在今天凌晨3时！”



1939年5月，叶飞率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抗日。

这时，叶飞、何克希、朱松寿不约而同地抬起左手腕，看着表上的时间，时针和分针正好重叠在12上。“现在，离开战斗还有3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睡觉！”叶飞说完，就向侧屋用门板铺着的一张简易铺位上走去。

江南夏夜，依然充满着生机。夜风轻轻地拍打着一块块成熟的小麦，传出一阵阵亲切动人的“沙——沙”声。已经栽秧的水田里，蜷伏了整整一个冬春的青蛙，此起彼伏地聒噪着，似乎在向人们诉说回到水中的快活。惟有一条条清澈明亮的小河，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音，像熟睡在乘凉桌子上的少女，在妈妈的护卫下舒展着她们白嫩细腻的修腿纤手。

“江抗”将士们顾不得欣赏江南美丽诱人的夜色，遵照总指挥部的命令，向忠救军五支队盘踞的祝塘镇扑去。

祝塘是一座古镇。原称筑塘，先民们在直塘河（现称祝塘河）沿岸的芦苇浅滩筑堤围塘，年久月长，形成了一个农村集市，到宋代已发展为“民聚而居，交易其所”的筑塘市。以后先民们又在这里造桥建镇，并改名祝塘。岁月流逝，即使石桥也会损坏。民国初年，先民们又一次募捐建桥，改名积庆桥，祝塘人习惯称为南石桥。南石桥不仅是人们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在战争年代还是重要的军事要冲。传说1860年太平军攻占无锡城以后，在讨伐四乡的时候，祝塘人王元昌率领“白头军”迎战，两军厮杀于南石桥畔，垒尸如山，血流成河。79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这一幕会不会重现呢？



“江抗”东进期间的1939年6月，朱松寿亲临江阴祝塘南石桥，指挥“江抗”部队打垮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图为祝塘镇政府近年重修的南石桥。

（徐泉法 摄）

朱松寿接受叶飞的重托，骑着一匹西洋大白马，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江抗”进入南街，三三两两的忠救军胡乱放了一通枪，就仓皇后撤。“江抗”趁势追杀。“减速前进，注意南石桥！”朱松寿传出命令。就在这时，“江抗”前锋已经冲到南石桥，被构筑在桥顶上的临时工事里射出的密集子弹挡住了去路，有几个战士当即中弹牺牲。朱松寿听到消息，立即在马背上猛抽一鞭，大白马在漆黑狭长的石板街道里飞奔起来，好像滚动着一团白色的云絮。

“朱司令，你不要靠拢南石桥。”余炳德见朱松寿策马向前，拼命狂奔过来，擦着额角上的热汗，气喘吁吁地说。

“这是什么时候，还这样顾惜生命？”朱松寿不满地瞪了余炳德一眼，“快传下我的命令，迅速抢占南石桥附近的房屋建筑，集中火力摧毁敌人桥顶上的临时工事！”

“江抗”战士纷纷爬上商店和民宅的屋顶，居高临下向忠救军建在桥顶上的工事射击。可是，临时工事是用沙袋、米袋构筑而成，靠子弹难以摧毁。一个战士用集束手榴弹掷过去，落到桥顶上，“嗤嗤”地冒着白烟，眼看即将爆炸。一个忠救军士兵从工事里探出身子，抓起正在冒烟的手榴弹，猛地向桥南“江抗”的阵地上扔去，未及落地就“轰”地一声炸开了，弹片击中了爬在屋顶上正在打枪的两个“江抗”战士，从屋上摔到地上牺牲了。

桥南、桥北在对峙中互射，东方天空渐渐变白，一抹晨曦映照在南石桥畔的鲜血和尸体上，唯有这座拱形石桥纹丝未动，巍然挺立着。

突然，南石桥北侧的街道上一片混乱，蜷伏在街中工事里的忠救军一个个抱头鼠窜，龟缩在桥顶工事里的顽军看见后院有变，无心苦守，纷纷钻出工事，边打枪边逃。桥南的江抗军看见敌人突然败退，蜂拥追杀过去，一路势如破竹。

原来，朱松寿看见桥顶工事难攻，就命江抗一部从桥东数百米的地方渡河北去，命另一部从桥西渡河。这两支部队在朦胧夜色的掩护下顺利渡过大河，就像两把钢钳向居守在镇中的顽军夹击，顽军自以为有南石桥上的守军顶着，阵地稳固，未及防备，看见江抗军潮水般地涌来，仓皇向北退去，一时阵势大乱。

这时，天已大明，刚刚结束战斗的祝塘镇一片静寂。突然，一匹如同屋檐般高大的白马，出现在堆满沙袋、米袋和尸体的南石桥顶上，马

上骑着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宽边大草帽，身穿土织青布衣裤，腰里左右各插着一支驳壳枪，飘着殷红的丝带，鲜艳得像夏天玉米吐出一束红绒花。大白马走下南石桥顶，悠然自得地向桥北的街道走去，马蹄敲击着花岗石板铺成的窄窄的街道，发出一串串清脆的富有节律感的“嗒嗒”声。

被尖厉的枪声和沉闷的爆炸声吓得不敢动弹的居民们，在枪声停止以后，仍不敢贸然开门。现在，听到这一熟悉的马蹄声，无不小心翼翼地 从门缝里、窗子里向外窥看着。不知是谁第一个认出了马上的人是朱松寿，慌忙打开大门，拉直嗓子呼喊起来：

“朱司令回来啦！”

“朱司令带着队伍把忠救军打跑啦！”

满街的居民听到喊声，“砰砰啪啪”地打开大门，走向街头，颇有秩序地站立两旁，向朱松寿挥手致意。

朱松寿看到这个热烈的场面，心头一热，让白马减缓了速度，举起两只铁掌般的大手，频频向站立两旁的群众致意，后面紧跟着的“江抗”战士，也笑吟吟地这边瞅瞅，那边望望，不时地接过居民递上来的茶水，一饮而尽，抹抹湿漉漉的嘴巴，向送水人敬个礼，算是谢了。刚才还冷冷清清的街道，像农历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游祝塘节场那样热闹和拥挤。

祝塘人有着明确的爱憎观。自从朱松寿的抗日游击队被袁亚承分化、拉拢和击败后，他们就受着双重的蹂躏和压迫：一方面，无锡、江阴城里以及附近据点里的鬼子、伪军不时地窜到祝塘来，随意地抓人、杀人、抢劫东西；另一方面，袁亚承的五支队、周振刚的十支队，像一群饥饿的蝗虫常常落在祝塘镇上和农村，吞噬着他们的劳动果实，砸门、募捐、派夫、抓鸡，甚至像鬼子一样抢掠和奸淫。朱松寿的游击队不是这样的，他们只知道千方百计打鬼子，颜家桥那一仗，他们还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渴望朱松寿和他的游击队回到澄东来，哪怕十天半月也是好的，让他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现在，朱松寿领着“江抗”打败了袁亚承，这叫祝塘人怎么不喜出望外地纷纷出来迎接呢！

可是，战斗还并没有结束。当“江抗”前锋部队追至祝塘镇北的后阳岗时，又被顽军雨点般的子弹挡住了。

后阳岗是一条一丈余高、东西长约一里许的泥岗，像一条长长的泥龙横卧在祝塘镇的北部，岗上长着各种树木、荳棵、茅草，十分茂密。



1939年6月，朱松寿指挥“江抗”部队在祝塘镇后阳岗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激战。图为后阳岗遗址，现已改名为景阳路。（徐泉法 摄）

岗的东部，长着一片密集的竹园。这条泥岗是祝塘人的骄傲，从不允许在岗上砍伐和挖泥。相传当年施耐庵在大宅村当徐姓大地主的教书先生时，一日路过此岗，忽见岗上树木丛中传出一阵阵吆喝声，走近一看，原来是镇上西街的一个武姓后生，正与一条大黄狗搏斗。施耐庵受到启发，据此写成了景阳冈武松打虎的千古名篇。以后，祝塘人为了纪念施耐庵，每年夏忙季节，都要在后阳岗举行一次全乡范围的插秧比赛，优胜者在吃饭时奖以鲜美味厚的鲜黄鱼肚子。改革开放后，祝塘镇政府扩大集镇规模，把后阳岗改建成新街，干脆就叫景阳路，与《水浒传》上的地名一致起来了。

再说朱松寿听到镇北传来枪声，拱拱手告辞夹道欢迎的老百姓，快马赶到后阳岗。他命令部队在岗上隐蔽起来，自己把马牵到后阳岗东端的那座竹林里，观察着顽军的动静，便于就近指挥战斗。

袁亚承的五支队退出祝塘镇后，像受惊的狼群，一直窜到镇北两里多路的大宅村。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住着上百户农家。村上的徐姓农民在元末明初发过大财，据说从祝塘到江阴的大路两旁，都是徐家的田产，家中的收租簿，就有9尺9寸高呢！到了1939年，徐家的兴盛早已成

为历史。然而，四周开阔的护村河，村中青砖铺就的通道，村外徐家大坟高耸的石柱，都告诉人们，大宅村确实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袁亚承刚走进村子，就指挥士兵抢占房屋等有利地形，向祝塘镇方向疯狂地射击，企图阻止“江抗”的追击。可是，“江抗”没有任何反应。袁亚承不甘心丢弃祝塘镇，又驱使部队向镇上反扑过去。顽军距后阳岗越来越近，朱松寿的两支驳壳枪向空中一扬，两梭子弹向敌人扫去，战士们众枪齐发，顽军没有遮拦，中弹者甚众，如潮水般向后退去。朱松寿跨上大白马，率部紧紧追赶，一鼓作气，一直追到大宅村。

祝塘这一仗击溃了袁亚承的“忠救”五支队，共产党领导的“江抗”来到了澄东，朱松寿又骑上了高头大白马，这些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传遍了江阴东乡的家家家户户。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把肩上的锄头一甩，就参加了“江抗”。一年前被袁亚承打败的原朱部人员，除少数不愿再干外，大部分回到朱松寿的身边。这时陈祥安、吴聚波等各镇地主武装的头目，见“江抗”势大，都潜往外地躲避。可是，顽军在澄东的势力，并没有被全部歼灭，朱松寿与袁亚承的斗争，也没有画上句号。如果“江抗”在澄东活动一段较长时间的话，那么，这里的抗日形势一定能很快地红火起来。可是，叶飞不能这样做，锡北和澄东，只是“江抗”东进的第一站，祝塘战斗后没几天，“江抗”就准备继续东进。大军行动前，朱松寿把余炳德安排在长寿，嘱咐说：“我们与日军的斗争没有完，与袁亚承、陈祥安等人的斗争也没有完。‘江抗’走后，你要暗中收集日军情报，监视忠救军在长寿地区的一举一动，更激烈更尖锐的斗争，一定还在后头。”余炳德点头答应而去。

“朱司令，前面甘露镇上，有一个叫杨忠的游击队司令，听说去年夏天同你合作，在苏州外跨塘破坏过京沪铁路，彼此有过交情。”“江抗”回到梅村，叶飞把朱松寿叫到总指挥部，恳切地说，“如果确有此事，我想请朱司令走一趟，动员杨忠接受‘江抗’的收编，我们的条件是杨部编为江抗独立第四支队，支队长当然是非杨忠莫属的了。”

“外跨塘破路，有这件事。”朱松寿回忆说，“我的印象是杨忠抗日比较认真，打鬼子有积极性。不足的是个性执拗，头脑简单，容易被人利用，翻脸不认人。争取工作我可以去做。”

叶飞见朱松寿慨然答应，又嘱咐说：“同这些游击队司令打交道，一定要谨慎小心，尤其是当他们在政治上转向的时候，更是如此。”

朱松寿接受了任务，做了一番调查，知道了杨忠的大概历史。杨忠原名杨筱南，苏州陆墓人，因排行第二，小时候被父母唤之为小因，倒把他的大名杨文敏遗忘了。当了游击队司令后，觉得叫小因太俗气，就改名筱南。随着名声的增大，又起了个单名忠，但一般人依然叫他杨筱南，他也一概答应。

淞沪战争爆发后，杨筱南在陆墓镇鼓动了10多个年轻人，组成担架队，赶到昆山，救护从前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兵。上海沦陷后，杨筱南就退到陆墓，以担架队为基础，又收容了一部分国民党散兵，组成游击队。因陆墓是水陆交通要道，距苏州又近，就把根据地从陆墓迁到吴县、无锡、常熟三县交界的甘露镇立下脚跟。

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杨部发展到了400余人枪。这支队伍，既是 he 藉以抗日的依据，又是 he 独霸一方的本钱，要说服 he 接受“江抗”收编，那得要冒多少风险呢！

“杨司令，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朱松寿只身来到甘露镇，走进杨筱南的司令部，像老朋友见了面那样拱手作揖，显得真诚而亲切，“去年我在外跨塘就说过，我们齐心抗日，志向相同，即使相隔千里万里，心也是靠近的。杨司令，这话说得不错吧？”

“对，对，这话不错。”杨筱南应酬着。在此稍前，有一个叫金毅的人来说服 he 靠拢“江抗”，他犹豫未决。因此，心里对朱松寿保持着警觉，“今天，朱司令可是为抗日而来吗？”

“眼下国难当头，战事紧急，没有要事，我朱某不会来闲串门子的。”朱松寿开门见山把“江抗”收编的事细说了一遍。

杨筱南犹豫了半晌，为难地说：“我是为抗战而举兵，非党非派，不想亲了这一头，疏了那一面。”

“杨司令此言差矣，”朱松寿摇摇头，“真正抗战的，应该说是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许杨司令早已知道，‘江抗’事实上就是新四军。既然新四军就在我们面前，岂有远远地站着看热闹，而不加入其洪流一起抗日的道理？”

看见杨筱南沉默不语，朱松寿又用自己如何因误入“忠救”而遭到袁亚承三次进攻的事说了一遍，杨筱南还是不放心。

“你怎样才能放心呢？”朱松寿不解地问道。

“我要拜你做干爹，由干爹关照着，我才放心接受江抗的收编。”杨

筱南狡黠地说。

这倒为难了朱松寿，答应吧，唯恐违反了“江抗”的纪律；不答应吧，又担心引起杨筱南的怀疑而影响了收编大事。最后决定让自己承担责任而许诺了杨筱南的要求。

杨筱南欢天喜地行了叩拜之礼，才决定接受“江抗”的收编。事后朱松寿才知道，杨筱南非常相信这一套，抗战前就拜上海青帮人物方三毛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一个徒子徒孙。也许由于这一层干父子的关系，朱松寿对杨筱南提高了信任程度，减弱了对他的防范心理，以致两年后的1941年5月在陆墓演出了一幕千古悲剧！

第二天，杨筱南跟随朱松寿来到“江抗”总指挥部，接受收编为“江抗”独立第四支队。

“江抗”继续向东挺进。1939年8月底，“江抗”已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为了适应行军作战的需要，总指挥部把部队编为二、三、四、五等四路战斗序列，朱松寿被任命为“江抗”五路司令。9月初，“江抗”奉陈毅命令挥师西撤。忠义救国军出动一、二、五、六、十等五个支队数千人的兵力，在澄东和锡北摆开战场，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锡澄公路以东地区。陈毅亲到定山湾，决定“江抗”撤至西石桥和扬中整训。

“江抗”走了，朱松寿的那一支抗日武装也被带走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遵照双方谈判的协议撤到浙江孝丰去了。澄东只留下了几个孤零零的日伪军据点，显得从未有过的空旷和寂静。这种虚假的暂时的平静让人困惑和窒息。要不要再组织抗日武装了？“江抗”会不会再回到澄东来了？怎样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朱松寿感到一片迷惘。

突然，他的眼前划过一道光亮。“对，我应该去找他，这位新四军副军长，一定能回答这些问题，只要他认为合适，我在军部当一个战士，也比在这里同顽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较量强。”主意已定，朱松寿找了一个人做伴，到皖南山区去了。

第十五节 项英给了他再度崛起的力量

深冬的皖南，远远近近的山峦，披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彩，呼啸的山风，席卷着满山的落叶，爬过一个山头，又向另一个山头冲击。前面

的那座山丘，它的高度，它那少女乳峰般的优美曲线，多么像莫斯科银色别墅花园后面小山的风姿。离新四军军部越近，朱松寿的心越是忐忑不安。见到项英，如果问及“六大”回国后的情况，该如何向这位实际上掌握着新四军命运的副军长汇报呢？

“不要想不通么，松寿同志！”项英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接见了朱松寿，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汇报，对这位抗日志士强烈的民族意识甚为敬佩。不过，项英隐隐感到，这位11年前的中共“六大”代表，思想深处潜藏着由于去年3次受挫带来的消极情绪，现在首要的工作是肯定他对党作出的贡献，以振作他的革命精神。“抗战以来，你做出的成绩还少吗？武装民众抗日，把地方上的群众动员起来了；你坚决脱离‘忠救’，虽然受到打击，但是给那些拥有武装的民主人士做出了表率；你几次三番把武装交给党，就为党的主力部队扩充了兵员。”

“现在，‘江抗’退出了澄东，我单枪匹马地干，孤掌难鸣，项副军长，你就让我留在军部工作吧，干什么都可以。”朱松寿听到项英肯定他的抗战成绩，紧锁的眉宇慢慢舒展开来。

“澄东，是澄锡虞的一部分，也是苏南东路到西路的重要跳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项英走到挂在墙壁上的军事地图前，伸出粗壮的手指，在澄东这块地方画了一个圆圈，却没有直接回答朱松寿提出的问题。“因此，在茅山江南指挥部工作的陈毅是不会轻易放弃东路这块阵地的，就是我老项也同样注重着这片辽阔的区域。只要时机一到，东路，当然也包括澄锡虞，一定又会热热闹闹干起来的。那时，我们党就需要大批的干部和抗日武装，像你老朱就可以再次大显身手！”项英从地图前又回到他的座位上，才明确地回答朱松寿提出的问题，“我看，老朱，你还是回到江阴去，那里有你的妻子儿女，有支持你的基本群众，有供你纵



1939年冬，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皖南军部鼓励朱松寿回到江阴继续抗日。图为抗战初期的项英。（原载《项英传》）

横驰骋的敌后战场。”

朱松寿在泾县军部住了几天，项英在百忙中陪他参观了几个地方，一起拍照留念，临走的时候，又亲手往他手里塞去一包沉甸甸的东西。当时两人都不会想到，岁月的车轮再转过一年零几个月，项英、朱松寿在不同的场合，为着不同的原因先后英勇捐躯，给后人留下的都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悲剧！

当新四军军部的驻地在视野中完全消失以后，朱松寿才打开包裹，里面是20个亮铮铮的银元。想到项英理着光头，穿着草鞋，过着艰苦的戎马生活，朱松寿禁不住热泪盈眶。

半年以后，朱松寿遵照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指示，在澄东经过细致的工作和深入的发动，又组织起了三个大队的群众抗日武装，打出的番号是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下设三个大队，朱松寿任司令。这时，袁亚承的忠义救国军五支队在浙江孝丰整训结束后，大部调到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去了，只将江阴长泾刘家桥的包汉生委以澄锡虞政治特派员的头衔，于1940年5月派到长泾地区，还没有力量向朱部进攻。在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地区活动着的几股土匪武装，诸如赵北、马乐鸣等部，由于实力有限，暂时也不会把手伸到朱松寿这里来。这样，朱松寿和新成立起来的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可以专心致志地抗日。

1940年6月的一天，朱松寿和余炳德、承小纹等骨干在长寿附近一个村子里商量扩大队伍的事，一个侦察员赶回来，报告说：“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前晚从武进方向过来，包围了长泾刘家桥，把包汉生部的几十个骨干都抓去了。”

朱松寿感到惊诧不已，是哪支部队神出鬼没地干出如此痛快的事来的呢？他还没有理出个头绪，另一个侦察员又汗流浹背地赶了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今天凌晨，从常熟方向过来的一支队伍，袭击了顾山附近的赵北三支队，抓获了一大批俘虏。”

话未说完，第三个侦察员未经得到允许就冲了进来，由于跑得太急，说话都不很连贯了：“河塘蒲市里，长泾小庄圩……住满了队伍，一色的……灰色军装，肩背长枪，有人说是……新四军，有人说是…新江抗……”

朱松寿跳了起来，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又回来了吗？联想起项英在新四军军部说的话，可以断定，澄锡虞地区红红火火搞抗日的机会来

到了！他心情高兴极了，两手按着插在腰间的两支驳壳枪，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偏长而黝黑的脸上，闪耀着光彩。

“是不是江抗的叶飞又回来了？”余炳德受到感染，兴致勃勃地问。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要领导澄锡虞直至整个东路的抗日斗争，没有叶飞这样的人是把握不了的。我们应该主动地和他们接上关系。”朱松寿满有信心地说。

朱松寿要找领导，领导也正在找他呢！不过，这个领导不是去年领导“江抗”东进的叶飞，而是指挥五次保卫繁昌大战的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

谭震林，湖南省攸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在湖南省茶陵县担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主席。1928年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9年起历任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央红军长征后，任闽西地区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副主席。新四军成立后，担任三支队副司令员。这次，谭震林是奉命而来的。在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倒退分裂的危险空前严重起来的时刻，党中央号召全党坚决反对顽固派，集中一切力量，发展抗日武装，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而奋斗。并指示东南局，“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谭震林的任务是建立包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到苏南东路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担任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政治部主任。

（原载《谭震林》画册）

括澄锡虞在内的东路抗日根据地。他一到常熟，就把以何克希为司令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番号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政治部主任，立即成立了一、二两个支队，并作出了“东出昆嘉太，西进澄锡虞”的战略决策。两天前从武进方向开来的那支队伍和今天凌晨袭击赵北三支队的那支武装，都是谭震林武装开辟澄锡虞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武进来的，是“江抗”二团，那天夜里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速度，包围了“忠救”澄锡虞政治特派员包汉生的老巢，抓到了除包汉生以外的全部骨干，现在正关押在蒲市里。而从常熟方向过来的则是何克希率领的“江抗”二支队，轻轻松松地打了一个胜仗。现在，东西两支队伍正在蒲市里胜利会师。

谭震林到东路之前，曾听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介绍过江阴的朱松寿。他一到蒲市里，就向人打听朱松寿的情况。当知道朱松寿在长寿、云亭、周庄周围第三次组织起一支群众抗日武装时，就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位曾到过莫斯科参加过中共“六大”的游击队司令的面。

在周庄附近的一个偏僻村子里，谭震林找到了朱松寿，“怎么能让你走这么多路来看我呢？”朱松寿内疚地说，“几天前，我们听到了谭司令率领新四军来到澄锡虞的消息，就想来看你的。后来一想，你刚到这里，各方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怎好来打扰你呢？因此，决定先把今年春天新组织起来的这支部队操练一下，再带着队伍到蒲市里见你。”

“我到澄锡虞又不是吃酒来的，不就是要找你们商量工作嘛，”谭震林很敬重地说，“我听不少同志说过，朱司令从1937年冬天，就拉队伍打鬼子了。也就是说，在澄锡虞边区已经转战三四个年头了。因此，怎样开辟和创建抗日根据地，你朱司令是有发言权的。项英副军长和陈毅司令员都同我说过，澄锡虞地区特别是江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朱司令在这里是人熟地熟情况熟。”

“谭司令，今天就在这里吃中饭吧，没什么招待你，凑巧常阴沙有个渔民送来十几条河豚鱼，不知你敢不敢吃它？”朱松寿偏长的脸上堆着憨厚的笑容。

“此鱼有毒，怎可随便吃它？”

“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句古话，叫拼死吃河豚，就是说，要有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才敢吃它。其实，河豚有毒，它的肉和皮没有毒，有毒的是鱼子、鱼血、鱼眼和内脏，只要将有毒部分清除干净，再细心烹调，并不会出问题。江阴是河豚之乡，大凡成年人，都敢吃它。河豚汛期在清明前后，现在只是渔民偶然在长江里捕获几条。”朱松寿扼要地介绍着河豚鱼的有关知识。

“好，今天尝一尝河豚鱼的美味，我把这条命豁出去了。”谭震林幽默、风趣的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不一会儿，一个村民端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河豚，一阵阵从未

体验过的异香直扑谭震林的鼻子，正要举筷夹鱼，却被朱松寿挡住了。他心中纳闷，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怎么鱼到桌上却又变卦了？正诧异间，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美丽的少妇，腰上系着围裙，额头亮着汗水，走到桌边，用筷夹着一块鱼肉，塞进自己的嘴里，慢慢咀嚼着，随后咽下肚去。少妇微笑着，站在一边不走。谭震林咽了一口唾沫，又要举筷，朱松寿再次把他挡住了，自己也夹一块大口大口地咀嚼着。

“现在，谭司令可以吃了。”朱松寿看着满脸疑惑的谭震林，知道他无法理解何以要两人比客人先吃的道理，解释说，“这是江阴人用河豚鱼请客的惯例，首先要由负责烹调的人先吃，刚才这位大嫂就是在灶间掌勺的，接下来再由主人吃，两个人先后吃了都没有反应，那么就有百分之百的保障了。”

谭震林被桌面上飘过来的一阵阵异香刺激得直咽口水，等朱松寿说完，举筷夹了一团鱼皮就往嘴里送去，只觉得满口黏糊糊的，味道鲜美极了。接着又吃鱼肉，有一种其他鱼类所没有的特殊韵味，裙边、海参、鱼翅，都无法与之相比。

“这河豚鱼不错。”谭震林颇为感慨地说，“不过，从吃河豚鱼，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江阴人有一种秉性，一种宁折不弯的秉性，为了追求自由和真理，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认定的路非走到底不可。而这种秉性，在当前的抗日战争中，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力量。”

“谭司令，你刚到江阴不久，对江阴人认识得何以如此深呀？”在一边陪着的余炳德来了兴趣，无拘无束地说。

“你是……？”谭震林瞅着余炳德。

“他叫余炳德。”朱松寿介绍说。

“小余，我是从刚才吃河豚想到的，说得不错吧？”谭震林谈笑风生，“还有，是从你们的朱司令身上看到的。据说你们这里还有一句俗话，叫‘江阴强盗无锡贼’，有这句话吧？其实，这里说的强盗，并不是指抢东西，而是强悍、骁勇、刚直的意思；无锡贼也不是说出去偷东西，而是智慧、机灵、精明的意思。如果这样解释，那依据就更充足啰！”

朱松寿梦寐以求的抗日根据地，终于随着谭震林的到来，在澄锡虞边区轰轰烈烈地建立起来了。江南救国抗日军和“江抗”二团，分别派出了民运工作组，来到各镇各乡，动员群众起来抗日。接着，先后成立了各个办事处，领导民众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

工抗会、店抗会像春雨后的草芽，漫山遍野地生长起来。到这年秋天，谭震林正式任命朱松寿为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简称江阴“民抗”）司令，杨行方任副司令，包厚昌任政治部主任，王明星任参谋长，跟随同时成立的澄锡虞总办事处一起行动。

不久，长寿区成立，要筹建常备大队，没有合适的军事干部，就同朱松寿商量把余炳德挖去了，当上了大队长。余炳德自从1937年冬加入朱松寿抗日游击队，虽然部队几经挫折和失败，但与朱松寿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阴“民抗”。两年后不幸被日军逮捕，因不愿屈服，在1943年清明节被杀害在无锡日军宪兵司令部，尸体用镪水毁掉，留给妻子和子女的只是一身被鲜血浸透的硬邦邦的衣服，这年他才27岁。

朱松寿和江阴“民抗”活跃在鬼子的据点里，出没在顽军盘踞的乡村集镇，遭到日伪军和“忠救”澄锡虞政治特派员包汉生的仇恨，日伪顽互相勾结起来，恶狠狠地向这支第三次崛起的群众抗日武装扑去——

1940年9月某日。

“朱司令，一队日军已进十字坝，正向我驻地靠拢。”一位侦察兵向朱松寿报告说，由于情况危急，声音带着明显的战栗。

“我们的岗哨呢？”朱松寿非常平静，缓和了司令部里的紧张气氛。

“5个鬼子装扮成割草的农民，走近十字坝把岗哨扼死了。”

“共有多少敌人？”

“大约一个连。”

十字坝地处祝塘、长寿、陆桥三镇中间，两条宽阔的河流在这里交会，为了交通的便利，先人们在河面上筑了两条互相垂直相交的土坝。这里的人都相信《水浒》中孙二娘的酒店就开在十字坝的传说，只是施耐庵在创作《水浒》时，悄悄地把十字坝改成了十字坡。十字坝东北一里多路有一个村子，以坝命名，就叫十字坝村。朱松寿领导的江阴“民抗”就驻在这个村上，保护赶制“江抗”的一批军衣。璜塘据点的鬼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情报，出动了100多个鬼子前来劫掠军衣。军情万分紧急。朱松寿简洁、明快地下着命令，村子里响起了一片嘈杂的脚步声。

鬼子冲到村边，看见朱部已从十字坝村撤出，向东北方向飞跑，路上的军衣、布匹、枪支丢得到处都是，敌人喜出望外，像一群越出铁栅栏的狼，向村中冲去。

“达达达……”机枪、步枪、驳壳枪的子弹咬着敌人的肌肉，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鬼子遭到当头一击，抬头一看，才知道十字坝村的屋上、树上、柴垛上都爬着密密麻麻的“民抗”战士，瓦屋里、猪棚里、草堆里都伸出黑洞洞的枪口，发疯似的向他们射击。敌人已经处在天罗地网式的包围之中。

朱松寿和江阴“民抗”战士歼灭了一二十个鬼子，保护了“江抗”的军衣，活着的鬼子慌忙向村外退去。原来，当鬼子快要进村的时候，朱松寿考虑到无论撤退或抵抗，都会带来重大损失。于是安排一个大队带了缝衣队和部分老百姓撤出村子，故意丢枪抛衣，造成仓促败退的假象，以此迷惑敌人，而让主力迅速抢占村上的一切有利地形和地物，结果鬼子中计，“民抗”打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胜仗。

战士们兴高采烈，都说朱松寿兵临村下而不慌。可是朱松寿却高兴不起来，他百思不得其解：璜塘据点里的鬼子是从哪里来的情报呢？从摸掉十字坝两个岗哨来看，敌人对村子里的情况早已一目了然。这情报会不会来自江阴“民抗”内部呢，也就是说，会不会有敌人打进了“民抗”，或者“民抗”出了内奸呢，他没有向谭震林汇报，只是暗暗警惕着。

一个多星期后，江阴“民抗”踏着浓墨似的夜色，在龙砂山北麓沿着东横河移动，走到朱家桥附近，突然天空划过一道光亮，如夏夜的闪电，白亮白亮的。“卧倒！”朱松寿意识到这是敌人的照明弹。果然，第一道光亮还没有消失，第二道、第三道弧形的光亮又出现在头顶上，把四周照得一片雪亮。“轰，轰轰。”北面后塍镇打来一排排炮弹，在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把成片的即将成熟的水稻刮得东倒西歪。炮弹的余波还没有止息，西边袁家桥又响起了重机枪“轧轧轧”的吼叫声，子弹在战士们头顶上呼呼飞过。再仔细一听，四面八方都是鬼子的声音，“民抗”被敌人重重叠叠地包围在田野里，受到严重的威胁。

朱松寿沉着地思考着对策，三四百个战士的命运就决定于他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他明白，这是鬼子对十字坝失败的报复，也是对他3年来抗击鬼子的一次总算账。如果摆开战场地硬打硬拼，江阴“民抗”将会毁于一旦！可是，不打又如何能摆脱被包围消灭的厄运呢？他向四周望去，黑黝黝的天底下，一片接一片的稻子起伏着黑色的波浪，好像在向战士们招手。他的眼睛一亮，立即传下命令，部队利用稻子的掩护分散撤离包围圈，两天后在长泾镇附近的某村集中。一刹那间，黑压压的一

长串人影悄然不见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7个据点的鬼子汇集到朱家桥，才发现江阴“民抗”不翼而走，气得哇哇直叫，向着乌黑的田野盲目地打着乱枪，把一片成熟在即的稻子糟蹋得像降落过蝗虫似的只剩下把把柴草……

朱家桥遇围是江阴“民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两天后，绝大部分的“民抗”战士来到长泾镇附近的某村集合，可是承小纹却没有回来。“会不会牺牲呢？”朱松寿想，“也许是受了伤，一时回不来……”自1927年承小纹跟随朱松寿参加农民暴动，至今已经13年了，虽然不时地暴露出一些思想上的问题，可是经朱松寿批评后也能够有所接受。现在突然不见了，总觉得失去什么似的心里很不踏实。

朱松寿思维的焦点又放到这次7路鬼子的大包围上，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民抗”内部潜伏着内奸，随时地向日伪报告着我军的行动情报。内奸不除，江阴“民抗”迟早会葬送在敌人的手里。他想向谭震林报告，可是谭司令到苏常太去了，“民抗”政治部主任包厚昌也在开辟新区，他只得暂时地把此事压了下来。

10多天以后，终于传来了承小纹的消息，这使朱松寿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

承小纹在朱家桥被围以后，借着稻子的掩护，突出了鬼子的包围圈。他觉得江阴“民抗”老是遭到鬼子的袭击，其中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因。照此下去，“民抗”早晚得被鬼子消灭，而自己也难免血流沙场。再说在“民抗”出生入死，风餐露宿，最后能得到什么呢？父母妻子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队伍，多次遭到鬼子逮捕，严刑拷打，家中洗劫一空。我为祖国和民族抗战，可祖国和民族又能给我什么呢？对，我应该自己去取，自己去夺。一个偶然的机会，承小纹得悉后塍一家典当为了防止鬼子和土匪的抢劫，把金银珠宝沉到了自家院子里的一口深井里。他大喜过望，连夜赶到后塍，找了一个同伙，抽干井水，把井底的财物全部打捞上来。带着这批不义之财，承小纹潜到上海，过起舒适的寓公生活来了。

怎么办呢？这是一件大事，不能有半点含糊和迁就，朱松寿立即赶到“江抗”东路指挥部驻地蒲市里。谭震林刚好从苏常太赶回，听了朱松寿的汇报，当机立断，通知在峭岐搞开辟工作的包厚昌回到指挥部，又配备了几个同志，协助朱松寿对江阴“民抗”进行整训。

包厚昌是无锡县东亭乡人，1936年8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担任过“江抗”三路三连指导员、“江抗”二团三营政委，中共澄锡虞工委委员等职。1940年5月，包厚昌在武进反“扫荡”战斗中受了重伤，不久转到祝塘养伤。伤好后，他所在的“江抗”二团催他返回队伍，可谭震林却挽留他留在江阴做地方工作。部队急了，告诫包厚昌再不回队要以军纪处分。谭震林则暗示包厚昌如果离开祝塘要以党纪论处。这下轮到包厚昌急了，一个人总不能劈成两半使用吧？最后，还是谭震林同“江抗”二团的领导协商妥当，把包厚昌留了下来。这时正值江阴“民抗”建立司令部，谭震林让包厚昌当了个政治部主任。凡是同包厚昌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敦厚、诚恳、朴实，可原则上的事从不含糊和让步，具有做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两种天分，所以谭震林和“江抗”二团都争着要他。

现在，整训正在向深入进展。

这一天，朱松寿和江阴“民抗”驻在无锡和江阴交界的斗山附近。白天，一切都很顺利，事情就出在晚上。世界上许许多多干坏事、做丑事的人，总喜欢在晚上进行，因为晚上没有阳光，没有色彩，没有千百双明亮眼睛的监视。

江阴“民抗”的一个排集体拖抢逃跑！

第二天，朱松寿知道了这件事十分生气。可是，更让他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有人在背地里说：这个排的逃跑是朱松寿策划的，因为他对整训不满。还有人说：这年头是“江抗”吃“民抗”，朱司令憋着一肚子气呢。更有人说：承小纹脱离“民抗”，是朱松寿对“江抗”的抗议……一盆盆的污水，带着血腥味，向朱松寿的头上泼去！

声辩、解释、愤恨、痛苦，都无济于事。然而，谎言和制造谎言的人，最害怕事实，犹如再厚的雪也害怕太阳一样，只是事实的揭露需要时间，有的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二三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会有谎言和制造谎言的人存在，好比那些不清洁的灶间，总有令人厌恶的带着成千上万个细菌和病毒的苍蝇在飞舞一样。荣幸的是，这次事实的澄清并没有需要太长的时间。半个多月后，“江抗”在进攻被包汉生的忠义救国军盘踞的北涇镇时，抓获了一大群俘虏，而那些拖枪逃跑的叛逆分子却在俘虏群中颤抖！

审讯。

交待。

终于真相大白，黑手，还是从袁亚承那里伸过来的。事情要追溯到去年冬天，包汉生跟随袁亚承到浙江孝丰整训，两人结为至交。今年5月包汉生就要出山了，袁亚承把他找去，推心置腹地说：“我在江阴两年，一旦离开，颇有依依不舍之感。现在仍想再去江阴，只是总部不会让我去了。我有一事耿耿于怀，就是共产党司令朱松寿仍活着，此人日后仍会有所气候，必是党国的死敌。”

包汉生点头会意。

袁亚承继续说下去：“朱松寿不死，我的心不会安宁。你出山以后，可派一精干之人，打入他的身旁……”

包汉生回到江阴，未几就遭到“江抗”二团的包围，虽然抓去的包福年、包福街等几十个骨干都用“以枪换人”的方式陆续放了出来，但他恨死了“江抗”和朱松寿，挑选了一个没有露面的心腹，混进了朱部，向日军密告“民抗”行动情报，策划士兵逃跑，并直接谋杀朱松寿。因为包厚昌等人搞整训划清了阵线，眼看就要露馅，包汉生就命令这个心腹怂恿和威胁受其拉拢腐蚀的一个排集体拖枪逃跑，并散布了一连串的谣言……

朱松寿亲自处置了这个内奸和这个排的逃兵，谣言顿消。然而，袁亚承和包汉生并没有放过朱松寿，像影子始终跟着人一样，人不倒下，影子就不会消失！

第十六节 亭子间夫妇诀别

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经过整训，谭震林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澄锡虞抗日根据地，决定把这支部队上升并分别编入江南抗日救国军，派朱松寿继续做扩军工作。决定宣布前，谭震林同朱松寿作了一次谈话。谭震林考虑到，朱松寿三次拉起了抗日武装，都陆续上升到了“江抗”，不容易呀！他这时会有什么想法呢？

“老朱，你对这次行动有什么想法？”谭震林问道。

“我服从组织决定！”

“你对继续做扩军工作有意见吗？”

“坚决完成任务!”

“真的没有意见?”

“谭司令，这是人民的武装，他们能够上升到主力部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好地同敌人作战，我感到光荣!”朱松寿态度十分诚恳。

“你说得太好了!”谭震林久久地握着朱松寿的手。

1940年11月初，在华墅中学的大操场上，“江抗”召开大会，谭震林宣布成立三个纵队，指出控制江阴、无锡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个斗争目标是向着太湖、淀山湖前进!

谭震林讲话后，朱松寿在大会上发言拥护“江抗”东路指挥部将江阴“民抗”上升为正规部队的决定，坚决执行指挥部要自己继续扩充新兵的指示。他说得真诚、执著、肯定，台上台下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在朱松寿即将外出招收新兵的那几天里，“江抗”东路指挥部副司令何克希同朱松寿也作了一次谈话。

“老朱，你的扩军任务很重呵!”何克希深情地说。

“何副司令，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任务再重，我也坚决完成!”

“好!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关于我的党籍问题，我曾给党组织写了一个报告，你看到了吧?”

“看了，我们几个人都看了，也研究了一次。”何克希点点头。

“党组织对我的意见怎么样?”朱松寿急切地问。

“部队马上就要行动，我们决定另外找个时间再讨论一次。”何克希望朱松寿的脸色，理解地说，“朱松寿同志，你的情况党组织是知道的，对你过去的革命活动也是肯定的，你就放心地去吧。”

“谢谢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关心。”

朱松寿说完转身要走，何克希又叫住了他。

“老朱，你看承小纹的问题如何处理?”还没等朱松寿回答，何克希接着说：“我的意见，你想办法亲自把他找回来，然后对照军法处以重刑!”

朱松寿沉默不语。他明白，何克希从严治军是正确的，但是要真的给承小纹处以重刑，他又不忍心。他知道自己在对待承小纹的问题上，既有革命友谊，也有私人情怀。

“有什么为难吗?”何克希问。

“承小纹是有罪，理应处以重刑，但是考虑到他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我想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朱松寿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样吧，我们现在不讨论如何处理承小纹，好不好？”何克希退了一步，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好，我先把她找回来，如何处理，放在以后再说。”朱松寿同意了。何克希与朱松寿握手告别。

1940年12月底，朱松寿到了上海。

“我又来晚了。”朱松寿愧疚地笑笑，从妻子杨绮云手里抱过出生才几天的孩子，吻着他嫩豆腐般的小脸，弥补着自己的过失。“你没有为他起名，就由我来起吧。鸿良怎么样，叫起来挺响亮的。”

“我依你。”杨绮云接过孩子，忽然想起旧历新年在即，丈夫到上海莫非是过春节来了？于是试探着问道，“江阴的抗战搞得红红火火，倒有时间想着来看看我了？”

这时门被推开，像洪水般涌进来一群孩子，都抢着叫“爸爸”。朱松寿伸出扇子般的大手，爱抚地摸着女儿露英、梅芳、雪芬的头，拍打着儿子鸿坤、国强的肩膀，最小的女儿秀芬张着胖胖的小手，扑向朱松寿的怀里，“爸爸，爸爸”叫得欢。朱松寿搂着秀芬，对其他几个稍大的孩子说：“你们都出去玩，爸爸妈妈有事儿，别来吵着了。”

“承小纹在江阴出事了。”朱松寿待孩子们又像洪水般退出去后，脸色阴沉地对妻子说，“江抗东路指挥部副司令何克希同我谈了话，要我把承小纹从上海找回去，依照军法惩处。我不能不执行命令，这就来了，可惜迟到了几天，没有赶在你生孩子前……”

“再说那些话做什么，”杨绮云也被承小纹的命运揪紧了心，“这个人就是离不开金钱。记得农暴的时候，他贪污了捐款，被茅学勤和你都批评教育过。革命十几年了，还是跌在这个钱字上。这样的人，应该接受处分。”

“还有一件大事我忘了对你说，”朱松寿把小女儿秀芬放到地板上，向妻子身边挪了挪，“谭司令要扩大抗日根据地，动员我把江阴民抗上升到江抗去，这倒是件好事。我把队伍交给党，就像山沟里的水流进长江注入大海一样，永远不会枯竭。我同意了，谭司令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让我担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副司令。这次何副司令要我到上海，指示我既要寻到承小纹，又要做好扩兵工作。”

夫妻俩坐在床上说着话，心里充满了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朱松寿因为妻子刚生孩子没几天，不能过多地说话，就走出亭子间，到下面找一群孩子去了。

第二天，朱松寿就开始寻找承小纹。谁知承小纹得了后膛典当里的那一笔金银珠宝，变卖了钱，深居简出并不露面。那时上海是日本军队和特务横行的天下，朱松寿又是名闻遐迩的地方抗日领袖，久住上海危险性挺大。只是因为何克希的重托，不把承小纹找到，如何回江阴向党交待？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寻找，直到1941年二三月间，才找到了承小纹。

本来，朱松寿应该带着承小纹立即回到江阴，交给何克希，就算完成了任务。可是，朱松寿一则想给承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二则想在下面的扩兵工作中有个得力的助手，因此，他在执行何克希的命令时打了个折扣。

“绮云，天明后我就要和承小纹到苏州去了，你人在上海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朱松寿翻了个身插插妻子的臂膀，柔和地说，“你不是说过要上前线去打鬼子吗？我看，你带好这7个孩子，比上战场还重要。”

“这么说，做妻子的战场就在亭子间了？”杨绮云俏皮地做了个鬼脸，可惜没有开灯，丈夫无法看见。

“孩子长大了，无论当兵上前线，还是做工下车间，都是为革命工作，你想，7个孩子他们的力量有多大？”朱松寿脸上有了笑容。

“儿女们的成长也离不开爸爸。你看，天明你走了让我如何向孩子们交待呢？”妻子说着，想起独个儿支撑着这么一个大家庭，心里伤感起来。

“绮云，我知道，你一个人生活得很累，很苦，我总觉得对你欠着点什么，对孩子们也欠着点什么，这些，我都知道。绮云，再忍耐点儿，从澄锡虞的形势看，鬼子在中国的时间不会很久了，鬼子一滚蛋，革命就胜利了。那时，我们可以常常在一起，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朱松寿抚着词儿安慰着妻子，忽然，他听到压抑的抽泣声，知道杨绮云在流泪，急忙伸出粗糙的大手，替妻子轻轻擦拭着。这时，窗外灌进一缕灰白色的光亮，朱松寿侧过身子，在妻子湿漉漉的脸颊上深情地亲吻着。他起了床，但不开灯，因为灯一开孩子们会醒来，就站在床边，借着窗外的微弱亮光，默默地凝视着蜷缩在地铺上的孩子们的脸。

“孩子们，你们就醒醒吧，快看看爸爸，爸爸就要走了，要到很远很

远的地方打鬼子去了。他没有时间疼你们，爱你们，可是，你们的爸爸，是世上最好最好的爸爸呀！”杨绮云嘴里嗫嚅着，朱松寿都听见了，心里热乎乎的，眼窝子一热，终于，两颗掺和着夫爱和父爱的珍贵的泪珠，滚落到他那偏长的脸上。他不能再看下去了，转过脸，向妻子投去深情的一瞥，就跨出了亭子间。天，依然是灰蒙蒙的，除了偶或一两声汽车的鸣叫声，整个上海仍在黎明前的沉睡中。

尾 篇

毗山之松



1990年清明节，病愈后的杨绮云在女儿的搀扶下前往毗山朱松寿烈士纪念碑前，凭吊丈夫的英魂。
(徐泉法 摄)

丈夫离开上海以后，杨绮云总觉得失掉了什么似的，待小儿子满月后，她常常走到楼下，踮着脚尖儿，向大街上张望。这一天，她抱着小鸿良，仍像往日一样，站在楼下，幻想着突然看到从



1989年12月，陆其明（左1）、田柳（右1）、朱远（中）、徐泉法（左2）在吴县陆墓镇三千浜村向当地群众须阿坤（右2）了解朱松寿烈士牺牲经过情况。（陈卫良 摄）

苏州归来的丈夫，欢欢喜喜地把孩子塞到他怀里，像城里许多妻子那样，挽着丈夫的臂膀，肩挨着肩地一起向楼上走去。

这时，有两个江阴口音的工人走过，好像在议论着朱松寿，其中一个说，“朱司令在陆墓被人打死了，报上还登了条消息。”

另一个接着说：“朱司令是抗日的，这年头，抗日的，都没有好结果。”

第一个连连叹息道：“我见过这个人，长得又高又大，长长的脸上整天笑咪咪的……”

杨绮云像被当头击了一棍似的，险些儿跌倒在地，可转念一想，应该问个准讯儿。于是紧走几步，拦住了刚才说话的两个工人，颤着声音问道：“叔叔，你们刚才说的朱司令是谁呀？”

“就是江阴朱松寿呀，你是他什么人？”第一个工人惊奇地看着这个手中抱着婴孩的漂亮女人。

“我也是江阴人。”杨绮云含糊地说，“你们是从哪里知道他已经死了？”

“今天报上有消息，你自己去看吧。”两个工人觉得这个妇女同朱松寿一定有着什么密切的关系，脸色惨白得非常难看，免得遭到意外的麻烦，说完就匆匆走了。

杨绮云向马路边的报童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仔细一看，果然有这样一条消息。眼前突然变得模糊一片，街道在旋转，马路在变形，汽车

在向她撞来。她紧紧地抱住孩子，稳住了神，才一步一摆地向自己的亭子间走去。刚走进房间，她一头倒在床上，“呜呜呜”地哭开了。

杨绮云哭得天昏地暗，突然，她自言自语起来：“不会，松寿没有死！”记得曾听蒋云他们说过，敌人常用刊登假消息来麻痹人们，达到他们逮捕共产党员的目的。这次敌人一定也是用这个方法诱捕朱松寿。对，松寿没有死，他会突然回来的，过去松寿不也是经常在自己的思念中突然回来么。于是，杨绮云又常常抱着小鸿良，走到楼下，踮起脚尖，幻想着突然看到从苏州回来的丈夫。

但是，杨绮云没有看到丈夫，看到的是从江阴来的一个外甥。二姑的一个儿子向舅妈哭诉：“乡下人都传说舅舅被人打死了！”这次，杨绮云没有哭。她抱着鸿良回到亭子间，取出丈夫的半身像，镶嵌在相框里，端端正正地放在小桌子的正中。又点燃一支香，插到小香炉里。她“扑通”一声跪下来，两眼默默地凝视着丈夫的照片发呆……

杨绮云毅然抱着小鸿良，决定到苏州去为丈夫收尸。

杨绮云乘了火车又转汽车，好不容易才到了陆墓镇。她抬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狼狗一般的鬼子和伪军，还有那生疏的街道、生疏的人群、生疏的河流阡陌，到哪里能打听到真实的消息呢？她想了想，决定寻找坟墓。松寿如果死了，才一个月，坟墓肯定还是新的。她先由南往北寻找，再由西往东寻找。坟墓全都长上了草，没有一个是新土。她失望地回到上海。

杨绮云前后共去陆墓三次，自然都一无所获。

不知过了多久，从苏州传来了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那天，朱松寿的确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在陆墓一户农家秘密养了几个月伤，痊愈后，直接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找六师师长谭震林去了。

杨绮云高高兴兴地撤掉了祭桌，收起了照片，砸碎了香炉。从这天起，她几乎天天晚上梦见丈夫笑咪咪地乘着火车和轮船回到上海，走进她的亭子间，搂着她的脸亲吻。她把梦中的事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也分享一份快活，使他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杨绮云的唯一想法是：如何渡过难关，直到抗战和革命的胜利。

但是，一家8口人的衣食住行，单靠杨绮云是无法支撑的。没有办法，她把大儿子鸿坤送到妹妹家，跟着妹夫学裁缝；又把大女儿梅芳和二女儿雪芬送到沙洲亲戚家，到免费的老海坝小学念书；再把小女儿秀

芬送到长寿老家一个农妇家寄养。自己则带着二儿子国强和小儿子鸿良。她虽然只抚养两个儿子，生活还是过不去。杨绮云只好变卖东西，她这样的家哪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呀！不到一年，家里卖得只剩下一张床板。再也活不下去了，杨绮云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久别的家乡江阴长寿朱家巷。

杨绮云带着孩子来到家门口。这是什么家呀？原来的20间房子，如今只剩下6间正房和2间侧厢。杨绮云走进房子，不觉一惊。屋顶布满了蜘蛛网，地上的老鼠还在打群架。杨绮云正发愁，村里的左邻右舍赶来了，默默地打扫着，整理着。他们见杨绮云什么也没有，有的就拿米来面，有的搬来水缸碗筷，还有的挑来柴火。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杨绮云才勉强地安下了家。

总不能靠着乡亲们的接济过日子呀，杨绮云决定自己种地。她把分散在外面的孩子们召回来，由于孩子都还小，只能自种一小部分，大部分还得出租。后来，亲友们给她出主意，请个长工，把出租的地再收回一些自种。于是，杨绮云就雇了一名长工。果然，自己多种了几亩地，收入增加了，日子好过多了。

不久，杨绮云买了一部织布机。先由二儿子国强织布，织了一阵，他感到收入不多，就到无锡一家纱厂做工去了。国强出去，家里少了一张嘴，还能捎回一些钱。大女儿梅芳接着织布，她心灵手巧，又很勤快，白天上学，晚上织到深夜，织的布又多又好，厂家很喜欢收买她织的布。

大儿子和二儿子已长成小伙子。有人叫他们出来做事。杨绮云想，做事是好事，可以增加收入，减轻家里负担，但是要弄清为谁做事。松寿说过，我们的孩子，要“跟着共产党走，走革命的路”。我们的孩子只能为共产党做事，不能为国民党做事。这世道什么人都有，也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她就来一个“关门大吉”，凡是有人来叫他们出去办事的，她都一概拒绝。

国民党江阴县政府要抓鸿坤当壮丁，杨绮云急了，这不是要把儿子拉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去吗？这不行！她托人找保长说情。保长说，不去可以，但要出壮丁费，折合4包洋纱钱。只要是不去当国民党兵就行！杨绮云咬咬牙，省吃俭用，东借西借，向保长交了4包洋纱钱。可是，小伙子在家，总是有人来动脑筋。杨绮云心想：鸿坤从小爱读书，对，叫他去教书。于是，鸿坤就在家办起了一所义务小学，教10多个学生。

家长们见鸿坤教书认真负责，就给他几个钱。又有人来说：“教书没出息！”还要他出去做事。杨绮云就说：“教人读书识字，比干什么都好，”鸿坤教了书，有了拒绝出去做事的“挡箭牌”。已经由无锡去上海的二儿子国强，突然给妈妈来信说，国民党海军招考去英国学习海军的学生，他已经报名考上了；还说，这样既能出国留学，又不花一分钱。他征求妈妈意见。杨绮云看了信，立即托外甥给国强写信：那个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不是你去的，在上海生活不下去就回来！国强听了妈妈的话，放弃了去英国学习的打算。

虽然爸爸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依然活着，杨绮云也竭力维持着这样的信念，可是，每当新年来临，看到别家的爸爸往孩子的手里塞着压岁钱的时候，或者围在一张桌子上吃着年夜饭的时候，或者背着、搀着孩子上街买豆腐花吃的时候，他们总是依偎着妈妈，纠缠着要爸爸。

“革命胜利了，你爸爸就回来了。”杨绮云总是这样安慰着孩子，也安慰着自己。

1949年4月21日黄昏，长江里沉闷的炮声彻夜响着，杨绮云暗暗猜想，莫不是解放军打过长江来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丈夫一定随着军队过江了，盼望了整整8年的夫妻团圆，父子欢聚的大喜日子终于来到了！天一亮，她就把孩子们一个个叫醒了。“爸爸就要回家了！”她对孩子们大声地说，像将军对着他的士兵宣布一个战役已经取得胜利，充满了喜悦、自信、骄傲的神色。

果然，第二天，一队队穿着草绿色军服的解放军，背着长枪，扎着绑腿，军帽上的红五星在春日的阳光里闪闪发亮，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毗山到长寿的大路上。

“走，我们去接爸爸回家！”已经长得像父亲那样高大壮实的朱鸿坤，招呼着他的弟弟、妹妹们，率先向外走去。“好，我们接爸爸去！”大家齐声响应，蜂拥挤出大门。

“呜呜呜……”后面传来了哭声，大家回头一看，是小妹妹秀芬在流眼泪。

“你这是怎么啦？”鸿坤粗声粗气地问。

“我没有鞋子，赤着脚，爸爸看见了。会生气的！”12岁的秀芬两眼盯着光脚板，委屈地说。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低头一看，都是光脚板儿，江南暮春的气温并

不高，脚板儿都冻得通红通红的梅芳、雪芬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挺着高高的胸脯，可是依然穿着哥哥的旧衣服。她们也不走了，这个样子，爸爸看见了真会生气的。这一幕情景，杨绮云都看在眼里，心里酸溜溜的，眼泪直往外涌。丈夫自1941年5月中断了信息，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7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呀？虽然家里还剩下一些田产，她都租给人家，收着最低额的租粮。有些佃户交不起租，她也像丈夫那样打着折扣，有的干脆免了。家里的经济一落千丈，不要说大姑娘穿花衣服和孩子们脚上的鞋子没钱去买，就连露英出嫁、鸿坤娶媳妇，她都无力操办得像样些。不过，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现在，革命胜利了，丈夫也要回家了，舒心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你们就赤了脚去吧，爸爸最喜欢穷孩子，他不会生气的。”杨绮云硬是把泪水咽进肚里，装着笑脸催孩子们快去接爸爸。

这一群小小的队伍，由朱鸿坤领着，来到村前的青石皮桥，坐在桥边，睁着一双双期待、渴望、热情的眼睛，盯着离他们不远的大路上的解放军队伍，一排排、一队队地向南面祝塘方向走去。

太阳渐渐升高，又渐渐西斜了，解放军的队伍还在一队队地向南面开拔，有的战士看到桥畔这一群年龄不一穿着破破烂烂的人，感到十分惊奇，有的主动走出队伍询问他们，站在这里有什么事。

“接我们爸爸。”秀芬抢着说。

“你的爸爸是谁？在哪一支部队？”战士又问。

“爸爸叫朱松寿，在民抗部队当司令。”梅芳骄傲地大声回答。

“没听说有民抗部队，也没听说有朱松寿。”战士坦率地说，当看到这群欢迎队伍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云的时候，战士马上转口说，“过江的部队成千上万，你们再等等吧。”

战士一溜小跑回到了他的队伍。

太阳快要下山了，他们还怔怔地站着，死死地盯着每一个过路的解放军，只有8岁的鸿良已经站不动了，倒在桥畔睡着了，发出甜甜的鼾声。

一连几天，青石皮桥都站着这样一支引人注目的欢迎队伍。他们向匆匆行进中的解放军挥手，敬礼，唱歌，献茶，期待着从队伍中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司令来，说一声“孩子们，让你们久等了，我回来啦！”

然而，他们每天都失望而归。

大路上的解放军队伍已经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没有了。杨绮云的脸上像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灰白灰白的，紧闭着嘴不说一句话。孩子们也不说一句话。被当年陈祥安拆剩的屋子里，压抑得连空气、血液、思维都已经凝固起来了。

杨绮云和她的孩子们，在心中的希望、期待破灭以后，艰难地生活着。

不知又过了多少天，青石皮桥出现了一匹大白马，马上骑着一个高大的军人，正向朱家巷飞驰而来。

“朱松寿回来了！”

“朱司令骑着高头大白马又回来了！”

“松寿官回来看他的亲人和乡邻们了！”

朱家巷顿时沸腾起来。杨绮云听到喊声，急忙拉着孩子们的手，像风一般地冲出大门，奔到砖场上，搭着凉棚，向青石皮桥那边瞭望。啊，是自己的亲人，孩子们的爸爸，那白马，那雄姿，那高大的身躯，那迫不及待的样子，都像自己的丈夫，不，完全是他，是朱松寿回来了！巨大的喜悦，倒把她郁积的泪水打开了闸门，哗哗地流淌出来，迷糊了她的视线，她赶紧摸出手帕，用劲地擦着。

这时，大白马已经在她面前的砖场上停下，马背上敏捷地跳下一个高大的汉子，一身整整齐齐的解放军军装，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鲜红的绸条拖在外面。她猛地扑过去，把头紧紧地靠在丈夫宽厚温热的胸膛上。

砖场上，人们别过头去，发出唏嘘的叹息。孩子们睁着惊异的目光，辨认着这位陌生的爸爸。

那大汉轻轻地推开依偎着自己的杨绮云，像晴天落下一个霹雳似的把沉浸在欢聚中的杨绮云惊得目瞪口呆：“啊，你不是松寿，我的天！松寿呢？我的丈夫朱松寿呢？你快说，朱松寿怎么了？难道他真的死了？你快说呀！”

“朱家嫂嫂，你不要难过。”大汉安慰杨绮云说，“朱司令已经牺牲了，确确实实地牺牲了，这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我叫周根，曾在朱司令身边做过通讯员，你应该认识我、相信我。现在，政府快要评烈士了。朱司令是一位值得人们千秋万代敬重和纪念的革命烈士，你们都是烈士的家属，当地政府和人民会妥善关怀和安排你们的生活的，你们尽可以

放心。”

杨绮云以前见过周根，刚才只是因为过分的激动和泪水模糊了眼，错把周根当作丈夫了。不过，现在不是羞涩的时候，她仔细地凝视着周根的脸，不错，是他，脸上不均匀地分布着一个个麻坑，以前人们都叫他周根麻子。

“我现在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周根看见杨绮云一个劲地瞅着自己，以为她不相信自己的身份，连忙从军衣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杨绮云和她的孩子们看。

朱家的砖场上，人们一片沉默，在这种时候，任何语言的安慰都是苍白而笨拙的。周根骑的那匹大白马，也不安地昂起头，踢着后蹄，击打着铺在地上的砖块，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

“我要爸爸！”小女儿秀芬一声尖厉的叫喊，打破了砖场上的沉默。杨绮云和孩子们再也忍受不住憋了半天的眼泪，终于放声哭了起来，悲切、凄楚、哀痛，对亲人的悼念，对不幸命运的诅咒，对未来生活的担忧，都融化在这一串串清澈的泪水中。

当夜幕张开黑色的翅膀停落到朱家巷的时候，周根团长默默地走了，乡邻们也陆续离开了砖场。杨绮云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回到了屋子里，她像8年前在上海亭子间那样，重新摆出了丈夫那张笑容可掬的照片，端上香炉，点燃了3支香，恭恭敬敬地插到香炉里。

现在，她和孩子们盼望的只有评烈士这事了，这是丈夫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唯一报偿。她们相信周根团长的话，并不担忧这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障碍。果然，朱松寿生前的战友：孙逊群、钱振标、茅学勤、陈叔璇、钱大妹、吴子卿……都很快被评上了革命烈士，他们的亲属也都收到了烈属证和抚恤金。

可是，唯独没有朱松寿的份。

这是怎么回事？杨绮云感到愤愤不平。

“妈，革命刚刚胜利，政府的工作忙着呢。评烈士自然要一批一批地来，你这样急做什么呀？”大儿子鸿坤劝说母亲。

杨绮云听了儿子的话，耐心地等待着。

日出日落，月升月沉，时间在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然而，朱家依然没有荣誉，没有鲜花，没有温暖！杨绮云身边已经没有儿女来劝说和宽慰她了，只有屋后远处的毗山，横卧在苍茫色的天底下，默默地陪

伴着她孤独的灵魂。她眯缝着眼，看见毗山顶上星星点点长着的松树，明显的比以前长高了，可是厚厚实实的积雪压得它们抬不起头来。难道丈夫的命运同冬天毗山上的青松一样的遭遇吗？青松的委屈指日可待，寒冬一旦过去，太阳恢复它灼热的光芒，积雪就化得无影无踪的了。可丈夫何年何月才能评上烈士呢？

朱松寿的革命烈士还没有评上，他的妻子及儿女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原因还是出在对朱松寿历史问题的评价上。

杨绮云见到丈夫迟迟评不上革命烈士，就常常向儿女们回忆他们爸爸的革命经历，谈到伤心处还常常泪流满面。儿女们从妈妈的嘴中，知道了爸爸的为人，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又分头走访爸爸的老战友，得到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代表母亲，向组织要求派人调查朱松寿的问题，做出公正、客观，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他们虽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冷遇，但是仍锲而不舍地努力着，追求着。他们这样做，倒并不是要享受烈士儿女的殊荣，或者让母亲每月领得一笔抚恤金而减轻自己赡养母亲的一份负担。他们总觉得父亲革命15年，横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革命革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地步，胜利后的政府对他应该有个令人信服的评价。

他们的这个正当要求，到了“文化大革命”竟然成了他们的罪行，吃尽了想象不到的苦头。杨绮云被剥光衣服挨打，大女儿梅芳被剃成光头做苦力，至于批斗、戴高帽、游街更是家常便饭。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受到了株连，有的被留党察看，有的下放劳动，还有的降职、降薪……

即使吃尽了苦头，杨绮云和她的儿女们仍盼望着朱松寿被评上革命烈士。

他们这样地期待着，盼望着。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希望被扑灭了！

1972年8月19日，江阴县革命委员会下达了一个《对历史反革命朱松寿的处理决定》。

这个决定说：“朱松寿出身地主家庭，大革命时投机革命，遭敌逮捕后，贪生怕死，屈膝投降，为敌效劳。抗战期间，虽一度投向我党，但后又公开叛变投奔汪伪，自绝于人民。据此，按照党的政策，决定将朱松寿定为历史反革命。”

这份被称为“澄革法 [1972] 199号”文件出笼后，杨绮云和她的一

家人被推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尤其是杨绮云，在丈夫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终日抬不起头来，成为当地群众专政的对象。有一次，杨绮云被当地造反派关押在一个叫“南油车”的地方，屋子里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造反派让她站在屋子中央，十多个人举着红、绿两种颜色的小彩旗，团团包围着她，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手持小手臂粗的竹棍，狠命地拷打她的全身，围着她的人有节奏地高声呼喊着口号：“打倒恶霸地主杨绮云！”“打倒叛徒特务杨绮云！”杨绮云看着这一张张凶狠的面孔，知道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她不明白在“文革”前彼此都很友善的干部和乡邻，为什么在政治运动中变得如此绝情，如此心狠！她想起那烽火四起的战争年代，自己跟随丈夫东躲西藏，历尽艰险，那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敌对阵营。可是，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呀，为什么自己人整自己要这样心狠手辣呢？在无比屈辱的囚禁和挨打日子里，杨绮云也想到过自杀，一死以洗耻辱。

但是，她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像丈夫朱松寿一样，没有做错什么事，如果自杀了，日后谁来理会这些事呢？自杀了，对得起自己的丈夫

和几十年来跟着受委屈的孩子们吗？她决意不走这条路。“除非眼前这些手举红、绿旗的人把我打死，我一定要活着走出去，一定要亲眼看到人民政府为丈夫平反昭雪！”这样的信念给了她力量和勇气，即使到了体无完肤、奄奄一息的地步，她都没有怯懦地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六年后，杨绮云终于看到了一缕曙光。1978年12月6日，江阴县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全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背景下，颁发了“澄革落[1978]第52号”文件，上面写道：“朱松寿因政治历史问题，本会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九日对朱松寿定为历史反革命。现经复议认为：对朱松寿（早已死亡）不应再给予定为历史反革



1989年12月，朱远跟随陆其明、田柳、徐泉法前往吴县陆墓镇调查父亲朱松寿烈士牺牲经过情况时在该镇三千浜村留影。

（徐泉法 摄）

命，现决定撤销本会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九日澄革法〔1972〕199号对朱松寿的处理决定。”

杨绮云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松得并不那么舒坦。朱松寿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伟业和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出生入死15年，革命革到倾家荡产，命丧他乡，尸骨都未回故土，全国解放后还连累到妻子儿女，自己的伤痛还经常复发，现在仅仅撤销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处理决定，就算了事？与杨绮云住得最近的大女儿朱梅芳，1950年7月参加工作后改名叫朱远，对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迫害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是朱远本人，也受到许多的牵连。她因为不服对父亲不公正的评价和处理，多次向组织申诉，要求组织上调查父亲的历史，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为此，“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从江阴县级机关被下放到乡镇的一个小单位工作，无论经济收入还是事业前途，都受到很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但是，她毫无畏惧，依然要为父亲说话。江阴县革命委员会撤销了对朱松寿的错误处分，她为此感激涕零，自此她的母亲可以不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不过，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没有推翻1972年8月19日江阴县革委会文件所下的“屈膝投降，为敌效劳”和“公开叛变投奔汪伪，自绝于人民”的错误结论，以后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这些罪名还会加到朱松寿的头上。为此，她继续向组织申诉，有一次还直接走到江苏省委领导包厚昌那里，诉说了她父亲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母亲长期受到的委屈，引起了包厚昌的高度重视。

三年后，重新调查朱松寿历史的机会终于来临。那是1981年8月6日，在全国上下编史修志的热潮中，中共江阴县委党史办公室正式成立。县委党史办是一个专门征集研究本地革命斗争历史资料的机构，朱松寿的革命活动横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自然是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重点之一。时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肖国衡，明确要求党史办认真负责、客观公正地调查朱松寿一生历史，不要受县革委会两个文件的束缚，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时任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主持工作的程以正和全办工作人员，在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从各地公安局和档案馆抄摘和复印了大量资料，又奔赴各地采访了当年与朱松寿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何克希、包厚昌、张志强等老同志，又与杨绮云及她的儿女朱鸿坤、朱鸿良、朱远、朱秀芬等人见了面，充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随着调查的不断深

入，资料的不断丰富，一个不惜舍弃舒适的富家生活、勇敢走向革命斗争第一线、远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手握双枪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清晰鲜明地出现在党史工作者的眼前。1984年1月，县委党史办向县委、县政府上报《关于朱松寿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朱松寿在三个革命时期的革命功绩，驳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在朱松寿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特别是推翻了澄革法〔1972〕199号文件关于朱松寿“公开叛变投奔汪伪”的罪名——

原来，1941年二三月间，朱松寿带着承小纹到了苏州，让承住在城里，自己带着驳壳枪，只身前往吴县陆墓镇，寻找地方游击队的头目杨筱南。朱松寿与杨筱南过去有过多次来往，彼此合作从事过抗日活动，尤其是1939年叶飞率领“江抗”东进期间，朱松寿奉命前往杨部动员杨筱南接受“江抗”收编，两人确认了干父子关系，相互之间增加了许多信任。

但是，杨筱南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常常左右摇摆，反复无常。1939年杨筱南接受了“江抗”的改编。这年秋天，“江抗”西撤江阴西石桥整编。杨筱南伪装患病没有跟去，仍旧回到他的老巢无锡县甘露镇做土皇帝。冬天，杨筱南又接受国民党三战区的委任，做起‘苏常太抗日自卫团’的团长

来了。到了1940年8月，“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谭震林亲到甘露与杨筱南谈判，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可是，翌年春天，杨筱南又翻脸不认人，与我军磨擦起来了，由于作战失利，他带着部队退到了老家吴县陆墓镇附近。朱松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



1985年4月，江苏省政府郑重追认朱松寿为革命烈士，朱松寿夫人杨绮云（前排中）心情特别开朗，与前来看望她的儿女们合影留念：大儿子朱鸿坤（前排右）、小儿子朱鸿良（前排左）、大女儿朱远（后排中）、二女儿朱雪芬（后排右）、小女儿朱秀芬（后排左）。（朱远提供）



1989年3月31日，江阴市委副书记翟怀新（左）、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肖国衡参加朱松寿烈士纪念碑揭牌仪式。
(胡永康 摄)

陆墓，以过去的老关系，劝说杨筱南与我军重归于好，共同抗日。

杨筱南犹豫着。第一次、第二次，他都没有明确的答复。就在这时，朱松寿的活动被3年前的宿敌、国民党军统特务袁亚承获悉，立即指挥

蓝衣社苏州站站长顾伟同杨筱南密谈，策划杀害朱松寿事宜。杨筱南原来就对新四军憋着一肚子气，于是就答应以杀新四军方面派来的朱松寿解恨。

1941年5月里的一天，朱松寿第三次来到陆墓，在镇东北一里多路的三千浜村见到了杨筱南。杨筱南设宴接风，并一口答应朱松寿多次提出的脱离“忠救”跟随他抗日的要求。朱松寿见达到目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起身告辞。就在朱松寿向陆墓镇走去的半路上，顾伟和杨筱南预先安排的两个行动员先后向朱松寿射出了两颗罪恶的子弹，这位忠心耿耿的中共“六大”代表、抗日英雄含恨倒在血泊中，走完了41年的生命历程。

袁亚承见杀害朱松寿的阴谋得逞，一面给凶手颁发3500元奖金，一面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朱松寿投奔汪伪的谣言，企图在这位抗日志士的身上，泼上污秽之物，让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江阴人民的优秀儿子，在自己的队伍中没有荣誉和地位，长期默默无闻而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那么，杀害朱松寿的两个行动员是谁呢？据当年留下的史料记载，一是黄永华，化名林德贤，一是钱楚臣，化名俞鸣。

1985年3月15日，江阴县政府讨论通过了《关于朱松寿历史问题的调

查报告》，上报江苏省政府。4月9日，江苏省政府审核了这个调查报告，郑重地颁布了48号文件，追认朱松寿为革命烈士。

4年以后，即1989年3月31日，在朱松寿烈士的家乡毗山南麓，也就是90年前朱母在送子观音面前许愿得子的地方，61年前烈士聚集农民队伍发动峭岐暴动的地方，52年前烈士单枪阻击日军和揭竿抗日的地方，江阴市暨长寿乡人民政府5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市委副书记翟怀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肖国衡轻轻揭开披在碑上的大红绸子，一座巍然屹立的花岗石碑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花岗石碑的正面，由江苏省政协主席包厚昌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在明媚的春光下闪耀着光亮：

朱松寿烈士纪念碑

花岗石碑的背面，刻着由中共江阴市委党史办公室撰文，市政协副



1989年3月31日，江阴市暨长寿乡人民政府在毗山修建的朱松寿烈士纪念碑。

(朱远 提供)



朱松寿烈士纪念碑背面文字，记载了朱松寿的生平事迹和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徐泉法 摄)

主席黄亚蒙敬书的碑文（作者注：原碑文记载朱松寿烈士的职务，经作者考证发现个别地方有误，本书已予纠正）：

朱松寿 又名寿华 一九〇〇年生于长寿朱家巷 江阴农暴领导人之一 中共六大代表 江阴农民革命军南路司令 红十四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 一九三七年冬 率先组织抗日武装 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司令 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司令 对发展人民武装抗击日军侵略 功绩显著 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吴县陆墓遇刺壮烈牺牲

“小妹，你记得元帅陈毅的一首诗吗？”朱鸿坤像他父亲那样长着一副偏长黑瘦的脸，微驼着背脊，站在纪念碑前的人群里，轻轻碰了碰秀芬的手，悄声问道。

“记得，大哥，”朱秀芬扬起与她的年龄不相协调的花白的头，“不信，我背给你听：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朱鸿坤正要说些什么，突然，他的眼睛一亮：那满山的青松挺直了历尽霜雪磨难而斑斑驳驳的躯干，在柔和的春风里摆动着倔强的松针，撞击出一阵阵雄壮的涛声。兄妹俩侧着头，默默地倾听着耳边滚滚而来的声音。啊，爸爸在为自己原本高洁的面貌重现在人们面前而欢歌笑语呢！他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我们说哩。爸爸，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对着站在你纪念碑前的人群，对着继承着你未竟事业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们，对着一切热爱你的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和朋友们……

这次在毗山为朱松寿烈士修建纪念碑，对杨绮云来说，是她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和最喜庆的节日。当年12月，她在写给江阴市委副书记瞿怀新并市委、市政府的一封长信中，把1985年4月江苏省政府批准追认朱松寿为革命烈士视为她的“第二次解放”，把1989年3月为朱松寿烈士树碑视为她人生更彻底的“大解放”。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次毗山隆重的揭牌仪式，她因患重病在南京治疗而未能亲自参加。

第二年清明节，老人恢复了健康，她在儿女们的陪伴下亲临毗山，颤颤巍巍走到丈夫纪念碑前。啊，这块由花岗石雕刻的纪念碑挺拔而修长，这正像丈夫生前高大而威武的身躯；纪念碑四周簇拥着众多的花圈，正像丈夫生前受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她把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到冰凉的碑面上，心里默默地诉说起来：“松寿，我的夫君，今天，我在儿女们的搀扶下看你来了。自你那次离开我，快半个世纪了，我没有一天像今天这样快乐，这样满足，这样紧紧地贴着你。夫君，你在地下有灵，就再抱我一次吧，紧紧地抱着我，不要松开，永远不要松开！”她的泪像打开的闸门喷涌而出，不一会儿，像核桃壳般刻满皱纹的脸上已经湿漉漉的。

大女儿朱远看到年迈的母亲这样激情澎湃，担心老人出现意外，急忙走过来抚慰母亲。杨绮云拉着大女儿的手，想到她几十年来，为了父亲的名誉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她的家庭，她的工作，她的前途遭受到的种种打击和不幸，竟然和她当年在上海出生时，自己和松寿对她的预感惊人地相似！这难道是她命中注定的吗？老人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大女儿，一股郁积了数十年的不平 and 心酸，从杨绮云的心底爆发出来，急忙伸出两只枯藤般的手臂，把大女儿紧紧地搂抱在自己的怀里……

附录

把民抗壮大起来

包厚昌



1940年10月，江阴民抗政治部主任包厚昌，奉命协助朱松寿整顿民抗队伍。图为包厚昌。

（原载《无锡革命史画册》）

江阴自沦陷以后，民众即纷纷起来，自动参加抗日。民国二十七年就有朱寿华（即朱松寿）领导游击队，数度与敌作战，因此更显得当地民众的兴奋和拥戴，参加部队的更是风起云涌，不过因为那时的领导，是封建式的，先生老头子的领导，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也没有明确的立场和方针。正在那时，反共专家袁亚承到了江阴，以卑鄙无耻的阴谋手段，把抗战的朱司令一脚踢开，他自己就替而代之，从此以后，江阴的民众就更加走入痛苦和黑暗的深渊中去了！“枪杆子高于一切”，横征暴敛，政治上的独裁和黑暗，非但人民得不到一点自由，甚至连气都透不过来，袁亚承在江阴的

时候，非但不做抗建工作，反而专来磨擦。如去年江抗东进杀敌，准备打开东路抗战的局面，而他却帮助敌人在后面拉脚，多方阻碍和进行磨擦。江抗虽然因顾全大局而西撤了，但是他留下的印象，却使广大人民日夜盼望着能早日东归。终于因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东路党正确的领导，江抗又重新成长起来了，而且壮大起来了，坚强起来了。他在东路，顽强的打击了敌军，消灭了土匪部队，把千百万人民的抗战热情，重新提高起来。江抗进入江阴以后，经过东西西剿数十次的与敌伪匪的战斗，积极的恢复和整理行政、教育、经济等工作，开展民

众组织，实行减租减税，得到全体抗日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但是敌伪军是时常下乡骚扰，伪军土匪继续不断的向人民欺压敲诈，绑架勒索的事，仍是严重地存在着。

民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在江抗的帮助和指示下，民抗司令部就在九月中旬正式成立，司令朱寿华，副司令杨应芳，政治工作制度也建立了，当时就进行整理和组织的地方武装，直接指挥的有三个大队——都是从地方游击队争取过来的，因为这些部队过去都是在封建的领导下，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升官发财的念头、轻游击队的作风，充满了大部分人的头脑和行为里。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整训，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克服了这些现象，现在已与主力部队并驾齐驱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整训期中，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就是顽固分子包汉生派了奸细到我们部队中来活动，企图瓦解我们，虽然处处加以防范，但终于在第一大队中发生了拖枪逃跑的事情，终因发觉尚早，处理得宜，并未发生乱子。这一事实，证明了包汉生已经到了最后挣扎的时间，我们在加紧部队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工作以后，这些阴谋就要完全破产的。

现在我们又进行组织了第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常备队，组织热心抗日的民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使成为抗战中有力的部队，反对过去的国民党的感情拉拢、金钱收买的坏习惯，代之以正确的政治领导，不就地筹饷，不派月捐，不强派款，经济由经委会统筹统支，他的权力，也打破“枪杆子高于一切”的包办现象，决不干涉地方行政。虽然这几个常备队成立未几，但他们的功绩和纪律的严明，是永远不朽的。最后，如第三常备队配合主力消灭包匪，第四常备队的击毁日轮“金山丸”，俘日人一，获胜利品无数，第五常备队的清除土匪，都使得人民兴奋和拥戴的。执行纪律方面，如第一常备队队员徐炳才藉名在外敲诈，经查出后已予处分，并在祝塘群众公审大会上公审，第五常备队队员毛幕珍等出外抢赌，经告发后，已予严厉军纪制裁。总之，凡破坏纪律之兵痞坏蛋，我们是毫不容情执行处分。

民抗，是澄锡虞区抗日人民的人民武装，是澄锡虞区民众的军队，更是东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保卫力量。

（包厚昌时任中共澄锡虞工委委员、江阴民抗政治部主任）

本文原载1940年12月21日《东进报》

永远的怀念

——回忆我的丈夫朱松寿

杨绮云口述 朱远整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杨绮云
(朱远 提供)

我的老家住在沙洲的长安镇。其实长安镇并不长安。我十八岁那年，长江上游冲下来一股洪流，将长安镇吞噬了。早寡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到鱼米之乡的江阴长寿镇朱家巷。十九岁那年春天，我和朱松寿结了婚。

我的阿公在松寿十九岁那年病逝，阿婆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松寿的四个姐姐亦全部出嫁了。家里都有松寿支撑掌权，管理着这个农户大家庭。

因为我生长在产棉区，不会做水稻区的农活，例如甩麦、打柴、堆麦篓等等，都有松寿帮着干。这些活，按当地的风俗习惯，都应该是女人干的，所以村子上的人总议论，说什么松寿是“男做女活，越做越穷”。松寿根本不去理睬他们。松寿不但会干农活，家务事也挺能干的，所以我感到很幸福。一年后，我们就生了第一个男孩，取名洪坤。全家都很喜欢这个孩子，特别是我的阿婆更喜欢，天天吃素念佛，盼她的孙子快快长大。说也奇怪，这个孩子未周岁就会走路了。于是，松寿的四个姐姐就说了：“男孩超季行（不满十二个月），长大无住堂（房子）。”后来好像真的应验了她们的预言，松寿参加革命后，十几间高大厅屋都给反动派（商团）拆光了。这样，我们幸福安定地生活了三个年头。

松寿的性格爽直、坦率，广交朋友，慷慨侠义。他长得魁梧，力气很大，远近乡里同辈人都喜欢亲近他。有一年，田里丰收了，他和同乡摇了一船稻子（约两千多斤）去无锡出售，回来时应该添置一些农具和过年用品，结果回来两手空空，我问他，钱呢？他说，都花掉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把钱借给了困难的朋友了。



参加工作之初的朱远

当时的朝代变化很快，孙中山闹革命把宣统皇帝推翻了，男人不留辫子，女人不缠脚（我小时候已缠了）。几年后袁世凯做皇帝了。后来又听说孙中山逝世了，天下又要大乱了。松寿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我开始为他很担心，问，“你在外面干些啥？”他告诉我说，“孙中山先生逝世了，革命没有成功。我们要实行‘耕地农有’，‘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要打倒那些土豪劣绅和官府中的贪官污吏，不准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时我听了有点糊里糊涂，我只说：“你在外面要当心，不要去闯祸。”尔后，陈家仓的陈叔璇（老五）、陈宇中（老六），接着是后塍的大个子茅学勤都来我家，有时还有一些陌生人面孔出现在我家里。当时松寿家有三进房子。他们一来，我就帮着做饭炒菜给他们吃。他们在里屋讲些什么我从来不去过问。这样，他们进行了一年的秘密组织活动。

1926年，他们的行动就公开化了。那年田地庄稼给蝗虫吃了一大片，又遇上水灾旱灾，农民生活很苦，交不出租子。有一次，松寿在长寿街上召开农协会会员会议，要土豪地主减租减息。结果农协会会员和长寿的反动土豪打起来了。那些反动土豪把松寿捆了关起来。农会就告到江阴县政府，县长派人来调解，将松寿释放了。

1926年1月，顾山周刚直被军阀孙传芳杀头示众。松寿回来对我讲时，只见他很气愤，说：“这个仇非报不可！”当时我想，他们是帮着穷人翻身，那些军阀为何要杀周刚直的头呢？我听了也很气愤。我更加担心松寿的安全，在外面可不要出乱子。

1927年三四月份，松寿、老五、老六、茅学勤他们来我家，告诉我

一个好消息：“替周刚直报了仇！”他们又说又笑，说是干得痛快。我听了也感到松了一口气。当晚他们吃了饭又走了。

这年，松寿参加了县办的农运会训练班，有一个多月没有回来。有一天，松寿回来了，对我说：“蒋介石要叛变革命，要向共产党人开刀了，我们亦要搞武装对付。”当时我听了很怕，因为拿枪杆子是有生命出入的。但是，我也不敢阻拦他，只是关照他自己要当心安全。

4月12日，蒋介石真的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进行清党活动。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受到严重打击，地方上的一些反动分子又神气出来了，镇上的反动商团又嚣张起来了，他们到处抓人，欺压穷人。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松寿和老六在长寿北面五里的茅柴火村办起了小兵工厂，制造土枪、土炸弹，整天不回家。有时他要衣服，就叫他的二姐女婿到家里来取。他一心扑在小兵工厂上。

9月，松寿在长寿农民协会宣传禁赌，和当地的大土豪、大赌棍陈祥安发生磨擦，形成了桥东为陈的势力，桥西为农民协会的势力。没几天，松寿他们得到消息，国民党县农协筹备委员祝兆同要来与陈祥安密谋分化农民运动。松寿和老五就发动了云亭、长寿的农民数百人，在七里庙拦截祝兆同，逼他出拘票逮捕陈祥安。到了长寿，不知谁走漏了消息，陈有了准备。赤手空拳的农民和带有武装的反动商团进行了搏斗。在这场恶战中，农民伤了几十人，陈逃了。自此揭开了农民暴动的序幕。接着，江阴的农暴就风起云涌地起来了，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军警，大长了农民的志气，一切权力都归农民协会。由于松寿、茅学勤、老五等一批人勇猛地冲击着反动派，他们怕得要命，恨得要死，采取高压手段，到处捕捉革命同志，弄得松寿很长时间没有回家。

12月份的一个晚上，松寿回来拿棉衣，当夜住在家里。睡到半夜，忽听得有人急敲门，我母亲起床开了门，冲进来十来个带枪的武装警察。松寿想上去同他们拼。我看他们人多，就喝住了松寿。他穿好衣服，我又给他披了一件棉袄，他就跟着他们走了。当夜我叫生活人去给老五送信。老五回来和我讲，他们正在设法营救，叫我放心。过了几天，他们探到松寿和茅学思（茅学勤弟弟）、张老四（他们都是同一天晚上被捕的）三人关在后塍梅寿根开设的电灯厂内，于是由县委领导组织暴动，救出了被捕的三人，狠狠打击了后塍公安分局的反动气焰。

自从松寿被营救出来以后，农民把他背到茅柴火村，用锉刀把脚镣

手铐铤开，星夜直奔江阴西门朱杏南家。

1928年2月，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缉茅学勤、陈老五、松寿等九人的布告。为了我母子安全起见，茅学勤通知我赶快转移到外地去。松寿就叫他大姐的女婿周阿生（长寿东面周家巷人）摇了船护送我们母子两人去苏州香山隐居。没想到，只身离开松寿老家，一别就是十年。这十年，亦是在外颠沛流离持续斗争的十年。

再说周阿生送我母子两人回到家里后（路上一来一去有一个多月），就给长寿的商团抓去拷问，要他说出我们母子两人在哪里。阿生不肯招认，就被反动派杀头示众。后来我知道了，心里非常难过。阿生的爱人（松寿大姐的女儿）受到如此惊吓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我在苏州亲戚家住了两个月，也是提心吊胆的。当地的乡长、保长经常来查询我是从哪里来，是什么亲戚关系。我推说是沙上的亲戚（因为我的口音不像长寿人），他们才没有怀疑我。我和儿子离家出走后，松寿和茅学勤、老五等人在江阴坚持开展农暴斗争运动，很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到四月份，松寿就来香山接我母子两人去上海。在上海碰到了许多熟悉的江阴同志和同乡。当时上海有省委领导机构，松寿等人在外从事革命工作，都有老六（即蒋云，都叫他老蒋大块头）写报告向省委汇报。他们一切都按省委指示工作，一天到晚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我觉得在上海挺安全，也很愉快。茅学勤和老蒋很会说笑话，都很乐观。老五有点书生气，不太讲话。我到上海一个多月后，一天，松寿对我说，省委指定他和老蒋去俄国学习，要半年以上才能回来，前年（1984年），县里有人告诉我，松寿去俄国两个任务：一是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84人，松寿是其中之一；二是大会结束后，在那里学习军事。松寿走的时候关照我，有什么困难找茅学勤帮助解决。当时茅的妈妈、妻子、儿子也都从后塍乡下来到上海了。我们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非常热闹。没事时，我们就叫了出租汽车出去玩，表面上装着有钱人家的妇人，其实是为了蒙蔽反动派的耳目。

到了十一月份，有两个操着山东口音的大个子来家，对我说，“朱大嫂，我们先回来一个星期，你朱大哥过几天就回来了，叫我们给你捎个口信，请你放心。”我谢了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又有人来叫我去旅馆接松寿。我高兴得抱起儿子就跟着那人到了旅馆房间门口，里面坐着十

几个人，大概都是从俄国回来的。里面的人都叫我去认松寿，我简直认不出来了，真不好意思，一直站在门口笑，还是老蒋出来领我进去指给我看。松寿有意装作不认得的样子，戴了一顶礼帽压到眉梢，穿了一件黑大褂子，全屋的人都笑了。我、儿子和松寿坐了人力车回到了家里。松寿回家一看，见两家人住在一起，认为这样集中住很不安全，万一反动派来抓人，就会被一网打尽。于是，我们另找了房子，搬出去了。

自松寿从俄国回来后，我一直带着孩子过着隐居生活，整天孤零零的。松寿一天到晚在外面搞工作。有一次回来，他和我讲，茅学思（茅学勤的弟弟）给敌人抓去了。我问他在什么地方被抓去的，他说，那天他们去上海附近一个地方搞武器，被当地警察署发觉，追了出来。由于寡不敌众，学思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他哥哥茅学勤背了一段，敌人越追越近，学思自己硬是从哥哥背上挣脱下来，叫我们赶快跑，并且还掩护我们。回到上海，他哥哥学勤哭了。过了几天，他们得到消息，学思被敌人抓去后，不肯招认我们的同志，就给当地反动派杀害了。多好的一个青年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每想起来，我就很难过。松寿和老六参加六大回国当年，老六被省委派往徐州工作。

1929年1月，松寿身体不好，在家休息。一天晚上，天还未黑，马路上已经戒严了。我和松寿悄悄议论，可能今天又要抓人了。正说着，江阴上来了一个交通员，他说，在火车里碰到了江阴公安局的侦缉队人员，带了手铐来上海抓人，不知要抓谁，要我们赶快避开。松寿已经来不及通知其他同志。因为全市戒严，马路上已不准行人车子往来。过了两个小时，弄堂卖报的报童已在喊着卖报：头等消息，抓获了共党头目茅学勤等人。听了这叫喊，我们都暗暗哭泣了，痛斥反动派的罪行，松寿更难过，一直闷住不吭声，只是流着泪。因为他知道，被抓去的人是死多活少。松寿深知茅学勤刚强不屈的性格。为了闯天下，松寿和他同甘共苦四五年，革命感情很深。由于茅学勤革命坚决，打击敌人狠，所以我们都送他一个相反的雅号“老土豪”。

过了一个多月，乡下送信的来说，学勤和其他同时被捕的同志都给江阴的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最年轻的一个同志只有十八岁，行刑时，他们都高呼口号，视死如归。老五、老六等同志都来到我家为死难的同志志哀。当时我和大家一样悲伤难过，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

三月份，省委派松寿等人去苏北通海地区协助搞武装斗争，老六也

被派到江阴家乡开展武装工作，老五因有病则留在上海休养，并托我为他掩护。他俩出去有一个多月，松寿回到上海。他穿着一件破棉袄，已不像人样，变得像个叫化子。我问他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他说，这次是死里逃生才回来的。原来，松寿到了苏北通海地区，同一个地下党员（小学教师）接上了关系。因为那里的反动势力很强，每天晚上要查户口。我们的地下党同志都不敢出来活动，群众也不敢出头。松寿去了一个月都没敢住在屋里，夜夜宿在露天的厕所棚里，得了伤寒病。有一次松寿去镇上看病，给反动警察当共产党嫌疑分子抓起来了，后来他推说是从江南过来贩卖白菜的商贩，又经那位地下党员作保，才放了出来，搭了白菜船回到了上海。老六也从江阴回到上海。老六请示了省委，松寿就留在上海养病。那年七月份，老五被派到江阴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不久就给江阴反动派抓起来，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没有招出同志的地点、职务，最后又给江阴反动派枪杀了，又是一个好同志倒下去了，反动派欠了我们多少血债啊！松寿和老六非常悲痛。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是很深的，现在老五被害，他们怎不悲痛！我经常听松寿说过一句话：反动派杀了我们共产党多少好人，迟早要算账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到了十一月份，我生了第二个男孩子，取名叫国强。当时松寿在外工作有十多天没有回来，不知道我已生了孩子。一天，老六来看望我，对我说，松寿在开会，不能回家，叫我来看看你。老六看我生了孩子身体很虚弱，家里又很穷，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四块银元给我做生活费，我不肯拿，因为我知道他们也很困难。可老六说，我们可以想办法的。他走时告诉我，他看到松寿一定叫他快回来看看你，你们又添了一个儿子，为革命增加了一个后代。老六这人讲话是很风趣的。后来就剩下老六常来我家串门，他一来我就给他望风。

1930年，松寿和老六（蒋云）一起到江阴乡下和京沪线一带农村搞武装斗争。由于蒋介石疯狂镇压革命，迫使江苏省委转入地下活动和分散隐蔽，我们又搬了几次家，最后搬到闸北（那时称中国地界）和穷苦的工人住在一起。从此，松寿就在工人中间开展活动，一天到晚穿了一身工人装（青短衫），一边做工，一边发动工人组织起来和反动派斗争；我帮大家洗洗衣服，做做针线活来糊口。

蒋云长得矮墩墩的，比较胖，人不算高大。在上海时，他一个人住亭子间，有时要到我家来吃饭。蒋云被捕后，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他

写一封信来，说“我已被捕，不日要押南京，请买一些酱菜来。”当时我们没有钱，当掉了一大包衣服，得了5元钱。我们用3元买了一罐头牛肉，一罐头酱菜，一罐头熟肉，两只大面包。朱松寿带了东西，一个人去探监。蒋云正在理光头，因为有人监视着，他俩没有说什么话。不久就被押解南京，以后被敌人杀害了。

1932年1月28日，中日战争在上海爆发，闸北区成了战场，我们就搬进租界，住进了一间小房子（由于战争有的居民已逃难出去了）。不久，我生下第三个孩子，叫梅芳，松寿自己接产。他很喜欢有一个女孩子。因为战争，松寿停止了去外地活动，在家服侍了我一个月。梅芳在全国解放后参加工作改名叫朱远。

1932年至1933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对上海地区的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关押和屠杀，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只得隐姓埋名，瞒过敌人的搜查。松寿化装成苦力，一天到晚出去做苦工，挣钱维持家庭开支；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托松寿的堂侄子朱幼臣秘密去乡下云亭季庄，到他三姐那里捎个信，设法搞点钱带到上海来给我们开支生活费。松寿的三姐胆大能干，她村上有许多农会人员，她的大儿子也跟着地下党闹革命去了。1934年冬天，我又生了第四个孩子，叫雪芬，也就是松寿和我的第二个女儿。我们的生活更苦了，松寿的三姐来上海，看我们实在难以过日子，就对松寿说：“阿弟，我看你们在外边这么苦，有家回不得，妹子（指我）身体又不好，我来来去去的也会引人注目，对你们也危险，就给我一个孩子，让我带到乡下去，抚养在我家里。”于是，三姐就将我们不满两岁的大女儿梅芳带走了。剩下四口，我们千方百计活下去，松寿还是在外做苦工，我也帮人家洗洗衣服，倒倒马桶，做一点针线活勉强糊口。

1935年8月，松寿在外滩马路上拉板车，突然给梅仁焕（即梅光迪）碰到了。梅问：“怎么拉起板车来了？”松寿说：“没有办法，要养活孩子、老婆，只好做苦工。”梅对松寿说：“你跟我走，保证你没有危险。”后来梅和松寿到了家里，关照我有困难去找乡下三姐商量，就离开了家。当时我不知道梅已叛变，只知道他们过去私人关系比较好，所以没有意识到松寿已经被捕。

过了三个月，松寿回来对我说，他在镇江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十六元，要我带孩子也去镇江，并讲好在车站接我。说完，松寿就走了。

我很高兴，把家里整理好，就带了两个孩子由上海乘火车去镇江，松寿果真在车站接我们。当时没有房子住，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松寿找到了一间小厢房（相当于上海亭子间大小），我们住了进去。松寿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员。我问他：“你干什么？”他说：“买菜，烧饭，当伙夫。”这时我才像大梦初醒一样，知道松寿是被软禁了，我们已受人监视了。从此，我们不和家人接触。松寿回家闷不吭声，只是埋头干活。后来，国民党有几个官要叫我帮他们烧饭（包饭），一个月给我几元钱。为了帮家里人糊口，我就答应了。到镇江一个多月后，松寿又把寄养在乡下三姐那里的梅芳领了上来。他说：“即使有危险，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那时候，松寿为什么能当伙夫，表面上看，好似自由一些，这可能是松寿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吧。就这样，我们在镇江度过了两年的软禁生活。

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了，接着又爆发“八·一三”淞沪战役，日军大肆进攻中国。当时我们看到省党部里那些国民党的官员，都非常紧张，在我们住的那个大院里，已陆续搬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和一个单身户的小公务员。

我们待到九月份，国民党省政府都撤光了，松寿就带了我和三个孩子离开了那个不自由的天地回到了江阴，暂住到云亭季庄三姐家的村子上。

松寿孤单一人回到了战斗过的家乡，很多老百姓都很高兴，说松寿又回来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了。松寿经过了解，过去一些老农协会会员，有的被国民党打死了，没有死的也逃离了家乡，不知去向。可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要在中国土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俄国看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人民是那样的自由，不受任何恶势力的欺侮。他常说，中国老百姓也要像俄国人民一样有自由。所以，当他一踏上家乡这块战斗过的土地，家也顾不上安置，就整天在外奔走，联系过去的地下党员和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会员。松寿以这些同志为骨干，在周庄龙潭庵等地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组织工作；发掘过去暗藏下来的枪支弹药，并到敌人手里去夺武器。松寿回来只有四个月，影响就很大了。不知那个汉奸去城里告密，一个大队的日军骑着马赶到季庄捕捉松寿等人，结果扑了一个空，撤走时就在村

子里杀鸡、杀猪，烧家具，干尽了坏事，晚上还叫老百姓扛了猪、挑了鸡送到城里。自从那次日军来搜查后，松寿干脆就扛起抗日大旗，加紧活动，后来又找到了长寿的吴之卿（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积极建立抗日游击队，前来投奔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参加共产党的队伍。

1938年春，我们从季庄回到了逃离十年之久的松寿老家长寿朱家巷。回去一看，后面第二、第三进的厅屋，在1928年给长寿反动商团拆得精光，留下了一堆堆碎砖废瓦；前面三间的牛棚屋留给他妈妈住的，据几个姐姐讲，妈妈眼望她和爸爸一生勤劳积蓄盖起来的房子被拆光，气得昏了过去，从此一病不起，又担愁独生儿子在外的安全，一二年后就病愁而死。她的棺材一直浮厝在坟地上，达十年之久，由于是“共匪”的家属，谁也不敢处理。空空三间破房，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看了这凄凉景象，不由得掉了泪。可是松寿半句怨言也没有讲，好似十年家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3为了尊重当地风俗，并尽对老母的孝意，以及他四个姐姐的劝说，松寿决定深埋母亲的灵柩。村子上一些老辈和小兄弟都来帮忙，了结了老人的一生。通过这次活动，松寿又借此机会招兵买马。前来参加抗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松寿他们在十八亩桥村和朱家巷村设立了临时招待难民所之后，参加抗日的人就更多了。日本人开始常来骚扰，有几次松寿带着部队出击，把日军打得躲在县城里，不敢再下乡来捣乱，因此，江阴东乡一度很太平。那时候，我将一个出生四个月的女孩秀芬寄养在附近杨家桥村上一个农妇家，余下三个孩子送往上海，叫我妈妈照顾，我就随着松寿流动，有时帮助他处理一些接待事务，当时随身警卫有陆富全等忠实可靠的同志。

1938年四月，抗日队伍发展到一千余人，松寿没有忘掉党，急着要寻找上级组织，以便听从党的指挥。松寿派吴之卿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就在这关键时刻，给那些地方上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官员高明澄等人钻了空子。国民党委任松寿为忠救军第五支队司令。松寿知道上当，就将计就计，向他们要一千余人的军粮，以维持部队的吃饭问题。同时，又马上派人再去寻找党的关系。

就在这时，上海国民党派来了一名特派员，名叫袁亚承。松寿知道袁亚承是军统特务，阴险奸猾。但是松寿想，现在是讲抗日统一战线，只要他从民族利益出发，以抗日为重就行，没有坚决回绝。可是，松寿

的估计错了，袁一来，就暗里拉帮结派，玩弄阴谋，争夺兵权，削弱松寿的权力，终于在六月底在拦干桥将派往常熟去运取枪支弹药的吴之卿等五人打死，出现了第一次流血事件。松寿引起了警惕，把亲党的基本队伍拉在自己身边，将司令部转移到离长寿十里的邬墩村。那里地形好，离市镇远，情况也能及时收听到。当地的农民很支持和靠拢松寿。可是袁亚承本性不改，仍在阴谋篡夺兵权。

1938年9月，袁亚承离间部队的中层领导和制造战士之间的矛盾。一天晚上，司令部内发生战士之间冲突而开枪动武，袁阴谋在混乱中打死松寿，以夺取部队全部领导权。因为我们对袁早有戒心，所以晚上不住在司令部。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塘湾里，当听到邬墩方向有枪声，松寿预感到袁有可能搞兵变，立即拉起队伍向西撤。果然，袁指使他的亲信追赶上来。我们边打边走了十里。袁的部队中也有松寿的人，听说前面是松寿带的队伍，知道追错人了，有的就回去了，有的也不追了。在撤退中，我也摔伤了。后来听说，回去的人，给袁打死了几个，有的不愿跟袁走就开小差回家了。好端端的一支抗日队伍，就这样给袁亚承搞垮了。一个月后，我就回上海照顾孩子去了。

松寿仍回到江阴。他后来如何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活动，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他整整一年没有回过上海。直到1940年快到春节了，他才回到上海家里来看望我们。他高兴地告诉我，他曾去安徽山里见到了项英。他们是在俄国认得的，在上海曾一起共过患难。松寿去安徽的路上，步行了一个月，在那里住了十多天，他俩住在一个房间。项英对松寿讲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新四军战斗的情况，他要松寿坚持在苏南从事抗日斗争，扩大统一战线，继续发展抗日武装和游击区，牵制住日军的侵略。项英还开玩笑说，“老朱，你看我剃了光头，蹲在山沟里，像不像和尚修行。”告别时，项英给了松寿二十块银元作路费，送了一些抗日书籍，还照了不少相片。可惜，这些相片和抗日书籍由于路上关卡检查严，都烧掉了。到家时，口袋里还剩下四块银元，交给我保存。1949年我的第二个儿子国强去南京考军大，我把那四块银元给了他当路费。

松寿在家休息了三天，又风尘仆仆，冒风险，顶恶浪，回到了苏南农村。或许是因为他找到了久离的组织，这次离家他特别高兴，我也为他高兴。他临走的时候，我说：“你没有重要事不要回上海。”因为当时

的上海滩太黑暗了，特务横行，汉奸仗势欺人，清洪帮流氓到处敲诈勒索，外国的捕头、包打听更是无恶不作，天天有绑票、暗杀，真是暗无天日。我只希望松寿在乡下早早将日本鬼子打出去，好过太平日子。我感到，松寿跟部队走，是最安全的。

1940年12月底，松寿又回到上海。快要过春节了，松寿也无心在上海过一个全家团聚的年，不声不响的离开了上海，又回到了他那念念不忘战斗的故乡。

谁知道松寿这次的离家，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和我、和他的儿女们竟成了最后的永诀，那时我们最小的男孩鸿良才四个月。我们是在上海看到当时的申报登出了松寿被害的消息。

松寿从参加革命起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于1941年5月牺牲，年仅四十一岁，战斗了十七个春秋。松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襟怀坦白，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他革命思想坚定目光远大，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为革命事业他抛弃了私利、家庭和孩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影响了部队广大官兵，使他们打成一片，团结战斗。他和群众心连心。他爱人民，人民也爱他。当他被杀害的消息传布开来时，苏南地区的人民为松寿洒泪，咒骂那些杀人的魔王。敌人害怕松寿，更害怕人民向他们讨还血债。松寿被害那年，敌人放出许多谣言，集中一句话，就是说“朱松寿没有死”。是的，松寿的革命精神没有死，他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永远怀念他。

1986年8月21日

朱松寿生平大事年表

徐泉法

1900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十六），朱松寿（又名朱寿华）出生于江阴县长寿镇（今属江阴市周庄镇）朱家巷一户富裕农家，上有四个姐姐。父亲朱景春，字文魁，登仕郎候选县佐，国学生。母亲姓张，本镇十八亩桥大户之女。

1918年，在父母亲安排下，朱松寿与早些年定亲的周庄刘长巷刘喜康第三个女儿刘三妹结婚，1920年刘三妹生下女儿朱露英。

1923年，朱松寿与刘三妹解除婚姻后，娶沙洲常安镇姑娘杨绮云为妻，第二年生下长子朱鸿坤。

1927年3月下旬，朱松寿参加江阴县农民协会举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地点在励实中学，一起学习的共有40多名农运骨干，学习时间两周。

6月，朱松寿由陈叔璇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记载：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明确规定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方能当选。朱松寿是中共六大代表，他的入党时间应在1926年11月以前。

9月13日，朱松寿、陈叔璇等率领农民数百人，前往长寿惩办土豪劣绅陈祥安，遭到打手伏击，农民重伤6人，轻伤20多人。

11月15日，朱松寿参加后塍第一次农民暴动，因奋勇冲杀在前，受到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的注意。12月中旬朱松寿在朱家巷家中被捕，江阴县委为营救朱松寿等人，于12月21日发动第二次后塍暴动，救出朱松寿等被捕人员。

1928年1月上旬，朱松寿在中共江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江阴县委委员，并兼任江阴农民革命军南路司令。

1月30日，朱松寿参加顾山周东庄暴动，农民革命军五六十人冲进

大地主周士仪住宅，将周家田契、单据全部烧毁，周士仪在暴动中受伤潜逃。

2月26日，朱松寿参与领导杨舍农民暴动，700余农民投入战斗，攻克杨舍公安分局，缴获一批弹药，占领缉私盐局，得款2万余元。

3月21日，朱松寿、茅学勤等领导3000农民发动峭岐暴动，攻占北峭岐大地主徐习吾的庄园，把徐家粮食、布匹、衣服等物分发给贫苦农民群众。

3月30日，江阴县委发动第三次后塍暴动，朱松寿与茅学勤在暴动前线负责指挥。3000余农民奋战10多个小时，终因弹药短缺而失败，农民牺牲50余人。

5月，朱松寿与蒋云秘密赴苏联首都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朱松寿代号46号，蒋云代号94号。

6月，长寿土豪劣绅陈祥安带领自卫团拆毁了朱松寿住宅大部分房屋。受此惊吓与折磨，朱松寿前妻刘三妹患上重病，在绝望中于1931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十八）自杀身亡，是年33虚岁。

7月，中共六大结束后，朱松寿与蒋云等代表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军事训练，为期一个月。学习期间，朱松寿在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受到苏联军事教官和代表们的热情赞扬。

冬，朱松寿担任中共南通特委委员。1929年7月，担任中共如皋县委委员。1930年3月，担任红十四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

1930年10月，朱松寿担任中共江阴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协助县委书记蒋云组建红十七军。1931年5月，江苏省委撤销蒋云职务和红十七军番号，朱松寿离开江阴至上海，继续从事秘密斗争。

1932年2月，朱松寿妻子杨绮云在上海生下第一个女儿朱梅芳。1950年7月，梅芳参加工作后改名叫朱远。

本年，朱松寿母亲在住宅被拆毁、刘三妹自杀等不幸事件摧残下，身患重病，不幸逝世。因独养儿子不在家，灵柩被浮厝在朱家祖坟上。

1935年8月，朱松寿在上海被梅光迪出卖被捕，被软禁镇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自此脱离党组织。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大举向南京进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官员纷纷撤离镇江，朱松寿携带妻女回到江阴，借住云亭季庄三姐

家里，着手组建抗日地方武装。

11月下旬，朱松寿在毗山松林里，阻击向江阴县城进犯的日军，打死敌人数名。

1938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朱松寿为扩大抗日武装，在长寿朱家巷借为母亲灵柩落葬名义大办丧宴，周边群众和难民慕名参加，其中许多人加入朱松寿抗日行列。

早春，朱松寿带领七八个农民混进江阴城里，袭击日军军火库，夺得一挺重机枪和12箱子弹，并顺利运回长寿。

4月初，朱松寿在江阴长寿镇上成立抗日游击队司令部，朱松寿任司令，吴子卿（又名吴志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设三个中队，又设特务中队，直接归朱松寿指挥。全部武装共有2000余人枪。

4月，在王志方、陆富全、陆步清等人的组织下，吴县乡村师范学校一群有志抗日的进步师生，前往朱松寿抗日游击队司令部，以抗日救亡剧团名义开展各项宣传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

4月中旬，受国民党官员高明澄欺骗，朱松寿抗日游击队被国民党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朱松寿任司令，忠救军总部派来的袁亚承任军事专员。

7月，中共澄锡虞工委书记何克希派张志强到澄东争取朱松寿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朱松寿当即决心脱离忠救军接受共产党领导。

7月10日，积极协助朱松寿组建抗日游击队并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吴子卿，在栏杆桥被土匪武装王炳珊部杀害，一起遇害的还有张汝明、张俊宝、黄锡春、顾浩根。

7月15日，朱松寿率领抗日武装埋伏祝塘大河颜家桥两岸，打响颜家桥伏击战，击毙日军96名，打伤数十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7月，朱松寿率部赶赴苏州外跨塘，扒去一段铁轨，致使日军一列军用火车翻车爆炸。抗日救亡剧团成员参与了这次扒轨行动。

8月，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军事专员袁亚承发动邬墩兵变，指挥该部二、三支队及地主武装1000余人袭击邬墩司令部，朱松寿率领余部退至九思街，自此，袁亚承任忠救军第五支队司令。

8月，活动在江阴西石桥的中共澄锡虞工委书记何克希至九思街，授予朱松寿余部7个连1个排武装为“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简称

“民抗”，任命朱松寿为司令，张志强为政治部主任。

9月，袁亚承纠集忠救军第五、第十两个支队2000余人进攻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民抗”寡不敌众被打散，余部120余人跟随正在侦察东进已进入澄东地区的新四军老二团一营一起行动。

10月，朱松寿及余部包括梅光迪部一起跟随何克希至茅山，陈毅亲自授予朱、梅两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番号，梅光迪任司令，何克希任副司令，吕平任政治部主任，朱松寿受命继续收集旧部。

1939年6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抗日，朱松寿随江抗行动，在祝塘镇协助叶飞指挥江抗一举击溃袁亚承为司令的忠救军第五支队。

8月下旬，江南抗日义勇军队伍扩大到5000余人，江抗总指挥部对部队实行统一整编，原新四军六团三营、原周嘉禄部和原朱松寿部组成江抗五路，朱松寿任司令，梁金华任副司令，夏光任参谋长，张志强任政治部主任。

冬，朱松寿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向副军长项英汇报组建抗日游击队以来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要求留在军部工作。项英鼓励他回到江阴继续抗日。

1940年6月，朱松寿在江阴澄东地区再次组建抗日群众武装，9月，谭震林授予“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番号，简称江阴民抗，下设3个大队，朱松寿任司令，杨行方任副司令，包厚昌任政治部主任，王明星任参谋长。

9月，璜塘据点日军偷袭长寿十字坝，企图抢夺江抗后勤机关在村上制造的军衣。朱松寿指挥正在村上负责保护军衣的江阴民抗突然出击，打垮了日军的进攻。

9、10月间，江阴民抗在龙砂山北麓朱家桥遭到7个据点日军的包围，朱松寿指挥民抗战士分散突围，两天后在长泾镇附近集合，民抗未受重大损失。

10月，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谭震林通知包厚昌回到司令部，协助朱松寿对江阴民抗进行整训，以提高民抗的战斗力。

11月初，江抗东路指挥部在华墅中学大操场上宣布成立三个纵队，从这时开始，江阴民抗分期分批上升到江抗和新四军正规部队，朱松寿被委为江抗东路指挥部副司令。

冬，中共长寿区委领导的长寿区常备大队成立，余炳德任大队长，

自此离开朱松寿独立工作。1942年7月被日军逮捕，余炳德宁死不肯投降，1943年清明节（4月6日），被残酷杀害在无锡日军宪兵司令部。

12月，朱松寿遵照江抗东路指挥部继续扩充新兵的指示，离开江阴到了上海。以后，他三次去吴县陆墓，动员杨筱南脱离忠救军，与新四军合作抗日。1941年5月，朱松寿被袁亚承派遣的两个行动员暗杀于陆墓三千浜村附近的麦地里，时年41岁。

1972年8月19日，江阴县革命委员会下达《对历史反革命朱松寿的处理决定》，错误地将朱松寿定为历史反革命。1978年12月6日，江阴县革命委员会颁发“澄革落〔1978〕第52号”文件，撤销县革委会1972年8月19日对朱松寿的处理决定。

1984年1月，中共江阴县委党史办向县委、县政府上报《关于朱松寿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朱松寿在三个革命时期的革命功绩。1985年3月15日，江阴县政府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江苏省政府。4月9日，省政府郑重颁布48号文件，追认朱松寿为革命烈士。

1987年2月，中共江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烈士传选辑》，发表徐泉法撰写题为《从农暴英雄到抗日志士》的朱松寿烈士传。这是首次为朱松寿烈士立传。

1989年3月31日，江阴市暨长寿乡政府在毗山南麓隆重举行“朱松寿烈士纪念碑”揭牌仪式，市委副书记翟怀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肖国衡等党政领导、烈士亲属50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纪念碑正面、背面文字分别由江苏省政协主席包厚昌、江阴市政协副主席黄亚蒙书写。

2013年2月8日

后 记

朱松寿烈士是江阴市著名革命烈士，一生革命活动横跨江阴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斗争事迹极其丰富，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他的革命牺牲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弦。我们把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写成朱松寿传记，尽到了一个党史和文学工作者的义务与责任，当这部传记出版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快乐与欣慰。

在征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江阴市党政机关和方方面面的关心鼓励与帮助支持。原中共江阴市委党史办公室历任领导许鼎贻、程以正、田柳、李正昌、奚国良及同事潘明清、唐麒、赵谷怀、王国中都热情支持本书的写作，提供写作所需的各种资料以保证写作的顺利进行，蒋振庠抄写了全部书稿。朱松寿烈士夫人杨绮云和他们的儿女朱鸿坤、朱梅芳（朱远）等提供了烈士大量生平资料，朱远还提供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历史照片，年近九旬的长子朱鸿坤和朱家重外甥辈亲属许鑫、程金坤、程金余等给予了许多真诚的帮助。本书作者之一的徐泉法，在1990年4月26日前往周庄镇龙潭村采访了朱松寿与前妻刘三妹的亲生女儿朱露英，她讲述了父母的悲剧婚姻，并提供了相关重要资料。1996年9月21日，朱露英逝世，终年77虚岁。1997年8月26日，杨绮云逝世，享年93虚岁。对她们母女俩的不幸逝世，我们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表示深切的哀悼。

照片拍摄和收集由徐泉法负责，“附录”部分由徐泉法收集、编辑和撰写。

朱松寿烈士革命活动资料，主要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战斗的上级领导和革命战友提供，他们是何克希、包厚昌、张志强、夏光、陈挺、张鏊、王征明、顾复生、于玲、陈伟斯、王楨、朱觉、李关玉、王燕浪、顾肇基、唐玉华、尹学成、归行肇、王兴、路云、徐彬、王志方、陆富

全、周德明、陈浩、曹文熙、潘力、陈士林、张雁、徐元、梅坚、严启文、严猛、吴增颖、陆天如、缪金洪、蒋福才、汤鸿祥、张厚生、赵金宝、项全宝、赵汝惠、沙子健、汤阿唐；还有一部分资料是由知情人士提供的，他们是庄祖方、钱耀淮、沈林望、钱素琴、耿汝娣、耿忠义、耿忠刚、金子芳、徐利生、杨富全、徐明元、龚天明、须阿坤、袁生和、邬福清、金良、刘培玉、刘吉成、刘佛庆、吴阿积、陆林才、程光国、黄洪福；省、市和乡镇党史工作者肖迪、张衡、储宴宴、陶炳才、常浩如、黄忠、黄瀛舫、瞿涌晨、李瑞安、陈和、陈元、张士成、洪桦、王同尧、陆天兰、郁荣生、郁荣坤等，给了作者许多指导和帮助；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刘德喜教授，把他收藏的重要图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邮寄作者参考；此外，作者还应用了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及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常熟、张家港、南通、靖江、如皋等史志、档案部门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文章，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中共江阴市委、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市史志办、市民政局、市档案局、周庄镇党委、政府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包厚昌、徐振东、王辅一、范敏若、徐慧征、毛微、杨玉伦、富耀南、程彤光、朱昱鹏、翟怀新、王伟成、姜宪、李兴、鲍品怀、蒋惠平、孙一青、周寿福、庄正荣、黄迈、陶青、周玫、李中林、李建华、耿永才、於中青、杨晓红、何国荣、朱进良、赵翠珍等领导和同志们给我们多方面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上述诸单位和各位革命前辈、机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及史志界同仁表示最真挚、最诚恳的感谢。

本书是一部党史纪实文学作品，主人公朱松寿以及书中写到的许多英雄人物，都是真实可信的，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坎坷命运，他们对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都实实在在存在过。但是，由于作者史学、文学水平局限和历史资料的收集无法最后穷尽，因此难免存在诸多不足甚至错漏，诚恳欢迎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史专家批评指正。

徐泉法 陆其明

2012年12月